



#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记忆的政治

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  
的、革命话语的体系化建构。  
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反复重述，  
党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周海燕◎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记忆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Memory

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政治学教授

通过展现一场著名政经运动的建构与再建构，《记忆的政治》透视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该书堪称学术著作之典范：言其肯綮，察其关键，思之明悟，读之愉悦。

**史明**

**Nicola Spakowski**

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历史学教授

周海燕厘清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权力和话语在其间相互纠缠的关系，……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确证了一个堪称精湛的解释框架。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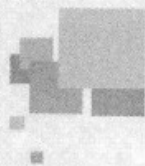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34-979-7



9 787802 349797 >

定价：48.00元





The Politics of Memory  
**记忆的政治**

周海燕◎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的政治/周海燕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80234-979-7

I. ①记… II. ①周…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3714 号

书 名: 记忆的政治

著作责任者: 周海燕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979-7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mailto:bianjibu16@vip.sohu.com)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 推荐语（代序）

就当代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研究而言，周海燕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著作，有着杰出的贡献。关于党治如何掌控民众对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忆，周著阐明了它的基本模式与诸种内涵，其意义远超个案研究。

这一运动的过程，是关于威权统治与政权合法性的宝贵课程——对毛时代的中国如此，对后毛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是。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政治学教授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运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战争中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模式，后来成为战后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然而，我们对这场运动知之甚少，甚至于那些我们笃信不疑的事实，也不过是在宣传“南泥湾精神”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诸种神话的一部分。

周海燕的著作改变了这一状况，她用关于政体合法性和记忆政治的分析框架，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党是如何将“南泥湾精神”作为政治工具和政治建构，以动员民众达成诸种目的的过程。

从三五九旅，到英雄的模板化、政治口号的创造，再到历次唤起“南泥湾精神”的热潮，直到当下作为商业工具的“红色旅游”，周著还延展了南泥湾的完整叙事。

通过展现一场著名政经运动的建构与再建构，《记忆的政治》透视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该书堪称学术著作之典范：言其肯綮，察其关键，思之明悟，读之愉悦。

——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历史学教授Nicola Spakowski（史明）

以社会记忆和话语分析理论为基本框架，围绕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及其后形成的各类叙事文本作话语分析，周海燕厘清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权力和话语在其间相互纠缠的关系，并对大生产运动及其相关记忆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解读。

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作者确证了一个堪称精湛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大生产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救因经济困难而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所做的战时应急性政治动员，同时也是运用“劳动”手段对人群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控制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情深”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等核心语义代码，是如何建构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论</b> .....	1
1. 南泥湾叙事：记忆建构与认同塑造 .....	2
2. 话语、社会记忆与权力：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路径 .....	12
3. 大生产运动：既有结论与“再发现”的可能 .....	23
<b>第二章 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b> .....	35
1. 厚土之上的凋敝古城 .....	36
(1) 征战之地 .....	36
(2) 地理、经济与社会发展 .....	38
2. 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制定与民众认同 .....	42
(1) 认同聚合的基础 .....	43
(2) 政治动员、民众参与与基层组织建设 .....	47
(3) 意识形态的输入 .....	51
3. 繁荣下的危机 .....	55
(1) 公粮危机 .....	56
(2) 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	61
<b>第三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危机下的紧急政治动员</b> .....	73
1. “大生产运动”的提出与神圣意义的赋予 .....	74
(1) 边区危机的真实起因 .....	75

(2) 政治议题的神圣性赋予与认同建构 .....	82
2. 议题的政治动员 .....	87
(1) 劳动竞赛：规训与激励 .....	88
(2) 典型生产：红色偶像的诞生 .....	93
3. 红色符号体系的形成 .....	100
(1) 红色民歌的符号生产 .....	101
(2) 秧歌剧中的符号生产 .....	114
(3) 延安木刻中的符号生产 .....	119
<b>第四章 南泥湾精神：核心记忆代码的形成 .....</b>	<b>133</b>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 .....	135
(1) 两场战争和一条出路 .....	136
(2) “自己动手”：从“出路”到“道路” .....	138
2. “组织起来”的记忆 .....	142
(1) 改造二流子：游民规训与惩戒 .....	143
(2) 变工与扎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声 .....	152
(3) “生产一整风”双重规训：知识分子的道路 .....	158
3. “鱼水情深”的记忆 .....	166
(1) “拜师” .....	166
(2) “纳谏” .....	168
4.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 .....	172
(1) 领袖干部的生产传奇 .....	172
(2) 家国同构的红色叙事 .....	176
<b>第五章 模范是如何塑造的 .....</b>	<b>185</b>
1. “南泥湾政策”：鱼水情深的屯垦传奇 .....	188
(1) 从“烂泥湾”到“南泥湾” .....	189
(2) 三五九旅的集体人格塑造 .....	192
(3) 生产与战斗，不朽的神话 .....	200
2. 吴满有方向：首个“典型人物”的诞生与遗忘 .....	204
(1) 谁能成为“吴满有” .....	205
(2) 翻身、感恩与革命 .....	208
(3) 被符号化的吴满有 .....	213

(4) 记忆的系统性剥夺及其民间抗争·····	218
3. 赵占魁运动：工会整风中竖起的红旗·····	222
(1) 清查“坏分子”·····	223
(2) 发现“好人”赵占魁·····	230
(3) 新式劳动者的政治人格塑造·····	234
(4) 整风中的思想改造与社会记忆重构·····	238
<b>第六章 话语即权力：大生产记忆的三次重构·····</b>	<b>251</b>
1. “人定胜天”：1960~1966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 记忆话语分析·····	255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59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266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272
2. “到农村去”：1970~1978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 记忆话语分析·····	278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81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285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294
3. “艰苦奋斗”：1989年6月~1996年的《人民日报》 大生产记忆话语分析·····	295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297
(2) 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301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305
<b>第七章 作为地理实在的南泥湾：红色记忆与中国现实·····</b>	<b>315</b>
1. 空间叙事中的红色记忆建构·····	318
(1) 精心复原的“革命遗产”·····	320
(2) 被安排的叙事史·····	324
(3) 行动者的四种模式·····	329
(4) 生产劳动体验教学：一次完整的记忆建构·····	335
2. 村落记忆与中国现实·····	339
(1) 饥饿、生产与斗争·····	340
(2) 三次“新农村建设”的记忆·····	347

(3) 分裂的村庄 .....	352
(4) 红色记忆经济学 .....	359
<b>结论 大生产记忆与中国道路 .....</b>	<b>369</b>
1. 作为战时紧急政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 .....	371
2.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大生产运动 .....	373
3. 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 .....	375
<b>参考文献 .....</b>	<b>382</b>
<b>后记 .....</b>	<b>393</b>



## 第一章 | 导论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大卫·奥威尔

## 1 南泥湾叙事：记忆建构与认同塑造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这是中国8年抗战中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一年——从豫南会战开始，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会战，在8年的22次大会战中占了近1/4。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由于在兵力投入、财政支出等各方面意见不一，合作关系渐趋恶化。

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战争中的兵力投入差距和相互配合不佳所导致的争执，以及争夺抗日战争中的话语权、对地区的控制权等等，但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由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因供给严重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是双方争执的重要内容。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原为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所辖区域，国共合作之后，1939年9月，这个地区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所辖者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延水等共26个县市。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带，干旱少雨，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农牧业交错经营的生产方式。由于明清两代大力垦荒，开发过度，“虽悬崖偏僻，天地不废”<sup>[1]</sup>，形成了过度垦荒以获取粮食的耕作模式。这种耕作模式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导致当地水土流失严重，森林和草原迅速消失。

自清末以降，战乱频仍，陕西人口骤减，尤其是农业人口总数下降至为剧烈。在延安市，至红军进驻前，人口仅约在3000人左右。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各界压力之下明确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次年的1月13日，红军迅即进驻延安，将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此后，延安人口迅速增加。除去进驻的部队士兵、机关干部和学生外，仅市内居民人口就上升

到 14000 人<sup>[2]</sup>。到 1939 年 9 月，下辖 26 个县市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其辖区人口已经达到近 150 万，此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耕地总面积为 862.6 万亩，即人均耕地约 5.7 亩。

土地虽多，却极为贫瘠，且乏人耕种，边区粮食产量并不丰裕。1937 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粮食总产量为 110 万石，1938 年的粮食产量则为 130 万石<sup>[3]</sup>。以 1938 年秋打下的粮食总量除以 1939 年的人口数量，边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0.87 石，即 140 斤左右。

农业之外，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商业和工业也处于极度落后的地位。此地偏居西北，工商贸易以盐业出口为主，以此来换回必需的其他日用品，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抗战早期，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很快提出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1937 年 1 月 25 日，也就是进驻延安后仅 12 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就红军的经费开支问题致电潘汉年，要求向蒋介石转达每年拨款 120 万元作为红军的伙食、薪饷等项开支的要求<sup>[4]</sup>。经双方反复磋商，最终以 4.5 万人的编制发饷。但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军饷入不敷出。中共中央曾经在 1938 年、1939 年多次就八路军的军费问题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为人员已达 50 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提供军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补给物资<sup>[5]</sup>。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这期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命脉，可说完全有赖于外援的多寡。

从 1939 年开始，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国民党频频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战”，并于 1940 年冬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军用物资，声称要“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声言将断绝对于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实行全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使得边区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时局变化以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延安等地人口骤然增加，据统计，1935 年，红军到达陕北时人数约为 5000 ~ 6000 人左右<sup>[6]</sup>。至 1939 年，八路军留守部队人数为 9000 人左右<sup>[7]</sup>。

1940年，据杨尚昆回忆：“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sup>[8]</sup>也就是说，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人。

到1942年，延安的党政干部总数达到1.2万人，军队人数在10万左右。而仅仅一年以后，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增至3万人，而延安市民则只有1万人。较之1937年，延安人口增长了近17倍<sup>[9]</sup>。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非生产人口的增加，而原因则是毛泽东急于扩大实力与蒋介石抗衡。在这一点上，强调“精兵简政”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之意见相左，曾发生极大分歧。

由于军队、干部、学生等非生产人员迅速增加，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1940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0年的9万石。即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为了保证粮食供应，1941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4%，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是1939年实际征收量的4倍、1937年实际征收量的14倍<sup>[10]</sup>。出产寡，而食者众，必然导致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紧缺和物价上涨。短短4年里，边区物价涨幅超过15倍，物价指数从1938年的143.1上涨到1941年的2228.9<sup>[11]</sup>。负担的加大和物价的飞涨，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

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人实际上是有所觉察和准备的。早在1939年（即民国二十八年）2月2日，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sup>[12]</sup>为解燃眉之急，毛泽东明确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制定生产计划，增加自给能力。但是，这个阶段，整个陕甘宁边区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在内，并未充分认识到生产自给的重要性和迫切程度。不久，自给生产实际上就已趋于停顿。

外援既已断绝，内需又日渐增长，到1940年底，边区已经到了极为艰困的时刻。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描述



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sup>[13]</sup>

在朱德的考察和推动下，1941年春，王震率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这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有关的历史叙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故事之一。

经过3年大会战式的垦荒运动，三五九旅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南泥湾发生了巨大变化，时称“陕北好江南”。到1943年，三五九旅已经垦荒10万余亩，生产粮食1.5万余石，不仅种上了陕北少见的水稻，饲养了成群的猪、羊等牲畜，还成立了大光棉纺厂，从向百姓借的一架旧织布机和向商人赊的一捆纱开始，发展到拥有800多名工人、108台机器，能够生产200多种产品的大型纺织厂，解决了部队的被服供应问题，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

在三五九旅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和部队以及其他地区相继开展“大生产运动”，秉承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各边区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学生都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救行动，农民们也在政策的鼓励下积极开荒放牧，边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好转。

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以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独特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一章：它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在这次生产运动中，除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各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垦荒地之外，仅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就垦荒达330.1万亩。到1945年，边区耕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425.6万亩，较1937年增加了563万亩，此时，边区人口总数为160万人，人均耕地达到了8.9亩<sup>[14]</sup>。

伴随一系列代表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数字的，是一系列为人们所熟知的、近乎传奇的革命故事：毛泽东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三五九旅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进军南泥湾；王震聘请71岁农民为“生产教官”、“烂泥湾”三年变成“陕北好江南”；毛泽东亲切看望7岁纺纱能手小吴萍；流浪工人赵占魁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二流子申长林被改造为劳动模范……随着这些故事的反复铺陈言说，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如“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起来”以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也被广泛传播开来。

纵观这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不可忽视的，是中共中央所采用的一系列宣传手法和动员手段：利用发布政府文件、工作报告、新闻报道、大会动员、劳模表彰、标语宣传、街头诗歌、秧歌剧、活报剧、大合唱、戏剧表演、木刻创作、小说、剧本乃至拍摄电影纪录片等多种方式，一向擅长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动员了干部、战士、学生、工人以及边区农民乃至无业游民，使其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并且还在此后的一次又一次生产建设中让这段记忆不断在人们的脑海里被唤起和固化，使“大生产运动”在此后的数十年内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在1957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生产建设运动中，通过对大生产运动中若干历史事实有意识的不断选择、重构，“南泥湾精神”以及它所依托存在的一系列传奇故事，与此前的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万里长征，以及此后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一起，成为国人关于中共创业史的社会记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up>[15]</sup>。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时值大生产运动中后期的1942年2月1日，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sup>[16]</sup>。5月23日，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总结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sup>[17]</sup>，延安文艺界开始了一场批判和清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延安文艺运动”，随之以鲁艺、抗大师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转向使用“民族形式”表现现实主义题材，进行文艺创作。同时期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他们结合现实进行创作最重要的内容。1943年，贺敬之和马可为秧歌舞《挑花篮》创作了歌曲《南泥湾》，歌颂三五九旅开荒生产，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类似的作品如1943年鲁艺教师王大化、学生李波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被评选为劳动模范的美术家王式廓同年创作的木刻作品《改造二流子》，由袁牧之、吴印咸等带领的延安电影团1942年拍摄、1943年播映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都是当时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使用“民族形式”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尝试。《改造二流子》、《烧炭组画》等后来还曾经被周恩来带到国统区进行展览，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产和生活。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承担

了传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的任务。

罗兰·巴特曾为“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赋予“神话”的定义<sup>[18]</sup>，大生产运动的种种“神话”，正是通过柯文所说的“即时神话化”的过程<sup>[19]</sup>，由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边区艺术作品和政府工作报告、党的文件、报纸新闻、口号、标语、民谣等宣传大生产运动的有效载体而广泛传播，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文件会被湮没，报告会被遗忘，新闻终将成为旧闻，但正是这些文艺作品使得一系列被我们称为“南泥湾精神”的、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被牢固地保留至今。

国内外一批学者如金观涛、刘青峰、施拉姆、马克·塞尔登等学者均指出，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威，并且以此为基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式道路”<sup>[20]</sup>。但是，要保证一个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经济上有所建树是基本前提——经济崩溃的政权不可能维持其长期和稳定的统治。因此，“中国式道路”不可能只仅仅包括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因此，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何时形成自己关于经济建设的系统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经济方面的思考呈现出照搬外国理论，缺乏实践经验、难以与现实情况结合的特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王明等人，均曾就经济问题进行过系统的思考和阐述<sup>[21]</sup>。1933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查田运动”等一系列斗争中开始了自身对于经济建设的初步尝试，既有经验尤其是财政收入方面的经验以“打土豪 分田地 挖浮财”为主，还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sup>[22]</sup>。由于这些政策过于激进，在后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导致军队失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大革命失败后，在长征时期，红军面临万里跋涉、生死辗转之际，无暇也没有能力关注生产建设的问题；在延安时代的早期，中共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落地生根”，在陕北根据地尽早获得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征收”，并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和发展工商业的自由等<sup>[23]</sup>。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开始了与国民

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期间的1937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考虑到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性，执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如前所述，主要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所发给八路军的每月60万元军饷支撑财政运行。

由此可见，在1941年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sup>[24]</sup>，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有了一定关于经济建设经验的积累，但多为对苏联式经验的生硬模仿，甚少考虑这些“先进经验”与中国乡村现实的契合可能，对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际上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

毛泽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sup>[25]</sup>

对正处于艰难创业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以准军事化的模式，通过战时的高度政治动员，发动包括军队、农民、干部、工人、学生和商人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进行经济建设，迅速和有效地改变了当时边区完全依赖外援、军队衣食无着、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的局面，在4年里大大改善了边区的经济状况，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道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民众认同基础，这使得大生产运动在中共建党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边区经济崩溃，必然导致整个边区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失去边区民众的信任，就不可能在之后获得全国民众的信任；1944年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的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以及由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组成的个人考察团，就不可能看到延安蓬勃向上的一面并且传播给国内外的民众，就很难获得边区之外国内外民众的同情和关注。

在大生产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有了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sup>[26]</sup>

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对未来红色中国的蓝图中勾画了关于经济建设模式的重要一笔。其中所采取的一些激发劳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如通过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大会战”方式组织生产、实行男女集体分宿、组织劳动合作社、制定生产定额、树立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等，均在其后的多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广泛应用。

这一系列强调国家政治动员、强调高度军事化体制的生产建设的做



法，在当时是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政策，但其成就却给一直深怀空想社会主义热情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真正执掌全国政权后进行国家生产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其“成功经验”被不断复制和运用，且数十年一以贯之。虽局部因应时局有所改变，但作为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据此思路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制定生产政策、全面控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改造，以“南泥湾精神”为代表的大生产运动之影响力无处不在，直至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些潜在影响：例如对“典型”、“模范”的发掘和塑造，通过人为制造先进与后进之间的对立以创造竞争气氛，以及自上而下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进行运动式建设的方法等。

可以说，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是官方所称“延安精神”，亦即马克·塞尔登所言“延安道路”经济层面之发端，它全面和深刻地影响了6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

另一方面，正如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言：“要使过去为现在服务，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的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和想象的现实综合起来，把它们转变为集体信仰。但没有什么传统会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习俗和已有的社会实践。这些创造的传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商榷，在最初面世的时候，其意义必须有相当可变的余地。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当它被整合进民众关于过去的信仰的时候，它才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权威。它一旦被嵌入一个社会的记忆中，就代表了这个社会中的很多成员的绝对真理。”<sup>[27]</sup>——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反复回忆、重述、建构，塑造了南泥湾垦荒等一系列“神话”，它们形塑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蓬勃向上、鱼水情深、官兵平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些具有丰富解读可能性的故事文本，通过相关社会记忆在个人、群体和社会中的传递被唤起、操演、刻写和固化，并且在连续不断的重新建构中将记忆传继下去。如同耶尔恩·吕森在《危机、创伤与认同》中所指出的：“集体的认同扎根于事件的表述中，也扎根于这些事件与最终延伸到现在和将来的其它事件的叙事联系中。”<sup>[28]</sup>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为执政党“形塑”了这样的叙事传统<sup>[29]</sup>，即我们的国家和执政党与民众血肉相连、鱼水情深；我们的政府励精图治、拼

搏向上；我们的民众无限信任党的领导，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等等。它是国人集体认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生产运动”以及其被总结为“南泥湾精神”的内核，不仅仅解决了当时的现实困难，它所塑造的一系列政治符号，也成为中国人社会记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今日国家执政者自先辈那里承继而来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

笔者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思考始自早期的一些乡村观察——在近1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多次有机会加入各种采访报道团，进入到中国的乡村社会去报道一些生产典型或是其他领域的模范。但笔者发现，这些典型和模范的塑造始终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在其塑造过程中，“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或曰“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简言之，无论原来所发生的事件真实情况如何，只要它符合权力的现实需求，秉权者将通过某些仪式，例如刊登纪念文章、举办纪念仪式、建设纪念馆，上演关于这一事件的文艺节目等等，唤起民众对事件的记忆；继之，权力将通过对事实的有意识筛选，包括强调、遗忘、扭曲乃至完全彻底的改写来重构这一事件；此后，权力会通过各种手段反复刻写这些记忆，直到确定它们固化，在民众头脑中形成符合他们所需的，某个抽象的固有观念为止。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自我发问，到2006年因为“新农村建设”的再一次兴起而更为频仍。此时，由于国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旨在改善乡村社会整体状况的新一轮“新农村建设”<sup>[30]</sup>，各地都旋即开展一系列行动，来配合中央的政策措施。对此，很多人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视其为“千古未有之变”，是改变中国乡村社会面貌的重要契机。当然，也有很多人持有谨慎乃至批评的态度。

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新的问题面前，更倾向于首先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尽可能了解农民自身的意见并且进行相关的分析。在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新闻传播学院组成了“新农村建设”联合调查组，选出了中国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明星村”，探讨它们是如何被典型化和“形塑”为神话的过程。作为带队前往南泥湾的教师，我率领学生来到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有机会和当地老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甚至找到了尚健在的当年进行南泥湾垦荒的老战士，并获得了关于一些关键性资料的口述实录。就在那里，就在

“大生产展览馆”的门前，我意识到，类似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这样一些由权力话语建构而成的社会记忆，是如何形塑中国社会的问题，正是我所一直追问的“真问题”。

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①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的一系列社会记忆，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如何诞生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传播的？权力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②在这个运动中，个人或某一群体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被“形塑”为模范的？

③这些社会记忆流传至今的诸多文本的背后，真相究竟如何？有没有事实被刻意强调、遗漏和彻底歪曲？

④“大生产运动”的生产模式，是否确实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社会进程？进一步的，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它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它们会对未来中国社会继续产生影响吗？

在最初7个月里对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研究之后，我意识到，长期以来，对大生产运动历史的解读和研究，都大多依循“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这项运动的开展，使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了难关，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一些基本论点而进行，材料的考证上亦不乏可商榷之处。

陈舜卿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就已经指出：“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专论都不太多，在许多流行的教材、年表、辞书的记述中以及革命博物馆和纪念馆的介绍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待商榷的问题。”<sup>[31]</sup>

这一意见非常值得重视，但遗憾的是，在那以后的20多年中，类似的不足，在关于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的相关研究中依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研究多依据转手多次的资料而进行，并未追溯至原始材料，缺少材料上的交叉质证，更罔论研究方法上的严密论证和学术视野上的丰富多元。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决定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入手，对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运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记忆的文本（如前所述，由于大生产运动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其数量相当丰富）

进行考察，结合历史文献研究法和话语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溯源而上，梳理它们最初的形态、传播的方式，尝试描述在这一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中，权力是如何精心过滤和筛选符合其需要的内容并且完成唤起、重构、刻写和固化的过程。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我试图考察在某些重大事件和历史时段内，与“大生产运动”相关的社会记忆是如何建构而成。

本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考察“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个部分，本文以话语分析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对国家话语的代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自1946年以来出现的以“南泥湾”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章进行统计和频数分析，结合在南泥湾当地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在国家话语中的流变，进而观察和描述它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 2 话语、社会记忆与权力：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路径

前文的阐述也许能够清晰地表明，对于此一选题价值的确认，直接起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亦即是说，本选题首先是一个“问题取向”的研究，正如米尔斯所言：“研究者不要盲目地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sup>[32]</sup>

事实上，“问题取向”的研究旨趣，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之中。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开始，史家所关注的研究重点，就已经迥然有别于“一人一家之谱牒”的传统史学<sup>[33]</sup>，而转向对近现代社会变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之拷问。今天的中国研究，跨越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理论源流多有交汇，研究方法不拘一格，而最终的落脚点，都着眼于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怀<sup>[34]</sup>，这正是学术研究“问题取向”的集中体现。此中颇为值得关注的一支，是史学界、社会学界在社会史领域所作的努力。

回顾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 80 余年来的历程，不难发现，从创始者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洛赫（Marc Bloch）等人“从阁楼到地窖”的研究取向，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长时段、多维度的“总体的历史”之研究视野<sup>[35]</sup>，强调的是对社会史、经济史乃至环境史的关注，也在兰克学派之后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年鉴学派的研究重点从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叙事转向底层史、心态史、生活史、微观史等既往历史学研究更少涉及的领域<sup>[36]</sup>，而在 80 至 90 年代期间，以夏利埃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年鉴学派学者则将历史叙述文本本身置于社会语境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sup>[37]</sup>。一系列的转向背后，贯穿始终的是不断将主流历史学视为“边缘”的研究对象纳入研究视野的思想脉络，但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史研究看来，这种“边缘”绝非次要，而恰恰是试图在政治、军事及重大事件等传统“正史”之外，不断突破和寻找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史研究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史学观对主流历史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孙江的观点，8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两大特征：第一，“终结政治叙述对历史的独占权，呼唤整体的历史叙述”；第二，“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加速社会科学化”<sup>[38]</sup>。这与历史学界对以往史学研究过于受限于意识形态的痛切反思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这个时间段内的社会史研究恰恰与当时年鉴学派反对整体的结构历史以及过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关注的仍然是年鉴学派业已对其进行反思的“总体的历史”<sup>[39]</sup>。因此，在 2000 年后，一个以“新社会史”为口号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sup>[40]</sup>。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社会史”的特点，一是强调政治/事件史的阅读方法，努力跳出以往主流历史研究中政治史和社会史互为切割、相互孤立的既有解释框架，将社会事件置于重新建构的政治——社会史乃至更为广阔的多维视野中进行考察；二是特别关注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由此，社会记忆理论就成为“新社会史”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杨念群在一篇关于如何理解“新社会史”的源流的文章中指出，“新社会史”应该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sup>[41]</sup>。而孙江则认为，“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是“追

求以非目的论为可接近之目标，以意义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sup>[42]</sup>他将“新社会史”的三个目标界定为“放弃构建整体史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和“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sup>[43]</sup>。

目前，“新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如杨念群对北京民国初年的生与死的社会控制与空间转换的研究<sup>[44]</sup>，孙江、黄东兰对岳飞叙述所建构的集体记忆与国族认同的研究<sup>[45]</sup>，方慧容对土改时期西村农民的社会记忆的研究<sup>[46]</sup>，以及景军对西北地区围绕一座孔庙的社会记忆的建构的研究等等<sup>[47]</sup>，都是“新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体现。

作为“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也同时指出，这一概念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目前“尚无法明确而清晰地解释其中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它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sup>[48]</sup>。尽管如此，应该看到，无论“新社会史”这一概念最终是否能够被确立和接受，它所强调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的研究旨趣，都将给社会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本研究并不在意社会史与“新社会史”之间学术代际区隔的描述准确与否，而更加认同上述学者将历史事件置于多元维度中进行考察的史学观念。就笔者而言，这一新的社会史研究路径最大的启发在于，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其成果本身就往往是权力话语生产的结果。因此，如果将大生产运动的相关原始史料和衍生文本视为当时的记录者以及后来不断阐释的话语产物，通过话语、权力与社会记忆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分析，对权力话语所建构的历史叙事文本进行层层溯源，将有可能找到一条新的解读大生产运动之路。

鉴于选题本身立足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着眼于通过对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建构的讨论，来考察其间权力的操控以及话语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经过慎重考量，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构在两个跨学科理论——社会记忆理论以及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者选择这两个理论建立基本理论框架的理由基于以下三点：（1）社会记忆理论强调通过对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的考察，探讨权力的操纵、控制和争夺，并讨论它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2）话语分析理论重在讨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强调凸显话语的产生与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深层权力关系间的争夺。同

时，它也是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的必要工具；（3）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诸多可以融合之处：对社会记忆的研究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方式——语言，因此，对承载这些记忆的话语进行分析是必由之途，而在任何话语分析理论的应用中，也无法忽视话语建构的历时性特征，而引入社会记忆理论，恰恰可以较为深入地分析话语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并凸显其在社会实践中的特殊价值<sup>[49]</sup>。本文的理论框架的建立，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的结果。

在哈布瓦赫之前，在研究记忆的重要领域如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很少有人关注到关于记忆的社会属性。心理学家们运用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技术，设定变量，建立模型，以研究记忆的产生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变化，这种方法在形式上看似精密，但却忽视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人类社会的实际运作中，记忆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所致。因此，这些通过实验建立的模型，固然可说明记忆的个体属性，却忽略了其同样重要的一方面：社会属性。

关于记忆的社会属性的研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其重要价值。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 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使用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一些富有趣味的材料，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合法性”和“认同”是社会记忆的固化中的两个主要维度，其实质则是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对社会记忆进行保存和巩固的重要成果<sup>[50]</sup>。巴特莱特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sup>[51]</sup>。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涂尔干所提出的“集体意识”概念的基础上，首次创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其最重要的几本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新约圣地的地理叙说》以及《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指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限制。对于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作为对以往有关记忆研究的一种回应和批评，哈布瓦赫尤其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建构。他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集体记忆”这一概念重点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如何在社会中被整合的过程。他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



“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对哈布瓦赫来说，“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sup>[52]</sup>这一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内，几乎是开创性的。

在哈布瓦赫的研究基础上，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他在所著的《社会如何记忆》中研究了仪式和过往历史的重现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sup>[53]</sup>。通过对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进行的分析，保罗·康纳顿解释了“操演”在社会记忆的传递和延续过程中的作用。

此后，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相继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例如，巴里·斯瓦茨（B. Schwartz）把研究的重点置于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sup>[54]</sup>。他在关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社会记忆研究中，考察了华盛顿是如何从一个并不持有民主理念的军人被逐渐构建为民主社会理念的首倡者的记忆建构的过程，而这一记忆的建构过程，又对美国社会的变迁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sup>[55]</sup>。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集体记忆的研究进路之一，是将过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而这一建构则由当下的需要与关注点来形塑<sup>[56]</sup>。但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他特别指出，不能将现在中心观推至极端。如果是那样，则可能令人忽略历史的连续性<sup>[57]</sup>。

在“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概念之上，研究者们进一步细分出“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这两个相互对应的研究向度。

弗朗西斯科·德利奇（Francisco Delich）在《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中认为，记忆“不是事实，而是创造，是发明”。它是国家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理性选择。在简短地回溯了纳粹大屠杀、广岛核爆炸、阿根廷约一万人失踪的惨痛记忆之后，德利奇指出，记忆并非重现往日事实：“记忆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忠实重现，不如说是对自那同一个（过去）以来不断更新的重新建构。”<sup>[58]</sup>

和他类似，其他官方记忆的研究者强调考察秉持权力者是怎样通过大事件的书写、媒体的传播、教育制度、文化艺术的展示空间、制定法定节日等来操纵公众的记忆。

海伦娜·勃兰特·麦克柯密克（Helena Pohlandt McCormick）在

《“我看见了噩梦……”——索韦托起义：记忆的暴力》一书中，通过对南非索韦托起义的分析指出，种族隔离政策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暴力政治，严重地影响了个人和社会对它的反思，这些记忆被有意识地选择、被遗忘，谎言和沉默使得南非的历史记忆成为暴力的牺牲品。她特别指出，身体的暴力和记忆的暴力在极权政治中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前者对人民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并在精神上形成永久性创伤；而记忆的暴力通过“缄默、保密和操纵已知因素”，“减损或忽视参与、见证历史事件的个人的声音和行动”，建构充满谎言和欺骗的官方叙事，以制造某种或某几种公共的历史记忆或判断。同时，海伦娜还进一步指出，记忆的暴力是统治者“试图借助意识形态内化统治者压迫”的手段<sup>[59]</sup>。

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J·rn Rüsen）长期以来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对记忆与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记忆既可以为历史连续性提供素材，也可以导致历史断裂。创伤记忆造成的“灾难性危机”令常规的历史解释结构无法容纳它，历史的断裂往往会由此产生<sup>[60]</sup>。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世代更迭，新一代德国人与大屠杀事件的距离日益拉大，这种断裂出现了弥合的迹象，而其基础则是年轻一代通过代际传承的记忆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重新构成族群的社会认同<sup>[61]</sup>。

与“官方记忆”这一研究向度相对应，“民间记忆”取向的研究者更加强调作为身在民间的个体和某些小群体使用自传、日记、手抄本等私人书写记忆的方式，反抗政府的话语垄断。他们认为，再强势的政治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记忆形成和延续的全部过程，在民间的某些小范围之内，与官方记忆截然相反的记忆版本仍然可能以隐蔽的形式代代流传，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时刻，颠覆官修历史。例如，汉森（A. Hanson）在关于毛利文化的研究中，通过对传说、舞蹈等毛利文化的分析，揭示了族群是如何通过对本民族的记忆述说来对抗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侵略的<sup>[62]</sup>。

自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引入“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开始，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及政治学学者乃至文学学者也纷纷尝试使用它来进行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哈布瓦赫及保罗·康纳顿的理论框架而进行的，其中大量使用了刻写、操演、形塑等一系列关于社会记忆的重要概念。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多使用了田野

调查的研究方法。

王亚秋的论文《“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通过对知青本人的讲述、知青文学文本和公开出版的知青回忆录、通信、日记的解读，尝试剖析这种以“青春无悔”为主题的知青记忆内涵以及这一记忆模式的内在逻辑，以及它被建构的过程。进一步地，作者试图从知青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关系的层层剖析，分析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记忆逻辑之间的关系<sup>[63]</sup>。与此类似，王汉生与刘亚秋合作的论文《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知青文学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知青聚会作为一种普遍参与的操演方式，它们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sup>[64]</sup>。

景军在其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著作《神堂记忆——一项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对一个位于甘肃黄河上游的村庄进行了研究，这个村庄因为政府修建水坝而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不过，景军的研究重点确立于试图理解村庄的过去是如何作用于村民的生活的。他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考察了与该村一座“孔庙”相关的每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对苦难的叙事、复仇政治、仪式意涵的对立观点，以及针对中国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他考察了“记忆是如何通过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被表述和传达的”这一议题。同时，他也讨论了国家权力如何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追忆这一重大议题<sup>[65]</sup>。在另外一篇类似题材的论文中，他运用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描述了庙宇的重建是如何将普通的人际关系网络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sup>[66]</sup>。

陈旭清对山西民众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注意到，老人们将有关抗战苦难的回忆始终纳入“苦也高兴”、“鬼子害的”、“咱不后悔”的记忆框架之中。他指出，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老者把自己琐碎的苦上升为一种群体认同的苦感，并进而提升到对“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的分担；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诉说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者，对艰苦的诉说不仅是一种情绪性的苦感，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反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因此，对抗战艰苦的记忆有着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sup>[67]</sup>。

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社会记忆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以国人族群认同的

形成、宣称和变化为线索，透过揭示“历史”的“记忆”与“失忆”本质，来诠释“什么是中国人”。不过，作者的研究重点并非“我们是谁”，而是“为什么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因此，他的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有所区别，通过社会记忆的进路，在“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sup>[68]</sup>。此外，国内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sup>[69]</sup>《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sup>[70]</sup>《关于社会记忆与人类文明的断想》<sup>[71]</sup>《敖包、文化记忆与游牧社会——来自杜尔伯特的个案研究》<sup>[72]</sup>《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sup>[73]</sup>等，都是基于社会记忆的理论框架所进行的、关于历史中的社会记忆是如何形塑村落、族群及国家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文学研究方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许子东所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笔者通过对多篇文革小说的文本细读，归纳和总结了文革叙事中对灾难起因、灾难降临方式、拯救主题、反思与忏悔及叙事模式等诸多方面，作者由此考察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是如何通过小说而形塑和传播的过程<sup>[74]</sup>。

在以上列出的多种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中，很容易注意到的一点是，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和对所研究对象的话语分析密切相关。例如，文学领域的记忆研究，必然涉及对文学文本的话语分析，而通过祖先崇拜来考察族群认同的研究，则时常以族谱、仪式、家规中所记载的相关话语进行细致的文本细读与分析；一些人类学研究虽然强调通过对舞蹈、音乐和民谣等非书面语言的研究来复原民间记忆，以对抗更多由权力话语掌控的书面文本中所建构的官方记忆，但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也应该归于话语分析的范畴，其区别在于，分析的对象不再是书面文本，而以口头语言文本和身体语言文本代之。由此可见，话语分析在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说它在某项研究中界定了研究的对象，或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毋宁说它是一种研究的路径和理论视角。

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学科来源极为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学者对“话语”有着不同的界定。例如，早期的话语研究主要应用于语用学领域，关注话语和语法、话语和语义、话语与认知等方面的研究，简要地说，它们分为两个派别，一类强调句法研究，一类强调

语义分析<sup>[75]</sup>。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识到，话语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是话语研究的一个关键。例如，法国的语言学家乔治·埃利亚和萨尔法蒂认为，话语是“话语分析指示的对象”，它指的是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相关的所有的文本整体。话语包含了文体，根据这些文体产生了文本。布迪厄则进一步指出，话语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中，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验通过它们而形成，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sup>[76]</sup>。

本研究在这里使用的话语和话语分析概念主要来自福柯（Foucault）。在福柯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理论中，所谓的“话语”，就是共同遵循某一特定的话语实践规则、“隶属于同一话语构成系统的陈述群”<sup>[77]</sup>。这一理论思想及其分析方法，“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地当作一种模式”<sup>[78]</sup>。他们强调话语的社会性和建构性，认为话语是一种行为形式，是一种社会事件，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互为条件和结果，它是具有建构意义的。

换言之，话语不仅能够反映实践，而且对社会实践有着建构作用。“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sup>[79]</sup>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话语不仅来源于社会实践，它还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建构着话语的主体身份，建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建构社会意识形态。

沿着“个人与社会”、“话语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二元框架，对于“话语”的分析，不仅迅速成为一种研究方法，更被视为一种新的视角乃至全新的交叉学科。话语分析强调在这对立的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对个人话语实践的分析，来研究其背后的社会语境，通过对话语及其结构进行分析，探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凸显话语的产生与运作过程存在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别以及政治、经济等深层权力关系的争斗<sup>[80]</sup>。一言以蔽之，话语即权力。

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遍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其中，尤其以历史学与社会学方面最为显著。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柯文（Paul A. Cohen）等。在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杜赞奇着力于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在考虑话语—主体

一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不能仅仅关注民族国家的叙事，还应该关注外来事物、制度本身的逻辑乃至偶然性。杜赞奇指出，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而是本来就存在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sup>[81]</sup>。

另一位美国学者柯文在其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把“义和团事件”分离出三个层面，即事件层面、经历层面和神话层面，分别加以考察。柯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前五四时期、反帝国主义时期、文革时期），所面临的解读语境完全不同，因此，对其解读也应该有不同的方式。他指出，“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以及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sup>[82]</sup>。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外，文学学者与法学学者也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相关领域进行了研究。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华人学者刘禾在其著作《跨语际实践》中指出，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同语言里的概念词汇与概念词汇之间的含义是“不自明”的，它们之间的“互译性”完全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各种势力乘机进行博弈，释放出特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sup>[83]</sup>。

在法学领域，安格尔·梅丽（Engle Merry）所著《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最为人所熟知。作为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会长，安格尔·梅丽从“法与社会”的研究进路入手，使用民族志方法来考察人们是怎样谈论案件、权利等法律问题，并进而对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进行话语分析，她指出，法律和社会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法律和社会互相塑造和定义”<sup>[84]</sup>。

传播学研究也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镇。其中，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尝试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媒体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的著作，如《作为话语的新闻》、《精英话语和种族歧视》等等。把话语和话语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把基于媒介运作和

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媒介文本研究<sup>[85]</sup>。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话语分析理论逐渐传入中国，并因其对国家政治话语的强大解释力而受到关注。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学者们都尝试使用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

比较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如金观涛、刘青峰的一系列观念史研究成果，他们指出，科学、民主、权利等一系列影响了中国人世界观的重要观念，其“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并“继续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sup>[86]</sup>。因此，他们强调通过运用思想史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研究方法，“从语言的继承和演变入手，挖掘其中的思想史和制度史演化的历史内容，以超越时间和遗忘。”金观涛和刘青峰也认为，“咬文嚼字式地研究事物名称中被遗忘了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恢复被掩盖的历史，还揭示了一个民族心灵结构。这正是今日科学与文化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意义。”<sup>[87]</sup>

与此类似，学者黄兴涛也试图通过对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话语分析，探讨其思想史上的意义。他分析了民主、社会等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和“现代思想平台”之功能，并从考察这些词汇的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入手，去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sup>[88]</sup>。历史学者杨念群则将五四叙事区分为“政治取向的历史诠释派”、“文化取向的启蒙诠释派”和“折衷取向的多元诠释派”三个派别，指出这些叙事都采用了一种“同质性”的诠释方式，却忽略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心话语其实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到“文化”再到“社会”的演变过程<sup>[89]</sup>。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则从民族主体、历史记忆及文学场域的建构等多个角度，通过对革命话语的分析，阐释了现代革命的起源及其影响<sup>[90]</sup>。

综上所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多数学者所从事的“话语”研究，学科取向与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关注现代性问题者有之，关注话语霸权问题者有之，关注性别意识建构者有之，关注传播模式者有之，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都已经超越了传统语言学的领域，而更加关注话语与当代社会语境之关系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的最终目的，必须最终落脚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希望它能够解答当



下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因此，本书对于大生产运动的研究，最终落脚于社会史的学科领域之中，并建立在社会记忆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之上。笔者力求通过这样一种有别于主流党史研究的方式，对大生产运动进行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再次解读。

### 3 大生产运动：既有结论与“再发现”的可能

大生产运动是中共党史中的代表性事件，国内历史学界，尤其是党史学界在对边区史的研究中均对此有所体现。近年来，国内若干著述如《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sup>[91]</sup>、《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sup>[92]</sup>《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sup>[93]</sup>《中国共产党建设史》<sup>[94]</sup>《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sup>[95]</sup>《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sup>[96]</sup>《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sup>[97]</sup>等，都在其间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大生产运动的历程并进行评价。此外，也有多篇论文对大生产运动进行了专项研究。

在关于大生产运动的20篇国内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学者们就大生产运动的原因、发展过程、作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发表了观点。陈舜卿指出，解放区内部的原因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决策进行大生产运动的主因<sup>[98]</sup>。张华则指出，屯田作为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自古有之，它是危机的有效应对形式，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将其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具有极大的历史作用<sup>[99]</sup>。

丛丽华则从合作社的建立和运作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合作社制度在大生产运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的文章指出，合作社能取得成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合作社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党为合作社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共产党员在合作社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sup>[100]</sup>。

一些学者将大生产运动与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陈骊珠认为，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与大生产运动密切相关。延安精神是大生产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为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大生产运动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整风精神提高了党指挥大生产运

动的能力；延安精神不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发挥积极作用<sup>[101]</sup>。吴波、任海滨比较了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实行的政策和现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政策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学说和生产经营理论，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两位作者认为，大生产运动是抗战时期一次成功的自救生产运动，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最大一次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由于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因此，大生产运动对今天的“三农”政策是有一定借鉴价值的<sup>[102]</sup>。

关于“南泥湾精神”的论文则主要集中于研究“南泥湾精神”对今天社会建设的重大作用，如阐述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刘引认为，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程很长，还需要艰苦奋斗，提倡“南泥湾精神”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sup>[103]</sup>。马中柱认为，南泥湾精神代表了大生产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上下一致、协力同心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sup>[104]</sup>。

阅读文献可以注意到的是，与后来对整风运动的研究逐渐从官修党史的统一口径转向多元化的结论不同，对于大生产运动的研究，从正面肯定其价值、意义，似乎已成为既有定论。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深受意识形态限制的早期党史研究中，即使是近年的研究，仍然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其重点强调的是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和今天的现实价值，如认为大生产运动使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了难关，改善了当时边区的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等。同时，大生产运动也对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李智勇认为：“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大生产运动也收获了丰硕的精神成果，这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迅速而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sup>[105]</sup>李建国在《陕甘宁根据地史》中则指出：“总的来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边区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困死边区的企图，基本保障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和抗日军民的需求。”<sup>[106]</sup>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从经济史、区域社会史及生活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回顾了1937年至1947年间延安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溯流探源，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借以考察塑造中国社会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sup>[107]</sup>。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收录了作者黄正林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代表意义的17篇论文，其中包括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经济状况、金融事业、税收、农业、乡村社会变迁和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sup>[108]</sup>。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也是黄正林在相关领域的一部专著。通过对边区一些经济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作者认为边区的一些政策并没有完全被民众所接受，甚至表现出了很强的抵制情绪，从而探讨了政府行为与民间惯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俗成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只有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国家政策方被民间社会所接受。由于将大生产运动的相关史料纳入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进行考察，这在陕甘宁边区的相关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sup>[109]</sup>。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进行了研究，揭示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主要特征，分析各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互动性及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作者严艳提出了“边区模式”概念，通过对边区经济地理的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描述了边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演化历程，并且以此来反思“边区模式”的成败得失。这本著作在研究的方法上颇有可取之处，“边区模式”概念的提出，也具有一定新意<sup>[110]</sup>。

值得关注的是，以“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为关键词在JSTOR及CALIS西文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完全没有出现相关的研究，与此类似的是，研究专著亦颇罕见，相关论述主要散见于包括《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延安的阴影》《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等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和军事政策的著作，以及一部分对于毛泽

东思想和政策的研究专著中。这显示，虽然对“延安精神”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已有一定积累，但对“大生产运动”及其核心“南泥湾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西方学界还缺乏专题性研究。

上述著述中，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所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是较早期的知名著作。马克·赛尔登首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提出了“延安道路”这一概念，并指出了它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也关注到由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所构成的“静悄悄的革命”，以及互助合作、民主政治的初步发展。不过，有如学者们所指出和作者自己最终在90年代所承认的，这本专著忽略了光辉的延安道路下所掩盖的“专横与倒退的倾向”<sup>[111]</sup>。近年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反思。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部著作中，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研究只是其中一个并非论述重点的部分。

值得提及的延安相关研究者还包括新西兰学者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她在延安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将阶级关系、职业类别、历史文化传统、人口数量以及自然资源等视为一个综合生态系统。纪保宁在《延安道路的生态学起源》中比较了同属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的社会生态系统，认为“延安道路”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生态环境有关，前者地广人稀，阶级分化程度低，社会自主性弱，尤其是新移民构成了延安道路成功的基础；而后者人多地少，经济发达，阶级分化程度高，社会自主性强，缺乏“延安道路”实施的社会生态环境<sup>[112]</sup>。在其1997年出版的《两种革命：陕北的乡村重建和合作化运动，1943—1945》中，纪保宁更进一步指出，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延安道路”无法从延属分区移植和复制到中国其他地区；她认为，受延属分区特殊生态环境制约的“延安道路”的成就，仅仅是一个特例，当它被推广到全国时不可能成功，而必然沦为意识形态的说教<sup>[113]</sup>。台湾学者陈永发所著《延安的阴影》在探讨了延安整风运动被遮蔽的面貌时，对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生态等也有一定的涉及。

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关于延安革命话语研究的专著：《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作者戴维·阿帕特（David E. Apter）和安东尼·赛

奇 (Anthony Saich) 放弃了对具体经济数据和政治生活细节的讨论, 而把研究重点转向政治话语分析。他们认为, 重点应当阐明中共怎样使极为分散的根据地保持行动的统一: “应该看一下那些仪式和符号, 中共将它们拼装在一起, 赋予共产党的行动以意义。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中共是如何对它所参与的革命进行阐释的。不仅要研究这些阐释是如何产生的, 而且还要研究这些阐释何以被党员个人逐步认可, 并接纳为其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sup>[114]</sup>

纵观以上研究, 可以发现, 在国内学者有关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的相关研究中, 主要肯定了大生产运动的光荣历史和伟大意义, 并指出今天以“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为代表的“南泥湾精神”, 仍然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这些研究多以官方认可的论断先行而继之展开阐释, 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在创新性理论贡献上存在明显不足。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重点更多地集中于对边区政治的讨论, 对大生产运动主要视作一次解决军民温饱问题的生产行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相关研究, 对于大生产运动中即开始形成的众多话语文本, 以及此后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记忆及其产生的影响, 几乎无人涉及和关注。

这正是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可以有所拓展的学术空间所在——如果说国内大部分研究成果的既有定论是肯定大生产运动在当时的伟大成就, 并强调其核心“南泥湾精神”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台湾学者陈永发在其专论中曾尝试全面推翻这一观点), 那么, 笔者的研究思路则更多体现出社会史的价值取向: 其一, 是力图摆脱“肯定/否定”、非此即彼的研究立场, 如同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之有力发问——“评判还是理解”?<sup>[115]</sup>两者之间, 本研究选择的是后者, 即尽可能中立地在事件发生 70 余年以来的时段内对这一历史事件及其社会影响进行考察; 其二, 是不仅仅将大生产运动中留下的相关文献视为史料本身, 而是进一步将其视作在权力控制的话语秩序下进行话语生产的过程, 并重点关注这些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

在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中, 笔者尝试与以上相关研究的既有结论“对话”, 对大生产运动中以及后来形成的一系列话语文本进行分析。如前所述, 社会记忆的建构和传播与一个政权的权力合法性密切相关。因此, 厘清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的形塑过程, 揭示其间权力的操纵, 对本研究而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 注 释

- [1] 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第359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转引自秦燕：《陕甘宁边区时期农业开发政策的环境效应》，《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 [2] 叶骁军：《历史时期西北城市的发展规律与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期；牛淑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党史文汇》1999年第2期。
- [3] 作为历史上最常用的粮食度量单位，“石”的实际容量标准在每个时期都不一致，民国时期，1911年至1919年使用旧石，每石合178市斤，1920年之后以市石为单位，每石合160市斤。
- [4]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 [5] 前揭书，第337页、第365页。
- [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 [7] 孙琦：《关于八路军编成人数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 [8] 杨尚昆：《党产问题的由来》，转引自：《党史信息报》，2001年12月26日。
- [9] 朱鸿召前揭书，第5页。
- [1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 [11] 朱鸿召前揭书，第20页。
-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下）》，805页。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
- [13]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92页。
- [1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2编），第574页。
- [15]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认为，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形式，一种是“普通型”，一种是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还有一种形式是修改涉及历史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艺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这种形式比历史著作更容易使历史形象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倾向于全面肯定的“地方的大力褒扬”体现于纪念馆、祠堂、墓碑和纪念碑上。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最常见和最有影响的形式。最后一种神话化的类型是借助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神话化。如果观察大生产运动的记忆塑造过程能够发现，它涵盖了几乎所有柯文提及的形式。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9页。
- [16]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
- [17] 但直到次年的10月19日，接近一年半之后，这篇讲话才几经修改，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学者施拉姆特意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思想》中特意指出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解释其中原因。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 [18]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 [19] 柯文前揭书，第188页。
- [20]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第407页注十四；施拉姆前揭书，导论第19页；以及马克·塞勒登著：《革命中的中国：延

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在这部研究专著里，马克·塞尔登把毛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形象地命名为“延安道路”。

- [21]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1923；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载《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九期。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662页。
- [22] 王明前揭书，第639页。
- [23] 黄修荣前揭书，第75页。
- [24] 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始时间意见不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包括：①以1939年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作为起点，见师连枝：《大生产运动缘起申论》，《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4月；②以1941年359旅进军南泥湾作为起点；见狄俊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然性》，《西藏大学学报》1995年3月；③以1942年中共中央召开西北局会议作为起点，见张素华：《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本研究倾向于以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为起点，原因是此一会议发动了涉及边区各界的党政军学人员进行生产，是来自政权最高领导的动员令。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和1938年不同了……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见《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92页。这显示出，毛也认为，1939年的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是发动大生产运动的起点。同时，笔者认为，1941年春三五九旅进入南泥湾地区垦荒是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生产自给运动虽然已经开始，但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给予重视，也没能推行开来。
- [2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页。
- [26] 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 [27] 景军：《神堂记忆》。此文为景军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未在国内公开出版。本文引自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7-12-20/4130.html>
- [28]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
- [29]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 [30] 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等几个时期，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运动。
- [31] 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 [32] 转引自陈向明：《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载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 [3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 [34]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年版。
- [35] 有关年鉴学派的相关文献相当丰富,比较重要的包括柏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麦田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 [36] 年鉴学派这一阶段已被译介到国内的著作包括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 2007 年年版;阿利埃斯、杜比:《私人生活史》,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对年鉴学派研究范式的介绍则可参见张正明:《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以及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2 期。
- [37]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 页。
- [38] 前揭书第 21 页。
- [39] 前揭书。
- [40] 两本明确以“新社会史”为题的论文集的出版可以视为这一学术共同体出现的显在标志,即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以及前面提及的孙江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
- [41] 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 页。
- [42] 孙江前揭书,第 1 页。
- [43] 前揭书第 22~23 页。
- [44] 前揭书第 131 页。
- [45]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二十一世纪》,2004 年 12 月号。
- [46] 杨念群前揭书,第 467 页。
- [47]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载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9 页。
- [48] 杨念群前揭书,第 61 页。
- [49] 一个类似的观点来自陈宁:“有两个思路或许可以引入到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中去,一是话语,二是权力。”陈宁:《社会记忆:话语与权力》,《社会学家茶座》,2007 年第 1 期。
- [50] 弗雷德里克·C. 巴特莱特:《记忆:一个试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51] 前揭书,中文版译序第 3 页。
- [5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 [53]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 页。
- [54] Schwartz, B.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Oct., 1996), pp. 908-927.
- [55] Schwartz B.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2 (Apr., 1991), pp. 221-236.

- [56] *ibid.*
- [57] Schwartz B. The Social Context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 No. 2 (Dec. 1982); 374 - 97.
- [58] 弗朗西斯科·德利奇:《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陈源译,《第欧根尼》2006年第2期。
- [59] Pohlandt - McCormick, Helena. "I saw a nightmare - "; vio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9, No. 4 (Dec. ,2000).
- [60]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
- [61] 耶尔恩·吕森:《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88页。
- [62] Hanson Allan.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1, No. 4 (Dec. ,1989), pp. 890 - 902.
- [63] 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 [64]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
- [65] 前掲景军书。
- [66]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载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 [67] 陈旭清:《心灵的记忆:苦难与抗争——山西抗战口述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 [68]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7年版。
- [69] 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思想战线》,2000年第2期。
- [70] 钟年:《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 [71] 严建强:《关于社会记忆与人类文明的断想》,《浙江档案》,1999年第3期。
- [72] 额尔德木图:《敖包、文化记忆与游牧社会——来自杜尔伯特的个案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
- [73] 康忠慧:《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74]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 [75] 乔治埃利亚、萨尔夫蒂:《话语分析基础知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 [76]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5.
- [77] 转引自谢立中:《话语或权力:福柯前后期话语分析理论之间的矛盾》,载郅正:《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8-长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 [78]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 [79] 前掲书,第59页。

- [80]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页。
- [8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2页。
- [82]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8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第4页、第10页。
- [84] 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85]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范·戴克(即梵·迪克):《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86]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87] 金观涛、刘青峰:《“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3期(2005)。
- [88] 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 [89]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 [90]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 [91] 黄文主,姜向文:《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
- [92] 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国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 [93] 刘继增、毛磊:《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94] 陈至立,刘吉:《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95] 赵凌云:《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96]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 [97] 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98] 陈舜卿前揭书。
- [99] 张华:《大生产运动中“屯田之举”的成因及历史功效》,《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5期。
- [100] 丛丽华:《大生产运动中合作社成功原因初探》,《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 [101] 陈骊珠:《延安精神与大生产运动》,《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
- [102] 吴波、任海滨:《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实行的政策与现今三农政策的比较》,《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103] 刘引:《论坚持和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 [104] 马中柱:《南泥湾精神对现实跨世纪宏伟蓝图的意义》,《现代哲学》,1996年第1期。
- [105]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 [106] 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 [107] 朱鸿召前揭书。
- [108]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09]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110] 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11]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112] Pauline Keating. *The Ecology of the Yan'an Wa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No. 13 (Aug., 2009).
- [113] Pauline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3.
- [114] 转引自罗燕明：《90年代海外延安研究述评》，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 [115]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 第二章 | 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马克斯·韦伯

## 1 厚土之上的凋敝古城

### (1) 征战之地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由陕西西北部、甘肃及宁夏东部三个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延水等共 26 个县市组成<sup>[1]</sup>。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呈蝴蝶形状的地区，正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中部偏北地区，北邻鄂尔多斯高原，南望关中盆地，西倚六盘山，东面以黄河为界与山西隔河相望。由于处于区分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年降水量 400 毫米分界线上，干旱少雨，属农牧业交错经营的地带，因此，这一地区从数千年前起就是以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和以农耕地为主的农耕民族争夺的焦点，多种文化长期处于相互争夺、并存、融合的状态。从商周时代起，白狄、匈奴、稽胡、鲜卑、氐、突厥、羌、女真、蒙古、满等近二十个少数民族曾经在此征战杀伐，留下自己的印迹。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些地名，如永靖、延安、安塞等城市名，以及安边堡，归德堡、永兴堡等军事驻防地点的命名，清晰地反映出统治者“安边归德”的愿望。

早在战国时期，为安定边防，秦国就在今天的陕北秦国边境上修筑了长城。此后，秦始皇又沿着这道长城重行扩建，最终形成了西起临洮，东抵辽东的秦长城。至明代，经过四次大规模的重建和修整，长城成为最为有效的北方防御性军事设施。至今，在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区，长城遗迹依然清晰可见，并存留有“头道墙”、“二道墙”、“三道墙”、“墙头”等地名——所谓“墙”，即长城也。

文化的交相并存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一个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的特殊地域。今天延安地区的宜川市，秦汉之前恰恰位于汉、胡两个族群的控制地域分界线——明初《图经志》上说：“川南是汉，川北是胡”，此处的“川”即宜川地区。因此，陕北、宁夏、甘肃的这一带地区，就



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又融合了北方游牧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

秦汉以前，这个区域一直以畜牧业为主，西汉以后，农耕地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南泥湾即位于黄龙山山区）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明代之后，政府格外重视边防稳固，配合长城的大规模扩建，统治者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其规模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成化九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在东起陕北清水营，西至宁夏花马池一线地区修建“边墙”（即长城）。边墙既成，战事稍息，余子俊于是在其内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岁得粮食逾600万石。此后，明朝政府持续在榆林以南大量募民屯田。由于人口繁殖迅速，农耕区域迅速向北地推进，农民们在无定河、渭河、延河等冲积而成的大片川地种植小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并且沿着川地渐次向沿岸的丘陵坡地上开垦，形成了以大面积开垦山地发展农业的生产方式。在明朝隆庆年间大臣庞尚鹏上书朝廷的奏折中，这位主张“宽粮额以劝开垦、广召种以辟荒芜”的官员描述他在陕北地区看到的景象说：“土人耕种，锄山为田，虽悬崖偏僻，天地不废”，“即山之悬崖峭壁”，亦“无尺寸不耕”<sup>[2]</sup>。据统计，仅在宁夏一地，明代屯田总量即达13万多顷，甘肃则达到屯田4.59万余顷，占全国屯垦数量的1/4<sup>[3]</sup>。

明代对西北农业开发的高度重视，使得元末明初西北因战乱而致的凋敝状况得到迅速的恢复。但是，大规模的屯垦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植被退化。黄土高原的特点是干旱少雨，但一旦下雨，则迅速在高原上冲刷出一道道浅沟深壑，水土保持极为困难。史料记载，这里原是森林草原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带，虽然自秦汉以来国人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生态已经遭到一定的破坏，但贯穿几乎整个明代的大规模开垦，则使得植被进一步遭到毁灭性打击。

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是陕西省北部一座有数千年历史的边关古城，位于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其支流延河及南川河在此交汇，并为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三山所环绕。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此地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依山傍水之地。根据史料记载，延安很早就成为中国人居住繁衍的核心地带，并被传说为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的诞生之地。在延安下辖的黄陵县，迄今仍存有黄帝陵遗迹。

自秦朝起，延安地区即设高奴县，此后先后改名为肤施、延州，成

为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由于地势险要，延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曾经为延安的战略地位写下“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的诗句。1089年，宋朝将延州建制升为延安府，下辖肤施、延川、延长、甘泉等七县，凭借关隘拒守西夏雄兵。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惊心动魄的战争——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正是通过这里南下西安的。此后的1000多年里，延安一直保持着它“边陲之郡、五路襟喉”的重要战略地位。

## (2) 地理、经济与社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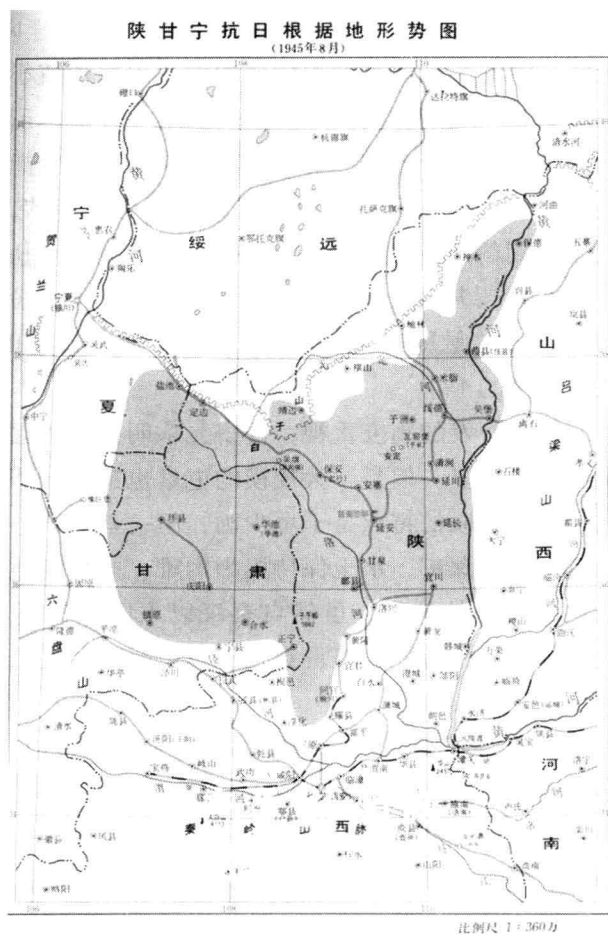


图 2-1 陕甘宁边区形势图<sup>[4]</sup>

与内地繁华多彩的城市面貌不同，这个边陲城市的地形以黄土梁峁以及因流水切割和风沙侵蚀而成的沟谷川道为主，看上去古朴而厚重。厚厚的黄土层非常结实，因此，当地居民利用它的特点发明了陕北特有的民居样式——窑洞。这些窑洞冬暖夏凉，在寒冷和干旱的陕北，是相当实用的建筑。

当地主要河流延河、汾川河、南川河等，其河流周围都形成了开阔平坦的谷底，农民们把这些川道开垦为丰产粮食的土地，是居民食品供应的主要土地资源，被赋予了“米粮川”的美称。从远处看去，一层层梯田从河谷往上依次排列，山坡上则是一排排的窑洞，给这座整体呈现浓重黄色的城市带来了些许生动的色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sup>[5]</sup>

而在那山峦的最高处，唐代建成的宝塔高高矗立其上，成为这座城市一千多年来最为显著的标志。

在被目为边陲要冲的同时，这里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状况发展一直处于落后地位，这是和陕西地区战乱频仍、匪患严重、灾荒迭起、农业劳动力损失巨大分不开的。据甘泉县方志记载，到清末宣统元年，整个甘泉县只余不足4000人，是明代人口高峰期的七分之一<sup>[6]</sup>。顺治年间修订的《安塞县志》里则称：“人丁十去其九，止遗寥寥残子，鸠形鹄面，略无起色。”<sup>[7]</sup>仅明清两代，经历明朝的王嘉胤、高迎祥起义、张献忠起义，清末的陕甘回民起义等重大战乱，陕西、甘肃等地人口即遽减近半。据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陕西省战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短短十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44.6%。在全部的损失人口之中，约有83.7%的人口是战争期间损失的，其人数大约是520.8万；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仅101.2余万，所占比例不过16.3%<sup>[8]</sup>。此外，陈独秀也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援引中华民国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数字称，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整个中国的农户数从五千九百万户下降至四千三百万余户，而其中，陕西农户下降率居于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湖南<sup>[9]</sup>。延安市至红军进驻前，人口仅在3000人左右。当时的边区资料显示：“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处有个长约二百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sup>[10]</sup>而在三五九旅前往开垦

前，南泥湾垦区中心的金盆湾地区，一大半都是荒地。

据统计，整个边区的可耕地总面积约为 4000 万亩，但到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边区的耕地总面积只有 900 万亩，不足总面积的 1/4<sup>[11]</sup>。

土地众多而人丁稀少，延安地区的农业并不发达。除了川道中的土地，山地并不值钱。斯诺说，当地的老农告诉他，当时的 25 元钱就能够买下一整座山的土地：“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sup>[12]</sup>

农民们在山坡上种植小米等粮食作物，产量很低。“大多数农民在交纳佃租之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sup>[13]</sup>

与农业人口遽降、农作水平低下相对应的另一面是盗贼蜂起，土匪横行。在延安四周及其他陕北地区，土匪控制了大多数重要道路。1933 年，国民政府关于陕西的一项农村调查表明陕西当时正征收一项特殊的税种：“平息土匪税”<sup>[14]</sup>。而在 1937 年，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亦曾发布一项政府通令，号召农民们要“武装保护秋收”以防止反革命土匪侵扰<sup>[15]</sup>。这些都可以说明此一地区匪患的严重程度。

不同帮派的武力团体向乡村收取不同名目的捐税，使得村民们疲于应付——也许在村民眼里，军阀（在红军接管延安前，这里是军阀杨虎城的地盘）、地方民团、土匪，乃至游击队，所带来的困扰可能颇为类似：都同样需要向本已贫苦不堪的老百姓征收人员给养。1926 年，在西部考察的英国领事埃里克·泰斯曼就他所见所闻评论说：“陕北在我们旅行时，是掌握在半政治性的土匪队伍手里，今天是强盗，明天是造反者，后天也许就是成功的革命者……加上土匪的洗劫和土壤的贫瘠，稀疏的居民穷得处在饿死的边缘，延安看来是最边远地区的中心，

是我迄今在中国考察见到的最穷的地方。”<sup>[16]</sup>

在中共中央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最终成功地进入延安时，他们所见与埃里克·泰斯曼 10 年前所见并无二致。这个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的中心，仍然保留着宋代华丽大理石牌坊的古老城市，因为多年战乱和匪患，商业凋零、人丁稀落。

《中央日报》记者在 1937 年的报道中说：“民众之瘠苦，记者所目睹者，以陕西为最甚。而民之负担，就记者所见所闻，实以陕西为最重。以最瘠苦之民众，任最繁重之负担，今年如此，明年复如此，……担无可担，负不胜负，安得不出于逃亡一途。”<sup>[17]</sup>

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这座城市里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的饭馆，此外还有露天集市<sup>[18]</sup>。而斯诺则以他记者的敏锐视角观察说，这里的居民们“面有菜色”、“食品极少，价格高昂”<sup>[19]</sup>。

据统计，延安当时的私营商户数量仅为 168 家<sup>[20]</sup>，整个苏区（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当时所辖的二十余县，商户总数不过一二百户，大部分资本不过数百元至几千元而已<sup>[21]</sup>。这些包括延安、定边等地在内的边区商户，主要从事纺织品的进口销售，以及家具制品、农具、食盐、粉条、豆腐等一些食品的加工制作和销售。专治边区史的学者黄正林在专著中细致地列出了关于当地商户所从事的手工业及商业的产品种类，如皮坊、染坊、木匠铺、铜铁铺等。从中可以看出，边区虽然已经有了零星的商业和手工业业态，但产品简陋、种类稀少，只能勉强满足当地的部分最基本生活需要<sup>[22]</sup>。实际上，直至大生产运动开始前，这里最为匮乏的棉纺织品和食糖、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只能长期依靠进口。

当时的《解放日报》上这样分析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基础：“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依赖外间输入的。”<sup>[23]</sup>

因此，一旦大量人员涌入边区，边区的商业供应顿时出现严重的匮乏和价格飞涨。

与经济的落后状况相一致的，是边区同样落后的卫生、教育及其他

方面的社会发展状况。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写道：“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sup>[24]</sup>

边区主席林伯渠也指出：“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极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sup>[25]</sup>

和国内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在红军设立解放区之前，农村妇女地位极为低下。在陕北地区，妇女是买卖婚姻的主要砝码，出3~5石粮食，就可以买到一个媳妇。此外，陕西还是当时国内鸦片的重要产地，百姓吸食鸦片者并不少见<sup>[26]</sup>。

这座厚土之上的凋敝古城，在20世纪30年代，和其他中国内陆的城市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战争的创伤，饱受匪患侵扰、民族纠纷及灾荒频仍的痛苦。它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痼疾缠身。当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时，它并未意识到，这支身着破衣烂衫的队伍，将给自身以及四周的广阔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 2 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制定与民众认同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相对于原中央苏区的激进政策，这些政策明显温和务实。例如，中共中央明确宣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部分外，不问自耕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此外，还提出“苏维埃……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sup>[27]</sup>

危亡关头，远在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及时地将工作的重点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新的形势、新的挑战以及新的机遇。此后的一系列行动——通过激发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迫使国民党与自己联手抗日，抓住巩固和发展、壮大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机会，扩展己方的控制区域和军事实力，发展经济，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和社会认同，并且获得国际力量的同情及支持，最终寻求机会与国民党逐鹿中原——都与这个后来被证明是极其准确的判断紧密相关。

### （1）认同聚合的基础

入主边区之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以系列政策来稳定民心，确保边区民众认同其施政纲领，支持军队，保证政权巩固。这些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征兵行动，土地改革、开展经济建设，开展文化教育和卫生宣传活动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调整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

在此之前的1933年开始，陕北照金、府谷等地已经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开始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为主旨的斗争。到1935年，这项政策已经在当时的陕北苏区普遍开展起来。当时，苏区各县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

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①在村和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由土地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代表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成分。

②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交公，一部分作为军需支前，另外一部分则由各乡苏维埃政府分配给穷苦农民群众，这种做法是当时解决红军部队给养的主要方式。

③查评和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总的原则是地主不分地，富农只能分得坏地<sup>[28]</sup>。

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中央苏区自1927年以来土地革命政策的影响，土地革命成为陕北革命者激发贫困农民情绪、获得农民支持的主要手段，普遍出现了对富农和小工商业者的激进行动，例如没收地主的一切



土地、房屋和牲畜农具，而对富农则分给坏地，导致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此外，红军还设立关卡，将行商的货物没收，这些行为引起了相当程度上的恐慌，苏区较为富裕的民众纷纷逃亡白区。例如，在保安区七乡，“逃跑群众曾达半数，有的全家跑。”<sup>[29]</sup>——很显然，当逃跑的民众达到半数时，意味着此项政策所欲打击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过了原定的地主和富农的目标，而转向生活水平一般的中等收入家庭。

假如失去民众中的支持，则处于重重“围剿”部队包围中的陕甘宁苏区就可能重蹈中央苏区的覆辙，不可能生存下去，遑论巩固和发展。在反思了中央苏区的政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之后，中共中央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激进政策可能导致的危险，那就是可能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失去陕甘苏区这块最后的立足之地。因此，对政策做出改变就成为必要的行动。

事实上，早在1935年9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苏区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注意到政策的制定必须因应时势。《指示》强调：“发动群众首先重的是保护群众的利益，争取群众的利益，要群众参加斗争，群众首先他就看是否对他自己有利益。”

指示明确地指出：“必须立即建立新的秩序安定群众的生活，恢复各种生产和商业，建立有秩序的新的生活。必须立即采取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办法……群众生活改善愈快，则群众接近苏维埃也就愈快。”<sup>[30]</sup>因此，在进入陕甘苏区之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立即采取了改变土地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决定。

1935年10月，在一封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在分析了目前参加“抗日讨蒋”的民众中的各种不同人群之后，中共中央特别指出，参加者中已经包括了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因此，对待他们的策略应当及时改变，争取他们的支持：“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

在这封信件中，中共中央明确了以往作为打击对象的地主，也能够作为争取的对象。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标志：中共将联合以往被视为阶级敌人的被打击对象，共同抗日。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

在目前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中立的态度，过去反对富农的策略已经不恰当了。在白区抗日反蒋、反苛捐杂税与军阀的斗争中，富农一般是参加的。所以“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是错误的<sup>[31]</sup>。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政治上实行的第一个重大的政策改变，其意首先是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并且在团结富农的基础上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据王首道回忆，时局因此项政策而日渐稳定。他指出，针对百姓纷纷逃跑的情况，苏区政策在1935年底之后有了较大改变：“为争取更多群众返回，政府对逃跑群众彻底执行苏维埃新政策，逃跑回来的群众一律补给他的自耕土地、窑房、农具等，绝对保持逃跑群众的家产，帮助夏收。”<sup>[32]</sup>此后，中共中央又采取了针对工商业的一系列保护性措施。1935年11月25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下列数项措施：取消一切工商业捐税，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苏区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大小商人也可自由到苏区营业；除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出产品可自由输出；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sup>[33]</sup>。次年1月，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又针对地主兼商人问题作出决定：“地主兼商人的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房屋财产不没收；有些小商人兼有小部分土地剥削，而不占每年总收入重要部分或主要部分的，不但商业部分不没收，即土地亦不没收。”<sup>[34]</sup>

政策的变化很快得到了民众的回应：“许多过去因误解苏维埃政策逃跑到白区的群众（甚至一小部分小地主富农）都一批一批地回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1月到2月初，从白区回苏区农民，延安县有100多人，延水县有2家，绥德县三、四两区有50多人，米西县有6家，秀延县一、九两区有19家，安塞县有5家<sup>[35]</sup>。

土地改革之外，中国共产党也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法规和政策。

由于连年战乱、土地贫瘠，此时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左健之在刊登于《解放》杂志的《从物价高涨说到抗战中的

民生问题》一文中写道：“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十亩以下的自耕贫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据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之统计），这些农民因自己田地不够耕种，必须向地主租田。陕西田租甚高，有所谓五五、四六、三七、二八数种……普通佃租都在五五以上，大多数的农民，在交纳佃租以后，所剩无几，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sup>[36]</sup>适宜种植棉花和养蚕的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80%的桑树被国民党军队砍作柴烧，农民基本无法养蚕。作为边区主要财源之一的畜牧业，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抢夺宰杀，羊减少了40万至50万只，牛马等大牲畜只剩10余万头<sup>[37]</sup>。

为了保证抗战粮食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农业生产成为自1937年中国共产党接管陕甘宁边区之后的重要议题。自1937年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陆续在夏耕、秋收等不同农时的关键时刻发布政府通令，详细指示如何进行农业生产。

在1937年9月20日发布的关于秋收问题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上，边区即明确指出，要积极动员民众，搞好秋收工作。其措施则包括：①通过各种会议动员和宣传组织民众进行秋收；②武装保护秋收，防止土匪侵扰；③加强劳动互助社、妇女学习小组、义务耕田队等劳动组织、吸收妇女老幼和半残废参加到秋收中来，扩大劳动力。同时还要求小学在秋收最忙期间放假七天以帮助秋收，组织秋收竞赛等<sup>[38]</sup>。

24日，边区政府又发布了另外一条通令，要求各地机关以向群众暂借粮食的方法，解决9月和10月县级及以下各级机关所需要的粮食给养。在这条通令中，政府规定，“借粮以各机关现有人数，按照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小米一斤，保安队每人每天小米一斤四两为限……所借粮食保证年内加利归还”，此外，为缓和可能因借粮而导致的矛盾，政府还规定，“借粮时需与抗战动员联系起来，向群众宣传解释，不得强迫命令。”<sup>[39]</sup>但各地仍频频出现强行借粮以及迟迟不还的情形<sup>[40]</sup>。种种迹象说明，当时的经济状况已颇为紧张。

由于未能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部队、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财政开支极为混乱，出现了自收自用、任意募捐乃至浪费贪污的情形，为此，特区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底发布通令，要求统一财政，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严禁任意募捐和贪污浪费<sup>[41]</sup>。

农业上，发动民众组织劳动合作社，并且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

奖励劳动英雄。政府也帮助农民解决了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并且发放了对农贷款，以保证农村资金的流通。

手工业方面，政府废除了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国营企业方面，政府加强了对石油和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为现代工厂。

通过这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39年，边区经济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①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从1937年的843万余亩增加到1939年的899万余亩，两年增加了56万余亩；粮食收获量从1938年的110万石增加到1939年的130万石。

②植树造林数量有所上升：1938年，边区植树造林共30万株，到1939年，植树造林的数量上升到48万余株。

③畜牧业水准亦有所进步：到1939年，边区的牛羊数目已增加到了30万头以上。

④小手工业显著发展：据统计，仅定边一县，1939年就增加了皮厂10处，染坊3处，木器铺13处，裁缝铺5处，鞋坊5个，此外民众还集股建设了木器、缝纫、瓷器等合作社，政府亦投资创办了相当数量的手工工厂。

⑤商业有所发展：据统计，新增加的商店约在1000家以上，尤其以延安为多，神府靖边等县还发展了集市。全边区建立了155个合作社，社员达到37万8445人，股金量近39万元。其中，延安南区合作社所取得的成绩尤其令人瞩目：经营以来，其所获红利已经超过股金数倍<sup>[42]</sup>。

## (2) 政治动员、民众参与与基层组织建设

边区施政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四方青年、难民踊跃来归，与这里强大的政治动员及因此而产生的广泛民众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相继进行了普遍的民主选举。最初，民众对于边区的民主选举态度消极，有些地主和富农认为是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家中有青壮年男子的家庭

则以为“又要抓壮丁当红军了”。在最初的第一次边区民主选举中，很多人表现冷漠，但政府则尽力消除民众的误会，并且以出台明确的政策及深入家家户户的宣传来力争获得民众的理解。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明确规定哪些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后改为18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有三种人：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经法庭判决有罪被剥夺公民权期限未滿者，精神病患者。行政首脑的产生不是直选：“乡长区长县长边区长官，边区法院院长由各级议会选举，但须得出席议员2/3以上的同意。”条例对选举的比例、程序等都作了规定<sup>[43]</sup>。

为鼓动民众参与边区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计人力，在所辖各地普遍成立选举委员会，并为不谙“选举”为何物的民众成立选举培训班，进行相关民主选举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还拨出经费，印刷各种选举宣传品。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就印了100余种报刊，如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此外，各根据地还注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利用演剧和歌咏形式，张贴宣传画等，走遍边区村落，宣传选举于民众的意义及价值<sup>[44]</sup>。

这其中，最能够说明政府切实考虑了民众需要的，是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和一般的条例不同，它在正文的后面还附有以和农民说家常话的口吻写成的说明，生动、活泼地描述前面文字的字面意思、选举的意义乃至投票时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在第21条后面是这样写的：

“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布，要求选举他的人。竞选的好处就是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将民主更加发扬。怎样竞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乡议会，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如何如何，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

团体，也都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摆在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竞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再来吧！”<sup>[45]</sup>

利用陕甘宁边区民歌资源丰富的优势，边区政府还编创了生动的歌谣来宣传民主选举的目的和标准：“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sup>[46]</sup>

对于难民和平民，边区持欢迎的态度，明确规定他们享有和原住民同等的政治权利。边区1940年颁布的《优待外来难民和平民之决定》中规定：“凡移入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之民主权利。”<sup>[47]</sup>他们拥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参加一切抗日团体，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对于工人，边区也成立了工会，号召“工会真正成为边区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sup>[48]</sup>从这一点看出，边区高度重视基层民众的政治动员，力求发动一切力量参与到边区政治中。此外，边区还规定，各种政治团体和党派，都有提名竞选者的权利：“各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任何干涉或阻止。”<sup>[49]</sup>

在选举过程中，考虑到当时的民众的分布状况和基本文化素质，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生动活泼的选举方式，除常见的票选外，还出现了包括“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和“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膊”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投票方式。

“投豆法”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投豆豆选好人”，当时的另一首选举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就生动地体现出这一选举的原则和宗旨。规则是发给投票人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乡长、副乡长和村长的候选人，当然是由党内提出的，但是，党内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名，而是几名。选举是在村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上进行的。几个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海碗。投票人从候选人背后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投票以后，由村民选出两名计票员，得到豆子最多的人，就是当选人。从上面这些方法可以看出，这些选举方式因地制宜，保证了选民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能够真实体现其选举意图，保证选举的公正性<sup>[50]</sup>。

由于准备充分，方法得当，选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1939年1月代表边区政府所做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林伯渠总结说，在选举各级议员时，当地民众参与者普遍达到了80%~90%，只有少数地方的参与率较低，但也在半数以上。“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sup>[51]</sup>

据统计，第一次选举后，农民占整个政权人数的比例将近90%，第一次真正能够当家做主，使农民干部和基层民众都爆发出极大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下，（选举出来的各级工作人员）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sup>[52]</sup>

在抗战的广泛专政动员下，边区建立了各种民众团体，到1939年，各行各业的工人有95%参加了工会，农民全部参加了农会，妇女则有70%以上参加了妇女救国会，青年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商人组织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安塞的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提出提案，呼吁妇女参加生产、放足、剪发、废除买卖婚姻等<sup>[53]</sup>。由此可以看出民众团体的普及程度。

这期间，边区政府强调宪政制度建设，林伯渠在1940年3月9日就宪政问题作了长篇报告，明确提出“抗战需要宪政”，在边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核心内涵是“广泛的各个阶级，一切抗日人民、抗日阶层的专政”<sup>[54]</sup>。毛泽东则提出，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sup>[55]</sup>在民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致力于发展党支部、农会、工会、妇女救国会等各种类型的基层团体及组织，例如，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党在农村中必须到处组织共产党支部，加强它在一切斗争中的领导作用。”<sup>[56]</sup>

经过努力，“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两个以上的团体。”<sup>[57]</sup>通过这些方式，中共中央成功地在边区农村发展了大量新党员和基层干部，并使得边区民众被高度组织化，有力地巩固了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权。



### (3) 意识形态的输入

在对日战争和经济建设之外，边区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文化、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建设活动，并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对当时文化水平极低的边区，这些活动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读报、识字和妇女运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教化的一部分。利用学校、扫盲班等多种形式，下派入乡的干部和教员进行革命政治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鼓励妇女外出劳动，以更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对卫生知识的普及则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增强了社会认同。

文化教育边区着重推进的一个方面。当时，整个陕甘宁边区文盲数量达到99%以上。为了让边区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从1938年开始，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扫盲。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举办冬学。

所谓“冬学”，即利用冬季农闲时间为广大民众实施的一种补习教育形式。在原边区师范学生、陕甘宁边区乙等劳动模范赵正才的回忆录《下乡办冬学》里，他这样描述了边区委派学生前往农村兴办冬学，普及教育的一些细节：

府君店只有十几户人家，……但识字的人极少，能提笔的几乎找不到。群众要求识字，党和政府大力支持。我进村时，一孔大窑洞和简单的教学、生活用具已经为我准备妥帖。十八九个从八九岁到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报名上学，我这个教员一到就开学了。办冬学因陋就简，课本不够就手抄，纸笔不够就在黑板、石板上写，或在地上画。白天学，晚上也学。

他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教授的内容：

教识字，讲读音、笔画和意思；领着念念、写写，一天下来能教七八个字，有时也教十多个字。

冬学并不仅仅限于识字，还必须进行革命政治教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此外，陕甘宁地区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知识，普遍

迷信鬼神。因此，冬学的教师们还担负着破除迷信的任务，时常需要应付当地的巫婆、神汉、阴阳先生的质问和种种花招。

冬学的教师很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与群众打成一片。赵正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往年写春联要到外村请人，今年就由我来执笔，一家写完又一家，整整忙了两天，村里人皆大欢喜。一位老人说：“有你在，我们就不作难了。过去实在找不到人写春联，就用小碗拓圈贴上，不识字真把人难苦了。”贴春联也成了鼓励人们识字的良机。冬学办了3个多月，一般学生能识到六七百字，最多的约识1000字，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老乡们都很高兴<sup>[58]</sup>。

1939年，宁县县长郭进亭向边区政府报告说，1938年该县举办冬学15所，学生数量共计403人，其中成人195人，青年134人，儿童74人。此外，他们还设立夜校17所，人数达到243人，不具备兴办冬学和夜校条件的，则举办识字组49个，人数也达到了323人。根据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这个县在这一年使近千人获得了非常初步的文化教育<sup>[59]</sup>。不过，郭也在随后另外一次报告中承认，学员存在应付差事的情况：“今晚是他父亲，明晚是他哥，再一晚又是他弟弟。”<sup>[60]</sup>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举办冬学、夜校和识字组，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形式，它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还通过文字教学渗透了政治教化内容，使得农民们更好地认识到了抗日救国的重要性，也对边区政权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对于发动广大农民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1940年，边区的小学数量已经从以前的八十几个提高到了二百多个，小学生的数量从不到四千人提高到了两万人，文盲数量从99%降低到85%左右<sup>[61]</sup>。

访问延安的记者赵超构注意到，这里的乡村教师是“乡村文化的轴心”，他们“如像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sup>[62]</sup>。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长年封锁和战争，内地普遍缺医少药，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但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已经非常低下的医疗水准相比，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可说是更加恶劣。1935年前，延安城区仅有

几家中药铺和几名坐堂中医，陕北农民遇见头疼脑热时的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寻医问药，而是求助于香灰和巫婆。据统计，当时边区巫医数量达到了2096人。伤寒、出血热等传染病在边区都曾经流行，因传染病致死的人占总死亡率近半，而平均年龄仅十岁<sup>[63]</sup>。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延安市郊区黑龙村的11名育龄妇女，1935年前生育67胎，仅成活22胎，占32.84%，且有两胎是残疾<sup>[64]</sup>。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年死亡率达到了6%，一年约有7万~8万人死亡<sup>[65]</sup>。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医院成立，到1939年6月15日，已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化验室、X光室、显微镜室等现代医科，不过，尽管如此，整个边区的医疗水平仍然无法普遍得到提高。

1938年，边区由边区民政厅领导，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及民政厅投资，筹建了医药并举的机构——保健药社，此后先后在延安、延川等20个县的县、乡建立分社26处。保健药社开始设在安塞，1939年一度扩大为边区制药厂，以中药为原料加工成药，供应边区医院及其他医疗单位使用。保健药社自行研发了多种多样的中药，同时也辅以少量西药，由于乡村医疗水准低下，因此医生实行轮流下乡制度，深入到军民群众中去送医送药，药社还对灾民实行免费治疗、免费吃药，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九折优惠，而且药价相对低廉，因此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sup>[66]</sup>。

在文化教育之外，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些工作和冬学运动及后来倡导的新文字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边区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几乎占有民众半数之多的妇女而言，这次解放运动的意义是非凡的。

妇女运动的兴起得益于中共中央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在1939年6月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也强调：“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sup>[67]</sup>随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于1939年7月20日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女子大学。直到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前，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女子大学已培养了上千名妇女干部。

实际上，远在女子大学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派出大批妇女干

部，深入陕北乡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她们支持抗战，拥护共产党。由于外来人员常常无法进入民风保守的当地农民的窑洞，因此，很多女性干部以拜姐妹、拜干亲的方式获得村民的认可，进入他们的家庭开展工作。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农民家里有婚丧大事，还以赠送礼物（除了布料、银锁等实物外，还包括对联等新式礼物）的形式来表示祝贺，以与村民拉近距离。这些方式，都对当地妇女的文化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让妇女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一些女干部努力融入当地的女性群体中，并且取得了她们的支持和信任。在回忆录《延河儿女》中，曾经担任崖窑河村教员的江峰在《办冬学记》一文中细致地描述了1938年她所亲眼目睹的、青年妇女在接受共产党教育之后产生的巨大变化：

当时我真为春花这种循循善诱的才能感到惊讶而又自愧不如。平时她能把难度很大的妇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把她们分别组织到各种支援前线的生产组里。……这位才能超群的妇女主任，她微黑透红的面庞，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流露出她对知识的渴望。我由衷地钦佩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迅速而透彻<sup>[68]</sup>。

在冬学的教育中，女教师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江峰在《办冬学记》中回忆说，当她进入到村里的时候，村长非常高兴，因为女教师可以提高妇女参加冬学的比例：“前两年来的都是男教员，咱这里封建思想还很重，今年你来了，妇女们进冬学的就多起来了。”

江峰把40多名学生分为三个部分，便于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教学。上午是儿童上课，下午妇女上课，晚上男子上课。她回忆说，由于她是女教员，因此，来了20多名妇女学生，而教材是董纯才同志编的《冬学识字课本》《政治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没有笔，就用树枝代替，没有纸，就用平地当纸。妇女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但学习都非常认真。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在政治上翻身、生活上温饱后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令江峰深为惊讶：“她们的聪明天赋像喷涌出来的地下泉水，洗刷着被旧世界封锢而造成的愚昧。”<sup>[69]</sup>

1939年4月4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婚姻条例》，

规定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等<sup>[70]</sup>。这就从法律上否定了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此后的1939年8月1日，边区又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偷偷给女孩缠足的父母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sup>[71]</sup>对于能够自动放足和推动他人起到模范作用的妇女，边区将予以奖励。为了真正打消农民家庭对于放足后大脚女儿“嫁不出去”的顾虑，边区政府还组织了放足突击委员会及放足突击队，到各乡各户进行宣传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认识到放足的好处，逐渐接受了放足规定。边区放足一时蔚为风气。不仅如此，放足的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到边区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参加自卫军乃至成为参议会代表等等。这一系列规定，解开了束缚了陕北妇女数百年的枷锁。

通过渗透到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普及等方方面面的各种行动，民众支持抗战、拥护共产党的情绪日益高涨。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1938年救国公粮的征收中，任务不仅提前一个月完成，还超出原定征收量的70%，许多区域“实际只有三五天便完成了任务”，“许多抗日军人家属和贫农本来照例应当免税，但他们都自动地送粮食捐给政府。更有许多农民自动超过规定标准而缴纳公粮等。”<sup>[72]</sup>对农民而言，积极缴纳粮食支持前线抗战，意味着对共产党抗日军事行动的高度认可，而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基层组织，则意味着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获得了较大的认同度。

### 3 繁荣下的危机

陕甘宁边区“四方来归”的乐观局面并未维持多久。从1939年开始，由于负担急剧上升，边区民众不堪重负，一系列民众逃亡、自杀、公开责骂领袖等事件相继发生，直接影响到了边区政权的声誉，而民众对于共产党领袖执政能力的批评，则显示出政权前期所聚合的社会认同

遭遇了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亦明显有所动摇。

### (1) 公粮危机

史料显示，中共中央此次执政危机的导火线，是边区民众对“救国公粮”沉重负担的强烈不满。

所谓“救国公粮”，其实质是当时边区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也是建国后农业税的前身。它的原则是“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sup>[73]</sup>救国公粮规定了统一累进税的原则，相对稳定和科学，比之以往中央苏区以“吃大户”和随意募捐来解决机关和军队经费的模式，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在当时，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推进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甚至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前线军队的生死存亡。

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当年完成征收15000石救国公粮的任务。10月，边区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布告——《为征收救国公粮事》，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并随之成立了县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及其下属基层机构，负责征收和向群众宣传此举的意义所在，推进征收行动的顺利进行<sup>[74]</sup>。这一年制定的公粮征收计划为10000石，而最终实际征收数量为14197石，超额超过四成，但还没有达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原定要求的15000石的数量<sup>[75]</sup>。

老百姓对于交纳救国公粮并无异议，但对数量多少则是有看法的。在回忆录《延河儿女》中，江峰细致地描述了1938年她所亲眼目睹的交公粮过程中争执的一幕：

24岁的妇女主任春花，她有着女议员般的口才，政治家的逻辑思维 and 军事指挥员般的组织才能。有一天，我参加了救国公粮自报评议的全村各户家长大会。有一户富农认为大家评议不公，给他家评的公粮数太多了。春花说：“老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要算这个帐，不要站在家门口算，要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算。你看看前方八路军一天牺牲多少人，咱们军队一天流的血、流的汗与你这几石救国公粮比较比较，你就清楚了。”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使那富农低下头来。接着她补充说：

“老爹，过春节时，我从县上给你带个缴纳公粮模范奖状回来，贴在你家大门上。”那富农听罢，扬起头，欣喜地笑了<sup>[76]</sup>。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征收救国公粮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更加清楚，如果老百姓对救国公粮的征收产生对立情绪，则不仅可能危及抗战，更可能危及中共中央政权的巩固，为此，他们进行了规模庞大、细致深入的社会动员，要求“每一边区人民都有拿出一点粮食来帮助抗战的光荣机会”，并把缴纳救国公粮这一行为提升到“保证抗日需要 争取抗战胜利”的高度上来看待<sup>[77]</sup>。应该说，这一宣传口径与抗日救亡神圣意义的结合，极大提高了农民交纳救国公粮的积极性。同时，对于“造谣破坏，或鼓动人民抗拒不缴，以及故意贪污盗窃公粮等”行为，边区政府则视之为“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之汉奸行为者”，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毫不宽贷”<sup>[78]</sup>。这也不啻是强有力的威慑。

但是，随着救国公粮的任务一次次增加，民众生活压力陡然增大，这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极大质疑。在此情形下，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以及边区政府均成为民众批评的对象。

表 2-1 1937~1940 年边区公粮征收统计表<sup>[79]</sup>

年 份	耕地 (万亩)	收获量 (石)	计划征收 (石)	实际征收 (石)	实征占 收获量 (%)	每亩平均 负担 (升)
1937	862.6	1116381	10000	14197	1.27	0.16
1938	989.4	1211192	10000	15955	1.32	0.18
1939	1007.6	1754285	50000	52251	2.98	0.52
1940	1174.2	1526741	90000	97354	6.38	0.83

从表 2-1 可以看出，据边区财政厅统计，1937 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 862.6 万亩，计划征收 10000 石，实际征收 14197 石，超额超过四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为 0.16 升；到了 1938 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 989.4 万亩，计划征收仍为 10000 石，但实际征收达到 15955 石，超额几近 6 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上升到 0.18 升；1939 年，耕地并无太大增加（1007.6 万亩），计划征收的救国公粮却骤然上升到 50000 石，实际征收的数量则达到了 52251 万石，平均每

亩地的负担也上升到了0.52升。此时，实际征收的粮食数量占总收成的比例，已经从1937年的1.27%上升到了2.98%，也就是超过了一倍以上。

由于上交公粮的任务年年上升，民众的不满也渐次加大。延川县在1940年征收公粮的报告中承认：“自征收五千石的数目宣布后，一般群众都嫌太重，对完成这一个数目，很有些为难。”报告还说，在禹居九乡等地出现了平均摊派的现象。随后，报告人指出了这一方式产生的后果：“……既不能顺利完成，又招致一般群众的不满或群起反对。”<sup>[80]</sup>

可资质证的另一份报告来自1940年的第6期《共产党人》，这份月刊上刊登了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对乡村干部征收公粮的工作总结。干部杨英杰在这篇文章中反思说：“在动员中，较少说服解释，较多摊派命令”，“如说服无效，就开群众大会与他们斗争。这叫做斗争会，也是群众最怕的一个会”<sup>[81]</sup>。

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通过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公粮的任务得到了完成：“最初，干部和群众都惊奇延川会有这样庞大的数目字，但经过联席会以后，干部明白了方式，有了信心，这一战斗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sup>[82]</sup>

但过度征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1940年3月1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联席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征收公粮中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如这次工作中用强迫命令摊派征收公粮，违反民主作风，在某些地方表现得很十足。”12日，在此次大会的另外一次报告中，他则要求救国公粮应该有一定的征收标准，不能随意征收：“……有的收得太多了，如志丹差不多有30%，这不大好，也不调和。”<sup>[83]</sup>谢觉哉经过亲身调查也指出：“一般是乡级干部估定某人出若干，提到大会报告一下，就进行宣传，名字叫做‘宣传估定’，即宣传所估定的人，宣传不听就斗争，斗争无效，就交政府强制执行，这叫做‘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配合’”。他承认，“这里自然就包含着强迫摊派的因素，特别是在‘估定’不当的时候。”“差不多每乡区都有”<sup>[84]</sup>。这个调查结论说明，强迫摊派的情况是普遍性的。

基层资料中个案显示的情况更令人不安。1940年1月安定县写给边区政府一份便函，工作团干部刘呈云在征收公粮部分“不好的现象”中提及：“延川县永盛区（应为永胜区——笔者注）五乡樊家川村，有



一个难民名叫高段，家庭牲口没有，吃粮困难，给此人摊公粮7升。该乡石瑶村，还有一个马治宝，家中无土地，无牲畜，依靠买粮过活，给此人摊公粮3升，这个人大哭。”“如南区五乡有一个石国栋（党员），他说宁可出卖共产党三个字不愿出二斗粮。”<sup>[85]</sup>而在延川县征收救国公粮的报告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个别党员还不能运用合理负担的原则，使无力交纳公粮者被逼迫自杀。如永胜区六乡刘家川村刘尚银逼迫富农跳窑……”<sup>[86]</sup>虽然最终这个干部被逮捕法办，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类似因逼交公粮而自杀的极端事件，不仅出现于延川县一地。由于采取了搞竞赛等方式来征收，干部之间相互攀比数字的上升，使得很多地区农民的负担远远超过平均数，在少数地区如志丹县等地，甚至达到了30%以上<sup>[87]</sup>。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制定了富裕者多出粮的政策，地主和富农的负担实际远不止征收公粮规定的那么多。例如，米脂县杨家沟“头号地主”马维新1940年的收入为98.63石，支出则为253.35石米。其中，48%的支出用于交公粮（121石米）。因为入不敷出，马维新不得不出卖粮食127.89石。1941年略有减少，但公粮负担也达到了33%。张闻天所带领的调查团对此也评论说：“给了他一个大的打击”，“从1940年起马维新的经济已经从发展走到停滞了。”<sup>[88]</sup>可见，救国公粮的征收政策对于富农和地主的压力，较之普通民众要更为沉重。

到1941年，救国公粮的负担前所未有地增大。此前的1940年实际上是陕甘宁边区整个抗战时期因灾粮损最惨重的一年——因为接连遭受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的袭击，整个边区受灾面积达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受灾人口达到515145人<sup>[89]</sup>。但由于外援的全面断绝，所有行政经费和军队给养不得不完全依靠边区民众来负担。这一年，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而实际征收量为201617石，实征数量占收获量的13.85%——这平均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税收“十收其一”的标准，大大超过了民众的承受能力。事实上，在离政府所在地最近的延安县，征收比例远远高于此数。

表 2-2 1941~1945 年边区公粮征收统计表<sup>[90]</sup>

年份	公粮征收量 (石)		实征占收获量 比例 (%)	每亩平均 负担量	每人平均 负担 (斗)
	计划数	实征数			
1941	200000	201617	13.85	1.66 升强	—
1942	160000	165369	11.14	1.33 升强	1.22
1943	180000	184123	10.16	1.38 升弱	1.30
1944	160000	160000	8.83	1.20 升弱	1.10
1945	124000	124000	7.75	0.87 升弱	0.77

据这一年的《解放日报》刊载，延安县河庄区四乡有居民 245 户，人口 1212 人，根据调查，当年全乡秋田收获粗粮 3500 石，按六成折合细粮 2100 石，麦子收获 500 石，按 1.4 斗折合小米 357 石。合计细粮 2457 石，征收公粮 664 石，征粮后，每人平均剩余细粮 1.48 石。由于 1941 年“延安县公粮征收任务比往年增加了一倍，所以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是加重了，致全乡的负担占收获量 27%，个别群众负担占收获量最高达 40%。”<sup>[91]</sup>按照这个数据，农民们的年均细粮占有量只合 237 斤，折合人均每日细粮占有量为 0.65 斤，即使完全换成粗粮，也只有 1.1 斤左右。

这一组数据所显示的粮食短缺并不仅仅限于河庄乡一地。据学者袁文伟研究，当时边区人民粮食占有量人均 1 石 1 斗 1 升，缴纳公粮后已不足 1 石。此外，由于粮食告急，边区还曾经向民众借粮 2 次，总数约为 5 万石<sup>[92]</sup>。扣除应留的籽种，边区群众的实际粮食占有量每天只合新制六七两左右<sup>[93]</sup>。由此可见，日均 7 两左右的粮食占有量是当时的普遍状况。

这个阶段，报纸上仍然保持着对局势的乐观情绪：“救国公粮征收以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总不像讲的那样严重，农民在公粮征收以后还有剩余粮，不但可以维持生活，还存有使农村经济向上发展的力量。”<sup>[94]</sup>但实际上，党的内部对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当时境况心知肚明。后任职国家物资总局某处处长的干部冯正明在回忆此一段时间的民众负担时承认，边区“每亩平均年产量不过四十来斤……难以养活众多的脱产人员。”“据历史记载，在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上，脱产人员从未超过两万的，可是抗战开始后，边区脱产人员从 1937 年下半年的一万四千多，增至 1939 年的五万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扩大了三倍，此后还

继续增加到七万、九万以致十二三万之多。”<sup>[95]</sup>

即使在当时，高级领导人对形势也未觉乐观。被要求到农村进行农民调查的张闻天观察到，“整个经济是缩小的”。他在“晋陕调查报告”中评价说，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地主的生产力水平<sup>[96]</sup>。很显然，民众当时的生活水平不但难以满足过上宽松日子的需要，更难以解除他们对于荒年无粮的恐惧。虽然民众能够理解这是抗战需要所致，但仍然对中共中央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也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 (2) 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和救国公粮上交数额的迅速增加类似，在大生产运动开始前，边区由于经济紧张，也不断加大了工商业税收及劳役代金等各方面财政收入项目的征收力度，使边区百姓的其他负担大幅增加。

首先是税收政策从保护经济为主改变为增加财政收入为主，导致边区民众税负剧增。

如前所述，陕甘宁边区工业基础几近于无，包括糖类、金属制品在内的生活必需用品都需要从外地输入。1935年长征胜利之后的1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随即颁发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宣布“取消一切工商业捐税，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苏区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大小商人也可自由到苏区营业；除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出产品可自由输出；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这就有力地纠正了此前中国共产党关于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极左”倾向<sup>[97]</sup>。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进驻，大批人员流入延安，使得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延安的私营商户从1936年的123户发展到1940年为280户，1944年为473户<sup>[98]</sup>，使得通过工商业税收来获得财政收入有了基础。但本着“休养民力”的宗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轻税政策。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边区取消了过去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轻税率。取消苛捐杂税后，边区只对食盐和出口皮毛、药材等征收统一税。食盐减为每一驮只收税2元，并取消盐税附加。一切税收除一次统征外，都无任何附加和重征<sup>[99]</sup>。1939年之前，除盐税外，边区不曾征过任何其他品种的工商税收。从1939年开始，

除了实质为农业税的救国公粮外，边区先后制定了工商方面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其总方针为“保护边区经济发展，配合物资政策，增加财政收入。”<sup>[100]</sup>

1939年12月28日，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税收条例》，这部条例共15条，其中规定了包括盐税、货物税、营业税和牲畜斗佣等不同项目，还规定了税率。在货物税中，有牲畜、皮毛、药材等货物的出境税，以及烟酒和迷信用品的入境税等。出境税率为货物价格的10%，而入境税收因涉及当时的所谓“奢侈品”，因此征收高额税收，酒类征收其价格的20%，烧纸锡箔等迷信用品的税征比例则高达价格的30%<sup>[101]</sup>。这期间，政府的相关政策显以保护经济和发展工商业为主，税收的政策相当宽松。

至1940年，随着国共摩擦加剧，边区经济紧张，政府随之开始调整工商税收政策。1940年5月30日，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货物税暂行条例（草案）》，在这个进一步细化税收条例内容的草案中，食盐产地税已经从骆驼每驮（即每头骆驼所运载的食盐数量）1元上涨到6元，牛、马、骡每驮（即每头牛、马、骡所运载的食盐数量）从0.7元上涨到4.5元，税率涨幅达6倍之多<sup>[102]</sup>。

1941年10月1日——距上一次提高税率仅仅一年半不到——边区政府因经济窘困，不得不再次修正原有的货物税条例，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货物税修正暂行条例》。这一条例的修正，旨在增加更多税源，体现了“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保护经济为辅”的政策思路，与此前一直坚持的“保护边区经济发展，配合物质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商税收政策思路，歧异殊甚<sup>[103]</sup>。

最为巨大的变化，是需交纳货物税的货物种类大幅增加，除旧有的盐、毛皮、药材、油料和迷信品、烟酒之外，税收种类扩展到了布匹、棉制品、杂货和毛制品等多项；其次，税率又有大幅度提高，货物税率成倍增加，仅以迷信品（烧纸、锡箔、香表、冥币等）为例，税率从原有的30%上涨一倍，达到了60%。

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外援完全断绝，边区政府不得不开辟新的财源，颁布了大量的工商税收法规。仅在1940年和1941年，边区颁布和修正的工商税收法规就达到了15部之多。<sup>[104]</sup>与前期相比较，此间的财政政策宗旨是以增加收入为主，而保护经济则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例

如，征税的项目大为增加，起征点明显降低而税率显著提高。到1942年，政府再度修正相关法规，规定“从量征收”<sup>[105]</sup>，即以货物数量为单位征收实物税。这是当时物价飞涨下政府的无奈之举。

短短几年间，政府颁布的有关税收的条例达到了26部<sup>[106]</sup>。

其次是义务运盐及“公盐代金”的沉重负担。

陕甘宁边区定边、盐池盛产食盐，而国内市场盐价颇高，因此，在财政出现问题之后，销售食盐所得成为边区财政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但食盐从产地向外运输，需要人力畜力，边区政府遂发动民众义务出工，帮助运输食盐。

当时规定，从边区到乡各级都要组织食盐运销委员会，中央局书记高岗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担任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这就使得“义务”的性质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成为准军事化的徭役。军队少部分人在具体操作中的粗暴态度，也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不满。

胡乔木在回忆这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之间的争论时承认存在分歧：林伯渠和谢觉哉“主张盐的运销‘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sup>[107]</sup>。

此外，由于边区大部分家庭都不具备运输食盐的畜力人力，不得不以交纳“公盐代金”的形式代替。

“公盐代金”始于1941年，是一项临时性的捐负，为边区政府代替无法出工运输公盐的替代物。据南汉宸在1944年8月所作《边区财政工作》所总结的数据，1941年部队赴定边生产食盐6万驮，代金收入为700.9万元<sup>[108]</sup>。但另一组数据表明，“公盐代金”的标准为每驮40元，据此推算，当年的公盐代金民众总负担本来按规定应为240万元<sup>[109]</sup>。这两组数字表明，政府向民众所收取的公盐代金，远远超过了它本身原定的标准。

“公盐代金”一直是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1941年和1942年，此项所得曾一度占边区年财政收入比例的27.73%和10%，后来则有所下降<sup>[110]</sup>。在这两年里，从民间到边区最高层，关于运盐劳役与“公盐代金”的争论与不满不绝于途。毛泽东在与谢觉哉的通信中指出，在盐的运输中，中共中央采“官督民运”之策确为无奈而必要之举，但他也承认，这一政策实际上含有强制成分在内：“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

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sup>[111]</sup>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曾经就类似问题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人多次沟通。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前信未蒙林老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sup>[112]</sup>

由此可见，当时对食盐运输所造成的民众负担，即便是边区最高领导人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

后来，南汉宸在回顾财政工作时承认，在食盐运输问题上已经达到了“赔本叫苦”、“天怒人怨”的地步：“历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是走了不少弯路。在食盐运输问题上，四三年以前为了发动大量运盐，用过动员贩运，运公盐，组织运输，设立草料店督运等，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人赶牲口’、‘牲口赶人’、‘赔本叫苦’。”<sup>[113]</sup>

除“救国公粮”和“公盐代金”外，边区民众的负担还包括购买“救国公债”（仅1941年，边区民众就被动员购买公债500万元）<sup>[114]</sup>、负担“救国公草”、“寒衣代金”、义务劳军、义务运粮运草，以及盐税、糖税、酒税、油税、耕牛税、羊子税、棉麻税、甘草税等。仅动用壮丁一项，每个壮年男子就需要服务至少20天<sup>[115]</sup>，此外，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每个边区家庭还需要承担出牲口的义务。每户出牲口一头，分富户、中户、贫户，“其全年总服役时间富户不得超过80天，中户不得超过40天，贫户不得超过20天。……如无牲口，需自行雇佣，费用由应征户承担。”到1942年1月，条例修改之后，这项负担更其沉重：“凡能供驮运之牲口，每月有为公服役三天之义务”。即每年贫户亦需36天<sup>[116]</sup>。

一些地区为增加财政收入，所列收费项目令人啼笑皆非——如宁县“为了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向砍柴的贫苦农民收取“斧头登记费”，每月每把斧头要交一元。事后被边区政府严厉批评，方得及时纠正<sup>[117]</sup>。边区民众负担之沉重，就连应毛泽东之命，于1941年出任边区财政厅厅长，着力征收公粮，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南汉宸，亦在1948年总结抗战以来的财政状况时承认，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sup>[118]</sup>。

由于人口增加迅速，需求无法跟上供给，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增加收入，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还是迅速走到崩溃的边缘，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物价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据西北财经办事处 1949 年 2 月 18 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显示，延安市物价总指数如下：

1938 年 7 月为 153.3，12 月为 161.4，全年为 143.1；

1939 年 6 月为 201.6，12 月为 377.3，全年为 237.3；

1940 年 6 月为 420.8，12 月为 716.9，全年为 500.6；

1941 年为 1914.5，12 月为 4421.0，全年为 2228.9<sup>[119]</sup>。

据朱鸿召研究，1938 年秋，延安的白糖每斤价格为 1 元，是重庆售价的 4 倍。1938 年 12 月 10 日开始到年底，延安《新中华报》开设“五日延安”专栏，公布延安市场上主要生活物资价格，该日，猪肉的价格为每斤 5 角，而同期重庆和成都猪肉的价格则分别为每斤 2 角 3 分和 2 角。同样是主食，延安的麦子每斗价格为 4 元 1 角，而重庆的大米价格只有每斗为 3 元 5 角，成都大米的价格则为 2 元<sup>[120]</sup>。

虽然物价几乎是边区之外的 2 倍，此时边区的商品价格仍然可称平稳。但至皖南事变发生之后，物价则可用“飞涨”二字来形容，特别是仰赖进口的轻工业制品，因为稀缺而洛阳纸贵。原来零售价一盒只有 0.1 元的香烟，涨到 100 至 300 元一盒，零售价 5 分钱一盒的火柴，涨至 50~100 元。延安一个乡的 20 户新来移民反映，他们买布的开支居然占到家庭总支出的三分之二<sup>[121]</sup>。延安县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的农民因为买不起布，夏天只能把冬衣里的棉花去掉作为单衣来穿<sup>[122]</sup>。边区的流通券也接连不断地发行面值 100 元、500 元、1000 元乃至 10000 元的大额票券<sup>[123]</sup>。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币最高面值甚至达到了 5 万元<sup>[124]</sup>。

由于边币、券币贬值太快，一日数价，“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物价迅速上涨，每种货品一天总是改变几次价。”<sup>[125]</sup>另外据学者研究，1945 年上半年延安物价指数达到战前 1937 年上半年的一万四千多倍<sup>[126]</sup>，导致不少地区的民众拒绝使用边币。

这一现象，让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极为焦虑，他在一份密电里通知各地财经机构：“最近边区各主要市场，金融和物价已发生了极大的波动。……我们必须看清楚，目前情形已非常严重，如果继续

发展下去，将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物资逃避，而影响到整个边区的财经混乱。”<sup>[127]</sup>

由于财力入不敷出，内部矛盾也逐渐显露，边区民众的不满已逐渐影响到红色政权的稳固。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如士兵纷纷逃跑<sup>[128]</sup>、民众迁往国统区、土地大片撂荒等，让毛泽东已经无法坐视经济等诸方面的巨大压力。他在咨询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和组织部长陈正人关于安塞县报告时要求“……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sup>[129]</sup>尤其是缺少粮食直接影响军心稳定，一旦军队无粮无饷，建立在枪杆子上的红色边区政权的未来不堪设想。事实上，此时已经出现军心不稳的情况。南汉宸在一份报告中密报“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8、9次的，扰民太甚，但粮食供给仍不能保证，有的部队两天没有吃上粮。”<sup>[130]</sup>

作为领袖，毛泽东意识到，必须从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入手，缓解边区的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以及对自己所领导的执政党的信任。

大生产运动，正是在新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下开始发动的。

## 注 释

- [1] 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历年多曾变动，这里以1937年成立时的数字为准。参见姬乃军：《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沿革》，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170页。
- [2] 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8，中华书局1962年版。转引自秦燕：《陕甘宁边区时期农业开发政策的环境效应》，《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 [3] 马雪芹：《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4] 图片征引自红色思源网：<http://www.1389.com.cn/a/laoqugaikuang/geminglaoqu/2010/0113/983.html>。
- [5] 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2）·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 [6] 甘泉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甘泉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 [7] 《安塞县志·田赋志》。
- [8] 路伟东：《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历史地理》2003年第19期。
- [9] 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载《前锋》创刊号，1923。
- [1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 [11] 前揭书，第8页。
- [12] 埃德加·斯诺前揭书，第225页。



- [13] 左健之：《从物价高涨说到抗战中的民生问题》，《解放》第97期，1940年1月30日。转引自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 [14] 《陕西农村调查》，151~156页，转引自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 [1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 [16] 埃里克·泰斯曼：《领事馆中国西北行记》，转引自马克·塞尔登前揭书，第26页。
- [1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9编，第4页。
- [18] 奥托·布莱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 [19] 埃德加·斯诺前揭书，第29页。
- [20]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 [21] 陈志杰、刘远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1年第4期。
- [22] 参见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 [23]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3编，第3页。
- [2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 [25] 林伯渠：《推行新文字与扫盲教育》，《解放日报》1941年6月4日。
- [26] 在当时的文件里曾经多次提及对买卖婚姻及吸食和贩卖鸦片的事件的处罚。参见前揭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第1辑，第171页、第188页、第280页。
- [2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1编，第27页。
- [28] 杨和亭：《红日照陕北》，西安：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1996。转引自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051c601000e3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051c601000e38.html)。
- [29] 《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效果》，《红色中华》，第255期。
- [30]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苏区工作的指示（1935年9月3日）》，中央档案馆910卷2（681）号，转引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 [31] 《斗争》，第77期。
- [32] 王首道：《西征中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7月21日）》，载《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 [33] 沙兵：《目前只有苏区才是经营工商业最好的地方》，《红色中华》，第193期（1935年12月1日），转引自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 [34] 《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3页。转引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 [35] 《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效果》，《红色中华》第255期（1936年2月13日）。

- [36] 黄正林前揭书，第65页。
- [37] 参见贾康、赵云旗前揭书。
- [38]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8页。
- [39] 前揭书第14页。
- [40] 前揭书第189页、第239页。
- [41] 前揭书第36页。
- [42] 前揭书第136~138页。
- [43] 《新中华报》，1937年5月23日。
- [44] 参见王铁群：《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
- [45] 前揭书。
- [46] 薛鑫良：《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学习月刊》，2009年第9期。
- [47] 前揭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第2辑，第84页。
- [48]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 [4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 [50] 关于“豆选法”的资料可参见王铁群：《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以及黄齐生：《延安选举见闻》，载任宏、高梅主编：《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 [51] 前揭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第1辑，第134页。
- [52] 前揭书，第135页。
- [53] 前揭书，第135页。
- [5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2辑，第96~97页。
- [55]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 [5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1编，第27页。
- [5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135页。
- [58] 贾芝主编：《延河儿女》，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 [5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191页。
- [60]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278页。
- [6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2辑，第129页。
- [62]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60页。
- [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前揭书第2辑，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93页。
- [6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7编，第377页。
- [6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前揭书第2辑，第93页。
- [6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7编，第377~379页。

- [6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 [68] 贾芝前揭书,第296页。
- [69] 前揭书。
- [70]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 [71] 前揭书第43页。
- [7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142页。
- [73]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105页。
- [74]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18页、第21页。
- [75] 边府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见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6编,第152页。
- [76] 贾芝前揭书,第296页。
- [7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19页。
- [78] 前揭书。
- [79] 边府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152页。
- [80]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2辑,第48页。
- [81] 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续完)》,《共产党人》第六期,第53页。
- [82] 前揭书第49页。
- [83] 前揭书第91页、第129页。
- [84] 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120页。
- [8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2辑,第35页、第32页。
- [86] 前揭书,第48页。
- [87] 前揭书,第129页。
- [88]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7~169页。
- [89] 贾康、赵云旗前揭书。
- [90] 前揭书。
- [91] 《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怎样?》,《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1日。
- [9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152页。
- [93] 参见袁文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及其特点》,《中国现代史学会30周年庆典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3页。
- [94] 《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怎样?》,《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1日。
- [95] 冯正明:《浅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从半自给自足向全自给自足的转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10期。

- [96] 张闻天：《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1942年7月9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 [97] 黄道炫认为，在中央苏区的工商业经济政策中存在严重的极左倾向，“……商人在中后期被认为‘是我们敌对的阶级’，和豪绅地主等同列为肃反的重要打击对象，因此，无论是税收政策，抑或以捐募等名义对私人工商业财产的收缴，都在实际上形成对私人工商业的打击：‘任意没收商人的货，以至加以拘捕’”。见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这一点，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来到陕甘宁边区后开始重视团结当地工商业从业者，并制定政策鼓励他们发展。
- [98] 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6期。
- [99]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 [10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231页。
- [101]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 [10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241页。
- [103]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231页、第241页。
- [104] 黄正林前揭书，第5~7页。
- [105] 前揭黄正林书，第25~26页。
- [10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241页。
- [10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 [10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373页。
- [109] 参见牧人：《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地区盐务》，《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110]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367、第374页。
- [111] 毛泽东：《致谢觉哉〔1〕，（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 [112] 前揭书。
- [113]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9编，第48页。
- [114]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 [115] 1941年颁布的《战时动员壮丁牲口条例》即规定：“凡年满18岁至45岁之男子为壮丁，其全年服役时间，依该户壮丁人数之多少分别规定为20天、30天、40天；”参见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等编：《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 [116] 前揭书，第81~82页。
- [11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2辑，第276页。
- [11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9编，第49页。
- [119] 朱鸿召前揭书，第20页。

- [120] 前揭书，第 21~22 页。
- [12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 3 编，第 16 页、第 550 页。
- [122] 《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3 日。
- [123] 朱鸿召前揭书，第 22 页。
- [124] 姜宏业：《革命根据地的货币（1937-1949）》，《党史研究资料》第 6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7 页。
- [12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 4 编，第 495 页。
- [126] 参见于松晶、薛薇：《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管理》，《历史档案》，1999 年第 1 期。
- [127] 贺龙：《发给各分区财经分会的密电》，#年#月 15 日，根据资料内容分析，时间估计为 1941 年底或 1942 年初。转引自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 9 编，第 43 页。
- [128] 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在《共产党人》的刊文《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们抓绑一个开小差的士兵，押送其归队的过程。同一期的《共产党人》中还刊登了一篇莫文骅的文章，介绍一个十六个月没有发生士兵逃亡的模范连党支部的组织管理的先进经验，由此可见，当时逃亡已经非常普遍。见《共产党人》第六期。
- [129] 胡乔木前揭书，第 140 页。
- [130]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 9 编，第 48 页。



### 第三章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危机下的紧急政治动员

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

## 1 “大生产运动”的提出与神圣意义的赋予

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以 359 旅进入南泥湾垦荒为标志性事件的“大生产运动”，其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经济和军事封锁，而通过推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年轻的共产党人有效地化解了边区的经济危机，使得南泥湾及其他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农村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北地江南。

这一记忆的话语逻辑建构，直接来自于当时的官方文件表述——在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作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时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sup>[1]</sup>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件，被收入总发行量达到 6 亿册的《毛泽东选集》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大生产运动之原因最为权威的表述。在《组织起来》中，毛泽东同样指出：“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sup>[2]</sup>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毛泽东这几段对大生产运动起因的表述也因此盖棺定论，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敌人封锁进行抗争的南泥湾垦荒，自此成为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应对困难并一再获得成功的精神象征。

纵观目前的各种相关论述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起因，基本与这一官方表述一致。

但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经济和军事封锁是否正是边区经济困难、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决定性原因？从原始史料的追溯来看，在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封锁的确令边区经济矛盾尖锐化，但如果因此



而认为它也是边区经济困难的起因，则与事实真相不完全契合。

### (1) 边区危机的真实起因

对于边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兼贸易局长的朱理治是最具发言权的人士之一。他在当时的一次财政部门的报告中对此解释如下：“过去靠外面的接济（单在一九四零年便有一千零四十万的外汇及法币）”，“那时边区所需要的布匹、棉花、纸张及日常各种用品几乎完全仰给友区。但由于边区是个国防重地，并且是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所以财政上的消费量不得不增大。于是经济的生产力和财政上的消费力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皖南事变之前，由于获得了国内外对边区的充分帮助而得到解决，而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外援助的完全隔断，遂尖锐化起来。”<sup>[3]</sup>从这段话中可知，出现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财政支出过大而导致的不敷出，而非外援断绝。

边区政府的经济困境是当时军政人员急速扩张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其原因则来自毛泽东对于各方面人力的重视。中共中央在抗战中注重扩展实力，因此而带来的军队急速扩张，干部、学生等非生产性人口大量增加，即毛泽东所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sup>[4]</sup>，是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的首要原因。

回溯边区经济状况的相关史料，即可看出，早在1938年，边区经济已初现困境。这一年的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要求各解放区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但必须注意到，其时来自国民政府的拨款及海内外广大爱国和进步人士的捐助不但没有断绝，数字还比此前的1937年有大幅度增加。1937年国民政府拨款1927672.84元法币，占财政收入366.27%；1938年为4480157.16元法币，同比上升为占财政收入493.44%。此外，仅这一年的11、12月陕甘宁边区就收到香港、重庆及宋庆龄从菲律宾的汇款共计法币64万元；1939年的1、2月，边区又收到外援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

1939年，外援金额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为85.79%，为抗战以来历年中最高。而这一年国民政府的拨款达到5000436元法币，也达到了历年拨款的最高点<sup>[5]</sup>。

上述数据显示，边区1938年底到1939年初的经济危机之起因，并非经援断绝所致。事实上，边区这段时间所接受的来自外界之拨款与捐献援助收入，数字是大为增加的。

那么，为什么在外援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最高的年份，陕甘宁边区却面临毛泽东所警告的“饿死、解散”的困境？我们也许能够自《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通过军队数字的增长一窥端倪：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的总人数约为7000~8000人左右<sup>[6]</sup>，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等人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编成情况的研究则显示，1936年底，各路红军集结陕北，截至抗战时期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该地区的军事人口达到4.2万余人。此后，八路军开拔前线，边区留守部队人口降落到约9000人左右<sup>[7]</sup>。

此外，朱德曾经于1938年在周恩来陪同下详细报告八路军的分布情况和战绩，称八路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万<sup>[8]</sup>。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留在了边区。到1939年的反共高潮时，为保卫边区和中共中央，边区的军事人口又逐渐回升到约3万人<sup>[9]</sup>。对于扩军的意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在军令中体现得异常明确：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与王稼祥一同致电叶挺和项英，要求扩军。根据这个指令，到3月，新四军已经从原有的五千人扩张到一万五千人<sup>[10]</sup>。第二天，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一同就扩军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晋西北及十五区域扩军不宜过多。否则，经费决难维持，不能持久。在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包括苏北在内，有枪可收，物力亦富，应大加扩充。”<sup>[11]</sup>从这个“扩军三十万”的宏伟计划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在急速扩张。

按照此前国共双方约定，共产党所属军队自国民政府处所获军饷，仅为正规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开支，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军队除上述两支正规军外，还包含了各地的大量游击部队。国民政府为了遏阻中国共产党增强实力，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总额严格控制在原有编制之内，对新增军队及游击部队军饷不加考虑<sup>[12]</sup>。1940年8月28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提交8月“中央提示案”的复案，内有关于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的要求<sup>[13]</sup>。这意味着，不计服装、蔬菜等其他用度，以当时每人每天至少一斤小米

的最低粮食供给标准而论，增加 30 万军队每年仅粮食就需要后方增加约 40 万石的给养。而此前，1939 年陕甘宁边区的粮食总生产量仅 175 万石<sup>[14]</sup>。急剧扩张的明暗军事力量之巨额军饷支出，远非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能够承担。显然，这一庞大扩军计划的制订者扩充实力的愿望，超过了对边区民力承担能力的考量。而如何维持庞大的军费，不使士兵因为缺乏给养而流散或心生怨望，势所难免地成为红色政权的一个重要课题。

直到 1940 年 9 月前，国民政府依然未有断绝边区的经济支援，按照朱理治援引的统计数字，这一年，外援总量达到法币一千零四十万<sup>[15]</sup>。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急速扩张，其巨额军饷支出，远远超过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能够承担的总量。

军队之外非生产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宣传，吸引了大批爱国抗日人士踊跃来归。随着抗日战事日益激烈，河山半壁沦丧，积极宣传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得到越来越多国内民众的支持，延安成为大批爱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从武汉、桂林乃至海外源源不断地经由西安来到延安，加入到八路军、抗大、鲁艺等各个群体的革命洪流里。从上海逃奔到南京而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的青年贝特兰回忆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sup>[16]</sup>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干部的培养，陕甘宁边区办了 20 多所干部学校，大批前来的青年学生，以边工作边学习的形式投入延安火热的学习运动。

据统计，1938 年 7 月，仅抗大就有学员 4269 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 2049 人，此外，抗大还有 657 名教职员工，其中外来知识分子占 47%<sup>[17]</sup>。

一般而言，行政人员数量应控制在总人口的 3% 以内，但当时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已经达到 5.4%<sup>[18]</sup>。5% ~ 6% 的行政干部数量，对于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可谓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杨尚昆回忆：“1940 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陕甘宁边区 140 多万人口，要供给 7 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sup>[19]</sup>即此时非生产人口已经达到了 7 万人。这些人口都实行统一配给制度，一日三餐均由单位供应。

由于非生产人员增加迅速，边区的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 18.86%。1940 年秋季开始，由于国共局势恶化，军饷停发，边区政府财政无款购粮，开始完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来解决机关干部、部队人员和学生的粮食供应问题<sup>[20]</sup>。如前所述，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上升，1941 年“救国公粮”额度为 20 万石，是 1938 年计划增收量的 20 倍、实际征收量的 12 倍以上<sup>[21]</sup>。仅仅 4 年间，边区百姓的负担增加到原来的 12 倍。此外，这四年里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使得边区百姓普遍产生了恐慌情绪。

恐慌情绪的表现之一是在公粮征收中以村落为单位，包含群众与干部在内的民众组织起来进行瞒报：“以多报少，互相包庇，甚至全村有组织的谎报”。例如，吴堡县个别干部不但自己不敢实报，“而且互相包庇。前坪村的群众全村隐瞒，甚至认为实报是‘鳖’”<sup>[22]</sup>。

二是民众罢市和逃亡。在安定县，部分商人和民众不堪 20 余种捐税的重负，相约闭门罢市。安塞县部分民众放弃生产，“准备吃完存粮后即走横山一带”<sup>[23]</sup>。

对此，毛泽东承认：“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例如 1941 年和 1942 年两年农民所出公粮、公草、公盐甚大，而两年农民所扩大的耕地只有 60 余万亩，仅占 1939 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 1941 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羊反而减少了（当然瘟疫有关系）。移民也减少，1942 年移民只有 4843 户，并有 3527 户老户发生迁移，原因主要是怕负担。”<sup>[24]</sup>所谓“迁移”，实际就是当地民众的出逃。对此竭泽而渔的做法，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三是部分地区出现了群体性抗议和骚乱迹象。例如，在本来就发生了灾荒却仍然被迫交纳大额公粮的华池县一些地区，“受灾婆娘、小孩、老人每至吃饭时即到区府吃饭，很长时期就阻止不住。”青化区、河庄区的群众对在生产者家无隔宿之粮的情况下，干部每天仍然享受一斤四两小米的配给深感不满，讥讽性地要求将收获的公粮全缴给政府，而政府则应该参照干部的标准，每天配发每人一斤四两小米<sup>[25]</sup>。而在环县，由于干部肆意打骂和拷吊无法交粮的农民，民众因征粮扩军而酝酿的不满情绪被土匪赵老五利用，酿成了 2000 多名自卫军跟随赵老五哗变的“环县事变”<sup>[26]</sup>。

边区各地民众普遍出现的不满情绪，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对政府工

作人员在征收公粮、收缴税捐中强行摊派、竭泽而渔的不满，更来自干部与农民之间的明显生活水平差距：相比起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阶段边区政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准虽比之前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要好得多。

1941年底，边府总务处在总结报告中说：“在公家规定原则内，改善了生活。”“全年一贯的是八分菜洋，而吃物价值最底（低）没下三毛，食粮调剂，一不惟能多用粮，而且保证了适合的吃米吃面，除此而外补助了行政与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也值数万元”<sup>[27]</sup>。从边府总务处全年实际消费的粮食来看，人均年消费量1.7石多，相当于边区群众的3倍<sup>[28]</sup>。就在边区民众最为艰苦的这一年里，边府总务处的报表还显示，整年边区政府伙食总费用为38273元（如前所述，伙食标准并不低），但所报这年养马的费用则达到了31297元，已经颇为接近餐费用度<sup>[29]</sup>。据总务处称，马“大都是首长骑”<sup>[30]</sup>。

此外，从1940年起，延安干部实行分灶制度，按照大、中、小灶来区分干部的伙食待遇，一些领导人还有自己的特灶。

在绝大部分人民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这种“衣分三等，食分五等”<sup>[31]</sup>的现象，就格外容易引发不满和质疑。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披露，毛泽东曾经两次挨骂。这两次挨骂的起因都是粮食问题所引发的矛盾。这些事件清晰地显示出几点迹象：

①如责骂毛泽东的农妇伍兰花所抱怨的——“这是我们一家的活命粮”<sup>[32]</sup>，显示税负压力已超过了民众所能够承受的限度，这使得部分民众对当时的边区政府和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强烈不满。

②不满的原因除了因为公粮征收而造成的经济压力，还来自于民众对干部的做法及作风的不满：“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sup>[33]</sup>

③基层干部对民众产生的不满情绪，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根源所在，却上纲上线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高度来看，进一步加剧了政府、执政党、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不无焦虑地承认说：“这次检查出来一七七个坏干部，有一百四、五十个是乡级的……

群众说县级、边区一级的干部都好，但乡级干部太其害怕了……”<sup>[34]</sup>但是，所谓“坏干部”，很多是因为催逼公粮而引发民怨，归根结底是由于粮食危机而导致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危机而不是官员腐败。

这些迹象表明，经济危机已大大破坏了前述1937年以来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民众中所获得的高度认同，而直接导致对红色政权的信任危机。

为未来逐鹿中原长远计，党需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扩充实力，发展军队和工作人员，但因此带来了非生产性人口的剧增；不增加救国公粮及税收等以筹措经费，边区工作人员和庞大的军队就无以维持；但边区地瘠民贫，若民力枯竭，民怨沸腾，又会使得政权的基础发生动摇，危及整个党和政府的生存。

在这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面前，毛泽东焦虑不堪。在苏区根据地具有一定经济建设经验的他敏锐地意识到生产自救的必要性，并且将其视为在这一阶段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主要关键。

这年新春伊始，按传统习俗，陕北农村仍处于冬闲期，但毛泽东作出决定，要向全边区的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明确的指令和信号，迫使习惯于公款配给制且已不习农事的干部和军队成员，制定生产自救计划以挽救危局。

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面临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sup>[35]</sup>不过，对于毛泽东的观点，边区政府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并不认同。1941年夏秋之际，中共中央内部就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朱德等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即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等人则主张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要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财政收入不敷用度，则应“精兵简政”，减少开支，并反对增发边币，认为若减少军队数量和边区干部、学生等非生产性人口的数量，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据谢觉哉同志日记和有关资料，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写给林、谢的信就有10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sup>[36]</sup>

当时的财政部长南汉宸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期的财政工作时承认，关于如何渡过困难曾引起了中央内部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sup>[37]</sup>

由此可以看出，在边区内部，不仅基层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大为降低，即便在高层，对这一阶段的执政政策亦争论颇多。对于一个实力尚弱、割据一方的年轻政权而言，来自内部的认同危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在内部局势紧张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外部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1939年开始，国共关系渐趋紧张。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频频公开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战”；《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主笔王芸生也严厉批评八路军“养寇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sup>[38]</sup>。地处陕甘宁边区南部前沿的宁县成为双方摩擦拉锯的焦点。从这年的4月到次年1月，双方摩擦不断，多次发生流血事件，最终，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夺取了原本属于边区的宁县和固原地区。

1940年冬，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这个时候起，国民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军用物资，声称“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并声言将断绝对于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实行全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一措施，使得边区内外交困，用“濒临绝境”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内有“仁政”之争，外有“游而不击”之讥，种种迹象显示出，中共中央在1941年所面临的困境，已不是简单的粮食供给问题，而是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双重挤压下，民众认同感急剧降低所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甚至认为，此次危机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1934年江西及其他根据地丧失后的第三次“灭顶之灾”<sup>[39]</sup>。

## (2) 政治议题的神圣性赋予与认同建构

“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sup>[40]</sup>虽然毛泽东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借机大力扩张军队和党的力量，等待将来有机会与蒋介石逐鹿中原，解放全中国。但在当时全民抗战、两党合作的现实政治形势下，这个理由颇难宣之于口，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已经物议沸腾，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徒然耗费军饷。因此，唯有避开关于“养寇自重”的争论，把种地、纺线和国家危亡联系起来，把经济建设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把“自己动手”和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联系起来，将危机起因引向边区之外，激起民众对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停发军饷的不满，以及激发他们通过自己动手战胜困难的自豪感，才能争取民众的认同，渡过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并平息外界关于共产党不依靠外援就难以生存的沸沸物议。这正如亨廷顿所言，当一个政权陷入合法性危机时，它将通过谋求“散布性支持”，即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在民众中培养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广泛好感。“在现代，威权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其效力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sup>[41]</sup>

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证明自己所领导的执政党合法性的有效手段：“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sup>[42]</sup>这一段讲话后来被广为转引，并被收录在《毛主席语录》中，成为中国共产党证明自身具备优于国民党的先进性的一个有力论据。

通过激起边区民众对民族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最初由于军队膨胀、人口扩张而致的边区经济危机，被中共中央直接归因为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的“三光”政策，并由此推出了以“大生产运动”对抗国民党封锁和日本侵略的政治议题。同时，在抗战时期不同的阶段，它体现为政治口号的核心诉求不断因应时势之变而变，经历了从“自己动手，才是出路”到“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再到上升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口号的演变过程。这一变化的过程绝非只是文字上的细微变动，而清晰地体现出中共中央在应对合法性危机时是如何将前期的应急对策一步步神圣化而成为党的宝贵政治资源的过程。

在作为解决吃饭穿衣所亟需，定位为应急性任务的第一阶段，“大生产运动”议题的神圣化重点是激发民众感受抗日救国的神圣性，以及对国民党封锁边区政策的不满。

在这个阶段，由于经济濒临崩溃，民众负担骤然加剧，因此，如何缓和民众的对立情绪，使他们接受和配合政策，参与到生产运动中来，就成为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深谙民众心理的中共中央知道，沉重负担，可能导致民变。但局势迫切至此，亦别无选择。因此，在向民众宣传这些政策时，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含义，遂成为必不可少的行动。只有将大生产运动与“抗日救国”的神圣献身精神联系起来，使民众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紧迫感受，才能动员边区民众承担起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与谢觉哉等人讨论边区经济政策时，毛泽东即明确地指出：“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sup>[43]</sup>在延安就此举行的多次大会中，均可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对此一动员策略的运用：

1939年1月25日，边区在延安举办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即指出：“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sup>[44]</sup>而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负责财政工作的领导人李富春之报告即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而毛泽东则将生产运动提高到“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的高度来宣示其重要性。这也就要求人们摆脱以往“种地种菜不是革命”的既有观念，而将对生产运动的认识上升到抗战的重要一部分的高度上来。

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上发表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文中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

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sup>[45]</sup>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紧密结合起来，把大生产运动放在了政治高度来进行动员。

在救国公粮的征收过程中，这种对神圣意义的附着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例如，在征收公粮的各种决定及通知中，均称，征收救国公粮是“边区人民一致要求缴纳救国公粮的爱国要求”，是“为了自救和救边区、救中国的最好办法”，“是为一般民众所热烈拥护的”，“是对公有利，对民无损的最公道、最进步的办法”；这些决议还特别要求党员们带头，不仅自己多交公粮，而且需向民众积极宣传，“应以‘缴一升救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来鼓励群众，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使每一个同志都彻底明了救国公粮的革命意义”<sup>[46]</sup>。这些言辞，均密切地将实质为农业税的公粮任务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与保证军队供给，参与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

救国公粮之外，在公盐运输劳役及“公盐代金”交纳中，亦可清晰地辨析出这种通过革命动员，将神圣性附着于经济负担，化作政治任务进行推动的形式。定边民歌《打盐歌》将抗日救国与运输食盐的义务劳役联系起来，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

#### 打盐歌

天是我们的天，  
地是我们的地，  
我们的天地同胞，  
岂容小日本欺，  
支持前线，参加打盐队。  
嘿，参加打盐队。

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加战争”的政治动员方式，使得边区的诸项沉重税捐与劳役，被上升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大义的高度，它们为开展大生产运动赋予了神圣光彩，也有效地减轻了民众的不满。对献身国家救亡事业的神圣性的弘扬，不仅在运动的前期中被政府宣传机构广

为使用，且一直持续至生产运动的中后期，成为有效的政治动员策略。

第二阶段，主导口号从“自己动手，才是出路”改变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激发民众对“人定胜天”的斗争自豪感以及成功地改善生活的自我成就感。

在大生产运动之后的约七十年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口号的宣传如此有效、如此有力地遮蔽了当时为求一条出路的无奈现实，乃至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毛泽东在1939年大生产运动之初即提出了流传至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字。

实际上，这八个字是1943年边区艰难形势有所缓解之后，毛泽东为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所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部纪录片后来被改名为广为人知的《南泥湾》——的题词。这个题写的过程被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队长吴印咸拍摄下来，成为电影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部分。这个镜头以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在中共创业史中被反复定格和无限放大，但必须指出，观众在电影中所感受到的历史“决定性瞬间”的效果，其实是纪录片导演刻意创造出的结果，而非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通过纪录片进行叙事，其实质显而易见是“使某个事件成为历史事件，以及通过解释和表现，将有关过去的经验铸造成了一种充满意义的历史”的过程<sup>[47]</sup>。

必须注意到，在大生产运动中后期，有关“自己动手”记忆的建构，已经开始回避早期政治动员“自己动手，才是出路”中的无奈色彩，而代之以“丰衣足食”的对于美好愿景的描绘。在这个时期，大生产的运动已见成效，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边区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塑造了共产党军队勇于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英雄主义形象以及乐观主义精神。

在第三阶段，中共中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因经济困难而发起的“大生产运动”，因其成效，可能成为今后执政时的宝贵财富，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精神成果，都具有珍贵的价值。毛泽东将其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而使这一不得已的“出路”成功地转化为代表执政党先进性的优秀品质之一。

“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提法，很早就分别出现在毛泽东关于大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场合的各种会议讲话和报告中，例如：

中国抗战主要依靠自力更生<sup>[48]</sup>。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sup>[49]</sup>。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sup>[50]</sup>。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sup>[51]</sup>。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要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sup>[52]</sup>。

将“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八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方表述，最早正式见于文革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4年5月1日公开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其中，第21条将多个语录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下收录了前述若干毛泽东的论述。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被正式收录入“红宝书”中。同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即引用此一语录高度赞扬了“大寨经验”：“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sup>[53]</sup>

随着总发行量超过50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推广发行，随着国家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多次引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遂成为毛泽东关于国家建设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论述之一。由此，这一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政治话语，完成了从“出路”到“精神”的演变，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本。

## 2 议题的政治动员

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并推广出一大批典型。这些典型涵盖了工、农、兵、学、商以及机关干部领域，既有集体典型，又有个人典型。据统计，1943年上半年仅《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政治动员的过程。通过它可以清晰地看到，执政党在提出大生产运动这一议题并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性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相关的政治动员——在不同的领域，例如农业、工业、军队屯田等多个方面，都有一套针对该领域的、议题细分、高度一致的政治动员过程。

这个完整的政治动员过程具有4个步骤。

①议题提出：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同时辅之以宣传媒体的社论进行配合和推动。

开展大生产运动，始自毛泽东在1939年2月2日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著名讲话，在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垦荒并取得明显成绩之后，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对三五九旅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间，《解放日报》紧密配合，发表了社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sup>[54]</sup>。此后，全边区的动员雷厉风行地开始了。

②议题传达：各个部门传达中央指示，同时，宣传部门紧密配合，在报纸上报道这些部门的相关会议和决定。

权力机器一旦启动政治动员程序推动预设议题，所属的各个层级机构必须在短时间内也随之启动并予以配合。因此，在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之后，中共中央所属各机关、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机构到“三边”地区的村落，都相应依序层层下达中央指示，并按照政策进行解释和鼓动。

③劳动竞赛：各部门发动劳动竞赛，以促成劳动模范的涌现。

劳动竞赛是大生产运动中最为常见的政治动员手段。通过竞赛，各

部门激发了成员的好胜心理与工作热情，并促使后进者努力追赶，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④典型生产：通过执政党所掌控的媒体发现基层涌现的典型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报道，而后由执政领袖确认其身份，以大会等形式对劳模的典型身份进行宣示，完成偶像的生产。通过报纸、文艺表演等方式，执政者不断扩大典型的影响力，通过偶像的力量激励、推进基层民众的动员。

在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和典型鼓舞的双重驱动下，基层群众增强了对动员议题的认同感，并在偶像崇拜和从众心理的支配下出现更多的典型，此时，国家权力将根据动员议题的执行情况，完成下一个轮回。

如此，国家权力就依靠它自上而下的各个层级的全力推动，以及通过激发民众对被赋予了神圣性之议题的认同，将大生产运动这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整套完整的仪式，并在民众参与仪式的过程中将其进一步推进。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制造偶像崇拜以使得抽象的议题具象化和仪式化，在发动民众进行偶像崇拜的过程中，政治动员的议题得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是使事先所预定的议题目标最终得以完成的关键性环节。

在上述政治动员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动员手法的运用，一是劳动竞赛，二是典型生产。

### （1）劳动竞赛：规训与激励



图 3-1 三五九旅在大生产中展开劳动竞赛<sup>[55]</sup>

劳动竞赛是大生产运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主题。它有效地促进生产效率，并以其对精神和斗志的有力塑造为重要的生产经验被长期继承。

这一生产中的动员方式据称早期起于自发活动，但观察其运作过程，即可发现，无论是自发进行的小范围竞赛，还是经过组织的大规模比赛，最终，竞赛都必须纳入到权力所指定的统一竞赛

规则之内。表面看来，这是为了方便评比时有所参照，但实际上，制定竞赛规则的过程，就是将生产目标和生产者纳入权力意志的过程。

通过制定规则和指标，不仅设立了劳动模范、模范单位等具体的荣誉称号，而且设定了获得这些称号所需要的显在条件（如达到一定的垦荒数量）和潜在条件（如评选模范时首先考虑党员等）。这些竞赛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使得预定的生产目标得以完成。

在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的回忆录《南泥湾屯垦记》中，非常详尽和生动地记述了劳动竞赛的组织过程与细节，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劳动竞赛所具备的巨大组织和动员能力：

竞赛，开始是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大家互相提出了一些挑战、应战条件。为了防止自流，领导上就把大家提出的竞赛条件加以研究整理，作为全旅的竞赛的条件。凡够条件者，即可评为劳动英雄或模范单位。有些部队还成立了“劳动英雄组”和“劳动突击组”之类的组织，凡够一定条件被评为劳动英雄的，可参加“劳动英雄组”；不够劳动英雄条件，但超过一般人的条件者，可参加“劳动突击组”，争取评为劳动英雄。他们在开荒生产中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对开荒生产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一般单位都是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竞赛的，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进行着挑战。还有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直接写信向劳动英雄们挑战。有时领导临时看到某战士开荒成绩突出，当晚即在队前表扬他，并发动大家向他挑战或向他看齐，这不仅鼓励了他本人，也推动了大家。

作用最大的要算当时出版的“生产小报”。这个小报每天早晚出，内容全部是战士们的开荒消息，如公布互相挑战情况，表扬个人或单位的成绩，批评一些缺点等，因此很受战士们关心和喜爱，每个单位、每个同志都想看到自己的成绩在小报上公布。

工人们开展劳动竞赛，热情很高。按照评订标准，每天每人织布十丈零五尺，但是大家都超过了这个定额<sup>[56]</sup>。

进行劳动竞赛的另一个目标是利用群众的从众心理和好胜心理，进一步进行动员以促进议题目标的完成。通常，在进行劳动竞赛前，权力已经设立最低的任务底线，但只设定任务底线有可能使得大家仅仅满足于完成底线所规定的任务。通过劳动竞赛，“使中间都不能向下看，都向上看，中间的就没有了。”“前面要拉，后面要挤”<sup>[57]</sup>，这就大大提

高了比底线高得多的任务量，使得人们如果无法完成底线所规定的任务或勉强完成，将遭到“先进”为首的群众的鄙视。这就是勒庞在论述群体中个人表现出的从众心理时所言之“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sup>[58]</sup>。

基于这种从众心理，原来那些只能完成底线任务的群众将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努力跟上已经大大提高的平均水平，以保证自己不在群体中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这种被称为“先进带动后进”或“抓两头、带中间”的动员方式，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非常有效。

由于竞赛的结果，开荒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了。如开荒开始，一般人每天只能开四、五分地，甚至还有开两、三分的。后来由于开展了劳动竞赛，大家情绪普遍高涨，而且注意了想办法找窍门，因此开荒记录日日上升。

这还不算最高的数字，以后许多新的惊人的记录又不断地出现了。……七一八团三营九连班长白银雪在一次十五小时竞赛中竟以五亩四分六的成绩获得了全旅第一。更叫人惊异的是，七一八团某部在组织一次连续达十五小时的劳动竞赛中，杜林森同志竟创造了六亩三分五的新记录<sup>[59]</sup>。

值得注意的是，竞赛是普遍性参与的而非志愿报名、少数人参加的比赛。这意味着，它的目的并非仅仅展现出优胜者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准以激励他人，而更多地在于通过这一模式，清晰地区分出表现先进、普通和落后的不同层级。藉由层级的划分，原本的落后与普通者将倍感压力，而被迫通过努力来跟上先进者的水平。

如开始有的单位是采取以连或排为单位一起挖，以后逐渐发现这样挖法不仅分不出成绩优劣，而且人多容易窝工浪费时间，所以后来就逐渐改成以班甚至以小组为单位来挖。连排干部分别编入各班进行具体领导。这样挖，易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sup>[60]</sup>。

连排干部编入各班，不仅仅是为了在生产技术上进行指导（他们在生产能力上未必强于他人），而更多地应该视作一种督促行动。将大



的集体细分为班甚至小组，则正是为了“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sup>[61]</sup>。同时，细分的小组更容易在成员之间造成竞争对手的氛围，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其中，表现优异者将被冠以各种等级的模范称号，每个人依照其劳动表现和政治表现（这本身又与劳动表现及对政策的响应热烈程度紧密相关），地位经常在不同等级之间上下浮动。

记者赵超构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属于农业的，由村居民大会选举；属于部队的，由连选举；属于工业的，由厂职工选举；属于机关的，由工作人员选举。依阶级说，劳动英雄制很像从前的科举，从秀才举人到进士状元。它有乡英雄、区英雄、县英雄及分区英雄、全边区英雄五级。”<sup>[62]</sup>他在当时的采访中就注意到，通常而言，只有贫农和中农才有被选为劳动英雄的资格，但也有例外：“‘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富农’，也该有几位，为的是告诉老百姓，这些英雄都是受过共产党的恩惠而发财的。”<sup>[63]</sup>这显示，在革命前因擅长农业生产而致富的农民个体，很难因自己突出的生产能力而成为劳动模范，取而代之的是因阶级划分和拥护政策的表现程度而产生的政治地位差别，以及“欢迎”（即主动上交——笔者注）公粮的数量。更明确地说，确定模范的标准是政治表现而非生产能力本身的考量，“生产模范”实际上是上交公粮最多者的代称。

在劳动生产竞赛中，权力机构的各个层级都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使竞赛变得生动、有趣、激动人心。三五九旅采用的方式之一是编写生产歌谣，在劳动竞赛中增加娱乐性和政治性两者兼备的元素，此外，这种形式还便于表演，增进士兵对“垦荒生产同样是抗日救国”、“建立革命家务”诸观念的认同，并加深群体内的亲密感，进一步鼓动部队垦荒的积极性：

（旅政治部）还经常编些快板、山歌、小调等让同志们唱，以活跃部队情绪，减轻战士们的疲劳。如初开荒时有些同志没有生产经验，就配合编些快板似的口号：“镢头低，要用力。慢慢挖，莫着急。挖得深，挖得细。要求并不高，每天四分地。”大家一面挖一面唱，一天就轻松愉快地过去了。

在各班、排小组分开竞赛时又编了一些快板，如“分开地、见高

低。每个人，要尽力。谁先完，谁胜利。”

在开荒中战士们自己还编了一些小调，如“铁打的胳膊铜打的肩，一镢头下去尺二、三，草根儿咯巴连声响，土块儿浪涛似的向上翻。”

无论你走到哪一架山，你都可以听到劳动的歌声和镢土声交响成一片。“你一镢头啊，我一镢啊，比比谁的力气壮！你一镢啊，我一镢啊，开荒好比上战场”的歌声此起彼伏响遍了整个山谷。

有时战士们在早上出工，晚上收工时还打起锣鼓，扭一段秧歌舞，唱一首四季歌：春天里春风吹，满山遍野镢头挥。夏天里庄稼长，抗日军人锄草忙。秋天里糜子黄，欢天喜地去打场。冬天里雪花飘，练兵整训本领高<sup>[64]</sup>。

为了随时抗击敌人的侵犯，部队实行了武装锄草，右肩背枪，左肩扛锄头。正如战士们唱道：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敌人胆敢来侵犯，坚决把它消灭光。同志们呀，我们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sup>[65]</sup>。

女工们最爱唱歌。她们经常迎着夕阳的霞光，唱起这支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工厂里好似大学园，又工作又学习，工友个个笑开颜；我络纱你织布，全心全意为抗战。工友们呀！同心同德同劳动，为国为厂多流汗，紧跟领袖毛主席，争取模范多光荣<sup>[66]</sup>。

轮机房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崔敬国同志，最受青年工人敬爱。他们把他的事迹编成了歌，歌词是这样：纺织厂，轮轴转，里边有个崔老汉。崔老汉，真能干，赛过一个小青年<sup>[67]</sup>。

在南泥湾的垦荒劳动竞赛中还出现了一些别出心裁甚至不乏趣味性的竞赛形式：

休息时间，战士们玩着用桦树皮自造的“扑克牌”，高声呼喊着“你把我的‘红猪’拿去了，“我把你的‘黑羊’拿来了”。原来战士们是采用各种生产品来代替牌上的符号，目的通过娱乐的方式，把开荒生产的兴趣深印在战士们的脑海里<sup>[68]</sup>。

综上所述，通过举办劳动竞赛，制定竞赛标准、推举劳动模范，清晰地区分出先进、普通和落后的不同层级，鼓励对手间的相互竞争和监

督；配合其他奖惩技术，如在上一级设立头目进行情况汇总、比较及实现层级监视、在下一级或同级之间以等级上升的奖励鼓励公开的告发与自我审查、自我监督（最典型的莫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思想汇报讨论会），使得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竞赛不仅仅成为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具体手段，还成为兼具思想改造色彩的有效规训方式。

## （2）典型生产：红色偶像的诞生

大生产运动中另外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动员方式是典型的生产。其中，通过执政党控制的媒体来进行组织传播，是最常用、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以至于在党报新闻学中产生了一个专门的概念：“典型报道”，即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sup>[69]</sup>。刘建明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sup>[70]</sup>

最早的典型报道，就起于大生产运动时期。《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是党报新闻史上最早的典型个体人物报道，而该报对三五九旅的连续报道，则是集体典型的首篇报道。

这种“宣传性的报道方式”<sup>[71]</sup>，如陈力丹所说，“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sup>[72]</sup>，它典型地印证了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判断<sup>[73]</sup>，清晰地展现出权力掌控和操纵的痕迹。

第一阶段，在生产运动中设立模范称号并发动群众进行评比。

七一八团三营劳动英雄、模范班长李位，不仅自己开荒生产好，而且他领导的生产小组在开荒中每人每天平均都保持一亩以上的记录。他本人用的镢头足有六、七寸宽，五斤多重，挖一下差不多顶别人两下。在一次劳动英雄竞赛中，他的成绩竟达到了三亩六分七的记录<sup>[74]</sup>。

补充团战士尹光普，绰号叫“大洋马”，个子大，身体壮，是全团“贺龙投弹手”的第一名。他在一次开荒竞赛中达到四亩二分的记录<sup>[75]</sup>。

织得最多的要算王福祿，他一天能织二十丈零八尺。打络子的平均每天十五码，多的达到二十码。打夫子的平均每天六斤半，最多的达到了九斤。竞赛的第一个月份，全厂产洋经土纬的大布八百九十二匹

(每匹十丈零四尺长、二尺四寸宽)，到第二个月份，产量就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七匹<sup>[76]</sup>。

王福禄平均每天织布十六到十七丈，而且保证95%以上是头等布：线密、眼方、边边整齐。他也会修理机子，不论谁的机子坏了，他都热情地给修理<sup>[77]</sup>。

延川县附近的马家沟骡马店的经理王苏琪同志是个老红军……他的老婆在他的模范行动启发下，对这工作也很积极。客人一进店，她马上殷勤地送上茶水，把牲口照料好，不要客人操心。晚间替客人点灯、熄灯。客人进店，好象回到了家一样的舒服。她每天还要磨二斗麦子，用白面招待客人，自己吃黑面。其他如做饭、喂猪、挑水、纺纱等，她也样样干得好。为此，旅直党代表大会奖她为女劳动英雄<sup>[78]</sup>。

可以看到，上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一步教化群众接受议题目标的过程。这些叙述清晰地展现出，通过劳动竞赛过程中的民主评议，群众进一步深化了对大生产议题目标的认知，并将其与自身所在群体的具体情况、与自身的情况相结合，以确立自己在生产运动中所应达到的要求。这使得最终推举出来的典型，既符合大生产议题的目标，同时又因为民主评议的过程而得到参评者最广泛的认同。此外，参评者还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典型的差距进行比较，并在未来的行动中力求将差距缩小，这也成为基层动员中相当有效的动员促进方式。

第二阶段是“发现典型”。根据政策和指令，媒体及其记者在基层广泛挖掘先进人物和事迹，对照官方标准，“发现”这些来自基层的典型。

在1942~1944年期间，《解放日报》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出了大生产运动中一大批典型人物。从1944年1月1日起，《解放日报》还专门开辟“边区生产运动”专栏，基本保持了每天报道一名劳动模范的频率，这一行动持续了三个多月<sup>[79]</sup>。

对典型的报道乃根据国家权力的要求而设。无论是吴满有还是后来的申长林、赵占魁、马杏儿等，这些基层典型经由本单位的评选大量出现的过程中，担任宣传任务的媒体都接受指示，应对其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适当时机，以社论、人物通讯、劳动现场特写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予以推出。其间，明显地呈现出在不同群体类别上的“配比”关系，

如吴满有代表的是苦大仇深的逃荒新移民，赵占魁代表的是工人群体、马杏儿代表女性群体，而申长林则代表着经过“抢救”运动改造后转变过来的“二流子英雄”，其他诸多典型也代表了军人、军人家属、高级干部、合作社集体等不同群体。因此，典型报道的出现，表面上看是记者挖掘出潜藏在基层的模范们的过程，而实际上，它是媒体根据动员指令及其指标要求，寻找符合议题目标的结果——两者的区别在于，模范被“发现”这一结果事实上早已被设定。

记者莫艾后来就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透露：

找一个模范的、而且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sup>[80]</sup>。

从这个“找模范”的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挖掘典型、发现典型和报道典型，其实都是权力操控的结果。记者的主动性，只在于如何寻找动人的事例和细节以将典型报道得更加高大。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一点非常有限的主动性，其中也贯穿了记者本人对权力所设定的大生产议题及其选择典型的标准的理解。

在穆青对赵占魁的报道过程中，就体现出记者主动了解政治大背景的自我审查：

穆青虽初来乍到，但他对眼前形势和中央政策知根知底<sup>[81]</sup>。

另一位研究典型报道的学者也注意到，穆青与张铁夫在采访赵占魁之前，首先到中央职工委员会，采访了邓发主席和另一位负责人，了解有关情况<sup>[82]</sup>。这里向贵为中央职工委员会主席的邓发“了解情况”，显然不是为了了解赵占魁本人的情况，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赵占魁这个工人模范典型人物推出的政治背景，在报道中予以体现。

发现典型的过程亦有成熟的模式。

第一阶段，由政治敏感性强的记者根据报社指令前往采访模范人物。

通常，采访的成果体现为典型人物的长篇通讯，这篇通讯将细述人

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度政治觉悟，其中通常涵盖着忆苦思甜、对党忠诚、全心奉献、配合党的政策积极发动群众等几个关键元素。

第二阶段，重要的典型人物报道应配发社论，以表明这是来自权力高层的意图。

就当时的媒体生态而言，这些社论体现的并非报社内部的真实想法，它是“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sup>[83]</sup>，是来自高层权力机构指令的意图。贺龙在一次讲话中转述毛泽东对《解放日报》改版后的要求说：“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解放日报》一个字、一个版也不准闹独立性。”<sup>[84]</sup>这段话清晰地表现出《解放日报》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喉舌”关系。

此后，记者将以跟踪报道、现场小特写等形式，描写各行各业、各地区的人们对典型人物出现后的反应，如表示“很激动”，自己“有差距”，要“努力学习”等。在这些报道中，被报道者会进一步体现出对设定议题的深入认知，并再次表达对党的忠诚。这些报道与此前发表的社论和典型人物报道形成应和之势，推动对典型人物的宣传。同时，利用宣传所造成的“一呼百应”的效果，驱使人们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自觉或被迫效仿典型的行动。

第三阶段，由权力正式确认典型的身份。

在社论、会议、文件以及极少数非正式场合，由代表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确认典型，是议题动员中关键性的一个步骤。对于那些打算在全国进行推广的典型而言，这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这一环节，则典型人物必将缺乏权力所赋予的权威性，也就缺少了成为被崇拜“偶像”的神圣性。

在大生产运动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都具备了被权力确认的过程。

吴满有作为典型地位的确认是在《解放日报》中被冠以“吴满有运动”之名。在这篇直接体现中共中央政策精神的社论中，把吴满有的行动上升到“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的高度——“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sup>[85]</sup>

赵占魁“中国式斯达汉诺夫”地位的确立，则是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的一个电话中：“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

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sup>[86]</sup>

南泥湾垦荒的典型——集体模范三五九旅，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sup>[87]</sup>

第四阶段：以大会等形式对劳模的典型身份进行宣示，完成典型的生产。

召开劳模大会，让典型们坐在主席台前接受群众的欢呼和赞美，是国家权力用于宣示劳模们的典型身份的一种惯用方式。

在1943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吴满有胸戴大红花走上大会主席台，现身说法，并被授予了“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通过吴的口述来使民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其从雇农到富农、从流民到模范的光荣感，增强参与的意识。

这种典型人物对民众的示范作用今天已被广泛运用，并被总结为“典型引路”，是执政者典型的宣传手法之一。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树立的第一个典型人物，吴满有在当时则以其出身的穷苦以及通过艰苦劳动所获成果而受到农民们的广泛关注。

在一张记录大会热烈场景的全景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吴满有半人高的大幅图片和其他十位边区劳动模范的肖像图片被依次排列于会场主席台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前排位置，而不是放在背景墙上。这种处理使得观众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清晰地看到这些被称为“英雄”的人的形象：他们中，有发动妇女织布开荒的妇女模范郎秀英、劳动能手陈德发、退伍军人杨步浩……他们和坐在台下的普通民众并无二致，因此，这些图片无疑给了听众们明显的暗示：这些人是“我们”中的一分子，“我”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当时的报道中这样描写劳模大会的盛况：“两个盛会在三万群众欢欣鼓舞的气氛中隆重开幕”，当边区主席林伯渠发表演说时，与会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生产运动已经成为保

卫和巩固边区最为重要的工作，交纳公粮成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为了把这个信号传递到基层农村和每一个农民那里，大会不仅邀请了边区政府高级领导、党的领导和劳动英模之间进行生产经验的交流和总结，还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奖状以及相当优厚的奖金——格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奖状的题字者都是党中央及边区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和李鼎铭。领导们会后与劳模们共同会餐，并举杯向他们敬酒表示感谢和鼓励。这些异乎寻常的礼遇，展示了党中央通过民众动员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决心。

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的第三届生产展览会，通过精心的设计，成为宣传大生产运动政策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的一个形象生动的展示场所。展览会设置了近百个展室，展出了6600件实物展品，如战士种植的土豆、南瓜等农产品，机关干部自己织的土布等。墙上贴有大量简明生动的图表，其中包括六年来生活水平升降的曲线图、供给与自给比较图等，此外，还有近2000张表现大生产运动场景的照片。展览会盛况空前。其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军队等各界参观者达五万余人。

自此，被称为“劳动模范”或“劳动英雄”的大生产偶像就正式建立了。

第五阶段：通过报纸、文艺表演等扩展典型的影响力，推进基层民众的动员。

为了把典型更快地推向基层民众，使偶像的力量在国家动员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权力需要动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来进行宣传和推广。例如，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暨第三届生产展览会结束后，可以见到的推广手段就包括媒体报道、组织读报、文艺表演等等。

由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陆石执笔的秧歌剧《动员起来》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代表性案例<sup>[88]</sup>。它通过劳动状元的转述，形象地描绘了这次大会的景象：

今天后晌劳动状元到咱村上来开会，做报告……

他见毛主席没？

人家有福气，毛主席、朱总司令、贺司令……一满都见过哩。



毛主席请他们一块吃酒席，给他们讲话，……

毛主席给他们说啥哩？说的多着哩。

毛主席叫咱们庄稼人一满都组织起来，好好务庄稼……

里面描绘的这幅场景，生动地展现出劳动模范传达中央领导即国家最高权力“指示”的过程——由于条件所限，当时的会议不可能让边区所有的民众都来到大会现场。因此，不仅要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详尽报道大会的相关活动和讲话，还需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和观念渗透，以使民众能够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劳模大会的热烈气氛，了解政府重视工农业生产、鼓励发展经济、共渡难关的政策。

发源于陕北地区的秧歌剧本身，正是极其有效的政策信息传递方式，在娱乐匮乏的当时，这种“寓教于乐，歌以载道”的表演，既符合民众的欣赏习惯和文化水平，又传达了权力所欲传达的“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议题，当然，在充满民俗风土气息的表演里，这个议题被通俗地演化为更加亲切和熟悉的“组织起来，好好务庄稼”。据统计，仅1943年，《解放日报》就发表了有关大生产运动的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以宣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及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sup>[89]</sup>。

第六个阶段，是新的轮回——在集中性的报道过程中，更多典型涌现出来并被推广，以迫人形势促发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史料记载，在赵占魁运动被推广之后，延安的多家公营工厂数百名工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后来，三边分区的公营工厂也加入进来。到1944年2月，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报名参加运动的工人共1041人。此后，中国共产党所辖各抗日根据地均开展了相似的工人运动，如太行区发起了“新劳动者运动”，晋绥区开展了“张秋风运动”，晋冀鲁豫区开展了“甄荣典运动”。这些运动中推举出了张秋风、甄荣典等典型人物，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sup>[90]</sup>。而这些典型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政治色彩强烈的运动，以及民众基于从众心理和偶像崇拜而积极参与的形势，又成为国家对既有设定议题进一步深入推进的强大政治资源。

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系统化运作，“大生产运动”从一个抽象的政治议题被高度动员，在当时就形成了一系列高度形象化的人物、事件、

政治话语和演绎文本。也正是在发动民众演练这一仪式的过程中，执政者运用动作、语言等基于身体的一系列被保罗·康纳顿称为“体化实践”的行为<sup>[91]</sup>，让它被深深地刻写进当时民众的记忆中，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 3 红色符号体系的形成

在大生产议题被充分深入动员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动员步骤是对议题的符号塑造。

大生产运动中最为成功的一点恰在于此。如前所述，1937年开始，出于对抗日救亡的高度热情及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大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然而，这样一批受“五四”思想熏陶，有着浓重质疑精神乃至叛逆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既为边区带来了活力，又给边区带来了一些被毛泽东视为不和谐的因素（即所谓“半条心”和“两条心”）。整风运动开展之后，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强化了意识形态对思想文艺领域的规范和控制，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工具及其作用，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1941年，中共中央在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sup>[92]</sup>这样，作为文艺界的中坚力量，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群众路线的洪流中，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号召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一系列当时的政策、路线和政治口号为创作核心，依托《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新诗歌》《边区文化》等大批刊物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歌社”、“抗战文化工作团”、“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sup>[93]</sup>，以图解式的方式对这段历史进行演绎和阐释。这个被柯文称为“即时神话化”的过程<sup>[94]</sup>，在当时就生产出了包括民歌、说书、秧歌剧、新编平剧、木刻、小说、街头诗乃至电影纪录片等一大批红色文艺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红色符号，形成了一整套大生产运动的符号系统。

在“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势背后，必须指出的是权力将其指定的话语秩序以程式化叙事嵌入作为事件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实质。它们在几

年的短短时间里创造了有关大生产记忆红色叙事的传统<sup>[95]</sup>，而后在长达 70 余年的时段内，通过文艺表演、主题展览乃至村野之地的随口歌咏，这一批延安文艺作品不断被社会记忆所记诵和重新塑造。它们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也不断衍生出新的符号含义和文化内涵。权力阶层通过对这些既有符号的重复记诵和形塑，操纵了公众的社会记忆。正如黄宗智等研究者所提出的，对毛主义社会主义的记忆大大影响了中国公民当前的行为与政治态度<sup>[96]</sup>。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是陕北红色民歌、秧歌剧和延安木刻。前两者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对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在主题、内容等方面进行革命化改造，而后者则是对舶来艺术形式加以民族审美趣味的改写，但其核心仍然是执政党的政治诉求。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革命”与“翻身”的话语重复地充斥其中：对旧社会苦难的诉说渲染出执政党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救星降临”的神圣感，对新社会翻身之后红火日子的歌颂，则展现出执政党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如同上帝般的神力。在本节中，笔者将通过对其中具代表性的几件作品的符号生产过程的分析，通过对文本的再解读，“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sup>[97]</sup>，以说明大生产这一国家议题的符号化过程是如何完成。

### （1）红色民歌的符号生产

在有关大生产的记忆中，最为人们熟悉和亲切的，无疑是边区的红色民歌。据两位民间研究者对陕北民歌的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的革命题材历史民歌达到 1000 多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出现的。如《东方红》《绣金匾》《边区小唱》《南泥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等，都成为传唱至今的著名红色歌曲<sup>[98]</sup>。陕北民歌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具有“诗言其志，歌咏其声”的特性<sup>[99]</sup>，在大生产运动期间，成为执政者展现自身合法性的最佳手段。它对演出的要求在诸种文艺形式中最为简便，田间地头，歌手兴之所至，即可张口唱来，因此在条件简陋的边区有着传播条件的最大便利；它的歌手均为民间歌手，他们无一例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歌词及旋律具有来自民间的特性，因此比新闻报道之类的手段更加容易亲近民众，获得传播的机会；但必须注意到，在民间色彩的表象下，不可忽视

的是权力意志的掌控——采集什么样的民歌进行宣传和传唱，禁唱什么样的歌曲，均取决于执政者的意志。此外，当民歌被传唱时，通常也会经过权力机构改写和认可的过程<sup>[100]</sup>。因此，与其说这样的民歌体现的是民众的思想态度，不如说是体现了被执政者选择表现的一部分民众的思想态度。在民歌被记载和传播的过程中，所谓“言其志”，更多并非原作者的所思所想，而是执政者的意志。

在这些民歌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第一段中，先以万丈高楼起兴，并以“盘龙”、“卧虎”来比喻毛泽东的身份——龙、虎都是民间最为贵重的祥瑞之兽，前者更暗含了“未来天子”之意——随后又以红太阳再次暗喻毛泽东，这几个比喻，既合古典，又切合当时的政治现实。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第二段，以日月星催化万物来比喻毛泽东的泽被苍生，因为他为穷人“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天上三光日月星，  
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第三段，歌咏落实到正在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国家动员的议题上，指出由毛主席发起的生产大运动使得人们努力生产，丰衣足食。

为咱们能过好光景，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  
丰衣足食吃饱饭。

第四段，鼓励边区百姓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紧跟毛主席，就能够像有靠山的千年古树一样，盘根错节、开花结子，意味着过上耀眼红火的幸福生活。

边区人民要一心，  
古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古树盘了根，  
开花结子靠山稳。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创作于1943年，其作者是当时的特级劳动英雄孙万福。对于孙万福与毛泽东的见面过程及创作这首民歌的经过，一篇发表于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上的社论有相当细致的描述：“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大会。12月19日，当毛主席接见17位劳动英雄时，一位英雄走近毛主席，用双手紧紧抱住毛主席的肩膀，沾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颤动。他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这位劳动英雄就是来自陇东曲子县的孙万福。这是一个动人的场面，一首美丽的诗，一幅人民与领袖关系的图画！孙万福简单而热情的语言，道出了千千万万人民对领袖的热爱。”<sup>[101]</sup>当日的《解放日报》还配发了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的文章。时任鲁艺副院长的周扬用充满感情的色彩夸赞孙万福是高明的“劳动诗人”，并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

这个老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象诗一样，简直是出色的朗诵啊，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呢！

孙万福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善于把这些思想和情绪化为活泼的、带有丰富多彩的语言。不但个别句子带有诗意，而且通篇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他时常在语言里用着一些成语、形象和比喻，而且有时用的那样恰当，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生命<sup>[102]</sup>。

周扬所说的“恰当”的“成语、形象和比喻”，正是指如以“盘龙”、“卧虎”、“红太阳”、“日月星”来比喻领袖毛泽东，而以“古

树”比喻曾经历苦难的陕甘宁边区，以“万丈高楼”、“开花红又红”比喻边区的革命新政权，这些比喻的确形象和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广泛传唱之后，它们就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符号象征，并在红色符号系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类似，另一首同样诞生于大生产运动时期的民歌《十绣金匾》也由于其精妙而切合政治议题的隐喻与歌唱，而具备了明确的指向性，而它历经修改的过程，则鲜明地体现出权力对民间话语的控制和改造。

《十绣金匾》源于陕北的民歌小调《绣荷包》，出自一位名叫汪庭有的木匠之手。这位喜爱民歌的木匠为了表达对边区新生活的赞美，以及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填上新词，完成了边区新版的《绣荷包》。在这首民歌中，作者描写了大生产运动的热烈场面以及群众对执政者的拥戴，很快就传唱开来。

艾青听到这首新民歌之后，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指出，“绣荷包”表达的是男女间的感情，而给人民领袖、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绣的，应该是“金匾”而非“荷包”——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送匾额意味着对地方统治者，特别是“青天大人”的赞美和感激之情。把“绣荷包”改为“绣金匾”，使得这一歌曲的内涵更为明确地指向对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清明政治的歌颂。

汪庭有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将《绣荷包》改成了《十绣金匾》后，这首歌曲经过《解放日报》的推荐被传唱一时，汪庭有还因为这首歌曲的撰写而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甲等艺术英雄”的称号。在经历了因应形势需要的数度改写后，最终，《十绣金匾》被定名为《绣金匾》，更加简短和明确地歌颂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袖，成为民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明确象征符号。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原《十绣金匾》中，歌唱的主体不仅包括党的领导人，还有边区政府、民众、军队乃至改造后的“二流子英雄”等不同人群。

第一段歌颂的是毛泽东领导有方，苍生有福，受到民众的爱戴：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爱我们，  
我们拥护你。

第二段歌颂陕甘宁边区政治清明，军民团结：

二月里刮春风，  
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  
世事多太平，  
军和民大团结，  
大家一条心。

第三段歌颂了八路军坚决抗战，与人民鱼水情深：

三月里是清明，  
金匾绣三层，  
金匾上绣的是，  
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  
抗战下决心，  
对民众多恩情，  
爱国爱人民。

第四段歌颂的是八路军屯田政策：

四月里立夏天，  
金匾绣的宽，  
金匾上绣的是，  
八路军生产。  
四绣军生产，  
比民忙半天，  
夜晚间守警戒，  
白天务庄田。

第五段歌颂的是边区百姓的抗战热情：

五月里五端阳，  
金匾绣的亮，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  
抗战最热情，  
组织起自卫军，  
打倒小日本。

第六段歌颂了“二流子英雄”，即通过改造成为劳动英雄的二流子：

六月里热气腾，  
金匾绣花云，  
金匾上绣的是，  
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  
有利有名声，  
行行出状元，  
二流子成英雄。



第七段歌颂了思想解放了的妇女积极参加劳动和识字活动：

七月里七月半，  
金匾绣金线，  
金匾上绣的是，  
女王女闹生产。  
七绣闹生产，  
织布又纺线，  
加入了识字组，  
要当女状元。

第八段歌颂了边区的家庭和谐，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家齐国治”，家庭的和谐也映射出边区政权的稳定清明：

八月里八月半，  
金匾绣的圆，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  
卫生身体强，  
全家人都和气，  
民主好商量。

第九段歌颂了难民在边区受到的优待和欢迎：

九月里九重阳，  
金匾绣的长，  
金匾上绣的是，  
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  
政府好优待，  
老户们帮助他，  
吃用有办法。

最后一段，回到歌咏的主题上——“政府恩情宽”。由于这首民歌是为新年而创作的，作者遂通过“冬学到处办，有吃有穿有文化 快活过新年”的美好欢乐景象来为前九段的反复歌咏作结：

冬月里天气寒，  
金匾绣十全，  
金匾上绣的是，  
政府恩情宽。  
冬学到处办，  
有吃有穿有文化，  
快活过新年。

从《十绣金匾》数度改编版本的变化中，可以体会出执政者在形势变化后对政治宣传需求的转变。“绣金匾”这一符号从一开始指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军队、边区政府、民众等边区各阶层团结奋斗的赞美，改变为更具针对性地指向毛泽东、朱德两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八路军军队的歌颂：

#### 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  
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  
救星毛泽东。

一绣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  
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  
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  
能过好光景。

三绣八路军，  
坚决打敌人，  
消灭了反动派，  
全国享安宁。

比对这个简化的版本和前面引用的《十绣金匾》会发现，虽然歌曲内容从10段80行压缩为5段20行，但却在篇幅上大大加强了对领袖毛泽东的歌咏。第一、二、三段均是对毛泽东的歌颂，将毛泽东比喻为救星、好福气，分别歌颂了他的执政能力（“领导主意高”）、一心为民（“一心为我们”），并表现了民众对他的支持和拥戴（“我们拥护你”），在20行里有12行都是歌颂毛泽东的，使歌咏毛泽东的篇幅从全歌曲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了五分之三，此外，第四段歌颂的是朱德，换言之，歌颂领袖的篇幅占到了80%；对八路军的歌颂基本持平（20%）。而在这里面，对于边区政府、边区百姓（也包括妇女、二流子英雄及难民等）的歌咏则完全在官方版本里消失了。

到周恩来逝世后，1977年歌唱家郭兰英又在上述版本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并在中央电视台演唱出来，即保持前四段，将原“三绣”这段去掉，增加了“三绣周总理”的唱段，自此，原来兼有歌颂领袖、政府及边区军民的《十绣金匾》彻底成为歌咏领袖的唱段，其“绣金匾”的含义，也就完全指向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拥护。

### 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  
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  
救星毛泽东。

一绣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  
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  
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  
能过好光景。

三绣周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鞠躬尽瘁为革命，  
我们热爱你。

上述版本的比较，清晰地显示出，符号指向的演变过程，也正是执政者在不同历史阶段，谨慎地通过审批表演场合、选择歌曲、挑选表演者、增删歌词、控制相关新闻报道和历史书籍的书写，来操控和塑造民众共有的相关记忆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社会记忆重新建构的过程。

在当时其他流传的民歌中，同样可以看到大量歌颂领袖的唱段：

### 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较来，还是咱们辛苦的“太”。

毛主席像太阳，马列主义放光明，她的思想照四方，照得人民亮堂堂。

这首登上了中国发射的首颗卫星的歌曲，最早起源于山西小调《芝麻油》，由于开头以“骑白马”起兴，因此又称为《骑白马调》：

### 骑白马调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个八路军粮。有心回家盼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

荞麦皮，落在地。娶的个老婆不如妹妹你，把她卖了个活人情，咱们二人打伙计。

煤油灯，不接风，香油炒的个白菜心，红豆角角抽了筋，小妹子你坏了心。

骑红马，跑沙滩，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亲的哥哥离不转。

传到陕北之后，“骑白马调”的歌词有所改变：

### 骑白马调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  
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可以看到，传至陕甘宁边区之后，这首民间歌曲最重要的变化，是《芝麻油》中情人间调情，且涉及买卖婚姻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被取消了。增加的则是鼓励军队士气的“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但是，很显然这类歌词的意识也无法受到官方话语的肯定，因此，后来的另一个版本再次进行了修改，在这个版本中，“一人一个女学生”消失了。

### 骑白马调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  
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黑哟，家里留下小妹妹。

为大家所熟悉的今天的版本，则是由李锦旗作词，公木修订后的作品：

### 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走。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在这首几乎代表了红色中国的歌曲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被直接等同于东方升起红太阳——这个宏大、光明、恒久、温暖的意象，使其成为红色符号系统中最为著名的象征符号。但是，由于它速度较快、民歌色彩强烈，曲调仍有少许陕北民歌中特有的俏皮色彩，因此，在大合唱等场合还无法符合颂歌的要求。1951年，作曲家李焕之对其进行了再次改编，淡化了民歌色彩，并降低了音调、放慢了速度，使音乐意象更显端严、凝重，这样，《东方红》就彻底完成了从民歌到红色颂歌的改造过程<sup>[103]</sup>。

解析这些反映大生产运动的革命民歌的构成元素，必然发现，其中大多含有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唱段：“中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领导咱们大翻身，咱们的大救星”（《歌唱毛主席》）、“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绣金匾》）、“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多亏毛主席，多亏共产党”（《秋收》）、“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一些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例如“一心拥护咱八呀路军”（《拥军花鼓》）、“军民一条心”

(《十绣金匾》)、“劳动人民地位高”(《北边有个好世道》)等等。

此外，歌曲中时常出现的还包括翻身革命、忆苦思甜的元素。歌咏者通过控诉过去生活(暗指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的黑暗，将其与边区新生活的比较，以强调边区的幸福生活。在题材不同、歌咏对象不同的多首民歌中，相互借用意象、唱句乃至唱段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反映出，无论作者是谁、歌咏对象为何，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歌颂执政者及其选择的议题上来。而那些单纯歌咏爱情的“酸曲”如《偷红鞋》、《张生戏莺莺》等，尤其是与歌颂八路军政策有所相悖的主题，则因为它们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而被忽视甚至被改写了。例如，广为传唱的《三十里铺》这首反映征兵题材的民歌，当时就被按照政治标准进行了和原意完全相左的改写，将“征兵征了三哥哥，急得我心上疼”改写为“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今天上前线”，以突出姑娘支持爱人上前线的场面。

在这个过程中，歌唱主体——民间歌手、说书人也经历了淘汰和改造。著名的陕北说书艺人韩启祥因被毛泽东请到窑洞里说书而广为人知。但在被毛请去之前，他曾经因为说书兼算命打卦而被政府四处驱逐<sup>[104]</sup>。韩启祥因弹唱的是一些“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的传统书目，三弦被没收，卦签也被砸烂。后来，他编写了一些“新书”，在延安的“说新书”运动中受到贺敬之的注意，并因此进入了鲁艺为安波等人表演示范。最终，作为一个被新思想感染和改造成功的典范，韩启祥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sup>[105]</sup>。这段故事本身无疑构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带有二流子习气的民间艺人，是如何被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改造而成为群众路线的歌咏者的。

经过符合权力需要的改写和在各种富含政治含义的大会、联欢会上的歌咏，陕北民歌歌词中的传统意象乃至曲调，逐渐凝结为国家议题中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符号。当人们一听到这些熟悉的曲调，或不自觉地跟随它们哼唱歌词时，国家权力所要传递的政治话语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民众的意识中，并在长期的积淀之后成为民众共同拥有的社会记忆。例如，利用起兴的手法，将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大救星”、“盘龙”、“卧虎”、带来光明的“三光日月星”，将共产党比喻为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将边区比喻为“共产党来了晴了天”<sup>[106]</sup>的晴朗天空等等。通过政府的全力推广和民众的反复歌咏，“红太阳”、“大救

星”、“晴朗的天”等等，在歌声中成为指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红色符号，并最终固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记忆，成为“时代的聲音”。

## (2) 秧歌剧中的符号生产

延安整风期间，文艺工作者在反思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灵魂深处的改造”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改造运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sup>[107]</sup>，着手对陕北秧歌、陕北说书等传统戏曲进行改造，进行意识形态的教化。现实生活中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进行渗透和改造的典型样本”<sup>[108]</sup>。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小型的民间戏曲品种——秧歌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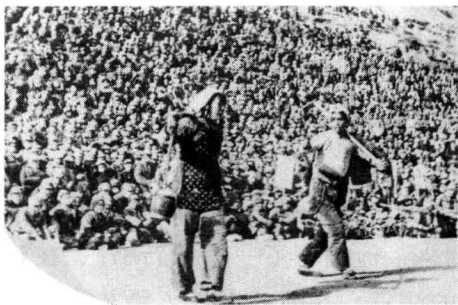


图 3-2 秧歌剧《兄妹开荒》<sup>[110]</sup>

秧歌是遍及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在陕北，秧歌又称“阳歌”。据考证，有关秧歌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社会形成的远古时期的祭日活动。在祭祀太阳的活动中，先民载歌载舞，因而就产生了阳歌。陕北地区的秧歌原为祭祀二十四星宿的歌舞<sup>[109]</sup>。而在执政党权力话语的介入下，这种样式简单、参与性

强的陕北传统歌舞形式被逐渐改造，成为边区最为流行的曲艺形式。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秧歌剧、1943年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创作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从它的唱词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秧歌从民间歌舞到权力话语载体的一个变化。

### 兄妹开荒

男：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



女：扛起锄头上呀么上山岗，  
山呀么岗上好呀么好风光。  
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来么依呀咳，  
咱们的家乡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

男：边区边区地呀么地方好，  
劳动英雄真呀么真不少。  
行行都能把状元出，  
当一个农业英雄真呀荣耀。

女：人家英雄是人家的功，  
自己的眼发红，又有个什么用，  
人人都能把劳动英雄来做呀咳。  
今年的生产，

合：要更加油来更加劲来，  
更多开荒（那哈依呀咳哎咳那哈依呀咳）。  
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向劳动英雄们看齐！  
加紧生产，不分男女，加紧生产不分呀男呀哈不分男和女。

男：哥哥我前面开荒地，  
女：妹妹来打土多卖力。

男：赶上那边区众英雄，  
女：赶上那马家两父女。

合：大家努力来加油！加紧生产不落后呀，  
加紧生产谁也呀不呀不落后。  
咱们生着有两只手，劳动起来就样样有。  
男女老少一起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  
边区的人民吃得好来，穿也穿的暖。  
丰衣足食，赶走了日本鬼呀，建设新中国<sup>[111]</sup>。

《兄妹开荒》是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秧歌剧，是鲁艺王大化等人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马杏儿父女的事迹编写，原名《王二小开荒》，后以群众通称的《兄妹开荒》定名。在这部歌词只有270字的短剧中，已经能够看到“雄鸡”、“红太阳”、“劳动英雄”、“状元”等符号化的意象与话语。其歌咏的核心是“边区边

区地呀么地方好，劳动英雄真呀么真不少。行行都能把状元出，当一个农业英雄真呀荣耀。”剧本通过对兄妹俩人早早起床上山开荒的生动表现，体现了人人都争当劳动英雄，开挖荒地促进生产的热闹场面。由于采用了当地民众熟悉和喜爱的秧歌形式，代之以崭新的边区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很快受到了民众和执政者双方的赞许。

春节演出后，延安《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剧本和音乐。并于同年4月24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社论中肯定《兄妹开荒》是一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sup>[112]</sup>。在春耕开始前有关生产运动动员的另外一篇社论中，作者则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上演这部剧的意义，“主要的目的是用他们生动活泼的榜样，来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生产热忱。”<sup>[113]</sup>

政治意图对创作方向的引导，对秧歌运动的开展和后来的新歌剧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兄妹开荒》所取得的成功的激励下，边区其他文艺团体也热情地投入到秧歌剧的写作中。很快，一批短小精悍、欢快活泼、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秧歌剧就涌现了出来，其中包括枣园文艺工作团集体编写的《动员起来》，陈戈编写的《参观农业展览会》、骆文的《男耕女织》、刘莎的《安家生产》等。这些秧歌剧以陕北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根据当时表现民众生活的现实需要进行了加工，摒弃旧秧歌中常有的小丑角色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由于它富于表现力，有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除了专业文艺工作者，其他机关和学校也纷纷组织业余秧歌队，形成了秧歌演出的高潮。到1944年春节时，延安已经有27个秧歌队，上演秧歌剧150余部。这些秧歌剧保留了旧有的曲调和舞步，但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必须指出的是，从秧歌剧开始的这一变化，其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秧歌或者民间曲艺本身。要深入体认其变化之剧烈，影响之深远，就必须从民间曲艺在中国承担的功能开始进行考察。正如王学泰所言，自宋以来，通俗文艺作品在中国民众的教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间社会中，它的作用往往要大于儒释道三教<sup>[114]</sup>。通俗文艺作品不仅使民众得到了娱乐和宣泄，也同时承担了传播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等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教化功能。此外，他也特别指出，更为隐蔽的游民意识的流布，主要依靠的渠道正是民间通俗文艺<sup>[115]</sup>。可以说，通俗文艺是中

下层民众接受教化的主要载体，他们的历史知识、政治理念，都来自以戏曲、说书等为代表的民间文艺。这在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下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显得突出：在红军进驻之前，除了乡绅外，走街串巷进村表演的陕北说书艺人几乎就是乡村社会里唯一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分子了。

出生于农村，而思想同样深受民间戏曲影响的毛泽东深知通俗文艺的感染与鼓动力量：要全面改造乡村社会，除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造和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对乡村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全面清算和对新的革命文化的彰显必不可少。但是，直到1942年之前，延安文艺界主要都由来自上海、北京等地国统区的年轻左翼知识分子所控制，“五四”之后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颇为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所接受的文艺理念也是完全非本土化的，但也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几乎完全无法为边区的民众所理解和认同——鲁艺早期创作演出的现代诗朗诵、西洋戏剧，在边区民众那里得到的是“解不开”（即听不懂）的评价。要让这样一批作品来承担在乡村社会中进行文化改造和生产宣传运动的教化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最为流行，同时也简单易学的秧歌的文化改造。

原有的秧歌形式以简单易学的歌舞为主，内容情节以“恋爱的鼓吹，色情的露骨的描写”为主，“调情几乎是它本质的特点”<sup>[116]</sup>。这一类的内容，在边区的新社会、在新的形势下显然已经不能符合执政者的需要。在当时的政府命令中，明确要求利用“化装表演”的方式，“向每个农户解释边区政府关于春耕运动的布告和标语口号及宣传要点，纠正农民中不正确的想法，启发农民的生产热忱”<sup>[117]</sup>。为了宣传的需要，在秧歌文本加入比较完整的情节就成为必须的任务。但是，秧歌本身是农民自发创作的歌舞，其唱词在地域之间的传播也主要由游走各地的民间说书艺人来担任，而要在简单短小的歌舞中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承载执政党所宣传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民间艺人的创作能力，因此，与民歌的创作主体仍以民间歌手为主不同，秧歌剧的创作主体交给了主要是各地承担宣传表演任务的文艺工作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在“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口号下，知识分子意识到，“原先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sup>[118]</sup>如钱理群等所述，他们放弃自己所擅长的、描写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

揭露，所代替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和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在主题模式上已经有所定型：便是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人民舍弃旧我，换成新我的模式。”<sup>[119]</sup>

因应这一要求，大部分新秧歌剧都直接将政治口号嵌入到歌词中，如在《夫妻识字》中主角唱道：“大囤小囤都装满，丰衣足食支援前线”，直言不讳地倡导政权的现实诉求。而《动员起来》则更为直接——作为枣园文艺工作团的当家戏，这部秧歌剧是毛泽东亲自命名的。

作为中外西北记者采访团的一员，《新民报》主笔赵超构 1944 年在对新秧歌表演的观察和采访中敏锐地发现了它的实质：新秧歌“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披上艺术的糖衣。”他援引边区提供的资料说，全边区共有 600 个秧歌队，其中，大的有战地服务团、鲁艺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等。六年里，仅一个民众剧团就下到 22 个县的乡村进行演出了 743 场，下乡时间占六年演出时间里的 45%，全部观众约为 61 万人<sup>[120]</sup>。通过行政手段的普及和推广，边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成立了秧歌队<sup>[121]</sup>。丁玲估计，每十二个人里就有一个会唱会跳<sup>[122]</sup>，由此可见秧歌的普及程度。

虽然赵超构并不认可这一风靡边区的曲艺形式的艺术价值，但他不能不承认，“它的宣传力量着实可惊。”<sup>[123]</sup>这位记者记叙一个孩子为他们表演秧歌舞的过程说：“那孩子拿着红缨枪，为我们表演‘张丕谟锄奸’中的一节，使我们感到连儿童的游戏都染上了强烈的党化色彩了。”<sup>[124]</sup>

在新的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原有的“溜勾子”秧歌改为“斗争秧歌”，“耍骚情地主”改为了互相鼓励积极生产的开荒兄妹，“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用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sup>[125]</sup>

作为延安文艺界的领军人物，周扬对于新“斗争秧歌”演出场面的上述描述，清晰地展现出秧歌剧中符号生产的过程：“工农兵”代表着社会各种阶层力量的联合，“镰刀斧头”代表的也是工农联盟，而“五角星形的舞形”则与后来的“忠字舞”一脉相承，都是以动作操演文字形态这种最为直白的方式表达符合政治内涵的舞蹈。在这类舞蹈

中，舞姿是否优美和地道已经不再重要，首要的是表现对意识形态的追随。

在“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号召下，秧歌剧，一个偏僻之地的地方小戏，被改造了它原有“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sup>[126]</sup>，率先承担起教化民众积极响应执政党政策，进行开荒生产的任务。后来1945年鲁艺集体创作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则是这一戏曲改造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政治诉求。《白毛女》在政治品格和革命话语建构方面所起的作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演出的当天就传达意见，认为这部戏突出了农村里面农民跟地主的斗争，并高度赞扬了让劳动人民登上舞台，并展现阶级对立和执政党的先进性的新方向<sup>[127]</sup>。这个方向，也成为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向传统戏曲发难和进行改造的一个原始雏形<sup>[128]</sup>。而秧歌简单易学的舞步、动听的旋律，则一直传承至今，在全国各地的广场舞蹈中，依然不时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与那身影后的社会记忆。

### (3) 延安木刻中的符号生产

延安时期，和陕北革命民歌、秧歌剧同样声闻遐迩，且对后来的红色符号系统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自国统区和海外来归延安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木刻艺术作品。

木刻版画是来自国外的艺术形式。20世纪30年代，由于鲁迅等人的大力推广，木刻版画成为当时左翼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风行于上海等地。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大批左翼艺术家的进入，这一艺术形式被带到了延安。

与油画、国画等艺术创作形式相比，木刻版画对美术材料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由于资源匮乏，缺少创作油画、国画等必需的画布、颜料和纸张，因此，因陋就简使用当地出产的木板和马兰纸进行创作的木刻就成为最为适合的美术创作手段。

在大生产记忆形成的初期过程中，延安木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它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巨大变革，甚至被冠以“延安学派”的名称。自国立杭州艺专毕业的力群回忆说：

“这个学派，是由艺术家们在政治思想、艺术方向上的一致，描绘



图3-3 延安木刻：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作者：古元<sup>[129]</sup>

内容和艺术风格的接近，以及地理环境和人物风貌，互相学习和影响等因素自然形成的。”<sup>[130]</sup>他认为，延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其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很大影响”<sup>[131]</sup>。

据《解放日报》统计，仅1943年，为了配合大规模的边区生产建设和文教展览会的需要，边区就动员全体美术工作者创作了3545件各种美术作品与图表。这其中，大量的作品就是通过木刻手法来表现的<sup>[132]</sup>。这个时期，力群创作的《帮助抗属锄草》《烧炭组

画》，彦涵1943年创作的《八路军回来了》，张望的《八路军帮助蒙民秋收》，王流秋的《宣传卫生》，肖肃的《人民有权向政府批评建议》，胡一川的《组织起来》《打倒汉奸》《送公粮》，刘岷的《驮盐》《开荒》《生产曲》《捻毛线》《生产与教育》等，都反映了当时大生产运动中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

最初进行木刻创作时，力群等人沿袭传统西方木刻的手法，采用浓重的黑色调，线条厚重，但这种手法并不受当地民众的认可和喜爱。在经过思考后，“延安学派”的木刻艺术家们在木刻的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减少画面黑色成分，学习中国传统年画中的手法尤其是人物面部的画法，表现明亮的感觉；使用套色木刻手法来刻画新边区的美好生活，使“画面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sup>[133]</sup>。如胡一川的作品《牛犊变工队》《胜利归来》，古元的作品《菜圃》《战胜旱灾》，力群的作品《丰衣足食图》《鲁艺校景》，彦涵的作品《抬担架》《把他们隐藏起来》等，都使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题材选择上，延安学派逐渐抛弃那些西方左翼木刻家如柯勒惠支等人使用的表现民众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的技法和题材，而重点选择表现边区美好景象的题材进行创作。例如，龙行的作品《变工队读报》描绘了变工队队员聚集在一起，听八路军战士为他们读报讲解政策的场面；郭钧的作品《怎样养娃》则描绘了妇女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听女战士为他们讲授如何科学卫生养育儿童的场面。正如力群所回忆的：“在延安我进一步接受了党的文艺思想——在版画创作上明确了党的文艺方向，主要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sup>[134]</sup>

在大生产运动的相关木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王世廓创作的木刻《二流子转变》（后改名为《改造二流子》）。这幅木刻创作于1944年，其背景则是配合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宣传“改造二流子”，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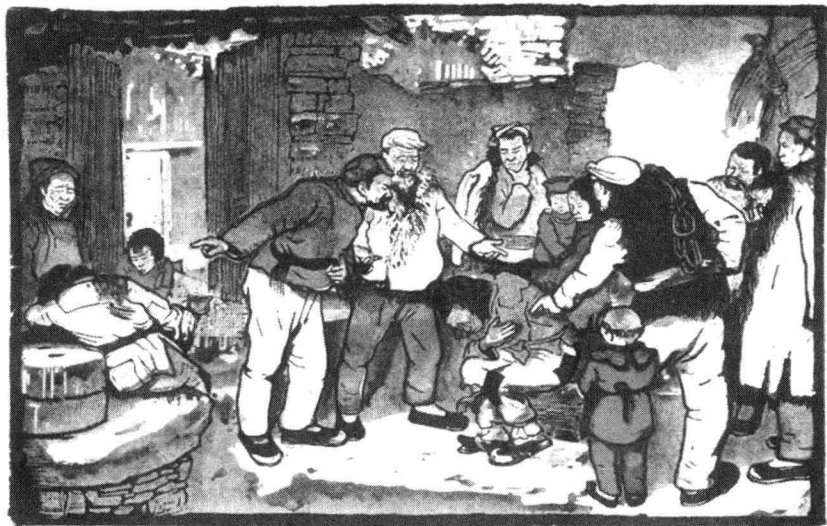


图3-4 改造二流子 作者：王式廓<sup>[13]</sup>

对照当时的历史现实，这幅作品的人物安排是具有明显教化意图的：画面里的人物除了二流子和他的妻子、孩子外，还有正在教育他的村干部和其他村民，以及围观的儿童妇女。与周围农民衣衫整洁、朝气蓬勃的形象相比，二流子穿得破破烂烂，一双破鞋里露出了脚指头。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显得萎靡不振，穷困不堪。在群众的指责和教育中，二



流子感到十分羞耻，低垂着头，痛哭流涕，表示愿意痛改前非。一位农民背上背着一条绳子（暗示着不服从教育将受到捆绑的处罚），伸出一只手指着二流子严厉斥责他。相比之下，年纪较长的村干部尽管是这次批评教育大会的主导人物，但他显得比较耐心和冷静，以说服为主。这一场景，显示出党的干部较高的群众工作能力，也暗示了党对于改造二流子的政策是“改造从宽，抗拒从严”。由于这幅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改造二流子”的时事，其艺术形象富有感染力，正在转变的二流子形象成为被党成功改造和团结的一个艺术符号。

另一位画家焦心河的版画作品《拥军》，也是大生产运动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中间的画面上描绘了五个陕北妇女为八路军洗涤军服的画面，背后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军服，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拥军行动。而在画面的下部，是一个陕北老农指挥两个年轻的农民男子抬着一头猪前往拥军，而后面还有一个戴着白色头巾的农民正在往士兵的腰间塞吃的。就连儿童也加入到了这个拥军的队伍中，他抱着一只母鸡，行进在拥军队伍的中间<sup>[135]</sup>。

细读这幅作品，可以看到，上述的人物形象，都象征着民众拥护军队以及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说这样的指向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其中的文字则更加明确无误地呈现了国家在大生产运动中所设定的议题，即边区民众应当以实际的劳军行动来爱护自己的子弟兵：图片上部的文字是“女给八路军洗衣裳”，下部则相应的文字是“男给八路军送猪羊”。

类似这样的抬着牲畜的农民与洗涤军衣的妇女形象，在《拥军花鼓》（古元）、《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八路军回来了》（彦涵）等众多相近题材中都有体现，这些静态但却生动的木刻影像，与“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南泥湾》）、“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拥护八路军》）、“炒鸡蛋，炸麻糖，摊下煎饼软又香，慰问亲人子弟兵，军民鱼水万年长”（《王震将军到庆阳》）这些红色民歌中的拥军场面一起，以其明确的含义指向成为代表民众拥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重要符号。

为了让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木刻艺术家们曾经在鲁艺礼堂展出木刻壁报、举办“战地写生队写生画展”，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集体展出。这些木刻在延安的窑洞里、城门洞里、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并且有



专人进行口头解释，便于群众理解<sup>[136]</sup>。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承担的，首先是配合国家动员议题的政治教化功能。

为此，艺术家们不仅要在作品中设定能够展现相关议题的图像和文字符号，还需要帮助民众理解和认知这些符号，以加深他们对相关议题的理解。反过来，当这些符号与特定的议题建立了直接且稳固的联系之后，符号就成为指代相关议题的、既简单又明确的方式。

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陆定一1946年在评价知识分子向大众靠拢的改造成果时，首先赞扬了戏剧的“成绩”与“收获”：

“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首先表现出成绩来的是戏剧。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场了。……这方面的收获最快最丰富，戏剧真正到了人民大众里面去了。”随之，他提到了木刻、小说和说书，并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道路”<sup>[137]</sup>。

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艺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主张歌颂光明的“鲁艺”派与主张暴露黑暗的“文抗”派还能够分庭抗礼，公开讨论的话<sup>[138]</sup>，那么，在文艺座谈会及紧随而来的整风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投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歌颂光明未来的潮流之中。如力群就说：“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经过整风运动，加强了文艺工作者的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重视了文艺的普及工作，纠正了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等不正之风，认真实践了‘讲话’精神，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sup>[139]</sup>而那些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品，则被打上了“特务文艺”的黑色标签<sup>[140]</sup>。与权力话语存在异议的个体，被视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的“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sup>[141]</sup>。通过会议斗争、登报批判，文艺工作者对自身和他人存在的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进行反复反省，“使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把我们已经开始的新文艺运动方针推向前进”<sup>[142]</sup>，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

1943年，鲁艺音乐系开展了“新秧歌运动”，而美术系则掀起了“新年画创作运动”，借鉴传统年画的风格和表现形式，表达向劳动英雄学习、拥军优属、五谷丰登等题材的内容，以替代关公、财神、福禄寿等传统年画。

像大生产运动一样，艺术家们在创作中也采用了类似劳动竞赛的方法，鼓励高产多产。鲁艺明确规定对创作给予物质奖励。作为鲁艺的教师，力群宣布一年要完成十幅木刻，在计划如期完成后，他得到了奖励。王世廓则因为创作的高质高产，获得了“劳模”称号。

革命艺术家们当时不仅创作了各种新内容的年画，还通过《关于新年画利用神像格式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共中央倡导的文艺方向主动进行艺术理论上的总结和艺术创作上的演绎运用。

在当时的气氛中，艺术家更为看重的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作品数量，而非艺术品的独特性和审美价值。在力群的画展介绍《长足的进步》上，鲁艺文艺俱乐部的负责人黄钢这样写道：“我们的木刻作家，自诞生之日起就和进步的政治运动的任务相结合。……更加通俗化、民间化。”<sup>[143]</sup>

艺术家们这种“和进步的政治运动的任务相结合”的良好愿望，正切合当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通过艺术品来推动政策、教化民众乃至进行对外宣传的现实需要。两者结合的结果，是木刻作品不仅走向了民间，而且形成了后来艺术史研究者们称为“红色美术符号系统”的雏形，其中，涵盖了一系列图形符号、色彩符号和文字符号。

在图形符号中，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是含义为保家卫国的红旗、红缨枪、大刀；象征大生产运动的犁铧、纺车、稻谷、手推车、马队以及象征边区美好生活的肥猪、肥羊、稻谷和壮健妇女、肥胖婴儿等。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套色木刻还是单色木刻，大量带有光芒线的太阳图案开始出现，这是后来红色美术符号系统中“红太阳”符号的起源。不过，在当时，它更多地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以表现边区的美好生活，而非对毛泽东的专指。

色彩符号中，频繁出现的是红色和绿色、黄色——这也成为后来新中国红色美术符号系统中最为重要的色彩。例如，套色木刻中的妇女儿童们，所穿的服装常常是红色的，绿色象征着生气勃勃，黄色则大量用于表现丰收富裕的场景。相应地，彩色作品中出现黑色、灰色的相对较少，即使有，也限于对落后人物或敌对方的刻画，例如，王世廓将《改造二流子》改为套色木刻时，给其他人物都上了鲜艳的色彩，但却特意保留了二流子本人在单色版画上原有的黑白形象。

木刻中相当突出的还包括大量的文字符号。由于本身担负着宣传政

策的功能，因此，不少木刻不仅要呈现与主题相关的场景，更直接将口号和标语置于画面之内。例如，在套色木刻《织布》中，画面右方就出现了“自力更生，坚持抗战”的宣传标语。而在另外一张表现冬学的木刻《读了书能写又能算》中，这句口号就直接置于画面的最下方。其他木刻中，也多见这样文字与画面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这些标语和口号，构成了延安木刻作品中一整套特有的文字符号。

蕴含在木刻作品、民歌歌曲、新秧歌剧等多种文艺形式作品中的红色图形、文字和色彩符号，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毛泽东曾经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高度赞扬新秧歌运动、春联、年画等艺术作品“文化的力量”：“……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

毛泽东清晰地指出：“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要求边区 35 万户人家“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sup>[144]</sup>。陕北最为有名的说书艺人韩启祥，受到革命文艺的感染，“在每日说唱之余，进行自我革命”，毛泽东也特意邀请他去自己家，此举无疑是对“群众路线”的有力彰显<sup>[145]</sup>。

至此，在这一文化改造运动中，被讽刺性地称为“大洋古”、“音乐界哭爹哭妈，戏剧界是装疯卖傻”<sup>[146]</sup>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逐渐适应了“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其创作也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权力的产物”<sup>[147]</sup>。如刘禾所指出的，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全部的文学实践都必须“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sup>[148]</sup>。

“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sup>[149]</sup>——作为哈罗德·D. 拉斯韦尔所定义的“政治精英”<sup>[150]</sup>，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宣传中符号的强大教化功能一直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依赖这些文艺作品所提供的象征来进行政治动

员。在江西红色苏区时期，符号象征系统全面模仿和沿袭了苏联的一整套符号系统。如同高华所指出的，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而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sup>[151]</sup>，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富含隐喻色彩的故事，并建构起一整套以“红太阳”为叙事中心、以边区“晴朗的天”为叙事背景的、富有民族特色和阶级色彩的符号象征系统。

## 注 释

- [1]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 [2] 毛泽东：《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 [3] 朱理治：《边币的根本问题》，载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 [4]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 [5] 参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 [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 [7] 孙琦：《关于八路军编成人数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说为1.6万~1.9万人）。见朱鸿召前揭书，第4页。
- [8] 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 [9]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196页，转引自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页。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 [12] 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第432~433页。
- [13] 黄修荣前揭书，第442页。
- [14] 参见边府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 [15] 1940年的外援数字说法不一，有研究者认为是4997074元法币，参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预算管理会计》，2005年第8期。即使按照这一数字，外援也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50%。
- [16] 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 [17]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 [1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1页。
- [19] 杨尚昆：《党产问题的由来》，转引自《党史信息报》，2001年12月26日。
- [20] 正式停发军饷日期为1941年11月19日，但此前国民政府拖欠了10月份的军饷，亦一并停发。黄修荣前揭书，第459页。
- [2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6编，第152页。
- [22] 吴永：《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 [23] 前揭书。
-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五）》，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8页。
- [25] 吴永：《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 [26] 参见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5期；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38页。
- [2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5辑，184页。
- [28] 前揭书，第188页。
- [29] 前揭书，第189~190页。
- [30] 前揭书，190页。
- [31]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此文亦载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2页。
- [32] 薛鑫良：《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学习时报》2007年11月19日。
- [33] 见前揭书。
- [34] 前揭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第2辑，第126~127页。
- [35]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 [36]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 [37] 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会计》2005年第8期。
- [38]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
- [39]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 [40]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 [41]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 [4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页。
- [43] 毛泽东：《致谢觉哉，（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 [44]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 [45] 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 [46] 《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 [47]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
- [48]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 [49]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 [50]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5页。
- [51] 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 [5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 [53] 陈大斌：《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 [54]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
- [55] 图片征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albums/3215585/3215585.html#655401%0865b5185c16d45635fa41ab>。
- [56]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7页、第23页、第37页。
- [57] 《西北局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第175页。
- [5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 [59] 何维忠前揭书，第17~18页。
- [60] 前揭书，第15页。
- [61] 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7页。
- [62]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
- [63] 前揭书。
- [64] 何维忠前揭书，第23~24页。
- [65] 前揭书第28页。
- [66] 前揭书第37页。
- [67] 前揭书第39页。
- [68] 前揭书第23页。
- [69]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 [70]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 [71] 前揭书。
- [72] 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新闻学刊》，1988年4期。
- [73]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散见第5页、第19页、第21页。
- [74] 何维忠前揭书，第17页。
- [75] 何维忠前揭书，第18页。
- [76] 何维忠前揭书，第38页。
- [77] 何维忠前揭书，第38页。
- [78] 何维忠前揭书，第49页。
-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2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 [80] 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新闻学刊》，1988年第4期。
- [81] 王光荣：《穆青与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人物春秋，2001年第1期。
- [82] 王中义、洪文军：《善于抓住第一个——穆青采访赵占魁的经验》，《新闻三昧》，2004年第3期。
- [83]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载前揭许宝强、袁伟书，第1页。
- [84] 贺龙：《关于整军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载《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 [85] 《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
- [86] 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载《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 [87]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4页。
- [88] 这部歌剧直接写明以“1943年12月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时”为时间背景。
- [89] 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 [90] 参见樊明方、胡雅各：《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 [91]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 [9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 [93]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 [94]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 [95] 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有可能在短时间——数年间被突然创造出来。为了灌输某种特定的价值和规范，创造的传统要通过一系列的礼仪和象征来暗示自身与过去的连续性。转引自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 [96] 转引自前掲景军书。
- [97]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 页。
- [98] 崔月德、王峰存：《陕北民歌作者、歌唱者初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410/18/90591\\_3086021.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410/18/90591_3086021.html)。
- [99] 《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79 年影印版。
- [100] 例如，贺敬之就对《十送金匾》进行了极为精心的改写。《东方红》也是公木等人改写的结果。
- [101] 《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26 日。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
- [102] 周扬：《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26 日。
- [103] 刘烽：《答记者问之五：东方红的创作情况》，刘烽是延安时期的著名作曲家之一。此处内容征引自其搜狐网博客：<http://liufeng1928.blog.sohu.com/55901712.html>。
- [104] 当时的说书艺人中不少是因患眼疾而从事这一行的，同时，他们也兼任算命先生，从事当时政府所批判的迷信活动。因此，改造说书人常常也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同时进行。
- [105] 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4 年改造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8 年第 3 期。
- [106] 这一意象后来直接演变为另一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 [107] 胡绩伟：《青春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1 页。
- [108]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 年第 1 期。
- [109] 参见许良：《陕北秧歌沿革的文化意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李红英：《秧歌剧〈兄妹开荒〉对旧秧歌形式的利用与改造》，《作家·下半月》2009 年第 8 期。
- [110] 图片征引自三门峡日报网：<http://www.smxdaily.com.cn/html/smxrb/2009/7/15/200971501608.html>。
- [111] 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羊路由编剧，安波曲。作于 1943 年初。载于高彬编：《延安文艺丛书 第七卷 秧歌剧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8 页。
- [112]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24 日。
- [113] 《生产大竞赛》，《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3 日。
- [114]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9 页。
- [115] 前掲书 449 页。王学泰在此一章节中主要论述游民意识在如《水浒传》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的表现，但他也同时指出，传统宗法观念和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也同样借助通俗文艺作品得到了宣扬。
- [116]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37~453 页。
- [117]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5 辑）》，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6 页。



- [118] 严文井：《原先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载王海平、张军峰主编：《回想延安—1942》，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 [11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第532页。此文虽然论述的是解放区文学，但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之后，此一定型趋势已然形成。
- [120]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 [121] 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 [122] 赵超构前揭书，第111页。
- [123] 赵超构前揭书，第109~110页。
- [124] 前揭书，189页。
- [125]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453页。
- [126]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 [127] 参见张庚：《要为农民、为士兵演戏》，载王海平、张军峰前揭书，第142页。
- [128] 毛泽东后来在1965年接见地方干部时就戏曲改造发表意见说：“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角，在台上跑。”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 [129] 图片征引自艺术数据网：<http://www.art-here.net/html/pv/37097.html>。
- [130] 孙新园、尚德周编：《延安岁月——延安革命时期美术活动回忆录》，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力群在延安时期的鲁艺担任美术系教师，解放后则一度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 [131] 前揭书。
- [132] 前揭书，第335页。
- [133] 前揭书，第5页。
- [134] 前揭书。
- [135] 前揭书，第8页。
- [136] 前揭书，第7~8页、第13页、第525页。
- [137] 陆定一：《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
- [138] 参见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 [139] 孙新园、尚德周前揭书，第7~8页。
- [140] “1943年还发出过一份对延安文艺人工作经验的党务通讯里说得更严重，说延安还有特务文艺。”黎辛：《这时候也是延安文艺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载前揭王海平、张军峰书，第212页。
- [141]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载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1页。“鬼计”应为“诡计”，此处照录原文。
- [142]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1943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 [143] 孙新园、尚德周前揭书，第10页。
- [144]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 [14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67页。
- [146] 王昆：《“白毛女”使我在艺术中成长起来》，载王海平、张军峰前揭书，第264页。
- [147]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 [148]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 [149] 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 [150] 哈罗德·D. 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 [151]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8月上半期。

## 第四章

# 南泥湾精神： 核心记忆代码的形成

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

——大卫·阿帕特 托尼·赛奇

不同时代的官方话语体系里，南泥湾记忆的核心均被表述为“南泥湾精神”。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八路军总政电影团1943年所拍的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的解说词，在这部电影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而在今天，“南泥湾精神”则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综合进行南泥湾精神总结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及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对南泥湾精神的定义，可以看到，“南泥湾精神”的内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 ②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高度自觉精神；
- ③组织起来，奋力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 ④团结依靠群众、敢于征服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 ⑤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sup>[1]</sup>。

那么，最初仅仅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口号的“南泥湾精神”，是如何在叙事中被总结、归纳和固化，形塑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形态，并被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呢？

如果参考保罗·康纳顿关于记忆中“记忆代码”的分析<sup>[2]</sup>，我们将发现，与南泥湾垦荒相关的一系列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等“口头代码”，是构成关于南泥湾集体记忆的基础，而这些记忆在不断的叙述中被各种材料如音乐、照片、画作、戏剧、小说等具象化，而形成包括视觉和听觉在内的一系列极易被唤起且容易被翻译为意象的具体事物，即保罗·康纳顿所谓的“视觉代码”。最终，这些视觉代码被高度抽象和归纳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义代码”，即在漫长的新中国历史中被表述和总结为“南泥湾精神”的一系列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等等。这些语义代码的适用范围之广泛，解释能力之强大，以至于它们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政治资源，在此后的一个又一个时间段内，这些记忆

代码帮助执政者有力地解释了不同时代执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使其取得了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直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各阶段领导人那里看到对它们的阐释和应用。

这一系列组成“南泥湾精神”的核心记忆代码，通过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故事，在之后的大跃进时期和新农村建设时期等不同时代通过教科书的书写、摄影图片展出、纪录片播映、歌舞和戏剧表演等一系列视觉形象中得到再现，进行再次的唤起、操演、刻写和固化，与时代需要紧密相连。通过这一建构（construction）过程，人们再现了当年的记忆，并且将其传承给后来人。薪火相传的过程是经过官方精心过滤的结果，它证明了执政党的坚强勇敢、艰苦创业、勤政爱民，以及民众对其衷心的拥护，由此，也就有力地证明和维护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且进一步在民众中塑造了对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认同感。

记忆代码对政治合法性的诉求，既是执政党建构大生产运动相关记忆的核心与支点，又是唤起这些记忆的起点——如我们所知，讲述任何历史事件，总是以故事叙述开头的。它们为历史叙事提供了被人聆听的契机与可能。

在这一章，笔者将解读“南泥湾记忆”中的四个核心语义代码，通过流传至今的多个故事文本，追溯它们如何被形塑的过程——如我们所熟知的，它们是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以及“鱼水情深”等政治口号。这些口号为那些处于困苦生活的民众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对100年来积弱积贫的中国民众具有极大吸引力，它激发出民众体内的道德能量，促使他们追随所选择的政党，共同建设美好的新中国。

##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

如前所述，肇始于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其首要起因并非国民党军队及日本侵华势力的封锁，而是非生产人口迅速增加所致。那么，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忆建构中，执政者是如何叙事，将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行动，并

将其塑造为延安精神的代表的呢？

### （1）两场战争和一条出路

在关于危机起因的叙事中，几乎每个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起因都从类似如下表述的一段话开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抗战出现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指挥抗战的中枢，更成为日、伪、顽的眼中钉、肉中刺。日本侵略者用重兵进攻我千里河防，并派飞机轰炸延安，妄图动摇我抗日决心；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陈兵几十万，构筑五道封锁线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面对重重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并且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解放区军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稍加留意便可注意到，对大生产运动之起因，这段表述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清晰地呈现出“敌人进攻、封锁—遭遇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话语逻辑。

①将起因直接指向“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就将粮食问题置换为战争问题，指出了边区军民面临的不仅仅是供给问题，而是两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正义之战：抗日卫国战争，和打垮国民党顽固派的战争；同时，也就将“自己动手”的号召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议题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议题联系在一起。

②对遭遇困难的主体的单方面强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对军队和干部困难的凸显，有意地回避了边区民众因沉重的公粮负担逃跑、饿死、自杀等更为困难的境况。

③第一点与第二点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成功地将军队无饷无粮的

责任指向了国民政府，而回避了当时边区经济危机肇始于非生产人口增加过快的真正起因。

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逻辑建构，则成功地呈现出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以及边区民众一呼万应、追随领袖完成伟大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证明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可见，使用这一话语逻辑，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危机起因归之于外因而非内部政策，回避合法性质疑，而其核心诉求则是将“只有共产党才能抗日救国”的神圣使命附着于大生产议题之上，以充分动员民众响应其“自己动手”的生产政策。

有意思的是，对于日本是如何封锁，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是如何停发经费的，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甚少提及，但在各种文本对于民众生产热情的详细描述中，则常常将生产过程与之紧密联系。例如，在《生产大合唱》中流传甚广的《二月里来》就将生产与抗战直接联系起来：

### 二月里来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也清晰地显示出当时将生产与抗战、与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的追随联系起来的话语逻辑：

王震旅长的决心最大，他三番两次地在干部会议上和全体人员会议上号召大家不要灰心，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和打日本鬼子的坚强意志来和困难搏斗。他说：“多生产一颗粮食，就是多一分抗日力量。失败不气馁，有了成绩也不骄傲。我们要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工厂里好似大学园，又工作又学习，工友个个笑开颜；我络纱你织布，全心全意为抗战。工友们呀！同心同德同劳动，为国为厂多流汗，紧跟领袖毛主席，争取模范多光荣<sup>[3]</sup>。

上述话语，都密切地将敌人的反动、顽固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行动进行鲜明对比，并着力展现了执政党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创造精神，鼓励民众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那些看似不可超越的困难。新中国“人定胜天”的信念，正是起源于此。

## (2) “自己动手”：从“出路”到“道路”

今天，谈及“自己动手”，民众立即联想到的下半句是“丰衣足食”，但实际上，它来自1939年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谈话<sup>[4]</sup>。这一颇具无奈色彩的表述，由于缺少上升到伟大精神与宝贵遗产的鼓动力，后来被普遍地替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与“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景承诺相比，“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表述显然含有浓厚的无奈与被动色彩，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行动，不足以激起民众的自豪感及认同感，更不足以成为一个稳固政权长期执政的指导思想。

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是出路”四字后来被普遍地从宣传中省略，而代之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更为昂扬和振奋的口号。相比之下，后者展示了配合国家行动的美好愿景，从而成为国家动员的有力工具。它有效地在国家几次出现经济困难时，成为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口号，并以其丰富的内涵上升为一个政党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思想遗产。

通过各种文本的叙事，一系列关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的故事被广为人知，直至今天依然以各种方式流传。这些故事非常直观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如何通过自力更生，创造性地克服了巨大的经济困境的，其中满载着道德、理想，及革命的豪情与欢乐。下面，我们将列举其中的几个主要故事，以说明这些故事是如何建构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记忆的。

第一个故事，是有关毛泽东如何决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大将萧劲光在回忆大生产运动的决策行动时说：

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加上连续发动反共高潮，使边区财政供给发生了



极大困难，边区军民穿衣吃饭成了大问题。当时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沉重的，群众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毛泽东同志到处向大家讲，只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会拥护我们，否则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有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听完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讲完这段话以后，我们当然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办法。于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号召，要求大家一齐动手，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sup>[5]</sup>。

在这个故事中，强调的元素是英明决策与忠诚追随。而细读这一文本将发现，毛早期“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无奈劝说，已经被巧妙地代之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的说法。此外，如前所述，边区当时的危机十分严重，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民怨已近一点即燃，但在肖劲光的这段回忆里，边区的沸腾民怨亦被轻描淡写地以“群众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一笔带过。

第二个故事是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如何前往南泥湾垦荒的。原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描述：

为了扭转这种困难的局面，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号召。这个号召一提出，立刻受到边区全体军民的热烈响应。……王震旅长立刻表示态度说：“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不影响战斗、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给。”

我们初到南泥湾的时候，一方面必须抓紧时间开荒，以便赶上季节，按时播种；一方面还迫切需要解决部队的住房问题。当时，大部分部队都住在临时用树枝搭起的草棚里，有的甚至露营在野地上。避雨是茂密的树叶，遮风是齐眉的野草。挖地归来，同志们就躺在这个深草丛林中的窝铺里，做着香甜的梦。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一想起当年国

内革命战争期间，敌人围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时期那些艰苦的岁月，那种常以茂密森林为“军营”，以茅柴最多之处为“床铺”，以枯草和禾草当“被盖”的情景，眼前的一些困难就都觉着不算什么了。有些同志逗趣地说：“诸葛亮的茅庐还不一定能比上我们的窝铺舒服哩！”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有一次在临近春节的前几天，因为部队缺乏粮食，七一八团陈宗尧团长在冰天雪地里，亲自带领战士去延长背粮。在回来经过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首先破冰涉水走了过去，使战士们深受感动，都说：“团长都这样，我们更不能叫苦了。”在途中休息时，陈团长就给大家讲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亲自背粮的故事，还提出和大家竞赛，比比看谁走得快。在陈团长的模范行动的影响下，同志们情绪始终是高涨的<sup>[6]</sup>。

这个故事里讲述的重点是革命的乐观精神，展现出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和官兵平等的作风。对苦难的描绘是为衬托战士们的无畏而乐观的言行，展现出共产党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的先进性。

第三个故事文本由劳动竞赛中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故事组成，它们展现了全军、全党以及全边区的老百姓一致投入大生产运动，以极高的热情开垦荒地，解决困难的情形。同时，它还展现了军民的创造能力。

劳动英雄李黑旦是七一七团某营一个模范班长，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劳动英雄”称号。他在开荒生产中使用着一把五寸宽的口面、四斤半重的镢头，干起活来真象黑旋风李逵一样，镢头一上一下抡得飞快。1942年，每人每天开荒成绩一般只达到五分至七分，最多一亩，而李黑旦同志却创造了两亩半的记录。于是“劳动英雄李黑旦，一天开荒二亩半”的声浪，传遍了各座大山。

可是英雄里面有英雄，李黑旦的记录很快就被人打破了。七一八团三营劳动英雄、模范班长李位，不仅自己开荒生产好，而且他领导的生产小组在开荒中每人每天平均都保持一亩以上的记录。他本人用的镢头足有六、七寸宽，五斤多重，挖一下差不多顶别人两下。在一次劳动英雄竞赛中，他的成绩竟达到了三亩六分七的记录。这还不算最高的数字，以后许多新的惊人的记录又不断地出现了。杜林森同志竟创造了六亩三分五的新记录<sup>[7]</sup>。

第四个故事则展现了毛泽东、朱德等前往南泥湾考察时，南泥湾所展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毛主席）看见一座座新开的窑洞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从哪里来的。王震旅长说是从山里取石头自己烧的。主席又问窑洞里的桌子、凳子是不是战士们自己做的。王震旅长回答说，全是自己做的。毛主席又一件一件仔细地指着战士们自己动手打制的镢头、锄头、镰刀，编的筐子，做的扁担、木杈、连枷和纺车，还看了战士们用野杏仁榨制的擦枪油和自己制的木枪、木马、山羊、平台、天桥等训练器材，满意地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毛主席看到那近两尺长的谷穗，结了四个棒子的玉米株、象小磨盘一样大的南瓜……非常兴奋，尤其是看了那碗口一般大、重达二斤五两的洋芋蛋，幽默地说：“嗨，这洋芋蛋真顽固啊！”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这一天，主席从早晨一直巡视到天色将晚，王旅长多次劝主席回家休息。可是主席还是那样毫无倦意，兴致勃勃……不远处山坡上，是成群的牛羊，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水哗哗的小河边生长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苗，还有一块块绿色的菜田<sup>[8]</sup>。

通过对所取得的成就不厌其烦的铺陈和描叙，读者面前展现出的是一派改天换地的昂扬气象。这些故事固然有其真实的事件情节的本源，但在官修史的叙说中，它的首要任务是展现执政党的一整套价值观念。

在故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挥了长期以来宣传方面的强大经验，很快，这些以“自力更生”为核心语义符码的故事文本就以会议、报道、街头表演、文艺创作等形式被生产出来。

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和艺术表现手法之下，潜藏的是南泥湾垦荒“遭遇困难—英明决策—统一思想—一致行动—战胜困难”的叙事逻辑，它们共同组成了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的故事原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三五九旅响应号召，挺进南泥湾，通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强大的革命创造能力，很快扭转了经济困难的状况。毛泽东所发表的著名演讲“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

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就成为最后的点睛之笔，而其核心政治诉求，则集中于执政党的先进性，以及执政边区的政治合法性。显然，此时此刻，党的领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因经济困难而发起的“大生产运动”，因其成效，必然成为今后执政时的宝贵财富，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精神成果，都具有珍贵的价值。对这一战时政策的总结和升华，使不得已的“出路”成功地转化为代表执政党先进性的优秀品质之一。

相比之下，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的反复强调、铺陈和吟咏，则以其丰富的内涵上升为一个政党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思想遗产。以古喻今，讲述光荣传统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释现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向民众承诺了领袖的忠诚追随者将获得的幸福生活，从而成为国家动员的有力工具，还有效地在国家几次出现经济困难时，成为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口号。

而这段记忆，伴随着三五九旅垦荒形象的反复叙事，也成为中国人对红色中国集体记忆中最突出的段落。每当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时，执政党对它的重新唤起、刻写和固化，不仅让民众对其建立更加深刻的印象，也丰富了它的政治内涵，让它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记忆唤起民众的强大道德能量，让民众能够甘心忍耐清贫乃至艰困备至的生活，将对这种生活的忍耐、体验甚至追求上升到宗教般的神圣高度；它让民众确信，自己确实能够依靠与集体保持一致的奋斗态度，为这个改天换地，步入共产主义的社会贡献力量。

## 2 “组织起来”的记忆

在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中，执政党所着力建构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边区军队、干部、民众如何组织起来，共渡时艰的记忆。

“组织起来”这一口号因毛泽东一篇著名的社论而为人们所熟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凡是有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

为“一支劳动大军。”<sup>[9]</sup>在当时，将习惯于小农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和零散商业经营的边区民众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运动，是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评价说：“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即发动和组织劳动大军的过程。”<sup>[10]</sup>

而它深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毛泽东的表述“劳动大军”极为准确地体现出这一政策的实质——从改造二流子、组织变工、扎工队伍，将零星商业集中起来进行合作社的建设，到组织各地干部机关、学校自行开荒解决粮食问题，一系列具体的运作，都充满军事化、集体化的色彩。“组织起来”的主要途径是发动群众，即毛泽东一直推崇的“群众路线”。因此，它也同时期进行的“整风运动”声气相通，其间始终贯穿着政治运动的主旋律。它不只是一项战时经济政策，而是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动员和改造，对此后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组织起来”的内涵涉及生产和社会改造的多个方面，同样由几个关键故事组成。

### （1）改造二流子：游民规训与惩戒

在“组织起来”的记忆建构中，最核心也最生动的事件之一是“改造二流子”，由于这一题材所具备的戏剧性元素和强烈的冲突性，它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中最受文艺工作者青睐的题材，也成为大生产运动中今天流传最广泛的记忆符码之一。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sup>[11]</sup>。在一份《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中，二流子也是指好吃懒做和不务正业：“在解放前，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动政府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而失去土地及其他职业，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游民（习惯上叫流氓）”<sup>[12]</sup>，和普通的农民不同，他们不是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为生，而是从事赌博抽头、贩售鸦片、说媒、看风水、巫医等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在重农轻商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观念里，“二流子”是给社会带

来极大负面影响的一个游民群体。

从对“二流子”的称谓和成分定义中可以看出，与传统农耕为生的朴实农民相比，“二流子”仍然属于“人民内部”，但处于农民的边缘阶层。如果细究其成分，可以发现“二流子”群体组成非常复杂：除了为人所深恶痛绝的流氓、地痞和小偷以及被蔑视的娼妓外，相当一部分是鸦片烟成瘾者。这一群体在当时的陕北农村并不少见，当时有歌谣曰：“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sup>[14]</sup>；另外一部分是农村婚丧嫁娶（如媒婆和风水先生）及迷信行业从业者。据统计，整个边区仅从事禳病祛邪的“巫神”就多达六千人，并分为“神官”、“法师”、“师婆”等7种类型，法术则包括扫魂、下阴等多种花样<sup>[15]</sup>。这些巫神在缺医少药的陕北地区颇具一定地位，民众对其的情感颇为复杂：既畏惧，又有些厌恶，但同时又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

边区政府对“二流子”的改造动因，当然首先是让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产出经济效益；其次，是破除萎靡、迷信之风，改造社会风气；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防止不事生产的这部分人对正困扰于公粮税负的农民们产生负面示范效应：阴阳先生、巫婆神汉等都以巧言令色为业，且假以神佛之名，在乡村社会中有着很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如果他们私下里劝说农民们抵制公粮税收，形成意见导向，对征收公粮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对这样一个群体，农民们的评价和政府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的人——如媒婆、神汉和阴阳先生——还是民间信仰的依托对象或农民们遭遇困难时所求告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农民的敬畏。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改造二流子”的行动，同样经过了一个社会动员并最终达到社会认同的过程。

1937年，刚刚成立的边区政府即对当时的“二流子”人数进行了统计，认为整个边区“约有二流子3万余人”<sup>[16]</sup>。1939年延安、华池率先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经验后在全边区推广<sup>[17]</sup>。但是，由于生产运动在这期间并没有大规模推广，因此，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效果也并不显著。

大约在1940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

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五百，占人口总数的16%，1937年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为1692人，占5%<sup>[18]</sup>。作为一个政策，1941年，毛泽东在其发表的“五一”施政纲领中特地指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sup>[19]</sup>。据统计，到1941年延安县已改造二流子1173人，占总数的72%<sup>[20]</sup>。

多达16%及5%的这部分人口是如何被认定为“二流子”的？史料显示，边区以是否自力生产、是否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判断“二流子”与否的基本标准<sup>[21]</sup>，并细致地将其划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与“非二流子”：

①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

②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③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sup>[22]</sup>。

“改造二流子”的方案由基层干部率先提出，很好地应和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组织起来”的思路，即福柯所谓通过“规训与强制”，“把无益或者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而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肉体中建立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关系”<sup>[23]</sup>。一方面，它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不劳动就将成为被批评乃至被唾弃的对象。另外一方面，它也体现出“公粮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符合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而很少为人所关注但相当重要的第三点是，由于各村公粮是定额分摊，如果本该摊到额度的“二流子”因为没有生产粮食而拒绝上交公粮，则这一定额势必分摊到其他农户身上。这样，对“二流子”不事生产的指责很容易得到农民的同情，也把对公粮负担沉重的指责部分转移到了不事生产的“二流子”身上，使得政府承受的舆论压力有所减轻。

对照官方划定的标准，边区各县将“改造二流子”的任务层层分

解摊派，每个村落都开始列出本村“二流子”的名单，并召开批判大会，进行改造。

北群在《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里生动地记录了甘泉六里庙乡对11个该村事先“选举”而出的“二流子”，尤其是其中一个女“二流子”的改造过程。在这个事件的描述中，可清晰地看出“政府主导—强大压力—行政处罚—改过效忠—回归和谐”的叙事模式，但无论叙事者通过修辞手法给这类故事抹上多么温暖的色彩，其通过行政权力进行规训与强制的基调一直贯穿始终。

故事的第一阶段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他们是旧社会中的流氓，在新社会里却变成二流子了。他们不但不努力参加生产，还吃洋烟，耍赌博，偷东西，串门子，以致农民对他们非常不满，政府屡次教育他们，但他们仍不改悔，二流子的恶习并未除掉。今年政府为动员每一个人参加到生产战线，对他们也不能再客气了。……今天下午，政府就在道佐铺街上召开一个隆重的群众大会，叫大家来教育他们，叫他们在大众面前宣誓改过自新，……并准备把几个最坏的二流子送县区教育。

第二阶段强调的是群体压力的影响。在民众施加强大压力的绘声绘色的描写中，显而易见的是愤怒的民意所展现的巨大力量：

当11个二流子进入街道时，大家潮水般地涌过来了，他们争先着，嬉笑着，惊奇地谈论着：

——捉的美！

——你看，那个女二流子！

——这次可得改过啦！

……会场上百多双眼睛，顺着乡长的指点有力地射过去了，二流子们感到大众眼光的威力，也无神地把头低垂下去。

……人群里忽然喊叫起来了：

——叫他们站起来！

——站起来！



对民意的生动描写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而不露的内涵：当政府主导此类行动的时候，民众显示出很高的热情，这说明了政府不仅是了解民意和代表民意的，而且也展示出民众对其行为的高度认同，再次证明了政权的合法性。

第三个阶段必然是行政处罚：

咱没办法怎样他们，政府可有办法管教他们哩<sup>[24]</sup>！

与前面对民意生动细致的描写具有显著区别的是，报道中对有关“处罚”的部分通常语焉不详：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惩罚措施、结果如何、对“二流子”的家庭有何影响，都很少见到明确的描述。而史料显示，当时“二流子”的改造方法可谓多种多样：

“用各种方式来给他以精神的压迫：开群众大会，大家来羞辱他”。“开劳动英雄大会，叫二流子来旁听，让他们感到劳动的光荣，这又是一种办法。”“在他家里挂一个二流子牌子，让大家喊他‘二流子’”，“发动全乡人，对他进行封锁”，通过“劝说、感化、宣传”，“形成一种群众运动”<sup>[25]</sup>。总而言之，制造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鲜明对比，以敦促这些与政策悖离的乡村个体走上政府引导的道路。

对“二流子”前期的劝服如果无效，伴随而来的惩戒措施则以收容改造为主。边区各地当时都设立了收容机构，以对这些不事生产者进行规训、惩罚和改造。在《陕甘宁边区违警罚条例草案》中，就以“妨碍风化”的条款明确规定：凡“游荡轻薄，行为不检者”、“僧道巫婆及江湖流丐强索人民钱物者”，“处以十日以下之拘留或十个工资以下之罚金。”<sup>[26]</sup>而“以符咒邪术医治疾病者”，则处以五日拘留或罚没十个工资以下的罚金<sup>[27]</sup>。这些治安管理的处罚办法中，很显然对已经划归了“二流子”行列、不事生产的巫婆神汉乃至仅仅是街头游荡者均进行了严格的行动限制。

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收集当地烟民流氓，除依法惩办外，一面监禁一面教育，一面使他们生产，要带强迫性。”<sup>[28]</sup>对一些有名的“二流子”，则要求他们进行“坦白”和“忏悔”，以揭露和羞辱的方式敦促其进行改造<sup>[29]</sup>。

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就是有组织地收容改造被称作“社会的

寄生虫”的“二流子”的场所。早上6点钟起床，由所长领导着到操场上跑步，上午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捻毛线。午饭休息后，下午上课<sup>[30]</sup>。

福柯曾经在分析禁闭所中的劳动教养制度时说，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实际上首先是一种道德关系而非经济关系，禁闭中的工作义务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sup>[31]</sup>。这一观点，可以在戒烟所的劳动改造中得到印证——“那曾经是枯黄的肮脏的脸，现在泛出了红色，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sup>[32]</sup>戒烟所对每个“二流子”都造册登记，张榜公布，犯何前科，改造计划，内容日期，一一在目，经所长考察鉴定，并经众人评议合格后，才可出所<sup>[33]</sup>。这些考核的内容，意味着“二流子”经过改造已经符合执政党的道德标准，作为一种惩戒的劳役暂告结束，但是，如果他积习难改，那么，面临的将是更加漫长和严厉的惩罚。

在《改过》的描写中，第四个阶段是改过与效忠：

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到我再吃洋烟活剥我……（冯老婆）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第五个阶段则是基于被批判对象改过自新之后达成的谅解和和谐：

会场里洋溢着笑声，充满了快乐。在老乡们的脸上，也在要改过自新的二流子们的脸上<sup>[34]</sup>。

“改造二流子”的题材很快成为秧歌剧、木刻等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鲁艺的秧歌剧作家王大化等创作了《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等秧歌剧，呈现这一新事物、新现象。陕甘宁边区的其他民间剧团也群起而效之，创作了《劝二流子务正》《懒瘠转变》等秧歌剧目。在《懒瘠转变》中，庆阳三十里铺社火团描写了一个“二流子”转变的故事：二流子自述过去“好吃懒做怕动弹，一天到晚胡球窜”，自去年“要学个劳动英雄汉”，夫妻和气了，庄稼务上了，光景过好了。一天两口子去锄棉花，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不走大道走小路，盘查他又无路条，夫妻俩判定他是个坏人，把他扭送到乡政府。此外，如斥责

“二流子”品德败坏的秦腔《二流子搬是非》、笑话“二流子”的快板《笑话二流子》《二流子骂庄稼》等，都是以“二流子”的改造为题材。

在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中，这些没经过改造或较为顽固的“二流子”媒婆、老来俏、爱勾搭年轻人的三仙姑、抽大烟妻儿啼饥号寒的金三……被表现为懒惰、丑陋、可笑甚至通敌牟利的形象，受到大家的鄙弃。而积极改过自新的“二流子”则通过劳动一跃成为新富农，并成长为人人敬仰的劳动英雄。例如《钟万财起家》《刘二起家》《刘生海起家》等，都遵循了这个批判—痛悔—改过—发家的话语逻辑。

从1940年开始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几乎贯穿了大生产运动的始终。据朱鸿召统计，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sup>[35]</sup>。1943年，安塞城区转变的43个“二流子”，种地939亩，约产粮124石；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荒2990亩；甘泉转变的13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sup>[36]</sup>。

改造二流子的过程中，执政者还刻意挖掘和塑造出“二流子”出身的劳动模范，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农民们学习先进，帮助落后，积极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其中最为典型的个案，是关于“二流子”申长林如何成长为劳动英雄的事迹报道。在看到《解放日报》社论《一位新的榜样》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亲笔写信给申长林，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曾沦落为失业的游民，现在是“边区自由的公民”、“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富裕的主人”、“边区党的模范党员”，并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解放道路”<sup>[37]</sup>。申长林的故事还被写入了红色小说《模范党员申长林的故事》，在边区发行<sup>[38]</sup>。

运用组织传播的方式，政府频频通过社论等形式敦促“二流子”进行改造：

努力生产的庄稼汉是劳动英雄，反对不劳而食的二流子<sup>[39]</sup>。

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sup>[40]</sup>。

“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违者除须罚出羊资或猪资外，另并接受公议的处罚<sup>[41]</sup>。

执政者同时也对死不悔改者进行“贴标签”式的宣示惩戒，例如，延安市各乡村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家庭内部“民主公议”以自我审查是否符合二流子标准的“滕杨方案”<sup>[42]</sup>，来选出“二流子”名单，并拟定公约在村民大会上宣布，将“二流子编成小组，每组选出一小组长，依照所定公约互相督促，规定生产期间，一切义务动员，概由二流子负担”。具体操作中还规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佩带以二流子的证章，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可取消。”<sup>[43]</sup>前述被区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民选二流子”不同群体也被依据政策区别对待。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改造，二流子从农村的边缘群体彻底沦落到对立面：“二流子已经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成了一顶十分肮脏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它。”<sup>[44]</sup>

这个时期，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步步深入，农村也开始进行对整风经验的学习，开展了“审干”、“抢救”和“锄奸”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与这些运动的结合，使得改造出现了扩大化倾向。带有明显区隔和侮辱意味的宣示方式，给被辨识为“二流子”的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强大心理压力，不仅使其被置于无所不在的监视和审查之中，也制造出被群体抛弃的恐慌感。对于那些对大生产运动存有异见的民众，这不啻是强大的群体压力。

有着长期重农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极为重视对游民的辨识和管制，例如，游民出身的朱元璋在执掌政权后，即刻宣布“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sup>[45]</sup>明清两代，均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清除游民：“督令力食谋生，不尊者送案究治。”<sup>[46]</sup>这里“游民”的概念，和“二流子”颇为类似。但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的措施相比，陕甘宁边区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则有同有异。相同之处表现在：执政者均将不事生产者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对“二流子”的惩戒多由司法系统进行拘押。两者的不同则在于：传统社会系由乡绅地保辨识“游民”，通过户籍制度造册管制游民，以行政监管为主<sup>[47]</sup>，而边区则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举报、相互审查和自我审查，系统化商议评定标准、民选“二流子”，甚至规定“二流子”的定额比例，使得不仅仅是“二流子”被纳入监控和改造的行列，其他从事生产的民众也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震动，并时时刻刻对照“二流子”的认定标准进行自我审查，在群体压力中尽可

能向“先进”靠拢。尤其是“群众评议”的过程，重在把“二流子”放在“熟人社会”中进行批判和改造，让“二流子”羞耻、悔改的同时，还达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即通过树立“反面典型”来促使农民进行自我改造。

今天，对“改造二流子”运动的研究，多从正面角度，论述它对生产运动的积极促进，对边区厘正民风、清除迷信思想、稳定社会等积极意义。这些好的方面，不容否认也不必否认。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改造二流子”的根本目的或者说核心诉求，并不是为了惩戒违法犯罪者——筛选“二流子”的标准是是否从事生产而非是否违法犯罪，事实上，大部分“二流子”都够不上违法犯罪的标准。

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加之以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群体压力，兼以此中可能随时背负的耻辱和被乡村社会抛弃的恐惧感来威慑对大生产运动持消极态度的民众——“改造二流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民主评定“二流子”的过程，把熟人社会里的道德贬斥化为具有一定司法性质的惩戒行动，通过集体监视和收容防止自由流动，通过劝说和收容强制进行生产培训，通过批判大会和贴标签的方式实现惩戒，通过集体批判和训诫来进行“思想改造”，让整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体在战战兢兢的评选和对照标准的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如福柯所言：“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sup>[48]</sup>这一方式虽然不同于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通过流放进行惩戒和改造，但在把“面子”看得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却同样甚至更加有效。

“改造二流子”运动，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提供了诸多经验。一方面，它将农村劳动力以村落为单位进行定位、监控与组织，为驾驭和使用民力提供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它和在学校机关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一起，为“树立劳动观点”提供了重新塑造人、改造社会的经验。

## (2) 变工与扎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声

靖边县清坪区阎俊旺老汉，有地 25 垧，牛 1 头，羊 100 只，自己放了羊就没法种地，种地就不能放羊，“眼看地要荒了，没办法。”同村的李来六，夫妻二人，男的给人做长工，女的在家闲着。隔村的李某，老婆有病在床，媳妇伺候病人，有地 15 垧，牛 1 头，羊 70 只，种地和放羊不能兼顾。于是，经“区上提议，三家商量同意，阎老汉拦（放牧的意思——引者注）两家的羊，李某种两家的地，他的媳妇看病人兼做饭，李来六婆姨拾粪、锄草、收割，并由阎李两家帮助伙食，收获四四二分（即按所收粮食，李、阎两家各得四成，李来六婆姨得二成）<sup>[49]</sup>”。

和中国当时的其他地区类似，陕甘宁边区的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劳动力分散，效率较低，由于陕北地广人稀，农忙时因送饭、放羊等往往无法充分利用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间自发形成了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扎工和唐将班子、兑地、请牛会、锣鼓班子等。其中一些为劳动力的人情交换，另外一些则属于短期雇佣关系<sup>[50]</sup>。这些劳动互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家一户人力资源不足的窘境。但是，由于它们系自发形成，缺少系统组织和信息交流，因此，在边区人力匮乏的情况下，边区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原来亲朋好友之间的大部分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关系，以村、乡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陕甘宁边区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迅速成立起来。据统计，1939 年，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达 249163 人，其中劳动互助社 89982 人，义务耕田队 66347 人，妇女生产组 53126 人，儿童杂务队 39708 人<sup>[51]</sup>。

表 4-1 边区劳动组织统计

边区总人口	1350000
劳动互助社人数	89982
义务耕田队人数	66347
妇女生产组人数	53126
儿童杂务队人数	39708
总计参加劳动组织人数	249163
参加劳动组织总人口比例	18.5%

从表4-1可以看出，如果以1941年边区人口（数量约为135万）计算，约有18.5%的人口被组织到各种劳动组织中来<sup>[52]</sup>。

遗憾的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农业合作组织，虽然看上去活动轰轰烈烈，但并不能够适应农村的劳动力需求。到1941年，这些由政府组织的劳动互助组织实际上大部分陷于瘫痪和解散的尴尬境地。

此时，毛泽东从上交的调查报告中敏锐地发现了“延安经验”。他在《延安县一九四二年八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中写道：

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互相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帐，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边区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变工，就是这种办法。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扎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的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各地对外来扎工应予以帮助，例如帮助找工做等<sup>[53]</sup>。

《解放日报》也迅速地跟进：

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调剂劳动力的方式：如“变工”和“扎工”，就是流行较广的方式。自发的“变工”和“扎工”，其范围虽然狭小，仅限于亲戚、朋友、邻舍等关系，可是它适合

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的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

把三五户七八家的人力畜力组织在一起，今天大家一齐帮你耕，明天大家给我种；那一块地草多，就给那家先锄；那家庄稼早熟，就帮那家先收。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犍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这篇社论肯定了“延安经验”，认为“延安县的宝贵经验，是值得称述的”<sup>[54]</sup>。

10月14日，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再次谈到“延安经验”，要求在全边区推广“延安经验”：

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sup>[55]</sup>。

通过社论和报告等组织传播形式，新式的扎工、变工等劳动互助形式热烈地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展起来，其中也涌现出许多故事，本节开始的这段引述就是代表。除此以外，还有绥德分区劳动英雄刘玉厚领导的郝家桥村、劳动英雄贾正才领导的安塞魏家塔村等，都通过把全村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变工和扎工的形式，开始了合作化的初步尝试。《解放日报》记者报道村民的态度时非常乐观：“这样的集体生活，大家过得分外高兴，从没有一个人不愿意或者觉得稍有不适当处。”<sup>[56]</sup>

从阎俊旺个案及其他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关于变工扎工的“延安经验”的记忆建构最初过程中，其叙事原型呈现为“生产遇阻—政府牵头—组织互助—合作致富”。其间，党政权力干预的痕迹格外浓烈。中共中央西北局明确指示说：新的劳动互助“是党政有计划的在领导，是今天农村支部最中心的工作”。具体的做法则是“经区上提议”直接进行行政化组织；或是通过政府认定的劳动英雄牵头，也有少量通过政府组织的其他社会团体等进行社会动员<sup>[57]</sup>。



对“变工”和“扎工”等故事的记忆建构，着重点在于通过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化生产的方式改变了农村生产落后的状况，其核心诉求，是强调通过政府各种渠道的组织调剂劳动力分配和使用，改变了分散和效率低下的状况。它一方面强调了贫苦农民通过合作化能够得到翻身致富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则展现了政府通过发动群众改天换地的能力。

在当时，农业互助组织的这些尝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提高了生产效率，圆满完成了开荒任务。如延安柳林区五乡念庄村“在没有组织变工时，乡政府分配开荒45亩，群众信心不高，组织变工后，除种原有熟地及完成45亩开荒任务外，还多开了225亩”。合水县“变工未搞好前一个月，只开荒100653亩，变工搞好后12天，就开荒13700亩”<sup>[58]</sup>。

其次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据统计，边区农业耕地从1937年的826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万亩，增量近600万亩；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1937年是126万石，1944年达到175万石<sup>[59]</sup>。这是和边区对劳动力的调剂分配分不开的。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牛发展到220781头，驴达到167691头，羊发展到2033271只<sup>[60]</sup>。此时，已经基本解决了困扰边区数年的粮食与经济危机，巩固了红色政权。

但是，如果不仅仅着眼于当时农业生产数据的改变，而更深入地观察互助组织给予乡村社会的变化，则也许可以发现，虽然从一味照抄苏联的“劳动互助社”向后退至农民容易接受的变工、扎工和唐将班子等农民互助组织，但这些互助组织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后来农业合作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性质。

①变工、扎工和唐将班子的重构，是一次部分改变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尝试。

据载，关中后殿村的唐将班子“取消了唐将班子和扎工包头抽空工，抽工人工钱，高价出售、出卖工具等一切办法”<sup>[61]</sup>。《解放日报》也提及“去年发展起来的扎工和唐将班子绝大多数是朋工和换工性质，而其中又参加了少量的雇工，他们以变工为主，……很明显地是向着小农户中间的生产合作性质的劳动互助发展”<sup>[62]</sup>。这些变化清晰地显示出，原来本质为短期雇佣关系的唐将班子，在新的行政力组织下虽然保留了原有名称，但参加者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为合作关系。

②新的劳动互助组织制度的制定者不再是雇主或来自民间习俗，而来自行政权力。

虽然是合作基础上建立的互助组织，但新的变工队、扎工队对劳动制度的规定更加严格。如大多数变工有这样的纪律：“按时到工，不到必须向组长请假批准；作息服从组长指挥；先给谁做由组长分派；自己怎做给人怎做；不半途退出……。”<sup>[63]</sup>把原来变工中“工头”的称呼改为“组长”，要求服从“组长”的领导和管理，遵守作息时间和任务分配，这些非常类似后来生产队劳动制度的规定显示出，通过权力引导重组的变工组织已经经由行政权力的细致规划和限定，完全改变了原有以亲友情分和民间契约为依据的工作方式。

不仅如此，新的劳动互助组织也改变了原有的亲缘关系及临时需求为主的互助基础，向以行政属地为原则的、长期的制度化劳动力配置转化。李维汉在后来反思这一阶段工作的失误时承认，边区政府急于将民间的变工形式整合为集体化生产劳动力的统一配置。变工中“要求组织大变工队，把50%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变工队”是“犯了急性病”，“与边区政府的贪大、求全、急躁的思想有关”<sup>[64]</sup>。当时《解放日报》连续报道说，“赤水县四区三乡共有劳动力153人，有111人参加在15个变工和唐将班子中，占73%。”<sup>[65]</sup>“绥德分区模范村郝家桥在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的带领下，全村男劳动力中88%参加了长年变工。”<sup>[66]</sup>“在边区甲等劳动英雄贾正才的率领下，安塞魏家塔村的77个劳动力全部参加长年变工。”<sup>[67]</sup>当整村的劳动力基本参加长年变工时，这就已经改变了原有变工队和扎工队临时性的农村劳动互助性质，而更多具备行政属地管辖下集体劳动的色彩。

行政权力还借助新的劳动互助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新作物和新农耕技术的推广，例如，边区原来没有种植棉花的习惯，但由于军队服装供应的巨大需求，边区进行科学调研，发展大规模植棉，棉花种植面积达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sup>[68]</sup>。让自给为主、少量交换的农民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有计划地进行某种作物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乃至在生产过程中“合伙吃饭集体纺线”<sup>[69]</sup>，没有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是不可想象的。

③劳动合作组织成为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的有效力量和基本单位。

一些村子的扎工队和变工队不仅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成为有助于抗战动员的社会运动组织，如白塬村的变工队“进行了开义仓地、运盐、优抗、送公粮、自卫运动的工作”<sup>[70]</sup>。“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变工队、扎工队在环境紧张时就转变成自卫军的组织。”<sup>[71]</sup>在行政权力的引导下，它们也承担了大量政治动员的工作，具备更强的政治色彩。尤其是部分年轻力壮的农民，通过扎工队和变工队，同时也加入自卫队的行列，并通过这一渠道加入军队，使得兼具自卫队性质的扎工队和变工队带有准军事组织的部分功能。

④经过组织的生产队伍同时也承担党的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例如，西北局的报告显示，这些劳动合作组织“取消过去唐将班子的一切迷信习惯，增加了读报纸，教唱新秧歌等等文化娱乐活动。……取消了包头、领头对工人的压迫，代之以民主生活”<sup>[72]</sup>。

当时在《边区群众报》工作的胡绩伟对此也有生动的亲身经历的描述：

当时正值中秋，生产互助组把玉米棒子掰下来堆在场上……全村能劳动的男女老少都团团坐在玉米棒小堆的周围，一边劳动一边娱乐。劳动是用两个玉米棒子互相摩擦使玉米粒脱落下来，娱乐是宣传时事、说评书、讲故事、唱小调、拉秧歌<sup>[73]</sup>。

在新的变工和扎工组织出现之前，只有中农以上的农户才能雇请扎工或唐将班子，但现在，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小农户甚至新来的难民也有“拉工”或“叫班子”的了<sup>[74]</sup>。

这种鲜明的对比，很容易让农民们，特别是贫苦农民对政府所强调的“翻身”产生高度认同。

从完全自主决定是否开荒、开荒数量多寡、种植何种作物，到被逐步引导定额开荒、以竞赛形式多开荒、被鼓励和组织种植棉花等作物——以渐进的、引导和鼓励的方式，边区政府小步快走，把完全分散型的自由生产的小农经济逐步引向有组织的集体化生产方式。

在面临粮食危机的40年代初的边区，必须首先看到这一行动促进生产的正面意义。《时代》杂志与《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1944年6月访问延安后给予毛泽东所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以极其正面的评价：

相反的，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主持了一次经济资源的充分调查，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为发展资源而工作。……到1944年，他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sup>[75]</sup>。

但这一行动的深远意义远不止于临时性的危机应对。“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sup>[76]</sup>的劳动合作互助，通过生产关系重构、组织重构、制度重构、内容重构和功能重构，将原有的扎工队、变工队、唐将班子等一系列自发的、基于乡村亲缘关系和雇佣关系建立起来的农民互助组织进行了实质性改造。虽然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名称，虽然没有“采取千篇一律的组织形式”，而是“根据各家农户的具体要求和各种条件来决定，不凭空臆造，也不要采取某种固定形式，只要在实际起着互助作用就行”<sup>[77]</sup>，但实质上，绝大部分农民劳动互助组织已经被改造为行政权力主导的、以行政属地划分的、依靠严格的纪律而非传统契约来运行的基层生产单位。它细致地对每个个体农民进行安排，各安其位，使得农民的肉体和军队士兵一样成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就使得千年来在极度分散的乡村环境中，以相对自由状态从事生产、主要以税负形式受到政府管理的农民，全方位地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受到监控和管理，成为可被驾驭的、驯顺而有用的生产机器。在生产关系改造过程中，它为后来的全面农业合作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同时，变工队、扎工队还兼具教化功能和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因此，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中，它也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公社改造，为毛泽东理想中的准军事化社会提供了杂芜、混沌但又充满想象力的原型。

### (3) “生产一整风”双重规训：知识分子的道路

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1943年11月底，时任八路军高参室战略组组长的童陆生，在边区生产成绩展览会上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展出了亲手种植的大冬瓜，感慨中赋诗一首<sup>[78]</sup>。当时的他也许没有想到，这首诗会伴随着朱德种菜

的故事，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核心记忆：

朱德自己也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在里面种上了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种蔬菜，就像一个“蔬菜王国”。几位勤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朱德种菜却是个能手。就像他指挥作战一样，他种菜也很有一套法子。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掏地、点籽、浇水，每道程序都有条不紊。为了积肥，他还带头拾粪。

因为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所以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1943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举办边区生产展览会。会上，朱德展出了他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很感动。

史料显示，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运动，最实际的推动者实为朱德而非毛泽东。1940年9月2日，朱德邀请一批高级干部视察高桥镇难民纺织厂，并推动开展纺毛运动，促进边区纺织业的发展以解决部队的军服需求；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朱德又命令属下部队的6个营参加打盐以获取现金收入；朱德还最先踏勘了南泥湾土地。作为当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朱德还亲自垦殖3亩菜地。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开垦了自己的菜地，而周恩来则通过纺线来完成自己的生产定额。

领袖垂范极大地激发了基层的劳动热情，但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引而不发的压力。如前所述，组织边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进行生产自救，其过程并非一呼百应。事实上，在1939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自己动手，才是出路”<sup>[79]</sup>的演讲之后，机关干部和学生应者寥寥。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大多存在轻视农业生产而以革命工作者自重的思想，此外，习惯于供给制，缺少强制性措施，也导致这部分人缺少生产自救的动力。

有三五九旅的示范，加之定额生产制度的推行，以及紧锣密鼓的政治动员，大生产运动终于在机关和学校等非生产人口聚集的单位推广开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在194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20余万石，约值边币一百万万元”<sup>[80]</sup>。

按照当时的规定，每个人需要通过垦荒种地，上交一定数量的公粮，也可以用纺纱织布所折的粮食数量来相抵。

每个人的计划都是在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而订出的，珊裳的全年计划是交纳八斗半的粮食。每天在报社工作三小时半，其余五小时半用来纺纱，完成这八斗半的公粮。

这段记录，来自知识分子陈学昭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sup>[81]</sup>作为曾经留学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名门闺秀，本以《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陈学昭怀着革命理想，最终选择了留在延安。对于大生产运动，记者出身的她既是生产者，又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难得的是，与其他趋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述相比，她的文章中不乏冷静的思考。

按照当时的定额要求，陈学昭每天都要纺出相当于0.35公斤粮食的纱，才能够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而当时的亩产量仅40~50斤<sup>[82]</sup>。这就是说，如果折算成农业生产工作量，陈学昭的工作量约为生产5亩地的粮食。即使以今天已经大为改良和简化的耕作技术来衡量，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拥有延安唯一的博士学位，以文字工作自任，陈学昭对于从事体力劳动“不单没有信心，也轻视这个东西”<sup>[83]</sup>。她曾经自问，“学纺纱，把时间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小时能纺多少呢？”也曾经产生抱怨情绪：“应当利用熟练的生产技术才能更好地完成个人生产任务。”<sup>[84]</sup>

因为革命理想而奔赴延安的陈学昭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此时已经处身于“整风运动”的风暴之中。从报纸上、从学习会议上、从其他种种渠道，她清楚地知道：“这是最实际的革命的任务。”但真正着手进行体力劳动时，不但需要解决“许多具体的思想问题”，还必须首先学着驾驭原始的生产工具：

当一辆纺车放在面前，我简直感到了一种类似失望的心情：“这样原始的工具！”我想。继之而来的，是许多这类的念头：“开动一辆汽车恐怕还比摇动一辆纺车容易些。比对付一架钢琴更困难。”我有一种很深的成见，总觉得现代机械的东西是容易学的，但是农村里的工具是

太原始了，锭子一碰就要跳，弦太紧摇不动，太松了也摇不动，那样碰不起，太难对付了。……急得我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的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sup>[85]</sup>。

到延安采访的记者赵超构也注意到了大生产运动中所带有的强制性性质：

虽不是强迫的，却也带有精神上之强制性。每个工作人员，在种地、纺纱、捻毛线三者之中，必有一种。每天 11 小时的工作，7 小时的办公，2 小时学习，2 小时生产。实际上，有些人为了贪图收入，生产时间超过 2 小时是极普通的。……赶不上计划的被批评，“加油”“超过”的被鼓励，人类的好胜心被发挥到极点，劳动力的利益也达到了极点<sup>[86]</sup>。

对工作效率的追求甚至已经改变了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

延安的习惯，是夫妻分居的，她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之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于因为夫妻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sup>[87]</sup>。

当时，很多女性结婚后为了不耽误工作，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由于卫生和营养差，孩子往往很快就死亡。在当时，这些被普遍认为是为革命做出的必要牺牲。

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知识分子普遍实现了角色转换和认同。例如，陈学昭在终于能够熟练地完成纺纱任务后，一方面感受到了挑战自我所带来的自豪感，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终于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但另一方面，又多少为自己“蜕变”的过程感到痛苦。

如周晓虹所观察到的：“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不仅证实了一个人作为角色成员的地位，而且也是自我评价的积极反映。显然，如果来自他人的反馈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sup>[88]</sup>”。此时，作为个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角色认同与他人评价发生

极大分歧时，对自身身份、立场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深刻怀疑，而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与其内在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sup>[89]</sup>这个阿帕特与赛奇称之为“取消个性”、“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的过程<sup>[90]</sup>，正是延安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中经历的重塑自我之路。这就是为什么陈学昭、丁玲、周立波、何其芳、王大化等众多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阶段进行如此深刻和痛苦的检讨、反省，下定决心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清算和灵魂改造的原因：

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一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羞耻的事情<sup>[91]</sup>。

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sup>[92]</sup>。

经过改造的张仃认识到“走了错误的一段路”<sup>[93]</sup>之后，痛下决心：

一定得把边区农民特色表现出来，把扎工、变工，日趋于集体劳动的新型农民表现出来，把党教育下的，觉悟的革命农民，表现出来<sup>[94]</sup>。

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星火燎原》、《延安往事》等回忆文集中找到大量对大生产运动亲身经历的回忆。阅读这些回忆录，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领袖务农轶事娓娓动听的叙述，还是如陈学昭等普通延安干部对大生产的往事追忆，都遵从着“遭遇困难—英明决策—统一思想—战胜困难”的话语逻辑。这一话语逻辑，在当时的目的是否定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重视“革命工作”、轻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强调通过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sup>[95]</sup>。而其政治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通过展示在短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来证明领袖决策的果断和英明。

②只要统一思想，追随执政党的领导，就能够战胜困难，“人定胜天”。



③通过执政党迅速改变局面的能力来证明其广泛群众基础，从而证明其政治合法性。

④通过贬抑知识的价值来强调证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保持对党的完全与彻底的忠诚。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组织起来”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干部及知识分子在内的非生产人口参加生产，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兴办合作社一脉相承的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来实现规训，保证生产效益和行动一致性，实现对肉体的驯服。

尤其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特殊力量则在于，与“整风运动”形成二重奏的定额生产制度，“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sup>[96]</sup>，这一过程，我将其命名为“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

①通过具备强制性的定量生产，树立“不劳者不得食”的观念。但这个“劳”不是指劳动，而是专指“体力劳动”，在极大程度上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如同毛泽东所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sup>[97]</sup>对既有能力和身份的否定，彻底打碎了知识分子的原有自我认知，而对其体力劳动能力低下状况的展示，则一方面加大了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又塑造其被生产运动边缘化的强烈孤独感，切断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执政党发动运动，使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自我审查和思想改造。按照阿帕特和赛奇在《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中的解释，整风运动是一种阐释约定（exegetical bonding）的过程——“阐释约定在即时社会学习的场景中把字词和思想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和符号，使自我意识被他人所掌握。阐释约定造成了约定俗成的解释，而它更大的目的则在于超越一般理解的启发。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约定，取消个性使人们进入一个纠缠话语的新的互动平台，人们挑选字眼，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sup>[98]</sup>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担忧自身与主流意见发生歧异，或因此被列入“抢救”对象，于是纷纷积极加入自我审查的行列——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将这种现象称为“沉默的螺旋”<sup>[99]</sup>。由此，运动表

面看来呈现出几近癫狂的火热状态，人人身不由己地遵从由权力预先设定的目标、轨道，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

在当时，发动军民大生产有其战时特殊阶段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抹杀劳动分工的必要性，“树立劳动观点”的过程中，将“劳动”混同于“体力劳动”，重塑“羞耻”与“光荣”的标准，通过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实现“生产一整风”的双重规训，要求知识分子通过对劳动英雄的模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其实质是要求这些继承“五四”质疑精神的知识分子，否定自西方学科体系中接触到的既有知识——从后来的发展理路看，实际上是除了毛泽东所认可之外的一切人文社科知识——的价值，放弃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无限效忠和追随执政者。如同韦君宜多年之后沉痛地指出的：“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sup>[100]</sup>

在这个“生产一整风”规训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sup>[101]</sup>

理解这些，也就能够理解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双重规训所建构的社会记忆，对后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在后来的大跃进中，如此之多的专家学者，文人和其他技术工作者，都对大炼钢铁、放卫星等明显违背了自然规则和科学规律的、狂热的群众运动钳口不言，盲目追随甚至大唱赞歌；也就能够理解，对于知识的贬抑，并非来自对知识价值本身的质疑，而在于让人们放弃独立思考，选择追随与效忠——这也是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劳动、思想双重改造运动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在那些运动中，“南泥湾精神”和大生产运动被频繁重述的关键原因。

作为大生产运动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有关“组织起来”的记忆由一系列令人热血沸腾的事迹和数字所组成：军民大生产、兴办合作社、改造二流子、成立农民互助组织……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叙事，它们的基本话语逻辑都一脉相承。通过这些事迹纷繁但内在理路完全一致的

叙事，有关“组织起来”的记忆就被成功地建构起来，它有效地证明了执政者的政治合法性，也证明了通过效忠与追随，执政政权就能够率领中国民众改天换地。

在这些记忆之下，叙事逻辑潜藏的另一条“暗线”，则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先进群体和落后群体的区分，树立模范鼓励效仿，再鼓励中间群众向模范靠拢，帮助后进，积极挖掘“破坏分子”进行宣示性惩戒，来保证个人在群体行动中的一致性，实现对民众肉体和思想的同步规训。

在生产关系的改造中，“组织起来”通过“新瓶装旧酒”，将绝大部分原有依照亲缘关系和临时需求为结合基础的农民劳动互助组织，改造为行政权力严格管辖的、依靠严格的生产纪律而非传统契约来运行的基层生产单位，它以互助之名，行合作化之实，让习惯于一家一户自然生产方式的农民逐渐去适应集体生产方式，并全方位地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受到监控和管理，成为福柯所说的“驯顺而有用的生产机器”<sup>[102]</sup>。它为后来的全面农业合作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也为新中国对乡村社会的公社化改造提供了原型。

在社会的改造中，它通过在熟人社会里对二流子的惩戒和改造，提高了生产率，厘正了民风，但道德贬斥的泛司法化惩戒，不仅改造了“二流子”群体，更通过集体批判和训诫来进行全民“思想改造”，让整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体在对照标准的自我审查和思想改造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

在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中，它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实现来灌输“劳动观点”，否定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其实质是要求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着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思考，而通过劳动和思想的双重改造向由官方钦定的劳动者模范看齐，如李维汉所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sup>[103]</sup>实现知识分子个体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群体特质的同一性，从而将知识分子改造为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组织起来”的记忆，虽然不像《南泥湾》的歌声那样形象生动，在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中传唱久远，但这一记忆对新中国的深远影响，却丝毫不下于后者。它所创造的“生产一整风”双重规训，从大跃进、

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七干校改造运动等，直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它有力地辅助执政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完成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改造。

### 3 “鱼水情深”的记忆

在“南泥湾精神”中，团结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被形象地表述为“鱼水情深”。

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民众鱼水关系的记忆塑造，自中央苏区时期便已经开始。不过，这种记忆的大规模和多种形式的塑造，则极盛于陕甘宁边区时期。

“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的记忆文本符码，同样来自几个流传已广的故事。它们展现出两种清晰可辨的叙事原型：“拜师”与“纳谏”。

#### (1) “拜师”

在“拜师”叙事中，王震和朱玉寰老汉的故事尤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这个故事里，王震为了提高产量，聘请了一位老农朱玉寰为生产教官，而老农则尽心尽力，教授士兵们生产技术，使他们都成为熟练的生产能手。

王震表扬朱老汉说：“听说你经常指导部队和农场种庄稼，对我们开展大生产帮助很大。”……王震思虑片刻，非常认真地对朱老汉说：“在种庄稼上，你就是我们的长官，有权教导咱们的部队！”……王震回转身对朱老汉恳切地说：“你看，这些团长、场长都听你的话，实践证明‘凡事要好，须问三老’，部队上哪块地庄稼种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嘛！我委任你当农业生产副官，今后不管359旅哪个单位，欢迎你批评指导，你看怎样？”

“成，能成！”这位爽直明朗的山东老汉慨然答应。

让朱老汉更乐的事还在后头呢。王震与朱老汉约定，两人一同乘车到延安城拜见毛主席。朱老汉哼着山东小调，挥舞着旱烟锅儿，逢人便

报告着自己要到延安见毛主席的喜讯，整个南泥湾的人都分享着他的幸福。

……在毛主席院落右侧，他们还拜见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请朱老汉吃晚饭时，还把朱老汉让到上座。毛主席、朱总司令都认可朱老汉当王震旅长的副官，当着王震的面，一再指示他勇敢地当好生产副官，大胆教育部队农作生产，建设好南泥湾。

在南泥湾军民齐心协力的努力下，1944年，359旅开荒达到了33万亩，人均33亩，真正做到了耕一余二，每位官兵，包括朱老汉，都分到了不少红利钱，他们还给当地政府上交了一万石公粮！

……359旅大部分人马南下了，留给陕北的是大片大片开过的田野和满山川的牛羊。朱副官这位老汉和留守部队人员及其千千万万当地群众，继续守护和耕耘着南泥湾这片肥油油的土地，直到王震率部南下北返<sup>[104]</sup>。

另一个著名的“拜师”故事是毛泽东为自己的儿子聘请当地老农为老师。《人民日报》于1946年11月15日转载了一个小故事：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毛岸英刚到吴家枣园，吴满有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也不懂的，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

吴满有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当开荒。”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拚命地学开荒，白白的皮肉，被太阳晒得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

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锄草、下种籽、耕

地。吴满有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的会种庄稼了<sup>[105]</sup>。”

需要说明，这篇文章原发于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作者张名哲只是一名9岁的小学生。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因应宣传的需要，这篇文章会被转载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吴满有的故事，在当时的边区的确达到了令人耳熟能详的程度。

与领袖、将领们礼贤下士相呼应的，还包括一批干部热情邀请百姓做自己的农业老师的故事。这些不同层次的共产党干部们“拜师”的故事至少有着三层含义：显而易见的表层，是党和军队的领袖礼贤下士、向当地群众虚心求教农业生产技术；在之下的一层，则是民众对党和军队的深切热爱，以及军民一家的深厚情谊；而潜藏于这下面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民众对党的追随和忠诚。它们共同构成了“鱼水情深”记忆的真实内涵，即对执政的群众基础，亦即政权合法性的证明。

## (2) “纳谏”

与此内容看似有别，但实质诉求同样指向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叙事——“纳谏”。事实上，这类“君圣臣贤”的故事绝非起自共产党执政时期，它在中国历史叙事上有着悠久的传统。

第一个故事是农民借雷电劈死县长发牢骚——“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

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在延安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第二个故事则是一位农妇由于征收公粮与干部发生的激烈矛盾：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后来，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sup>[106]</sup>

《学习时报》称，毛泽东经过两次“骂”后，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负担”<sup>[107]</sup>。

对此，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由于“毛泽东很能体谅人民的疾苦，而且宽宏大量，能容忍对他的咒骂”，反而从这件事中得到了边区民众的拥护：

这件事同打雷打死县长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边区各地，十分得人心，很多老百姓称赞毛泽东主席是“明君圣主”<sup>[108]</sup>。

这个故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被放在相当显著的地位加以铺叙。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中，这一类故事并不少见，大体可总结为：地位崇高的领导者因不知民情等原因一时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地位较低的人勇敢地进行了纠正，而在了解民情之后，领导者立刻纠正了自己的政策偏向。“群众陈情—领袖纳谏”的话语逻辑同时展示出领导人倾听民意和知错能改（他总是无意犯错的，而绝非故意为之）；以及在纠偏之后民众对他表达的持续信任。这个过程中虽然有曲折，但总体而言民众是信任和支持执政党的。

故事的意义和激励作用往往来自传播对象的自我投射，如果把视角从文本移开，而关注故事的聆听者身份，就会发现，无论是“纳谏”的故事，还是“拜师”的故事，聆听者都是干部或民众。对干部而言，意识到连高高在上的领袖都那么关心底层民众，所以，作为属下当然追随其步伐，应该而且必须关心底层民众的疾苦；对民众而言，不仅获得了荣誉感和认同感——伟大的领导人成为和他们一样的群众的学生，而且，地位如此尊崇的领导人如此关心民众，“从善如流”，不但丝毫不损于他所执掌的政权的光荣、伟大与正确，反而能够为红色政权的“明君圣主”增添更多富于人情味及传奇的色彩。至于这个故事的叙说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相比之下反而不再重要了。

这清楚地表明，叙述这些并非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传递历史事实，而是为了以故事为依托一再重述和确认政党的合法性——故事是代码而不是事件本身。

也许有一个迹象可以佐证这一点：这类故事会向同一个群体反复讲述，即使他们已经听过多次，仍然必须带着敬意聆听，这就证明，故事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强调和确认。

大量的新闻叙事强调表现的还有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场景，例如：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一九四三年春节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状况。春节前，边区政府做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六万二千多元，由林伯渠等亲率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



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扎搭彩门，张灯结彩，准备热烈欢迎慰问团。

在这篇报道中，在形容军民关系时，描绘了“热烈的掌声”、“欢乐的海洋”、“欢腾雀跃的儿童”，“无比欢欣的笑容”，整个场面“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了整个山谷”。

报道还特别提及林伯渠离开时给驻军全体指战员的留别信，在这封信中，林伯渠写道：“这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现象，是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展生产开辟南泥湾政策的结果。”<sup>[109]</sup>

“军爱民，民拥军”的主题，由于贴近民众，形象比较生动，因此，在关于南泥湾的各种流传文本中都有明确的展现，其中，尤其以秧歌剧和木刻为突出代表。据周扬统计，1944年春节上演秧歌剧56篇，其中，描写军民关系的秧歌剧达到了17篇<sup>[110]</sup>。

而在“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形成“脱离了外国影响的富有民族气味的风格”的延安木刻<sup>[111]</sup>，亦被艺术工作者们用于充分地表现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从1940年开始，一批表现共产党军队与老百姓融洽无间深厚情谊的木刻作品涌现出来，其中，代表作包括表现军队为边区民众排忧解难的《帮助抗属锄草》（1940）、《帮助老百姓盖房》（1943）、《帮助老百姓扬场》（1944）、传授卫生知识的《讲授新法接生》（1944），以及表现民众拥护军队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1943）、《来了亲人八路军》（1943）、《歌唱八路军是恩人》（1944）等。

若将这些作品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品中的政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益加浓厚，从朴素叙事的“盖房”、“扬场”到“亲人八路军”再到“恩人”的标题创作，作品中直接的政治指向越来越明显，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sup>[112]</sup>，一切以服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为创作准则。

“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在这些文艺作品的叙事中，核心政治诉求集中于表现执政党领袖的虚怀若谷、重视民意；执政党对民众的爱护，以及民众对执政党的感恩之情和无条件拥戴。

军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给，在当时，有效地缓解了由于公粮负担过重、物价飞涨而导致的沸腾民怨；向民众积极学习生产

技术，同时帮助民众从事生产活动，以及为民众普及卫生知识等，也在极大程度上密切了军民关系。有关“鱼水情深”的记忆建构，在《拥军秧歌》中“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八路军”的歌声中，成为大生产运动最为广泛、最为人所熟知的政治符号。这一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解说词中得到了强调：

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征服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最显著的标志。

“支部建在连上”——在国家权力控制中，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一点，是通过党的教化来掌握军队领导权，因此，对于军队与民众之间鱼水情深的关系的强调，是强调执政党政权的广泛群众基础，证明其政治合法性的最关键手段。不管是在红色苏区的记忆构造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独轮车推出的胜利”中，或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60余年内，“鱼水情深”的记忆都贯穿了中共创业史和执政史的始终。

## 4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

在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中，国家权力所着力建构的第四个方面，是关于边区尽管贫穷困苦，却充满平等与民主精神的记忆。

关于“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在革命回忆录与传记的记述中尤为多见。其叙事原型可大略概括为“同甘共苦”和“革命大家庭”<sup>[113]</sup>。

### （1）领袖干部的生产传奇

对于在国统区耳闻目睹国民党政权之腐败的有志之士，下面这类叙述共产党军队官兵如何同甘共苦的故事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吸引力：

在开荒生产中，干部都以身作则，和广大战士一起生产劳动，这不仅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密切了上下级和同志间的关系。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同志在开荒生产中，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亲自带头，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不仅获得了鼓舞力量，而且常常感到极大的愉快。他亲自担任团部生产小组长。他的组员有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政委左齐因残废未正式编组）。他们八个人一天挖地十一亩多，每人每天平均挖地一亩三分多，是该团模范小组之一。陈团长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扛着锄头从这山到那山，去各连队督促检查。有一次陈团长去十连检查开荒，老战士们老远就望见了，大喊“团长来了，加油啊！”刚从伪军解放过来的新战士却不相信地说：“我们在旧军队多年，眼看团长到哪里去，后面起码要跟三、四个卫兵，哪会就一个人扛着锄头走的呢！”待陈团长走到他们面前，问：“同志们辛苦啦！”几个新战士才信服地向别的同志说：“我们今天才真正知道八路军的官长和我们当兵的一样啦！以前我们在反动派军队里，一个班长、排长就摆个了不起了架子，随便打人，谁还敢见团长啦！”

另一位干部虽然无法参加开荒，但也同样和大家一起加入到生产与建设的工作中：

团政委左齐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右臂，不能参加开荒，但他也不肯站到生产战线之外，他一有空就帮着炊事员烧水做饭，唯恐误了吃饭时间使大家挨了饿。他经常挑着担子到山上去给战士们送水，大家喝了他送的水，都感到增添了新的力量。左政委有时还拿自己的津贴，买些红枣给大家作枣糕吃，当同志们吃着那香甜可口的枣糕时，都为左政委这种行动感动了，激起了无比的劳动热情。补充团团团长苏鳌同志过去曾光荣负伤十五次，身上有二十多处伤痕。开荒时他领导全体指战员猛干，创伤复发，但他仍坚持劳动，后经同志们一再地恳切要求，方才休息，但他仍然不离开劳动战线，继续担任着生产的领导工作。

相应的，基层士兵也关心和爱戴上级领导干部：

陈团长走遍各连，一面检查开荒，一面了解下面有什么问题，和大家说说笑笑。当大家看到陈团长手上包着破布时，都关心地问：“团长，你手上打了血泡了吧？”很多战士提出替团长代耕，要求团长休

息，他们说：“我们每人多挖十镢头，就满把团长地挖出来啦！”三营营部通讯员喂了两只老母鸡，生了蛋，拿去慰问团长。这些都被团长婉言谢绝了<sup>[114]</sup>。

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的机关干部也参加到了生产中。这些轶事成为“延安传奇”：

陕北的春天，干旱少雨，尘土飞扬，人们看见任弼时、吴玉章、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一起到后山开荒或者平整土地。毛泽东一边干活，一边认真听取汇报。……柯庆施说：“杨家岭的同志提出，现在边区财经困难，老百姓种地要缴公粮，我们开荒种地，也要向边区上缴公粮。”“缴多少呢？”毛泽东一听说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赞赏地问道。柯庆施回答说：“按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四十五斤。”“好哇！举双手赞成，我也有一份。”毛泽东兴奋地说。柯庆施忙说：“主席，同志们说你工作太忙，由大家代你缴一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一边吸一边风趣地说：“请转告同志们，谢谢大家。请客、看戏可以代替，缴公粮不能代替。”……毛泽东主动缴公粮的故事，在延安传为佳话<sup>[115]</sup>。

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其中包括西红柿、白菜、萝卜、南瓜、黄瓜、菠菜、莴苣、豆角、辣椒等。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就出现在菜园里，浇水，翻土、施肥、移苗、绑架。……有一次，延安总部在王家坪桃林招待美军观察组，并以朱总和总部机关生产的西红柿、瓜果招待客人。当观察组的客人一看到朱总的菜园和生产的西红柿、黄瓜时，赞不绝口。他们说，西红柿原为南美产品，在欧美属上等水果蔬菜，没有想到这种果菜，竟然在中国荒凉的陕北也长得这样好，并且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生产的，真是奇迹<sup>[116]</sup>。

官兵一致的工作方式，给外来的访问者以深刻印象。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观察并记录说：

虽然朱德、周恩来的上衣口袋上可能插着自来水笔，可表示军阶的

徽章却是没有的。司令员和士兵的制服都是一样的。……在共同的事业中，所有的人都处于平等地位<sup>[117]</sup>。

负有考察共产党人控制地区状况的“迪克西使团”则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比喻为斯巴达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刻苦而自律<sup>[118]</sup>。

甚至连共产党的对手也表示出对同甘共苦的共产党人的同情和赞赏态度。1937年，国民党一个17人的考察团抵达延安，团长涂思宗注意到了桌上摆的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现共甘苦。他说：“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sup>[119]</sup>。”

“人人平等”的叙事，在共产党的红色创业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如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和士兵一起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的故事，朱德和士兵一起挑粮食的故事，等等，都遵循着“官兵平等”的话语逻辑，这一政治话语逻辑的宣示是与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存在的腐败和等级差别的凸显同时进行的。延安斯巴达式清教徒的清苦生活，感召了一大批反感国民党腐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回忆延安的“青春岁月”时，胡绩伟就曾经生动地描述了他甫抵延安，尚未知晓“小灶食堂”的存在时，被“一个人拿两只碗，一人一勺菜”的绝对平等深深打动了的情景——“大家穿的都一样，吃的也一样，这不是自己多年来追求的平等社会吗？”<sup>[120]</sup>这些景象同样也极大地打动了在旧式军队里习惯被打骂和虐待的低级士兵，让他们感受到抗日救国和抵抗“顽固派”的崇高使命感以及类似宗教献身的精神，进一步建构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话语逻辑。

今天的史料研究已经证实，当时的延安，并非胡绩伟甫到时所感受到的，是“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而同样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别，物质待遇的区别只是表象，更实质性的变化是少数人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威权。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阶段政治风气从民主到独裁的变化：“小恺撒正在出现。棉布服装三种不同的颜色表明你向上爬时所到达的位置。”<sup>[121]</sup>由此看来，王实味当时在《政治家、艺术家》以及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野百合花》上所批评的“歌舞升平”、“衣分三色，人分五等”<sup>[122]</sup>，都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攻击，而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平等的切实感受。也正因如此，任何对于“人人

平等”的叙事主题的质疑，都首先被视为是对执政党尤其是其领袖的恶意攻击。丁玲在后来关于《三八节有感》一文的反思中承认，此文有错，而错误在于“信笔所之”，“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sup>[123]</sup>。

应该看到，丁玲晚年的这个反思虽然仍然建立在对领袖权威的服从上，但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执政党为何如此反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作品：无论是《野百合花》，还是《三八节有感》，以及刊登在《轻骑兵》上的其他文章，之所以在当时被视为错误乃至敌我矛盾的典型，都起因于反映了边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虽然执政者心知肚明，但却不能容许它们被公开评论，甚至连内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政治错误。这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了，刻意过滤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凸显人人平等的叙事主题，很显然是，而且仅仅是一种宣传边区执政者领袖正确与先进的手段。

## （2）家国同构的红色叙事

相比起“同甘共苦”的一系列叙事，另一类叙事原型，即“革命大家庭”的故事则扩展了叙事主体所涵盖的范围，将军队干部家属、抗属以及更广范围内的民众都囊括在内。当这些民众都被纳入“革命家庭”这一称谓之内时，很显然，它的确更容易给人以“平等”和“融洽”的印象，并为军队斯巴达式的清苦增添了温暖的光彩：

这里还应该谈谈我们的干部家属。在轰轰烈烈的开荒热潮中，干部家属也不甘落后，她们为开荒生产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她们除了自己纺纱，解决自己和孩子的吃穿以外，一有时间就去帮助战士们洗洗缝缝。补充团的干部家属们，为这事还开会作了决议，要求洗干净，补结实；手巧的人还要补的好看；耽误了的纺纱任务，以后补上；孩子多的可为附近战士洗补衣服；没有孩子身体又强的，就去较远的地方给战士洗补衣服。

她们对战士的衣服洗得非常认真，一件衣服要洗三次：碱水洗，开水烫，清水摆。有时战士们拿着自己洗过的衣服请她们补，当她们发现没有洗净时，就重洗一遍再补。战士们的衣服破了，她们总是想方设法给补好，长裤子破得不能穿了，她们想法给改成短裤，长袖衬衣不能穿了，她们想法子改成短袖衬衣。这一点，对于刚从伪军解放过来的新战

士感受最深，他们说：“在旧军队里，当官的老婆叫做太太，坐在椅子上喝茶，还是觉得不舒服呢！给当兵的洗衣服，休想！别说团长副团长的老婆，就是排长的，见一下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说，“我们八路军，男的种地，女的纺纱，又帮我们洗洗缝缝，真是革命的大家庭。”<sup>[124]</sup>

军人家属的突出代表是三五九旅特务团政治委员谭文邦的妻子陈敏。在《解放日报》专门报道她的事迹之后，音乐家们迅速行动了起来。例如，在马克的歌曲《学习陈敏同志》中，他写道：

学习陈敏，女同志们！学习陈敏，组织起来建设革命的家庭！

这种将“国”与“家”联系起来的分析，自古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叙事手法。如“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家国同构的观念长期存在于皇权专制社会的宗法观念之中，有力地维护了皇权稳定，而在以共产主义理想为诉求的边区社会，执政党巧妙地将其核心概念进行了置换，将国君之“家”在修辞上置换为民众之“大家”，使民众有了当家作主的感受，而当朱德将大生产运动称为“革命家务”时，更强烈地增添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

在革命大家庭的叙述中，“父慈子孝”的传统叙事模式清晰可见——领袖扮演了传统家庭长辈的角色，展现出家长的亲和力，而年轻的士兵则展现出对待长辈的孝顺和真心疼惜。

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在未睡觉之前，就扛着镢头出来开荒了。干一会儿后，他才回窑洞休息。办公一阵，又出去挖地。

警卫员、勤务员一见毛泽东下地，急忙回到窑洞里，拿起锄头跟上去，和毛泽东一起挖。毛泽东立刻阻止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就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

大家一边笑，一边挖。毛泽东满脸淌着汗水，衬衫都被浸湿了，还是不肯放下锄头<sup>[125]</sup>。

“家国同构”、“父慈子孝”的叙事，其目的直接指向的是传统的忠

孝观念——尽管是以革命大家庭的新称谓出现的。

在领袖的行为感召下，地方政府官员也加入到革命家务中，为“革命大家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解放日报》在春耕生产中以显著的版面、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报道了庆阳县苏县长在春耕中不嫌肮脏，替百姓用手抓粪播种棉花的事迹，在最后，作者以农民的口气写道：“咱们边区，政府和百姓是一家”<sup>[126]</sup>。显然，这也是对“革命家务”和“革命家庭”的文学化吟咏。

在故事里，甚至连“二流子”也受到了领袖行为的感召：“杨家岭村有个二流子，成天闲逛，不务生产，当他看到主席冒着炎日，在地里锄草、浇水，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跑回家里，扛起锄头上山生产去了。”<sup>[127]</sup>

无论是革命大家庭的故事，还是官兵平等的描写，在这两类不无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背后，草蛇灰线般暗藏于内的是“革命施恩——翻身感恩”的话语逻辑，这些由传记故事、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众多叙事文本包裹其外的核心诉求，是“党的恩情比海深”，是民众对“翻身”所带来的“感恩”情怀。其根本目的，如同前面笔者所一再论述的，仍然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反复证明。

在当时，对“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的建构，为巩固延安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稳定了军队，让基层士兵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其二，稳定了民众，尤其是对领袖自觉过着艰苦生活的描写，以及对他们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安抚了已经难以承受沉重负担的边区民众。其三，获得了外界舆论的肯定，无论是黄炎培、陈嘉庚，还是前来考察边区军事实力的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都对延安上下在艰苦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示了极大赞赏。这为边区执政党获得外界的物质支援及舆论支持奠定了基础。其四，牵制了蒋介石政权，使其在双方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不敢过于贸然行事。

更重要的是，“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记忆，通过这些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反复铺陈，有力地在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树立了“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对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他稳定其权力的最为核心的政治资产之一。

几乎所有的政治系统都依赖于一系列象征物、符号、仪式行为以及话语的运作来维持其运转。它们表述意义、展现价值、表达情感，并构



成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达致政治认同。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指出，对政治象征的操纵是各种权力精英驾驭环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四种主要途径之一<sup>[128]</sup>。

本章围绕作为大生产记忆核心的“南泥湾精神”，对它流传的各种文本进行了详细的政治话语分析，解读了它作为神圣符号系统建构的过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政治口号成为这套红色符号系统中的核心符码，在其外围则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符码的一整套词语系统，以及一系列薪火相传的叙事文本，而暗藏其中的则是精心建构的话语逻辑，它们塑造了作出英明决策的领袖、与民众鱼水情深的党和军队、高度服从组织决定的部队官兵、深怀感恩之心并无限忠诚的劳苦大众……通过歌谣、戏剧、文学、美术作品以及传记、新闻报道、文件报告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改天换地能力的边区社会群像，这个严密的象征系统经过数十年的反复叙说铺演，不断“为过去赋义”<sup>[129]</sup>，并深深沉淀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阿帕特与赛奇在《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中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对历史叙事的控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sup>[130]</sup>。如前所述，围绕着“南泥湾精神”，一系列延安红色政权的大生产叙事，无论是在中共经济建设史，还是政权建设史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上述这些记忆符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反复唤起、重构、刻写和固化，系统性地纳入到“遭遇困难—克服困难”、“英明决策—忠诚服从”、“革命施恩—翻身感恩”；“群众陈情—领袖纳谏”等一系列政治话语逻辑之中，成为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资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被反复讲述，流传至今。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以形形色色的宣传和教育强化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培养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并在建国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

## 注 释

[1] 《南泥湾精神代代传》，载任勇：《南泥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第8页、第16页；亦可参见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延安精神的解说词：“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征服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

神最显著的标志。”

- [2]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 [3]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第37页。
- [4] 《毛泽东选集（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年版，第805页。
- [5] 萧劲光：《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红旗》，1982年第15期。
- [6] 何维忠前揭书，第1页。
- [7] 前揭书，第17~18页。
- [8] 任勇前揭书，第38~42页。
- [9] 《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 [10]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 [11]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 [12] 参见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4期。
- [13] 图片征引自艺术家网：[http://www.santage.com/artists/2008/1028/article\\_42510.html](http://www.santage.com/artists/2008/1028/article_42510.html)。
- [14] 孙晓忠前揭书。
- [15]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 [16]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 [17] 前揭书。
- [18] 孙晓忠前揭书。
- [19]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 [20] 朱鸿召前揭书，第58页。
- [21] “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这是根本的。”——见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年6月4日。王丕年时任延安县委书记。
- [2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2编，第693页。
- [2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6页、第167页。
- [24] 北群：《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0日。
- [25] 赵超构前揭书，第216页。
- [26] 《陕甘宁边区违警罚条例草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 [27] 前揭书。
- [28] 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 [29] 赵超构前揭书，182页。
- [30] 岳瑟：《人的改造——记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 [31]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3~54页。
- [32] 岳瑟前揭书。
- [33] 前揭书。
- [34] 北群：《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0日。

- [35] 见朱鸿召前揭书，第65页。
- [36] 见黄正林前揭书，第81页。
- [37] 《向申长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3月16日。
- [38] 穆义：《模范党员申长林的故事》，新华书店1943年版。
- [3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5辑，第240页。
- [40] 社论：《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年2月24日。
- [41] 《延安县村民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2月25日。
- [42] 孙晓忠：《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
- [43] 《党政协力劝导，本市二流子参加生产，男耕女织痛改前非》，《解放日报》，1943年3月23日。
- [44] 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年6月4日。
- [45]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 [46] 前揭书，第13~14页。
- [47] 前揭书，第14页。
- [48] 前揭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62页。
- [49]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 [50] 参见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 [51]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2编，424页。
- [52] 参见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 [5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1~772页。
- [54]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
- [5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 [56] 《杨朝臣村全体居民广泛推行变工运动 变工开荒合伙吃饭集体纺线》，《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 [5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一），第29页，转引自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 [58]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1日。
- [59]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2编，第85~86页。
- [60] 《1943年边区农业工作总结》（1943年），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2编，第76~84页。
- [61] 中共西北局研究室：《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2编），第478页。
- [62]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 [63] 前揭书。
- [6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页。

- [65] 《赤水四区三乡劳动力十分之七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2日。
- [66] 《绥德郝家桥大变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 [67] 《魏家塔村全部劳动力参加变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 [68] 《1943年边区农业工作总结》（1943年），前揭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书第2编，第76~84页。
- [69] 《杨朝臣村全体居民广泛推行变工运动 变工开荒合伙吃饭集体纺线》，《解放日报》，1943年5月17日。
- [70] 中共西北局研究室：《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2编），第477页。
- [71] 《解放日报》，《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1944年2月10日。
- [7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前揭书第2编，第478页。
- [73] 胡绩伟：《青春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 [74] 参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 [75] 任宏、高梅主编：《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 [7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 [77]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 [78] 童陆生：《朱总司令与军委高参室》，载《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246页。
- [79] 《毛泽东选集（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年版，第805页。
- [8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 [81] 朱鸿召：《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炎黄春秋》，2001年第12期。
- [82] 参见冯正明对边区粮食产量的描述：“每亩平均年产量不过四十来斤。”冯正明：《浅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从半自给自足向全自给自足的转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10期。
- [83] 朱鸿召：《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炎黄春秋》，2001年第12期。
- [84] 前揭书。
- [85] 前揭书。
- [86] 赵超构前揭书，第82~83页，
- [87] 陈晓卿、李继峰、朱乐贤著：《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 [88]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 [89] 前揭书。
- [90] David E. Apter &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转引自罗燕明：《90年代海外延安研究述评》，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
- [91] 何其芳：《改变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 [92] 朱鸿召：《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炎黄春秋》，2001年第12期。

- [93] 立波：《后悔与前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 [94] 张仃：《画家下乡》，《解放日报》，1943年3月23日。
- [95] 立波：《后悔与前瞻》，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书，第386页。
- [96] 米歇尔·福柯前揭书，第156页。
- [97] 转引自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8月上半期。据他研究，上述整风运动的讲话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被删去，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1942年延安印行，第4~5页。
- [98] 罗燕明前揭书。
- [99] 郭庆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从“沉默的螺旋”假说谈起》，《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
- [100]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 [101]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8月上半期。
- [102] 米歇尔·福柯前揭书，第156页。
- [103] 李维汉前揭书，第495页。
- [104] 王光荣：《人民永远是靠山——记王震与71岁的“副官”朱老汉的故事》，《党风与廉政》2003年12期。
- [105] 《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5日。
- [106] 薛鑫良：《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学习时报》，2007年11月19日。
- [107] 前揭书。这两个个故事在毛自己的叙述中很简短：“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 [108] 胡绩伟前揭书，第236页。
- [109]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 [110]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453页。
- [111] 力群：《鲁艺六年》，载孙新园、尚德周编著：《延安岁月——延安革命时期美术活动回忆录》，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 [11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7页。
- [113] 毛泽东对军队官兵中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一直持有“官兵一致”的要求：“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7页。但在这些公开宣示的政策背面，中共中央机关也实行“特供”制度，直至今日。
- [114]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 [115] 《毛主席在陕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作者不详。

- [116] 雷英夫：《雄怀胜似海洋宽》，《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 [117] 托马斯·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 [118] D. 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 [119] 陈晓卿、李继峰、朱乐贤前揭书，第165页。
- [120] 胡绩伟前揭书，第159页。
- [121]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 [122] 李维汉前揭书（下），第480页。
- [123]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 [124] 何维忠前揭书，第22页。
- [125]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 毛泽东延安种菜记》，《当代陕西》，2011年第1期。
- [126] 张铁夫：《县长替我种棉花》，《解放日报》，1943年6月6日。
- [127] 《毛主席在陕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作者不详。
- [128] 马敏：《政治象征：作为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功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 [129]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
- [130] 罗燕明前揭书，第483页。

## 第五章 | 模范是如何塑造的

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古斯塔夫·勒庞

在大生产运动中，今天最令人们耳熟能详的标志，是三五九旅的南泥湾垦荒运动。不过，在当时，与被称为“南泥湾政策”的这一决策有着同样重要影响的，是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和工业领域里发起的“赵占魁运动”，它们和“南泥湾政策”一起，组成了农业、工业、军队领域内的三面“旗帜”，为人们描绘了以工、农、兵为主导力量的边区各界民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共渡经济难关的热烈场景。

关于大生产运动中这三个典型个案的社会记忆重构，清晰地显示出执政党运用话语霸权，向民众输送其价值观念与政治诉求的过程。经过一次次的刻意筛选和精心过滤，南泥湾的故事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逐渐提升到核心地位，从最初“进军南泥湾”到“南泥湾政策”再到“南泥湾精神”，从官方话语的流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从一项应急性质的行动被提升总结为国家政策，经由记忆的重构，最终被形塑为“延安精神”这一红色记忆的核心元素，“吴满有方向”和“赵占魁运动”则逐渐隐退到次要的位置乃至被淡忘。

这两次在当时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南泥湾政策”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在重构南泥湾记忆的过程中渐次隐退，与其说是被历史淘汰而致，毋宁说是无法因应政治需要的结果。

红极一时的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是共产党的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富农”阶层的代表。虽然在1948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鼓励农民致富，“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sup>[1]</sup>但进入合作化运动阶段后，“新富农”的光荣历史显然不宜再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此外，吴满有因为被捕叛变而遽然从政治高地上跌落，被开除党籍、回乡务农，以他命名的“吴满有方向”当然不可能再被视为大生产运动的精神内核，相反，有关他的内容均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写，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不得不进行大幅度改动，乃至被彻底封杀。显而易见，无论“吴满有方向”的政策内涵是否正确，吴满有以其



“领袖之子老师”的身份而向政敌宣示效忠，其行为本身就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反讽。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作为一个曾经的红色政治符号，吴满有在有关大生产的记忆建构中被无情删除的命运势不可免。

相比之下，“赵占魁运动”中树立起的工人模范赵占魁，始终保持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忠诚，在工业大跃进时期作为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工人阶级代表而时常被官方话语提及。但应该注意到，这位任劳任怨的“天下第一好人”之所以被树立为工人运动的红色旗帜，其实是中共中央工会“整风运动”中“破旧立新”的结果。他作为政治偶像的诞生，自始至终伴随着为改造工会、整顿生产秩序而发动的严厉斗争，伴随着以“坏人”狄德建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被打为“破坏分子”、“特务”，进行群众批斗和残酷审讯的惨痛记忆。今天看来，工会干部通过发动工潮提出坚持8小时工时制、减少义务工时、保护工人利益等要求的做法，在战争时期很容易被视为过激行为，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因此被打为“破坏分子”，标上“特务”标签乃至几乎遭到枪毙的命运，则显属过火，在讲求法治、人权的今天，并不符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发动对赵占魁的宣传，极可能导致对“整风运动”的追问和质疑，因此，淡化“赵运”显然是必要的。

阿尔蒙德曾说：“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坚持或造就国民一种共同的信念，那么该政权就是合法的或有权威的。”<sup>[2]</sup>在有关大生产运动的诸多事件中，南泥湾垦荒经过文艺工作者传奇叙事的塑造，以其神话般的色彩，成为红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精神、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其军队与人民“鱼水深情”最为形象化的象征，也因此而成为对执政党所自称的先进性多方面、多角度、多元化的有力证明。

正如柯文所言，“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加深或扩大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是“使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sup>[3]</sup>在不同的时代，“南泥湾精神”作为核心政治话语，都能够适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的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重构这段记忆，灌输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引导民众实现和加强对现有政权合法性的社会认同。

“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的伟

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sup>[4]</sup>——正因为南泥湾垦荒故事的传奇色彩和内涵的丰富多义，使得它成为延安政权留给新中国最为宝贵的政治资产：执政者利用它来唤起民众对红色时代的激情，激发民众的群体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和维护，而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则为其神话般的色彩深深打动，不知不觉在倾听故事的过程中接受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从最初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诸多事件中脱颖而出，成为大生产记忆建构中的主体，被反复回忆和讲述，是执政党刻意筛选和不断强化的结果。

但是，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sup>[5]</sup>。笔者所关注的是，在大生产运动记忆重构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凸显或放弃故事原型，又是如何重构相关记忆的呢？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最重要的三面红旗——“南泥湾政策”、“吴满有方向”、“赵占魁运动”的兴衰史，厘清权力对其相关记忆建构的过程，对解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 1 “南泥湾政策”：鱼水情深的屯垦传奇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南泥湾/到处呀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  
 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江呀南

又战斗来又生产/359 旅是模范  
 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这首著名的歌曲，名叫《南泥湾》。迄今为止，它是中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之一。听到它的旋律，中国民众会下意识地想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歌唱家郭兰英提着花篮，和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舞蹈演员一起把鲜花送给八路军的场景——这一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 (1) 从“烂泥湾”到“南泥湾”

正如歌词中所描写的，1941年之前，位于延安城东南约40公里处的临川镇南泥湾——当时还叫“烂泥洼”或“烂泥湾”——的确还是一片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荒芜之地。清末民初的一首民谣中，南泥湾是这样一幅景象：“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山鸡窜，一片荒凉少人烟。”但其实，烂泥湾曾经人烟稠密。据史书记载，占地超过300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废于清朝回族暴动时期，由于左宗棠在镇压暴动民众的过程中放火烧山，百姓纷纷逃亡，连年战火，荒废经年，烂泥洼遂成为山林密集，豹狼横行之地。到1941年前，南泥湾地区只有区区十数人家而已。但这里土地肥沃，山林茂密，水源充足，与陕北其他地区的干旱贫瘠相比，因为有广袤森林的围护，小气候颇为理想，是一个适合开垦的好地方。

如果不是1941年三五九旅的进驻，南泥湾仍然是陕北高原上一个籍籍无名的山沟。但在大生产运动中，这支部队的进驻屯垦和因此而命名的“南泥湾政策”成就了它的红色传奇。

“南泥湾政策”，其实就是屯田垦荒政策。如我们所知，这种缓解财政困难的方式，自然并非八路军首创。早在汉朝，政府就已经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给养和税粮。在明代，自朱元璋开国起，即行九边屯垦，“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sup>[6]</sup>。事实上，地广人稀的西北边塞地区素有屯田的传统，大规模的荒地垦殖甚至贯穿了整个明代时期。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曾经颁布“九省荒

地开垦计划”、“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组织大片开荒，促进粮食生产<sup>[7]</sup>。不过，对习惯游击战争，长期转战各地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尝试利用屯田的方式来大规模解决军队的粮食供给，自“南泥湾政策”始，确凿无疑。而需要强调的是，南泥湾的屯垦，和旧有屯田制完全不同<sup>[8]</sup>。它同时承担了多项任务：首先是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其次是展现军队忠诚，肯定政权合法性与政策合理性；第三，在作为典型推广到边区的过程中，还要推动高度政治化、军事化，强调集体协作的生产模式，以此对乡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所有这些，都与前朝的屯田制度迥然有别。

如前所述，在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之前，由于边区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已开始发动延安各界机关制定生产计划。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整个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构及军队的生产，仍然是小规模、零星的，其目的是改善生活，而非实现部分或完全自给。此一工作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1940年已趋于停顿<sup>[9]</sup>。真正使得大生产运动产生标志性转折的事件，应属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屯田垦荒。

南泥湾屯田的高层发起者是富有务农经验的朱德。据实地踏勘南泥湾的农业专家乐天宇回忆，为考察边区森林资源的利用情况，他本人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重视，乐遂于1940年6月和林山、江心等6人组成考察团，用一个半月勘察了延安周边的15个县、6个林区，并写成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在对“烂泥洼”（即“烂泥湾”）的考察中，乐天宇等人发现该地适于农耕，于是提出了开垦“烂泥洼”的建议<sup>[10]</sup>。李富春随即将关于“烂泥洼”的情况报告了自华北抗战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斗争的朱德。此时，朱德目睹边区经济形势的明显恶化，部队机关得不到供给，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异常艰苦，而由于供给方面的问题，边区政府与军队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大为紧张，甚为忧虑。得知“烂泥洼”的土地宜于垦荒之后，朱德十分重视，随即在乐天宇等人的陪同下亲自三次前往踏勘。

此前的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奉命进驻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中共中央和边区的任务。为了给边区减轻经济负担，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他们开始进行商业、运输及少量垦荒的尝试，力求

自给。但由于绥德等地的土地大多已经被开垦，与民争地显非上策，且青化砭等地已有因耕种居民土地引发纠纷的先例<sup>[11]</sup>，显然，在这里完成自给的任务，存在极大困难。

1940年冬，朱德决定，将三五九旅调进南泥湾，垦荒种粮，彻底解决这支部队的供给问题。1941年，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及炮兵团也先后开进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马坊、临镇一带，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通过宣传组织，又从榆林、神木、横山、佳县等地引来了一些移民，南泥湾的开发从此开始。

第一年，由于农时已过，加之缺乏农业经验，三五九旅所获粮食不多。但到了1942年，粮食就自给了一部分，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经过全旅官兵的艰苦奋斗，几年里共开荒耕种了约27万亩土地，打了1000孔窑洞，建起了600多间平房。

据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的何维忠回忆，到1943年，全旅各部在南泥湾、金盆湾等地共开垦荒地27万亩左右，经费物资自给率达到93.3%；1944年，三五九旅不仅全部自给，而且可以积余一年，做到了“耕一余一”，士兵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sup>[12]</sup>。

屯田垦荒的“南泥湾政策”，并不仅是农业开发，除垦荒取粮外，还包括工业、运输业和商业。

工业方面，三五九旅建立了织布厂、肥皂厂、造纸厂、榨油厂、酿酒厂、木炭、盐业等一系列制造生活必需品的工厂。其中，织布厂不仅完全解决了全旅官兵的穿衣大问题，还可以出售部分产品提供给边区军民。据统计，到1942年春，三五九旅的纺织厂已颇具规模：全厂共计有棉、毛纺织机130部，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毯约一千五百条。

三五九旅开办的“大光肥皂厂”，不仅年产20万条大光牌肥皂，还出产粉笔、牙刷、牙粉等日用品，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解决了生活必需品匮乏的问题，满足了部队的需要。其他如食用油、酒类、木器铁器等日用品，也都成为边界封锁、经济困难时期的重要物资。

运输业方面，三五九旅集中军用马匹畜力，在运输线上开办了相当规模的骡马队和骡马站，成立了一个运输大队。这三条运输线以延安为中心，纵横整个陕甘宁边区，主要运输货物以盐为主，也运输各地需要的商品，促进流通。

商业方面，从早期开办的“军人合作社”逐渐发展为遍布边区的“大光商店”，其资本为全旅干部战士的两个月津贴，货物则包括土产和自己工厂生产的毛毯、皮鞋、布鞋、牙刷、牙粉、陶器等生活用品<sup>[13]</sup>。

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垦荒，成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虽经多次推行，但大生产运动并未在基层得到重视。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部队战士，都存在“种粮纺线算不上革命工作”的想法，对自给生产任务非常排斥。而三五九旅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给边区各界作出了示范，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群众都利用业余时间，制定生产计划，从事农业生产。从1942年开始，边区各机关、学校达到了大部分自给。据统计，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达到自给经费65.6%，边区直属机关生产达到自给经费51%，边区到1942年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石<sup>[14]</sup>。

1943年9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三五九旅取得的成绩，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sup>[15]</sup>从1942年到1944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政领导先后视察南泥湾，高度赞扬三五九旅是“全党全军的榜样”。从这时起，三五九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最佳典范<sup>[16]</sup>。

## (2) 三五九旅的集体人格塑造

对“南泥湾政策”大张旗鼓的宣传，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军队的现实需要，减轻供给压力；另外一方面，则是寄望于这一典型的出现，能够有效减轻民众对军队供给需索无度的反感，缓和军队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官兵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也是中共中央需要解决的问题。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双拥活动”，内容涵盖军队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劳作、帮助政府工作；民众与政府保证军队给养、优待军属等15个方面。这一活动出台的背景，是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的紧张和双方相互滋长的不满情绪。贺龙后来在一次

关于整军问题的讲话中承认部队存在此类问题：“……对党与政府不尊重，随意破坏政府法令，打骂老百姓及政府人员，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时有发生。”<sup>[17]</sup>

正因为如此，对“南泥湾政策”和三五九旅模范形象的推广，着力塑造的是一支人民军队内部及其与民众之间心连心的集体形象，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对“鱼水深情”的歌颂，以及官兵平等关系等元素的呈现。在这里，笔者将对大生产运动中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南泥湾屯垦记》进行话语分析，考察“又战斗来又生产”的三五九旅是如何被赋予“无限忠诚的人民子弟兵”的政治人格特征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南泥湾的众多文本中选择这一部作品进行话语分析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它的作者何维忠系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所提供的事实和数据相较其他作品更为全面和翔实；第二，这一作品是1957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南泥湾记忆”的早期原型；第三，最重要的是，作品中记录了大量当时如何进行生产运动的细节，便于通过作品进行相关分析。

政治人格特征之一：鱼水情深。

这个典型首先被强调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子弟兵与劳动人民有着“鱼水情深”的深厚情谊。在《南泥湾屯垦记》中，何维忠回忆：

我们不仅经常访问边区劳动英雄，请教他们，有时还把他们请到部队来当教员，开办“临时训练班”。……穿着大棉袄的和披着光面皮坎肩的农民，一个一个站到台上讲课，我们的干部一排一排地坐在下面仔细听课，唯恐遗漏了一个字。我们旅的领导同志，同样地静坐在这里，用含笑的眼睛，紧盯着这几位讲课的老师。后来这个训练班，竟开到山上去了，请他们就地指导我们实习<sup>[18]</sup>。

在这些农民老师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被王震任命为三五九旅“农业生产副官”的劳动英雄朱玉寰：

南泥湾著名劳动英雄朱玉寰，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对驻军非常爱护，常来部队指导生产，和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要求参军，当即得到王震旅长的批准，并委任他为本旅的农业生产副官。记得旅首长还

署名给他一个执照，上面写着：“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七十一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的招待。”朱老汉很热心的执行他的职务，经常为部队看地、撒种子，殷勤指教，看到同志们耕作中有不到的地方，立即就跑来纠正，对部队生产起了很大作用<sup>[19]</sup>。

### 屯垦记也着力描述了部队对农民们的深厚情感：

部队对农民群众也有很大的帮助。如帮助训练民兵，帮助办学校，帮助安置移民和不堪国民党反动派压榨而逃到边区的难民。对于一些特别贫苦的老乡们，还常支援他们粮食，供给他们镢头、种籽，各单位卫生机关，还经常帮助他们看病。此外，每当开荒、播种、春耕、秋收，部队总要抽出大量人力帮助农民突击。王恩茂副政委经常要求全旅人员切实做到拥政爱民，决不损害老百姓一点利益，哪怕是一针一线、一草一木。1942年全旅平均每人帮助群众三个义务劳动日。1943年帮助群众开荒、锄草各两万多工。出工的日子，部队常自带行李粮食，连日住在群众家里。我们帮助的对象一般是烈属、抗属、新移难民和贫民等。

由于部队经常帮助农民群众开荒、上粪、播种、锄草，大大鼓舞了群众生产情绪，都说：“八路军这样热心的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不好好生产，那就太对不起八路军了。”<sup>[20]</sup>

### 在何维忠的笔下，军队与驻地百姓间相互的关系有如一家人：

有的老乡感动地说：“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吃老百姓的，只有你们自给，不吃老百姓的粮食，不要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帮助老百姓生产。八路军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军队。”

陈外欧团长几次帮助驻地附近的李老汉挖猪粪，并亲自送到地里，四周群众都深受感动地说：“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团长还能帮助老百姓送粪。”后来李老汉给团部送了一面红旗，并叫他老伴特地给陈团长作了一双布袜子。

……后来当部队开赴边防前线的时候，百里周围的老百姓便组织起



来替部队锄草，而部队走到哪里，只要情况稍为许可，就帮助当地老百姓锄草。军民之间在生产上的互相帮助，保证了庄稼的丰收<sup>[21]</sup>。

生产运动带来的军民关系的改善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sup>[22]</sup>

政治人格特征之二：官兵平等，上下友爱。

对官兵平等友爱，亲如一家的主题的叙述和歌颂，同样是南泥湾故事中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细读《南泥湾屯垦记》，可以发现，在劳动模范中，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部队各个阶层和群体热情参与劳动的形象，特别强调的是官兵上下“毫无例外、一律参加”，以及民众与重点突出解放过来的新战士对旧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对比——“一辈子也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开荒也是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头一道关。全旅同志，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毫无例外，一律参加。旅、团首长和旅直属各部门负责同志，也都分别和本部门秘书、警卫人员等编成小组……一律以班排为单位进行开荒。

在展现的劳动模范中，主体首先是普通士兵，作为连接军队中高层领导和士兵之间桥梁的、担任最基层干部的班长们也是着力描写的目标，此后，团级干部们也频频作为劳动英雄出现在了生产的行列里。随之出现的是以班为建制的集体英雄，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团部的小组：

七一七团有名的劳动英雄王福寿班，在开荒高潮中，每人每天平均开荒二亩多，而且挖得深，挖得透，真正做到了深耕细作。

七一八团有名的劳动英雄赵占奎，在大竞赛中，挖地成绩达到四亩七分四。他第一个响应上级关于“每人种三十亩地”的号召，领导全班十个人共开荒地三百八十亩，超额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团模范班之一。

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同志在开荒生产中，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亲自带头，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不仅获得了

鼓舞力量，而且常常感到极大的愉快。

他亲自担任团部生产小组长。他的组员有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政委左齐因残废未正式编组）。他们八个人一天挖地十一亩多，每人每天平均挖地一亩三分多，是该团模范小组之一。

在对生产过程的描绘中着重展示了官兵友爱团结的形象，并最终以“刚从伪军解放过来的新战士”“从河南移居到这里来的难民们”的惊讶和赞美来收尾，达到了画龙点睛的目的：

从河南移居到这里来的难民们，看到这种情形都用惊异的口吻说：“八路军的官和兵一样，当团长还参加生产哩！真是一辈子也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这种同志间的友爱甚至扩展到了干部家属与部队的关系中——如笔者前面所转录的，何维忠栩栩如生地记述，干部家属们为战士们洗衣缝补，令“刚从伪军解放过来的新战士”们感到“真是革命的大家庭”。

在回忆录、民歌、秧歌剧、木刻作品等多种多样关于南泥湾故事的叙述中，上述情节都极为类似。通过对“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们自下而上、从个人到集体的集体模范形象的展示，包括《南泥湾屯垦记》在内的诸多南泥湾叙事，均着力于塑造齐心协力、官兵平等的新式军队的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与当时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衣分三色，人分五等”等尖锐言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

早期的延安生活供给制度以平均主义为主旨，除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所照顾外，其他工作人员一视同仁。这种上下平等的做法，吸引了很多有着天下大同理想的革命青年。

随着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稳固，一系列党政干部的制度开始完善，其中也包括待遇问题。从1940年开始，任弼时即着手制定党内干部的待遇等级，按照大、中、小灶来区分干部的伙食待遇。这项制度到1941年11月由任主管的中央办公厅正式确立。

以1942年7月，西北局党委会议确认的该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标准为例，可以看到，三个灶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大灶规定每人每月须吃

8次肉，每次4两，即旧制32两，而中灶肉类标准为每人每天3两，即旧制90两。中灶与大灶的肉类供应标准差别为3倍。在这份讨论中，小灶的伙食标准没有公开，注明“维持现在水平”<sup>[23]</sup>。此外，还有专门供应中央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的特灶，当时极为少见的牛奶，就属特供少数人的物品。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之初，“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一文，质疑干部供给制度中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sup>[24]</sup>。

在当时，王实味的言论代表了党、政、军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因此，将三五九旅的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树立为典型，密切配合整风运动，以批判和回击这种情绪，就成为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段。毛泽东后来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总结说，军队生产自给的一大副产品，就是“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sup>[25]</sup>

人格特征之三：对党无限忠诚和服从。

在所有关于三五九旅的叙述中，它始终被展现为一支对党无限忠诚和服从的军队。

三五九旅本来并不承担生产任务，但在毛泽东、朱德提出大生产的号召之后，旅长王震积极响应了前往南泥湾的要求，并在全旅指战员誓师大会上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中央的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前期因认识不统一而陷于停滞的“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在《南泥湾屯垦记》对三五九旅领导层如何说服基层官兵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家对“生产自给”的认识明确后，情绪高昂，纷纷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表示坚决用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为保卫边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多做贡献。

组织上调他到骡马站工作时，他丝毫没有考虑什么个人地位或是什么个人发展前途，他所追求的是党的事业的发展。到这里以后，为了营业中便于接近群众，他把自己以往暴躁的性情很快地就克服了。他领导四、五个人，把马房打扫得清洁整齐，把马槽洗刷得干干净净；草铡得短，筛得净；料煮得软硬适宜。黄昏时客人来到了，他便领大家为客人卸驮子。他的老婆在他的模范行动启发下，对这工作也很积极。……为此，旅直党代表大会奖她为女劳动英雄。

对于诸如“当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种地的”之类的想法，《南泥湾屯垦记》里提及，贺龙、王震等领导按照党中央的思想路线，在部队多次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个别刚从敌伪军投诚和解放过来的战士，甚至对“生产自给”有抵触情绪，背后说怪话：“从来还没见过当兵的自己吃自己的哩！”“既然当兵也要生产，还不如回家生产。”等等。

对于这些思想，我们通过各级党代表、军人代表大会以及各级生产动员会议都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王震旅长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几乎每次也都要批判这种思想，他常向大家说：“这种劳动，不仅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支援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早日胜利。虽很艰苦，但却很光荣。”

贺龙司令员一次来绥德巡视工作时，也亲自给我们作了指示，他说：“劳动是工农大众的固有品质，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生产不仅可以改善军民关系，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战，生产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从实际中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最后他强调指出：“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轻视。”

这种忠诚，在文中引用的当时歌谣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敌人胆敢来侵犯，坚决把它消灭光。  
同志们呀，我们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锄头底下刷拉拉的响，锄头变成革命的枪。  
风又调雨又顺苗长得高，咱们的边区吃不了。  
穿的哪暖来吃的又饱，谢谢共产党领导得好。  
我络纱你织布，全心全意为抗战。  
工友们呀！同心同德同劳动，为国为厂多流汗，  
紧跟领袖毛主席，争取模范多光荣<sup>[26]</sup>。

对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党而言，军队和干部的忠诚和服从是至关重要的品质。由于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垦荒，不仅使边区政府减轻了供养这近一万作战人员的压力，还大大推动了其他部门进行大生产运动。正因为如此，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对三五九旅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sup>[27]</sup>

人格特征之四：朝气蓬勃、充满革命乐观情绪。

通过对部队前期开垦时的艰苦条件的描写，以及后期南泥湾如何从烂泥洼改变为肥沃农田、繁荣市镇的叙述，展现了共产党军队善于克服困难，励精图治的社会改造能力。

无论你走到哪一架山，你都可以听到劳动的歌声和镢土声交响成一片。“你一镢头啊，我一镢啊，比比谁的力气壮！你一镢啊，我一镢啊，开荒好比上战场”的歌声此起彼伏响遍了整个山谷。

在金盆湾，我们开辟了一座新的集镇。……这是一座富有革命作风的新集镇，街道宽敞、平坦、清洁，两旁店铺都是新的粉白墙、新的木门、新的蓝底白字的招牌，有的屋内还摆着新油的玻璃柜台，再加上红色的门联和丰富多彩的标语，图画，就更显出一片新的气象。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新内容的门联，如饭馆的门联：“高朋满府畅谈生产事，美酒好菜全凭劳动来。”客栈门联：“今夜住店好好喂牲口，明早赶路快快去驮盐。”铁匠铺门联：“造刀加强杀敌武器，打锄充实生产

工具。”合作社门联：“大众投资金建立合作社，集体出主意发展新财源。”纺织厂门联：“筹备军需纾国难，振兴实业济时艰。”等等。到处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的气息！

一到晚饭后，大家就都三三两两地汇集到这里来，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有的唱歌，有的拉胡琴，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打球，有的敲锣打鼓，还有各种剧团（歌舞团、京戏团、评剧团等）都在积极地排演节目，准备参加晚会。这里到处洋溢着活泼愉快的空气，你在任何一个战士的脸上，也决找不到一点疲劳和怠意<sup>[28]</sup>。

通过对生产、练武、学文化的各种活动的描写，通过对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党军关系方方面面的刻画，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对党无限忠诚的、官兵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军队形象，在《南泥湾屯垦记》里跃然而出。

### （3）生产与战斗，不朽的神话

在当时，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垦荒，虽然是因应时势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但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成为陷于停滞状态的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执政思路下，它也充分展示了一支军队所应该表现的忠诚，但更为重要的是，它集体协作的军事化生产模式，给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以巨大启发和充分自信，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改造农民”的毛泽东<sup>[29]</sup>，在十余年后将这一经验首先用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动，掀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试图以全面集体化、军事化的方式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将五亿分散的个体小农改造为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现代农民<sup>[30]</sup>。如果说毛泽东在几乎同一时期发起的整风运动，是一次规训边区干部的精神和心灵，使其服从自己建立的权威的行动，那么，大生产运动则赋予了这心灵的规训一个外在而有效的组织形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中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sup>[31]</sup>

另外，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史料所显示的，1942年底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高级干部例行会议，就经济形势而言，它承担着发动以高级干部为首的干部阶层进行生产的任务；就意识形态而言，它更承担着干部整风的重大任务，有着其重大的、特殊的政治目的。在这次高干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曾经特别发表讲演，痛斥“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虽然不算是路线问题，但已经是原则问题了。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在论述毛泽东这两次讲演的目的时，认为其真实所指，是批判“对党不能有无上忠诚，在思想上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倾向<sup>[32]</sup>。他更进一步指出，康生主导下的整风、审干与肃奸密不可分，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整风与生产，可能成为互不相交融的两个层面上的工作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统一思想，确保党员干部并督促普通群众形成对党的无限忠诚，正在南泥湾从事农业屯垦和工商业生产的三五九旅为这一政治任务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当前典型；而对三五九旅的典型推广，则又反过来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压力，促使边区的干部和从四方汇集到延安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在整风、抢救运动中，铸造“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无限忠诚态度。

由此可见，“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正是毛泽东的社会改造和控制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作为它的体现，“南泥湾政策”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依靠高度的政治动员来发动生产运动的议题，实现成员对目标的认同。

三五九旅回到延安时并非是为生产而来，但当朱德和毛泽东要求他们在担负边区保卫任务的同时还要实现生产自给时，旅指挥员王震“坚决地”接受了任务。何维忠回忆说：“王震旅长立刻表示态度说：‘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不影响战斗、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给。’”<sup>[33]</sup>

作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军队之一，三五九旅迅速地将生产任务与抗战的神圣性相结合，层层下达到最底层。这显示出，在群体内的每一层级，权力的拥有者都首先依靠政治动员来促使群体中的成员接受任务，为了高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将这一任务与抗战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生产目标与政治目标的高度结合，是运动式生产建设模式的根本

特征，对后来新中国“抓革命，促生产”的生产建设和社会治理模式影响深远。

其次，在生产中强调集体行动，通过大规模协作，达到预定的生产目标。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小农经济，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副业、家庭畜禽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所谓“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sup>[34]</sup>。而在三五九旅的垦荒运动中，这种生产方式被彻底改变。部队以现有的战斗建制班、排、连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建设。参加者严格按照事先预定的生产计划（至于这生产计划是否合理，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进行集体化的烧荒、挖地、播种直至收获的工作。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团、旅，都必须完成事先规定的生产定额，此外，有人负责烧饭、送水的工作，还有人专门负责宣传鼓劲的任务，并将所取得的成绩层层向上汇报。

对比其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五九旅集体生产建设模式，即“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影响。

第三，通过宣传树立“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高度自信。

南泥湾传奇中，充满了种种革命乐观主义的叙事：

当时，大部分部队都住在临时用树枝搭起的草棚里，有的甚至露骨在野地上。避雨是茂密的树叶，遮风是齐眉的野草。挖地归来，同志们就躺在这个深草丛林中的窝铺里，做着香甜的梦。

粮食、油盐都要组织人力到一百里甚至百里以外去背。有时每人还要背上柴禾去卖。背粮时布口袋不够用，战士就将自己裤子的两条裤脚扎起来当口袋用。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四更天的光景，大家就摸着黑穿好衣服，带上工具，悄悄地爬上寒风刺骨的山坡开起荒来。黎明前本来是要有一阵黑暗的，碰巧这天天空又飘着雪花，因而就更显得阴暗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可是同志们仍然坚持着干，谁也没有提出个‘回’字。实在看不见，大家就分头捡些枯枝、落叶架起火，借着火花，又继续干。

纸是文化用品，需要量很大。我们部队办公，一天没有纸也不行。



但是部队没钱买，有时有钱也买不到。我们能不能自己动手造纸呢？是的，造纸是需要技术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不管条件怎样简陋，我们的造纸厂终于在这里诞生了<sup>[35]</sup>。

朱毛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直以重视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政治宣传著称。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批评军队的部分领导人单纯重视枪杆子的力量，而“不知道红军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并于1928年11月出台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正式建立宣传兵制度，规定“连上需组织三人以上宣传队”，宣传队的标语口号需由军委规定发出，以求统一，免致混乱。此外，宣传队还制定了极为细致的规则，如口号的内容、位置、识别标记、工作程序等。这一系列细则明确无误地显示，毛泽东把宣传视为与军事实力同样重要的、党夺取政权和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sup>[36]</sup>。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垦荒中展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自然地被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应对时局困难的一个重要宣传手段。

对长期处于艰难时世的中国人，这些对“苦难中欢乐”的传奇叙事，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困难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后来修建红旗渠、建设大寨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中，起到了强大的感染作用。

勒庞曾经断言，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其真正的基础不是某个制度或某个政府，而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sup>[37]</sup>。此说可能失之片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延安无所不在的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其存在基础正是这些充满神奇魅力的故事。南泥湾的传奇故事赋予了中共中央及其军队以强烈的神话色彩，而这种神话色彩，则给民众以丰富想象的空间，使他们在后来新中国的大饥荒以及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的年代里，从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的评价中<sup>[38]</sup>，获得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巨大道德能量。

南泥湾屯垦取得的成功，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尤其是边区军队渡过了难关，更使得中共中央意识到此种生产模式中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尝试将其运用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

但它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据周晓虹研究，新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以土改结束后办起的互助组始，历经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以1958年底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终，前后历时仅仅8年，中国农村就完成了跃进式的集体化改造运动<sup>[39]</sup>。这种“快马加鞭地跑向‘共产主义’”的改造，其心理动因并不来自农民的自觉行动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来自毛泽东在建国后自上而下对农民施加的强大政治压力<sup>[40]</sup>。但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信，以及对农民个体全方位掌控模式的迷恋，其缘起正是来自“又战斗来又生产”的三五九旅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起于战争时期的特殊军事化、政治化的屯垦生产方式，在推而广之之后，将经济制度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经过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建设改造走向极致，把中国数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全盘改变为集体经济模式，这也深刻地改变了新中国的农村社会形态。

## 2 吴满有方向：首个“典型人物”的诞生与遗忘

一个逃荒而来的农民，在延安落地生根，因为配合党的政策积极交纳公粮，在因经济危机而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中被树立为特等“劳动英雄”。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塑造的第一个典型人物，他的故事被刊入报纸，被写入文件，被拍成电影、刻为版画、写成长诗，传唱于歌谣戏剧，一个政治运动的方向被冠以“吴满有方向”之名，成为“大生产运动”中鼓励农民致富的代名词，最终，这个名字还被载入《毛选》，成为证明边区改革卓有成效的标志之一。

这个农民明星就是吴满有。吴满有生命中的这前半段辉煌，因为与大生产运动紧密相连而被修入中共正史，被深深地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记忆里。但他后来的人生故事，则因为其投敌叛党的“污点”而被这记忆无情地删除。

1948年，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时任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的党员吴满有积极报名，和儿子一起参加了解放军，表示要痛击“胡儿子”<sup>[41]</sup>。激动的王震当场接受了这个要求，54岁的吴满有随即被

破格任命为他属下的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陇东战事中，吴满有不幸被俘并随后被押送南京。在公开发表了“痛改前非”的投诚宣言之后，吴被视为“叛徒”，他的后半段人生从此被正史彻底抹去<sup>[42]</sup>。50年代末，吴满有在延安郁郁而终<sup>[43]</sup>。在今天的延安，政府批准认定的“红色遗址”随处可见，但吴满有的“吴家枣园”，作为大生产运动中“吴满有运动”和“吴满有方向”的地标，作为毛岸英应父亲毛泽东之命专门前往学习劳动技能的“劳动大学”，却蹊跷地被延安无所不在的红色记忆所冷落。

一个普通的农民是怎样因强大的权力意志的需要，一跃而成全边区的劳动模范和运动方向的象征，乃至成为领袖之子的劳动教师，往来于庙堂之上？又是怎样因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在记忆的重构过程中悄然湮没的？作为党报新闻史上首个被大书特书的典型人物，“新富农”代表吴满有从崛起到红极一时，再到遽然衰落，直至其相关记忆被国家意志系统性剥夺的经历，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个案。

### （1）谁能成为“吴满有”

吴满有，陕西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阳台儿人。1928年，34岁的吴满有拖家带口逃荒来到延安，在当地的枣园租了一亩地，收成很差，连地主的租子都还不上。为此，地主把吴满有送进了监牢。吴满有的妻子病死后，因极度穷困，两个女儿先后被他卖掉，大的11岁，卖了24元钱，小的三岁，只换回三升粮食。1934年土地改革后，吴满有分到了一架60多垧的荒山，政府补助了农具、口粮和种子。他积极投入开荒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开荒种粮，还饲养牲畜，日子渐渐过得红火起来。

1941年秋，吴家收获粮食34石，在当地算得上首富了。这个淳朴的农民联想到以前卖女活命的惨状，真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1941年，吴满有上缴公粮14石3斗（合1400余斤），此外还上缴甘草1000斤，购买了公债与盐代金815元。从1941年到1944年，吴满有累积交纳公粮近100石。

在艰困的时局中，吴满有的行动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榜样。随之，吴满有受到了政府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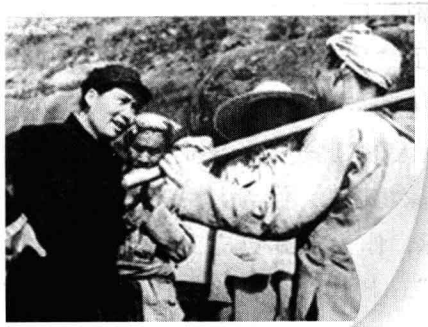


图 5-1 扛着农具的吴满有（右一）  
和毛泽东<sup>[44]</sup>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发表了报道吴满有事迹的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充分地塑造了吴勤劳致富、不忘恩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交公粮的形象,也充分表述了贫苦大众在土地改革后对共产党政府的拥戴之情<sup>[45]</sup>。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对这个典型的出现

迅速作出了反应。次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号召整个解放区向吴满有学习:

今天边区所有的人民,不论哪一个阶级都同样享受着充分的民主权利,都一致为抗战而努力,都一样的受着政府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之培育和扶植而得以自由的发展,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学习吴满有,我们希望千千万万个劳动英雄模范出现在我们的面前<sup>[46]</sup>!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刊发《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把吴满有的个人事迹升华到代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吴满有方向”的高度,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sup>[47]</sup>。据这篇社论的作者李锐回忆,朱德赞扬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20万石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由此可见朱德对该报道的重视程度<sup>[48]</sup>。此后,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翻阅这个阶段的《解放日报》,可以看到,有关吴满有和“吴满有方向”的报道,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

吴满有的行动影响之广,甚至使他的盛名扩展到陕甘宁边区之外。在1944年11月20日太行区政府召开的“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战绩展览、生产展览联合大会”(史称“南委泉群英会”)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倡导“吴满有方向”,让贫的变富,富的更富。

吴满有是党报新闻史上塑造的第一个“典型人物”,而吴满有的报

道，则成为党报新闻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报道”。纵观对于吴满有的宣传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吴满有方向”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政策代表，其原型人物本身的发掘是政治权力操控的结果，而目的则是证明边区经济政策的必要与合理，以及它在边区民众中所得到的广泛认同。

吴满有发家不忘本，通过多交公粮、多买公债来报效边区党和政府的动人故事，绝非记者偶然得之，而是宣传机构刻意寻找的结果。记者莫艾后来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透露：

找一个模范的、而且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sup>[49]</sup>。

为什么找一个模范劳动英雄“很不是易事”？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如前所述，由于公粮负担的不断上升和物价飞涨，边区民众对渐趋严苛的经济政策颇多抱怨，甚至发出了“打雷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质问之声。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sup>[50]</sup>在民怨四起的状况下，要证明边区能够最终为民众带来幸福和富裕，要证明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经济政策从宽到紧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就必须寻找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这些行动获得了边区民众高度和广泛的认同，以证明其政策的合法性。吴满有的出现，为边区红色政权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完美证据。

出身赤贫、流浪延安，土改后分到了田地，逐渐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致富之后不忘恩人，通过多交公粮反哺党的军队……这一故事无疑是当时政策宣传的绝好样本。可见，吴满有这一大生产运动先进典型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权力阶层因应自身宣传需要而刻意挖掘的结果。

赵超构在当时的采访中就注意到了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塑造过程中明显的政党操纵色彩：

为着“农业第一”，规定着重选举劳动生产上的英雄，为着鼓励私人生产，规定人民中的英雄应占半数，为着鼓励军队生产，又规定部队

英雄应占四分之一。而尤其可代表共产党的色彩者，是在阶级的成分上，规定要选举贫农和中农，至于富农，原则上是没有被选资格的，但也有例外，便是在“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富农”，也应该有几位，为的是告诉老百姓，这些英雄都是受过共产党的恩惠而发财的<sup>[51]</sup>。

对吴满有事迹的报道不仅使他的行动广为人知，还有效地证明党的政策受到了边区民众的广泛拥护。在此基础上，执政党为广泛发动民众效仿吴的事迹多交公粮、多借军粮、多买公债以及乐于承担其他经济负担而采取的措施<sup>[52]</sup>，就具备了行动上的道德合法性。

## (2) 翻身、感恩与革命

从1942年到1948年，边区通讯社、报刊和后来的解放区报刊大量刊载了关于吴满有运动的报道及评论，直到他1948年5月陇东战事遭国民党俘虏投降时戛然而止。这些报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莫艾的第一篇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还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这篇社论把吴满有定性为在经济上“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文章指出：

吴满有的榜样，证明不仅已有生产基础的农民，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实现繁荣的生活，而且今天还比较贫苦的农民和移民难民，在政府帮助之下，经过自己的积极劳动，也可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不仅改善农民自己的生活，而且对于边区经济，对于抗战，都有很大的贡献<sup>[53]</sup>。

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吴满有方向”和“吴满有运动”两个名词：

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

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sup>[54]</sup>。

通过媒体发起运动，树立榜样，政府有效地把一个农民自发的行动

转化为群众动员的被效仿对象，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在当时，发动“吴满有运动”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向吴满有学习，究竟是学习他努力劳动，还是学习他成为富农，提倡富农方向？从“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鼓励致富，是进步还是倒退？由此，吴满有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解放日报》特意就读者的质疑进行了详细解答：

吴满有式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正是边区革命后必然的产物……这种富农经济虽然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但比之未经土地分配区域的地主经济，却是进了一步，比起未经过减租减息区域的地主经济，更是一个进步。……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sup>[55]</sup>。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这个结论确认了吴满有在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吴满有也就因此确立了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地位。

通过新闻报道、大会奖励、文艺宣传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成功地将同时具有农业天赋和政治敏感的老农吴满有塑造为他们极力提倡的“新富农”阶层的代表，与被宣传为剥削穷苦贫雇农，奸猾贪婪的旧富农相比，作为“新富农”政治符号的吴满有形象具有如下三个典型政治人格特征。

#### ①出身贫苦，革命翻身，劳动致富。

吴满有最初来到延安时是个雇农，地无一垄，田无一分，完全依靠给当地的地主打工维生。但他在1935年土改后分到了少量土地，并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农业积累。因为他的富有，他所在的村子甚至以他的姓命名为“吴家枣园”。

作为边区土改后的第一代“新富农”，吴满有这样总结自己发家致富的经验：“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他是全村最早起床劳动的，天还没亮就上了山，喂牛、垦荒，一刻也不闲下来；别人给地除一次草，他要除两三次；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回家。家门口还开了一小块地种辣椒，夜里从山上垦荒回来以后，他还摸黑去给辣椒浇水。冬天是农民最闲暇的日子，但吴满有却利用这段时间到处拾粪积肥，为来年的

春耕作准备。这些措施，使他的土地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农民，据说，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1/6。

通过垦荒，吴满有在1942年把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6亩，1943年更是增加了96亩，增收粮食40石。边区人少地多，通过垦荒增加土地和粮食产量，正符合边区政府的政策需要。因此，吴满有的发家致富成为当地大力宣传的典型。

像吴满有一样，大部分延属新区的“新富农”原来的成分多为贫雇农或中农，多为无法生存而逃荒来到延安的难民。由于精通耕作技术，吴满有在边区制定的垦荒政策下逐渐走向了富裕，这符合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提倡和扶持广大农民生产劳动致富以改善劳苦民众生活的宣传方向，同时，还符合当时边区政府大力吸收山西、河南等地流民，通过吸纳劳动力来扩展边区人口实力的政策。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对吴满有前半生的苦难生活与边区土改后的幸福富裕进行了鲜明的对比。首先，报道叙述了吴满有在“民国十七年的秋天”流浪到延安之后的惨状，以及不得不卖掉女儿的悲惨故事：

当时延安虽然是一个大城市，但朱门酒肉臭的豪绅，并没因吴满有没饭吃，布施一粒小米；也没有因为吴满有需要种地，而拨给他一小块的荒地；茫茫人世，诉苦是没有地方的，做工吧，总要一点生产工具，但这也是毫无办法可想的。于是就把十一岁的女儿，换得了二十四元的代价……

此后，报道对吴土改前和土改后的生活进行了对比，通过“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吴满有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吴满有是模范公民”三部分事迹的讲述，表现了这个淳朴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sup>[56]</sup>。

## ②爱党拥军，积极响应党的政策。

与边区政府着力批判的“小农习气”有所不同，吴满有在发家致富之后对党和边区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在上交的公粮定额年年上涨的情况下，他不仅不像其他农民那样充满怨气，还踊跃上交定额外的粮食。在公粮上交政策在民间遭受普遍抵制的敏感时期，吴满有的举动对政府



证明政策合理性和受到民众拥护的合法性无疑是极为有力的支持。对政府而言，着力塑造的“新富农”的典型特征，是能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缴公粮、购买公债，承担政府分配的各种经济负担。

1944年春节期间，吴满有给毛主席写信要替他代耕两石公粮：“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并非通过行政渠道层层转呈，而是直接发表于《解放日报》，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将声音更直接地传递到各级权力机构并且传达至各地区的基层。

毛泽东接受了吴的请求。自此，吴满有每年都精选出收成中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sup>[57]</sup>。

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给中央办公厅，而自己全家则在大年初一啃着糠窝窝头。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很快也通过《解放日报》推广到全边区，充分地显示了一个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响应国家的号召并付诸行动。

同样地，毛泽东也乐于通过与吴满有的交谈来展示党的高层领导关怀民生的形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犏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sup>[58]</sup>。

### ③高度敏感，热心政治。

“新富农”对党的政策极为敏感，能够积极配合政府进行组织动员，帮助发动民众进行大生产运动。

1943年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随即通过2月24日的《解放日报》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在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sup>[59]</sup>。

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吴满有所提出的以集体为单位的、“劳动英雄庄”之间的竞赛，对农民的传统生产模式不啻是一种调整和变革，也恰恰应和了毛泽东关于组织变工、扎工，将一家一户的零散生产组织为集体化生产的经济思路。吴满有将自身发家致富的行为因应政策所大力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政治敏感，使其一举一动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赞扬。报道刊登后，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也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使得组织化农业生产成为一时风尚。“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sup>[60]</sup>

吴满有的政治敏感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上，也广泛地体现在他的各种政治发言中。1944年2月29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吴满有的发言：

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

在这次会议中，吴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建议：

请他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sup>[61]</sup>。

这段贬蒋扬毛的精彩发言引起了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注意，他把它记录进了自己1944年2月29日的日记里：“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据考证，吴满有是第一个提出“人民政府”一词的人<sup>[62]</sup>。

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将旧富农和新富农按照是否“带着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sup>[63]</sup>，明确地加以区隔，是当时政治宣传之所必需。如不进行这种区分，则无法反映出旧富农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及普通农民在党的革命政策下生活大有改善的“翻身”。而将新富农的标准之一设定为在政治上的高度积极，也即王若飞所谓“革命的富农”<sup>[64]</sup>，则是因应政府需要依靠高度的社会动员来获取战争所需资源，维持统治的需求。

正因如此，吴满有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吴得到了空前的政治礼遇。在吴满有过生日时，包括林伯渠、高岗、汪东兴等人在内的中央办公厅、西北局、边区政府干部一行十多人前往祝贺，并带来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天下有名”的奖状。

1946年，毛泽东把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吴家枣园学习劳动，并将吴家称为“劳动大学”。

为了回应这种特殊的礼遇，1946年秋天，吴家交纳公粮更为积极：生产粮食60多石，却交纳了50石，此外还交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

纵观所有这些报道，都遵循着“受到压迫—苦难、落后—革命、斗争—翻身、致富”的叙事模式<sup>[65]</sup>。通过媒介神话的制造，吴满有及他所代表的“吴满有方向”就被塑造出翻身之后的无限感恩，对党的政策高度服从与积极效忠等人格特征，为“吴满有”成为一个政治符号奠定了基础。

### （3）被符号化的吴满有

通过大会、文艺作品和表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将吴满有拥护边

区经济政策，与政府共渡时艰的劳模形象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将其塑造为形象生动的红色政治符号。

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请上主席台，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称号，与主席握手、戴大红花、坐上汽车接受人们的欢呼，号召所有人向他们学习——这些，的确是淳朴的陕北农民从未得到过的礼遇。

身穿自制土布衣裳、头缠白羊肚手巾的农民英雄，第一次置身于边区政府的巍巍庙堂之上。看上去，吴满有和在台下的群众形象别无二致。但是，感人的事迹、精彩的发言、领导们对他们的高度赞美，会场上一阵阵的欢呼鼓掌声，与这些半人高的图片、满布会场的标语组合在一起，又具有神奇的动人力量：

毛主席的“抓握”，朱总司令的看酒，不是没有代价的。“抓握”过了的劳动英雄，他们回到他那山坳里去，说共产党，说毛主席，说延安，说组织起来……开民众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变工、纳粮、办合作社、办小学，他总是头一个出来说话；村里有“二流子”，外面来了一个难民，他得帮忙安插，总一句话，他现在是出人头地了……觉得“毛主席”是他一辈子的知己，粉身碎骨也要对得起“毛主席”才好。

他们并成了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得边区民众在共产党执政下而仍能发生平等的感觉。不问这种平等是真是假，它的确已相当地提高了农工的自尊心，而使他们乐于追随共产党的政策<sup>[66]</sup>。

在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到，“劳动英雄”们的形象化身为红色符号，其一举一动都争相被民众学习和模仿；同时，这些模范们朴素的形象则使观众们感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只要向他们学习，就能够同样得到这份光荣。如同哈罗德·D. 拉斯韦尔所言：“政治运动首先给群众带来的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但即使在一个不能稳定运行的政治制度下，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还是会把他们的一些爱和希望投向某种共同的象征：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名称。”<sup>[67]</sup>

塑造一个“吴满有”，以及一大批从普通民众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符号，极为有效地利用了这种对“共同象征”的情感需求，并

在普通民众中制造了“与有荣焉”的感受，让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得以彰显，政治行动得以贯彻。但是，其实质则如赵超构所直言不讳的：“有了劳动英雄的鼓励，才能给群众以刺激，将群众的最后一滴汗血都吸收到生产运动上去，有了劳动英雄，延安产生了在工头的皮鞭下都不能产生的奇迹。”<sup>[68]</sup>

另一个有效的手段是文艺创作与表演。

让艺术作品成为“匕首与投枪”，让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宣传鼓动的武器，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个大趋势。诗人艾青在延安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展街头诗运动》中曾经阐述说：“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所以要把政治和诗密切地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团结抗战建国、保卫边区、军民合作、缴公粮、选举、救济灾民等，使人们在诗里能清楚地感到当时大众生活的脉搏”<sup>[69]</sup>。

吴满有的事迹见诸报端之后，众多文艺工作者或奉命或自发，满怀热情地创作关于他的各种类型的作品。

1943年，艾青为吴满有创作的长诗《吴满有》，以整版篇幅发表于3月9日的《解放日报》。在写作这首长诗的过程中，艾青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来到吴家枣园，在吴满有家里住了半个月左右，和吴满有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与他谈心，和吴家一家人交上了朋友。此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这首长诗。这首720行的长诗分为“写你在文化界的欢迎会上”、“写你受苦的日子”、“写你翻身”、“写你勤耕种”、“写你发起来了”、“写你爱边区”、“写你当了劳动英雄”、“写你叫大家多生产”、“写你的欢喜”九个部分，歌颂大生产运动给吴满有家带来的变化。长诗的9个段落，贯穿了“受苦”、“翻身”、“发”、“爱边区”、“劳动英雄”、“多生产”、“欢喜”等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语汇，行文中也活灵活现地突出展现了这些符合政治需求的细节：

### 吴满有

你是一个新农民  
你过的是好光景  
身体结实健康

腰上束着腰带

脸上闪着红光

你说 我是革命的人

我忘不了革命

我真心爱边区

……<sup>[70]</sup>

把政治和诗紧密结合，正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体现。这种服务性在当时的文艺运动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新华书店在1943年为艾青出版了单独刊行的诗集《吴满有》，其中，在长诗之前的第一部分，是新华书店丛书编辑部“编者的话”，这篇题名为《关于文艺的新方向》的序言通篇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肯定艾青的《吴满有》在“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三大问题上，是朝着文艺“新方向”发展的好作品。而在诗后，则收录了艾青于1943年2月17日写的一篇附记。这个附记描写了1943年春节之后，艾青向吴满有当面征求意见的情况：“不一会，同庄子的人都来了，他的窑洞里人站得满满的。我把《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艾青的这篇附记，可以说是文艺工作者对“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这三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此外，《吴满有》诗集最后还附有柯蓝所著的《吴满有的故事——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分“吴满有种庄稼”、“吴满有和他的长工”、“吴满有上市场”三部分，同样也着力于赞颂吴满有勤劳致富和拥护边区政策的劳动态度与政治积极性。

作为党报新闻史中出现的首个典型人物，强调政治人格的特点在吴满有的塑造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也为后来塑造典型人物、塑造与典型人物相关的政治记忆提供了一个被认可和沿用的模式。

另一个今天可以看到的塑造吴满有的艺术作品是石鲁创作的版画《群英会》，这幅版画中没有明确点出吴满有的名字，因此后来得以逃脱被禁的命运。在这幅版画上，毛泽东和吴位于画面的中心——一张长条桌前，毛泽东正面面向观众，而坐在长条桌顶端的吴满有则背向观众

侧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正与毛热烈地交谈。

在这幅版画中，毛泽东与其他人的位置处理是饶具意味的：毛与吴位于画面的中心，但形体大小与其他人物完全一致，描绘角度也没有采用后来在关于毛泽东的绘画作品中常见的仰视视角，而是与其他人物基本平齐——这和后来同样以“群英会”为题材的一幅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类似的题材中，采用了仰视角度，将毛的形象高大化和神圣化。这种对领袖形象的创作手法受到了高度评价，在当时就被称为是“延安时代以来的新年画的进一步发展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sup>[71]</sup>。相比之下，石鲁的《群英会》则将毛置于人群之中，甚至还略次于吴满有的位置，突出表现了“吴满有方向”在农民群体中所产生的影响。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方向下，吴满有的故事成为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曲艺工作者为吴满有专门创作了《吴满有鼓词》，传唱边区<sup>[72]</sup>。红色民歌《移民歌》中，也提到了这位劳动英雄：“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作为参议员，吴满有的木刻肖像被挂在边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和毛泽东的照片并列；他的名字还被制成一种产品的商标——“吴满有”牌香烟。

吴满有的名字甚至被记录进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就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十二月会议决议中，在论述对农民和农村的政策时，特别提到了吴满有：“在减租减息后提出吴满有方向，对于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sup>[73]</sup>

在党内部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吴满有也成为屡屡被提及的对象。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从吴满有谈到了边区生产增长的具体细节。毛泽东说：“好像从前提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sup>[74]</sup>

作为“新富农”的代表，吴满有的名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被载

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史，是因为他的事迹不仅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策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欢迎，而且“对于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这个卓有成效的成就证明了“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sup>[75]</sup>

“吴满有”这个普通农民的名字，由此成为当时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政治符号之一。

#### (4) 记忆的系统性剥夺及其民间抗争

直到1948年向国民党政府投诚之前，吴满有这一被媒介秉承权力之意而塑造的神话人物，都是大生产运动中充满光辉的红色记忆的一部分。但他后来的人生故事，则因为其投敌叛党的“污点”而被官修党史无情地删除。

1948年，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时任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的中共党员吴满有积极报名，和儿子一起参加了解放军。54岁的吴满有随即被破格任命为王震属下的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同年5月陇东战事中，因为监运着部队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行动迟缓的二纵民运部被俘数百人，其中就有吴满有，他也是这次战役中被俘的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在证实了吴的身份后，这位名人被押送南京。四个月后，吴满有在南京国防部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痛改前非”，自己将追随“蒋总统”，支持南京政府<sup>[76]</sup>。这些讲话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后，吴被视为中共“叛徒”，他的后半段人生从此被正史彻底抹去。解放军解放重庆时，从南京转押至这里的吴满有被辗转送回延安。1959年6月，吴满有在延安郁郁而终。

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吴满有后来没有被捕，没有发表向南京政府投诚的讲话，他会成为中共党史中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但随着吴的被捕，这些荣耀都烟消云散。

作为大生产运动中无法回避的人物，关于吴满有的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sup>[77]</sup> 期间的变化，清晰地显示出权力对社会记忆进行严密控制和严格改写的过程。

吴被视为投敌后，大批有关吴满有的文艺作品遭到清查。艾青的代表性长诗《吴满有》及其单行本都被彻底封杀，吴满有的众多木刻画像作品被一一剔除出后来的延安时期木刻选集。在文学界，丁玲等人一



些少量内容涉及到吴满有的文艺作品也被要求删改。

龚明德在《改“吴满有”为“刘玉厚”》中考证说，1948年八月东北“光华书店”出版的第一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十五章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另外一次，他在一个县委家里吃饭，想找几句话同主人谈谈，他便说：“你的胖胖的脸很像你父亲。”那个主人很奇怪，问：“你见过他老人家么？”他指着墙头挂的一张木刻像说：“这不是你父亲么？你看你的两个眼睛多像他。”不防备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对面的人，忍不住把满嘴的饭菜喷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吴满有嘛，你还不认识，同志，亏你还在延安住过。”“吴满有的像我看得多了，这个不是，这真不是你父亲么？”

这位学者指出，在1950年后印行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各种版本中，两处“吴满有”都一律被改为绥德分区的另一位劳动英雄“刘玉厚”<sup>[78]</sup>。

比起丁玲这部小说中涉及吴满有处均改头换面的遭遇，红色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则在吴被捕后被指令彻底停拍。

这部红色中国的首部故事电影至今未见天日，但据当事人回忆，剧本串联起了1935年陕北的土地革命、红军改编、抗日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保卫边区等重大历史事件，试图通过吴满有从流民到劳模、参议员的故事来反映劳动人民为国效力、翻身做主的动人事迹。

《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是在1946年开拍的，在此之前，反映三五九旅事迹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戏剧电影家陈波儿开始酝酿以吴满有的事迹为蓝本写一个电影剧本。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1946年8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了，这个专门为拍摄吴满有的故事而成立的制片厂直属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延安电影制片厂董事会成员有习仲勋、陈伯达、安子文、李伯钊、江青、鲁直等，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这部电影的重视。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为《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下拨了1万万元边币的拍摄经费开拍此片，还专门

从外地调来了凌子风扮演吴满有。

凌子风回忆说，为了演好这个陕北的农民明星，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就到他家住，和他一起生活。两个人睡在一个炕上，一块儿聊天，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割荞麦。”<sup>[79]</sup>为获得好的摄影效果，有关人员甚至还在延安南门外的铺山沟里建造了一个“拍摄基地”，利用山村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貌，搭建剧本需要的场景。这在物质匮乏的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可见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遗憾的是，战争爆发使得只拍摄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电影的拍摄被迫中止，此后，随着吴满有被俘，中宣部指示：“吴满有已被俘，表现无气节，关于他的电影不再摄制。”<sup>[80]</sup>

很显然，这部故事片承载的绝不只是一个人物故事，而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来塑造红色中国的国家历史与记忆。但随着故事主角不再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更多作为宣传品而非艺术品出现的这部电影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现在的红色中国电影史中，均以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摄制完成的《桥》为首部故事片，对拍摄吴满有的这部人物故事长片则讳而不提。

执政党所拥有的话语霸权，使其能够轻易地实现福柯所言的“政治遗忘”<sup>[81]</sup>。1948年之后，吴满有个人的照片从中共党史中消失，而他与党的领袖的合影，因为前者地位而具有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史料的编撰者于是在图片说明中将吴满有的名字彻底隐去。艾青在回忆延安时期的“新诗歌运动”时曾经提及“我写了一些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受到了表扬。”但是，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非常谨慎地回避了吴满有的名字<sup>[82]</sup>。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党史中仍然需要保留毛泽东关心农业生产、虚心求教于陕北农民的叙事，因此，今天还是可以看到少量经过精心选择和改写的相关叙述。例如，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曾经被视为这一运动中代表农业生产方向的吴满有，虽已不见其名，但他与毛泽东、朱德的合影，仍然作为展示领袖光辉形象的重要历史文献而出现在纪念馆的展览图片及相关的出版物上，其标题被精心地处理为“朱德同志与农民谈话”等<sup>[83]</sup>。与此类似，以“关中吴满有”之称而闻名的劳动模范李学义虽然在相关展览陈列中出现，以证明大生产运动开展的地域广度，但“关中吴满有”这一称谓也消失了。

在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及毛岸青之妻邵华的回忆录中，对于毛泽东送毛岸英去吴满有家上“劳动大学”则这样表述：

1946年春，岸英哥哥回到延安。父亲询问了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中国的劳动大学你还没有上过。”嘱咐哥哥到农村去，好和贫雇农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父亲把自己打着补丁的灰布衣服送给了哥哥，哥哥穿着爸爸的衣服去经受三大革命的锻炼<sup>[84]</sup>。

尽管邵华与吴家情谊颇深<sup>[85]</sup>，但这篇回忆录中还是小心地避开吴满有家，而将其改名为“劳动大学”，始终没有提到吴满有乃至吴家枣园的名字。

同样在1977年，“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即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写了《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送审稿），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名文集，在这两版中，有关毛岸英的故事《送岸英上劳动大学》中均未出现吴满有之名<sup>[86]</sup>。

在吴满有去世后，吴家一直没有放弃为他正名的努力。他们不仅上访、邀请党史学者参观、前往北京的老革命干部处游说，将吴满有事迹的相关视频上传至网络等等<sup>[87]</sup>，甚至自行筹资在吴家枣园兴办“毛岸英青少年教育中心”，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来恢复吴满有的名誉。一些政界元老、历史学者出于各种原因，也尝试帮助吴家平反，这使得吴满有的故事开始零星散见于网络及少量出版物中<sup>[88]</sup>，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的民间记忆的力量<sup>[89]</sup>，在“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显得如此弱小<sup>[90]</sup>，以至于即使能够利用旧日关系上达天听，也很难改变官修史学中既有的立场。

“忘却也是记忆的一部分。”<sup>[91]</sup>吴满有，这个曾经满载荣耀的名字和它所代表的一段历史，按照权力所认定的标准，被官方记忆选择性地改写和遗忘了。它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如何显赫一时，又如何悄然湮没的个案，有力地证明，忘却和回忆一样，是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面。

今天，与媒体对“劳动大学”的叙述遥遥相对的，是“毛岸英青少年教育中心”曲折隐晦的、对权力话语的民间抗争。追溯这一对纪念物的历史缘起，可以看到，它们恰恰形成了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的一个完整隐喻。

### 3 赵占魁运动：工会整风中竖起的红旗

大生产运动中，竖起了两面特殊的红旗，农业上是“吴满有方向”，在工业上，则是“赵占魁运动”。

所谓“赵占魁运动”，是以边区特级劳动模范赵占魁的名字命名的“新劳动者运动”，简称“赵运”。从1942年到1948年，“赵运”在工业战线上可谓家喻户晓。在当时，毛泽东对于“赵运”给予了高度评价：“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sup>[92]</sup>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对于公营经济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甚至将其重要性置于农业生产之上。

和身败名裂、郁郁而终的吴满有不同，有着“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之称的工人阶级代表人物赵占魁解放后官至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并曾经担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至今，他仍然被视为是爱厂如家、艰苦奋斗的工人先锋典范。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新劳动者”模范人物的挖掘，源于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整风运动”期间对公营工厂工人发动的一次罢工和怠工工潮的调查，是一次严惩工会中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行动的意外发现。而此次运动的目的，则是为工人群众建立新的行为规范，改造工会，迫使工会从工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转为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人。

“赵运”的本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动”<sup>[93]</sup>，以褒扬与打击、激励与强制双管齐下的社会教化，实现对边区工人阶级严格而长期持续的规训，塑造执政党所期望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灵魂。这个规训的过程包含了两面：一方面，是对赵占魁等工人模范不遗余力的表彰和弘扬；另一方面，则是对不符合执政党要求的工人激进分子不遗余力的打击与惩罚。其结果，则是让工人阶级“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sup>[94]</sup>。

和其他群体的遭遇类似，在“赵运”长达数年的运动式教育之后，延安工人群众中讲求民主、自由、平等的风气被一扫而空，代之以对“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推崇。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关于无限忠诚于党，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新式劳动者”的社会记忆，正是从大生产运动中的赵占魁叙事开始的。

### （1）清查“坏分子”

1938年末，日寇相继占领了中国大批中心城市和铁路干线，上百万的学生和工人逃亡西部。此时，随着红军的到来，陕甘宁地区人口急剧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大为增加，而本地除了少数手工业作坊外，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空白，延安迫切需要大规模吸纳受过训练的技术工人，于是在安吴堡成立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职工训练大队，在西安设点招收工人<sup>[95]</sup>。同蒲铁路失守之后，沿途榆次、太原、介休等火车站的大批铁路工人流散到西安。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关于延安招收工人的信息，不少人决定前往。赵占魁就是这样在介休失守之后来到安吴堡青训班职工训练大队的。

当时的资料显示，这个职工训练大队的1000余名学员来源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辽宁、四川等16个省市，绝大部分是大城市的熟练产业工人，还有少数从泰国、南洋为抗日归国而来的爱国华侨青年。从职业上看，包括铁路、海员、矿工、兵工、机器、纺织、缝纫、印刷、电气等17种产业的工人。他们的出现，为延安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最为亟需的劳动力<sup>[96]</sup>。

应该承认，选择前往经济水平低下、生活艰苦的延安，在谋生因素之外，这批青年工人心中大都怀有热切的抗日理想。不过，他们的思想觉悟，则未必都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党委派了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张浩（即林育英）为大队长，曾经在国统区担任地下工作的曹瑛为指导员，安排职工训练大队的课程，对这批青年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使这些城市里的产业工人能够及早适应边区的要求。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基本政治常识和马列、毛泽东著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抗日军事问题，游击战、职工运动问题，文化课和辅导课等，目的是“在于短期内，授与工友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

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敌救亡工作。”<sup>[97]</sup>

职工训练大队的大队长张浩前往苏联前曾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于如何发动工人在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斗争有丰富经验。在1938年10月28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张浩即强调指出，在国家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状况下，“我们的工作也要适合此种环境”。“这种困难复杂的环境，对中国年轻的工人阶级，是要费很多精力，碰很多的钉子，才能学会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在工人中必须进行教育，要纠正其行会的思想，纠正其只顾经济利益忽视整个民族利益的现象”<sup>[98]</sup>。

由此可以看出，青训班职工训练大队的学习任务，首先在于进行革命思想的教化，如普及马列主义基本常识，认识阶级差别等；其次是启发阶级觉悟，纠正工人中盛行的行会思想，强调服从革命大局；三是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四是进行军事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游击战之重要性的认识教育。此外，职工大队还要求工人学员帮助农民收割麦子，参加生产劳动，以增强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国共关系微妙的阶段，对这批工人进行身份甄别也是训练大队重要的任务——这从曹瑛此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身份即可见一斑——一些可疑分子被驱逐，也为后来怀疑有人“搞破坏”而在工人队伍中进行的整风和清理留下了伏笔。

对于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在当时极为有限的物质条件下，青训班的职工训练大队尽可能给予了他们相对优厚的待遇：

对于工友特予优待，除供食宿外，并发给文具讲义。本班虽受物质条件所限制，但对于工友的生活，无不尽力改善。在饮食上，因他们多来自北方，不惯米食，所以有时增加他们常食的面条、馒头等；在居住方面，亦选较好的房屋为宿舍。此外，关于医药费，亦往往由校垫付。即因故离开本班者，也常资助旅费。对于无衣服鞋袜被褥者，则由队部发起阶级友爱捐，将所得的现金，购置鞋袜，连同募得的衣服，分发给他们。所以全体工友在生活上都极感满足<sup>[99]</sup>。

“在生活上都极感满足”可能未必尽然属实，但相对于延安当时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待遇确属优厚，这并非出于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特殊礼遇，而是当时延安急于发展工业的要求所致。

20世纪20年代，陕甘宁地区的工业基础虽然不发达，但仍然有一定的手工业基础。这些手工业包含食品、木作、铁制品、毛纺、皮革、造纸等行业，基本能够满足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需要<sup>[100]</sup>。其中，制盐业是这一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和经济支柱之一。据统计，边区曾有盐池7个，至边区建立仍有5个，年可产盐7万余驮<sup>[101]</sup>。

但到30年代前期，边区的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原因之一是近代手工业的冲击，而另一个造成衰落的原因，则是红军对当地工商业从业者执行激进的政策。直到1935年9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新苏区工作指示”，要求“恢复各种生产和商业”，安定群众生活之前，红军一直在当地设立关卡，没收行商的货物，令许多商人逃往边区之外的地区<sup>[102]</sup>。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其中就特别提及对于富农“经营的土地、商业、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sup>[103]</sup>此后的一系列规定也注意到了保护当地工商业者积极性的措施。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才开始有所恢复。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边区对于布匹、粮食、糖类尤其是军工业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刚刚复苏的边区工业无法应对迅猛上升的需求，大批产品依赖于从边区之外进口。但很显然，完全依靠边贸，无法满足庞大的行政和军事人口的需求，边区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提供门类齐全、基本能够自给的工业产品，以应对庞大的行政和军事人口的需要。为此，大批招收棉毛纺织、皮革制造、采矿、冶金、化学工艺、造纸、机器修造及印刷等方面的熟练技术工人就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大队技术工人的到来，无疑给延安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工业注入了极为宝贵的动力。

为了留住这批人才，边区给予了特殊的待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当时边区供给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也较全国其他地区略高。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工资标准比较而言，最高的是技术工

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才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到38元不等<sup>[104]</sup>。

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sup>[105]</sup>。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熟练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军队干部的4~8倍，也是知识分子的2倍以上。此外，工人的工余生活和活动也颇为丰富：

他们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禁止，男女同工同酬。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假，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公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得出该机关证明请政府救济，或得社会保障基金救济。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sup>[106]</sup>。

工人们每年还能够得到配发的冬夏两季衣服各一套。公营工厂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娱乐之外也进行文化教育，以及讨论政治问题<sup>[107]</sup>。

边区工人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有顺利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并且还得到边区抗战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援助。边区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没有失业的恐慌<sup>[108]</sup>。

在这种优厚的待遇之下，工人们情绪是比较积极的。在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称，工人们“自动提出每日多生



产一小时，以帮助抗战。”<sup>[109]</sup>

1940年底，边区工人工资达到了延安时期的最高点。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国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星期日休息，此外还享受规定的各种假期，加班的工资加倍。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sup>[110]</sup>。可以看到，当时被称为“职工会”的工会组织掌握着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在组织结构上并非党支部和厂方的附庸，工会干部时常不愿听命于工厂行政领导的指挥。应该说，这是当时“三三制”民主制度在基层的一个很生动的体现。

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势下不但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还可能激化双方矛盾，引起突发事件。后来中央职工委员会于1945年9月29日发布的文件《中央职委关于国营工厂职工会的问题》中即在总结1943年厂长联席会议前的工作教训时指出：“由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三人组织”的三人团作为领导工厂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三权鼎立、各行其是、互不协调’的现象”。“有些工会的权力很大……工会在工厂居然成为一个独立单位，而不会和工厂步调一致去为共同的生产任务而奋斗。此时的工会，一般对生产过问少，而注意的却是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工厂无法满足工人的生活要求，于是和厂方发生磨擦，处于对立状态。”

这个总结也承认，国营工厂厂方存在以频繁发动劳动竞赛的形式，要求工人加班导致工人产生对立情绪的情况：“……而在工厂领导上，缺乏群众观点，只向工人要多——如发动竞赛，加义务工——照顾职工的疾苦少，不适当去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甚至不尊重劳动者，采取资本家的态度来管理工人。”<sup>[111]</sup>双方不断的摩擦，在这个时间段内使得矛盾愈演愈烈。1938年底，延安的难民工厂工人认为工资偏低，生活待遇尤其是伙食太差，工会主任刘遐龄遂领导工人与厂方交涉；1942年3月，振华纸厂又再度爆发矛盾。由于物价上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

大为下降，工会委员高承明、宋俊杰，就领导工会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并组织工人怠工。此类举动引起了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的极大反感，认为工会“很少过问生产，而多注意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由于工厂不能满足职工的要求，职工会与工厂的关系多搞不好，甚至发生严重的对立”<sup>[112]</sup>。

作为对此类问题的回应，1941年，中共中央在制定《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劳动政策提纲（草案）》时，特别提及了以下几种需要加以纠正的偏向：“片面与过分的强调工人生活的改善，未能同时照顾远大的整个利益，于是提出过高的不合于战时敌后情况的要求和办法（过度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监督盈利，过高的伤亡疾病的救济和抚恤的规定等等）”以及“轻易使用请愿罢工尖锐的斗争方式”、“某些职工会对于自己的任务和作用的不正确的了解，……甚至还有不尊重政府而与政府对立的现象”等等，并对工厂的工作时间做出了规定：

一般规定为10小时，农业工人则依照当地习惯工作，三八制为世界无产阶级多年奋斗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坚决赞成三八制的实现。但由于中国之工业的落后，战争之摧残破坏，生产之分散，外来工业之断绝，战时军需工业品及一般工业品需要之激增，熟练工人之缺乏，敌后根据地必须获得经济上之自足自给，是中国工业中习惯上工作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战时敌后暂以10小时工作为适宜。一方面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缩短工作时间3~5小时。另一方面又使生产之发展不受大的影响。

草案第七条还提及了对工会组织的要求：

……职工会应从各方面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反对一切游荡怠工之懒汉<sup>[113]</sup>。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对工人工作时间以及渐趋激烈和普遍的罢工、怠工问题的鲜明态度。

类似地，在《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中，也提及“党政军民关系有些不正常”，承认国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不仅低于

敌占区工人的工资，而且也低于农村工人（即农村打零工的手工业工人）的收入，是一种“抗战义务性的光荣劳动”<sup>[114]</sup>。

在1941年9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的决定》中，工资采用实物与货币混合制，并且详细地规定了实物的数量，在食物的项目中包括小米45斤（16两计），盐一斤，油十二两，肉一斤，柴80斤，蔬菜1斤，菜干四两等。此外，还发给一年单衣、衬衣及棉衣三套服装的所需五丈五尺布匹及一斤半棉花，货币部分，则有轻重工业工人之分，轻工业工人每月收入为15元至50元，重工业工人收入为25元至75元不等<sup>[115]</sup>。应该说，这些收入比起军队干部的收入，还是相对丰厚的。不过，这些实物其实都是按当时的市价折合为货币进行发放，而在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之时，显然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与能够购买的实物之间仍有相当差距。

到1942年5月，由于工资和工时等问题上的分歧，延安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罢工工潮。

罢工的导火索是1942年5月5日到9日召开的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工人的教育工作和工会的“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会议指出：

公营工厂的生产，不单纯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主要的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公营工厂的财产，是革命的公有财产，是工人自己有份的财产。在公营工厂做工，是具有抗战义务性的光荣劳动。全体职工应以新的态度对待这有意义的新的劳动。……应表现工人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节衣缩食，勤苦劳作，以维持和发展工厂，供给抗战军队需要，迎接与克服空前的困难，向光明前途迈进<sup>[116]</sup>。

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有几点重大变动，一是工人每天每天劳动时间增加了2小时，从8小时改为10小时，取消了一年14个休息日的规定，此举使工人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作量；二是工资标准的估价由原以工会人员为主的估价委员会决定改为厂方决定。三是针对原《合同准则》脱离战时艰苦环境、对工人福利待遇规定过高，而工人对工厂应承担义务却未被提及的不足，增加了有关工人有遵守劳动纪律与管理规则的义务的一章<sup>[117]</sup>。

这份修改后的《准则》随即引起了各个公营工厂工会领导人的激烈反弹。率先发难的是中央印刷厂的工会组织部部长孙铁林。中央印刷厂承担着当时边区和中央系统的报刊、书籍、文件资料、地图、月历、表册和包括钞票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是中共中央及边区的核心部门之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后，孙铁林公开向工人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指责厂工会的“妥协退让”态度，并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此前签订而未能兑现的劳动合同。遭到拒绝后，孙发动了怠工<sup>[118]</sup>。紧接着，光华印刷厂也爆发了工潮，在工会干部路明、江琳的带领下，该厂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此外、难民工厂、边区机器厂及新华化学厂等均发生了罢工工潮。

最为激烈、影响巨大的是边区农具厂（手榴弹制造厂）的“狄德建事件”<sup>[119]</sup>。工作勤奋的狄德建曾经被选举为边区劳动模范，后又因为他愿意为工人的待遇出头说话而当选为这家兵工厂的厂工会主任。1942年6月16日，边区农具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狄德建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劳动，指责“共产党一天不如一天，剥削工人；总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sup>[120]</sup>。于是组织工人召开大会，公开表示反对，会上，工人们纷纷指责留守兵团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并贴出了标语，一时震动延安。对当时的情况，陈用文回忆说：狄德建“‘代表工人说话’，提的条件很高，行政不接受，就闹翻了。闹到什么程度呢？闹到煽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贴出标语来，说共产党‘喝工人的血，要罢工，要闹事’”<sup>[121]</sup>。其时蒋介石正指挥胡宗南向陕甘宁根据地发动进攻，情况万分紧急。军委命令兵工厂要在短期内造出十万颗手榴弹，以应御敌之需。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人闹事，严重影响了军火生产，时任留守兵团司令的贺龙一怒之下打算枪毙狄德建。

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出李颀伯和边区总工会干部章萍两人进驻该厂，清查狄德建及其他“坏人”的群众运动随即开始。

## （2）发现“好人”赵占魁

就在清算“坏人”狄德建的同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发现了“好人”赵占魁。

赵占魁，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张村，和吴满有不同，他不

是因为活不下去而逃难到陕甘宁边区的流亡难民，而是边区政府为解决工业生产问题而招募的技术工人。

赵占魁家境贫寒，17岁就学习了铁匠技术，后来又去太原铜元厂当学徒，去兵工厂学翻砂，到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火炉工。

1939年4、5月间，赵随职工训练大队来到了延安，进入桥儿沟工人学校学习；这一年的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赵占魁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翻砂股股长，先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农具厂评为模范工人，并于1941年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他“经常每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以上，大热天，穿起棉衣代替石棉衣，汗水不停地滴在熔铁炉前，从没有叫过半声苦”，认为“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和



图5-2 边区劳动工人的模范赵占魁<sup>[122]</sup>

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是自己应尽的义务”<sup>[123]</sup>。最重要的是，在狄德建事件期间，他没有跟随狄德建闹事，坚守工作岗位。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这篇社论指出：

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现在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展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象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sup>[124]</sup>”。

随后，作为“扬善惩恶”的示范，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政府在农具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奖励了赵占魁。毛泽东立即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sup>[125]</sup>

1942年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应“认识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

这显示，“赵运”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次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为目的的行动，而是对其中出现的“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工厂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在“有条件的有目标的发动”的基础上的一次政治行动。

通知也指出，“这是工厂整风学习中具体的材料，因此应配合整风学习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象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各厂应详细定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

“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其评判当然应该符合红色中国的标准，《通知》中极其具体地列举了这一模范的标准要求：

爱护工厂 严守纪律  
积极工作 始终如一  
数量最多 质量最好  
爱护工具 节省原料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努力学习 帮助别人  
克己奉公 团结群众<sup>[126]</sup>

上述标准清晰地描绘出，技术是否过硬，并非执政党与边区政府评

价模范与否的首要标准。“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新的劳动态度”，才是赵占魁式模范工人的首要条件。而大规模挖掘模范的目的，正是以其为“模”、“范”，配合工业领域内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新式劳动者”改造。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特别指出“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和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与处罚犯错误的工人，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提高的。”<sup>[127]</sup>

1943年，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在纪念“二七”罢工大会上，专门作了《响应生产号召 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讲话，随后的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朱德、洛甫（即张闻天）、邓发等均就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进行了指示，《解放日报》随即大幅刊载，张闻天甚至亲自为难民纺织厂的几位工人制定个人生产的计划。

据研究者统计，到1943年5月25日，延安市已有农具厂、中央印刷厂、边区被服厂、工艺实习厂、中管局实验厂、光华印刷厂、八路军制药厂、难民工厂、新华化学厂、边区纺织厂、边区弹花厂、华侨毛纺厂等12个公营工厂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参加的工人达数百人。此后，各地公营工厂应者云集，到1944年2月，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报名参加运动的工人共1041人，在这些参加者中，涌现出袁广发、孙云龙等近300名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sup>[128]</sup>。

赵占魁运动的影响之大，及于陕甘宁边区之外，太行区的“新劳动者运动”、晋绥区的“张秋风运动”、晋冀鲁豫区的“甄荣典运动”等，都是“赵占魁运动”扩展的体现。

这一阶段，赵占魁运动的目的主要是旨在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提高生产率。其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从数据上看，各工厂工时普遍延长、产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仅仅以难民纺织厂为例，在1942年发动赵占魁运动后，每月用机油由原来的200斤减少到70斤；每天的废纱由原来的20至25斤，减少到1至7斤，而且在两个月内，共节省办公费用7000元（边币）。从1943年5月起，该厂产品数量逐月增加：5月份，共生产土毛布552匹；6月份，生产650匹；7月份，生产908

匹；8月份，生产1006匹。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加了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则提高了59%。该厂用纸，由过去每印1000张要损坏8至10张，减少为1.5至3张。仅1943年第二季度，该厂就节省纸张1.8万张，价值边币8万元<sup>[129]</sup>。

根据当时的报纸刊载，“广大职工纷纷要求增加工时和做义务工。如工艺实习厂分厂，1943年6月有54人共加工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加工812小时。1944年2月，全厂做的义务工共达3700小时。”<sup>[130]</sup>

由于“赵占魁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明显效果，在1943年11月和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两次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赵占魁均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和特等劳动模范。在大会上，赵占魁的肖像和毛泽东的画像一起挂在了大会主席台的红色帷幕上。如此特殊的政治优待，在边区工人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 (3) 新式劳动者的政治人格塑造

从1942年9月7日发表穆青、张铁夫关于赵占魁的首篇典型人物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开始，《解放日报》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赵占魁所代表的“新式劳动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1942年9月11日）、《赵占魁同志》（1942年9月13日、9月14日）、《恭喜赵占魁同志》（1942年9月29日）、《继续展开赵占魁运动》（1942年12月22日）、《赵占魁号召工友爱护工厂增加生产》（1943年1月4日）、《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1943年2月7日）、《赵占魁运动普遍展开》（1943年5月1日）、《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5月7日）。1948年，穆青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工人的旗帜赵占魁》（1948年8月15日）。

通过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的传播，执政党不断强化赵所代表的“新劳动者”的光荣形象，塑造其鲜明的政治人格，同时通过政治动员和组织传播推动这一政治人格在工人中的群体认同，促使更多“以革命者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新式劳动者’”的出现。通过这些报道，赵占魁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在苦难中成长、



在斗争中坚强、在革命中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代表性形象。

在穆青的系列报道中，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个政治人格特征的塑造过程：

第一篇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中，穆青着力塑造的是“天下第一好人”的形象。作者对赵的认识还局限在一个“好人”的判断标准上，没有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的高度上来进行总结和提升。第二篇报道《赵占魁同志》描绘了赵占魁“在工场里”挥汗如雨认真工作的情况，并且以“老赵是火里炼出来的”的精彩比喻，追叙了他在旧社会当铁匠的痛苦经历，以此来说明赵占魁投身革命的无穷动力。“工人参议员”一节，说的是他如何参政议政，展现了一个苦孩子出身的铁匠如何当家做主的形象，这就使得赵占魁从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到边区参议员的经历，形成了昔苦今甜的强烈参照，展示出边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美好场景。在第三篇描写“奖励赵占魁大会”的现场报道《恭喜赵占魁同志》中，穆青把大会内外、主席台上下向赵占魁学习的热潮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第四篇长篇典型人物通讯《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对赵占魁的忘我劳动和革命精神作了全面介绍，对他成长的全过程作了具体的报道，并最终总结升华为“十年来，劳动英雄赵占魁成长的道路，正标志着职工运动的道路”。这清楚地说明，发动“赵占魁运动”的目的绝不只是表彰一个模范而已，它的目的是树立赵占魁这面红旗，以推动更多“以革命者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新式劳动者’”的出现。

与被宣传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狭隘行会思想”的旧式工人相比，“新式劳动者”的形象呈现出如下人格特征。

①感恩者形象：在新生活里热衷忆苦思甜，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恩之情。

在关于赵占魁的报道里，充满了这位工人忆苦思甜的动情描述：

赵占魁和一般年老的工匠一样，在社会上曾受尽一切剥削与痛苦，过了半生困苦与屈辱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他从同蒲路退下来，走到西安，听说延安是工人出头的地方，于是就由安吴堡青训班转道来延。到了延安，他遇到一件一生梦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居然能够进抗大与工人学校学习<sup>[131]</sup>。

这些报道还这样描绘：

他没有忘记当学徒时受过的师傅的打骂，没有忘记那些资本家对他的剥削和工头对他的侮辱，他没有忘记因为拉了汽笛而晚到五分钟便拿不到牌子而失业一天，或是因为一点点不注意被扣除了工资。他没有忘记常常过着不能供给家里甚至连自己吃饭也维持不住的那些日子<sup>[132]</sup>。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公营工厂里，工人则有了完全不同的地位：

我做了一辈子工，可从未看见工人会被选举成模范还发奖，还开会庆祝，还要给他演戏，这都是几十年工人流血斗争的结果。今天在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真正已得到解放了<sup>[133]</sup>。

咱们这里，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随便找厂长谈问题和兄弟一样，公家管吃管穿还发钱，人只要心里痛快，就是工作再累也甘心<sup>[134]</sup>！

这些报道把赵占魁描写为为了追寻自由、解放而奔向延安，追求进步的形象，但实际上，赵占魁最初来到安吴堡时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找到活干，得以谋生”<sup>[135]</sup>。由于青训班职工大队属于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他误以为被抓了“壮丁”，一度试图离开安吴堡，另谋生路。后来，经职工大队大队长张浩劝说，赵占魁才安心地留了下来<sup>[136]</sup>。当然，假如照实描写，则赵占魁的形象就远不如宣传者所期望的那么典型和高大了。在推广典型的运动中，适度地拔高显然是必要的。因此，后来的诸多报道，都将这一段隐匿不提。

对赵占魁一度摇摆不定的思想的完全遮蔽，与对其“忆苦思甜”感恩之情的极度夸大，使得赵占魁呈现出“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种对记忆的筛选与过滤，显然出于政治运动的实际需要。对此，李泽厚在与刘再复的对谈中有过精辟的论述：“它既是政治运动，又是道德运动，又是宗教运动，其宗教性质是通过今昔对比证明人间确有一位神似的救星，其道德性质，则是警告如果忘记‘幸福之源’便是道德良心的败落，其政治性质就不言自明了。”<sup>[137]</sup>

### ②奉献者形象：大公无私，任劳任怨。

在赵占魁的报道中记者这样写道：

来到工厂里不用问，你光看吧，那个唯一的穿着棉衣的，那个站在离炉子顶近的，那个工作最忙而出汗最多的，就是赵占魁。

在工作中，他发挥了极高度的劳动热情，树立了一种新的劳动态度，埋头苦干，一切为革命利益着想。他在农具工厂期间，一直是担任熔炉看火的工作，这是一种最辛苦的工作，在二千度高热的熔炉面前，即在夏天，身上还要穿着棉衣，披着皮裙，终日流汗不止，但他工作到十二小时。这一件辛苦而又不出名的平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干，但他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从来没有表示过不安心。

在工作中被扎烂一个手指后，赵占魁仍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的手是橡皮的”。在右脚被火红的熔钢烫伤后，依旧“拿着棍子拐来拐去的走着”<sup>[138]</sup>。

这些刻意凸显的描写，固然是对赵占魁工作态度的写照，但也蕴含着对“落后分子”挑肥拣瘦、讨价还价的不良态度的批评。塑造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先进工人形象，目的在于督促其他普通工人向赵占魁看齐，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试图以这一模范形象的彰显，极力改变工人群体以往对其阶级领袖“擅长谈判、擅长发动工潮、擅长维护工人阶级权利”的既有社会记忆，使其改变为老实肯干的奉献者形象。

### ③效忠者形象：对党无限忠诚，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

他在工作上不怕艰苦繁重，始终站在最前面，而且又做得最多最好。但他从来不夸张自己、不贪功；每遇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总是让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自己并无什么功绩可言；并且他认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为自己应尽的义务<sup>[139]</sup>。

通过新闻报道和艺术作品等多种方式，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不断塑造赵占魁的高大形象，强化他所代表的“新劳动者”的光荣形象，使

赵的工作态度能够变成边区工人的统一认识，以榜样力量来教化工人，推动更多“以革命者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新式劳动者’”的出现。

贺敬之写的《赵占魁运动之歌》在当时传唱一时：

咱们的模范赵占魁，  
他的名字到处飞。  
记在那心里挂在嘴，  
提起那老赵多带劲。  
哎嗨嗨嗨！  
赵占魁运动千万工人来响应，  
赵占魁运动个个工厂都进行……

对赵占魁翻身和感恩形象的塑造，旨在为其“效忠者”的人格特征铺垫逻辑发展上的合理性。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道德概念，“效忠者”形象在文化不高的民众中有着极高的道德认同。于是，如雷蒙德等人所说，“通过给政策加上一个道德范畴”<sup>[140]</sup>，执政党成功地将“多做些工作”与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忠诚于抗日事业的革命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赵占魁翻身者、感恩者和效忠者形象的记忆建构，意在展现赵占魁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对执政党政策的高度拥护。与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吴满有方向”、军队生产领域内的红旗三五九旅相呼应，中共中央通过工、农、兵三条战线上广泛的政治动员，达到了“政治议题——认同聚合”的目的<sup>[141]</sup>，获得了民众的忠诚追随，进而有效地证明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 (4) 整风中的思想改造与社会记忆重构

必须指出，正如毛泽东所说，赵占魁运动“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sup>[142]</sup>，它绝非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个单纯树立正面典型的激励运动。它是工业生产运动的一面红旗，更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依托“赵占魁运动”，迅速淡化二三十年代“革命工人”向往民主、自由，擅长发动工潮，勇于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记忆，着手以“新式劳动者”态度来教化和规训政治觉悟高低不齐、

出身不一、背景复杂的一万余名边区工人，使他们迅速成为大公无私、享乐在后的新式工人。通过福柯所言“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normalizing judgement）与“考试”，使所有人“受制于无形的权力”<sup>[143]</sup>。其宗旨并非奖励，而是利用高高在上的典型来形成对比和巨大落差，并使用各种惩戒手段，以促使和威慑“落后分子”，使其尽可能迅速地赶上执政者的思想改造要求。

为此，边区总工会采取了“破”与“立”双管齐下的策略。对赵占魁的宣传显而易见是立起一个鼓励工人效仿的先进人物，而“破”的策略，则是将工人群众明确地区分为少数“破坏分子”与大多数好人及“可以改造好的后进工人”两个阵营，通过对破坏分子示范性的严厉惩戒，起到加强劳动纪律和迅速提高思想觉悟的作用。

在《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中，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为，破坏工厂生产的人”<sup>[144]</sup>。这个定义，几乎把所有对工厂现有政策持异议者都涵盖在内。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中则明确指出：“各厂应详细定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sup>[145]</sup>

第二年推进赵占魁运动的一篇报道中，更是严厉地将持异议者视为“破坏分子”：

在今天国营工厂的生产任务中，与赵占魁运动同样重要的，是建立各工厂必要的管理制度，清洗破坏分子，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sup>[146]</sup>。

同一版面上，邓发、洛甫分别在《论国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和《关于国营工厂的几个问题》中强调了工厂的一元化领导。邓发严厉地指出：

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在建设厅二科有分总支，反革命分子就竟敢公开把分总支书记视为多余的。

他明确提出，要对国营工厂进行一元化领导，必须绝对服从政府领导，反对任何闹独立性的倾向<sup>[147]</sup>。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解放日报》发表这些报道和文章前，正值“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同时，工会的政策也应和着中央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将工厂的生产秩序整顿与对王明的打击联系起来：

苏区一开始，王明这些人，左倾教条主义，在劳动政策上就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群众在“左”的政策影响下，没有用主人翁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sup>[148]</sup>。

4月1日，延安进行了“反特”大逮捕，在延安被疑为特务而被捕者达数百人之多。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揭发和清算，使坏人得到暴露<sup>[149]</sup>。同时，每个人也必须自我审查和反省。通过整风运动和紧接着进行的“抢救”运动，不仅找出了大量“特务”，“某些两条心的人也被清查出来了”<sup>[150]</sup>。《解放日报》的报道以赞赏的口气说：“纺训班每个同学，都写了反省笔记”，对“自己的出身、以往对根据地工厂的不正确的认识、自身的缺点等，毫不隐瞒地揭发了出来。”<sup>[151]</sup>

对这段时间的工厂工作，后来工会的一些领导在回忆中坦承“过了头”。例如，李强在《略谈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中说：

但是到了抢救运动，整的过头了，搞得很不好，对工厂的生产工作有影响，有的工厂生产下降得厉害。主要是抢救运动不搞思想教育，而讲整人，无中生有，乱控告、搞逼供信，当时把一些知识分子当特务来抢救。像徐驰、王立、汤钦训、龚家宏这样一些抗战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都被关起来了。有的工人说一两句错话，也被抢救了，天天晚上开大会批斗，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sup>[152]</sup>。

抢救运动在工业行业开展之广泛，大有人人自危之势。边区工会的主要领导人难以自保：

我们农具厂的几个领导干部全被抢救了，党总支书记杨长春、几个工程师、技术科长王立、生产行政科长罗坦、工会主席贾亚夫，一下子都被抢救了，都被抓起来了<sup>[153]</sup>。

甚至连刚刚树立起来的模范赵占魁也不能幸免：

……赵占魁同志看不过眼，只说一句话：“我不相信徐厂长有问题，如果他那样的人有问题，那我们不是更有问题了吗？”他们就抓住他说自己“更有问题”这一套，也把他关起来了<sup>[154]</sup>。

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期，被定性为“破坏分子”会给当事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前一阶段组织怠工和罢工的工会干部，均遭到清洗。据朱鸿召考证，振华纸厂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被开除，光华印刷厂工会主席江琳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德建则被交由留守兵团司令部军法处法办<sup>[155]</sup>。而工会与党支部的一切活动，也必须无条件服从生产的需要：“如与该厂生产计划抵触时，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sup>[156]</sup>

从此，工会从与工厂行政领导、党支部三足鼎立的地位，一变而为厂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下的附庸，不复工人阶级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通过清洗坏分子，树立正面典型，恩威并立，执政党向工人们成功地灌输了“国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观念<sup>[157]</sup>，由此，揭发和清算运动通过对工人中“破坏分子”的清洗，不仅吓阻了落后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个别人，还有效地实现了对工人这一最激进又最具团结能力的职业群体的精神约束，成为执政党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从此，民主商议工资待遇等早期存在于国营工厂内的做法不复存在，而罢工、斗争、谈判等早期被共产党广泛运用的工运运动手段，则彻底在边区内部绝迹。

在对“赵运”记忆的建构中，效忠者的形象与狄德建等“反革命”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们因此而生的遭际，则绝不仅仅是对效忠者的荣耀的宣示，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如果不追随前者，而落入落后分子乃至反动派的阵营，失去群体认同，其后果令人畏惧。

中国共产党是以发动工人罢工运动开始自己的政治历程的，但与早期的工运精英陈独秀、邓中夏、李立三、林祥谦等人相比，赵占魁最大的特点不是富于抗争精神，擅长组织罢工谈判，进行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也不是富于个人魅力，善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群众。他的特质，是应当如张浩在和赵占魁谈话时所说的那样：“要做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那里就要发挥一定的作用”<sup>[158]</sup>——完全地、无条件地听命于党的要求，这种服从和效忠的姿态，既展示了执政党的至上权力，又展现了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无上魅力。

《解放日报》对“赵占魁运动”长达七年的宣传，不仅把淳朴木讷的好人赵占魁塑造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还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成果：一是使工会从当时工人的代言人角色转为党的政策及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人；二是让工人们“树立群众观点”、“建立新的劳动态度”<sup>[159]</sup>，从这个时候开始，工人们被要求放弃 20、30 年代在国统区破坏性的“罢工斗争”的经验，放弃 40 年代初工会仍然提倡的“充分发挥和运用抗日民主自由权利”的权利<sup>[160]</sup>，转向“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sup>[161]</sup>，建设国营工业。

民主制度建设让位于经济建设，独立的工会听命于工厂行政部门，通过 7 年“赵运”的记忆建构，早期关于工人运动中那些具有强烈鼓动和组织能力、善于代表工人进行谈判和争取应有权益，擅长发动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形象在社会记忆的唤起过程中被刻意淡化了，新一代工人的旗帜，是克己奉公、严守纪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完全效忠于党的“忠仆”赵占魁。

## 注 释

- [1]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70 页。
- [2] 燕继荣：《政治学 15 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9～150 页。
- [3]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1 页。
- [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5 页。
- [5] 三岛宪一：《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9 页。
- [6]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 [7] 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38页。

- [8] 例如，明代屯田，是将田地分到每个世袭军籍的农户，即“军户”中。明洪武初年，中央设大都督府为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统领全国各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等官。每个都司所辖卫所无定例，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每卫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设千户等官。每千户所管辖十个百户所，以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百户等官。每百户所又管辖两个总旗，设总旗官。每总旗及设五小旗。按照这个建制，明代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一军户都分到若干土地，一方面守卫边地，另一方面则通过垦荒种粮来解决自己的给养并向国家纳税。由此可见，军户虽身在军籍，但其实是承担了军事任务的农民，所遵循的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
- [9] 靖边县1940年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县政府13个机关部门中，只有3个完成了事先预定的生产计划。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 [10] 杨正国：《毛泽东与友人乐天字》，《党史纵览》，2004年第9期。
- [1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233页。
- [12]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 [13] 此处数据均来自何维忠前揭书。
- [14]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 [15] 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 [16] 后来毛泽东对解放军职能的这一论述，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15条。
- [17] 贺龙：《关于整军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贺龙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 [18] 何维忠前揭书，第23页。
- [19] 前揭书，第24~25页。
- [20] 前揭书，第25~26页。
- [21] 前揭书，第26页。
- [22]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解放日报》，1945年4月27日。
- [23]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 [24]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文艺版第201期，1942年3月13日、23日。王实味因此文而被打为“五人反党集团”，1947年被秘密处死，时年41岁。
- [25]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解放日报》，1945年4

- 月 27 日。
- [26] 何维忠前揭书，散见各处。
- [27]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1 ~ 894 页。
- [28] 何维忠前揭书，散见各处。
- [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44 页。
- [30] 当然，在这之后执政党也将经验部分用于对中国城市社会的改造，如文革中赋予各单位强烈的军事化特征等等。
- [31]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解放日报》，1945 年 4 月 27 日。
- [32]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第 59 页。
- [33] 何维忠前揭书，第 1 页。
- [34] 《苏绰传》，《周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卷 23。
- [35] 何维忠前揭书，散见各处。
- [36] 国琦：《朱毛红四军的宣传制度》，《党史研究资料》，第 6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2 页。
- [37]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 页。
- [38]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1 页。
- [39]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2 页。
- [40] 前揭书，第 162 ~ 169 页。
- [41] 边区民众对胡宗南的蔑称。
- [42] 徐宗懋：《吴满有的故事》，《老照片》第 62 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 [43] 吴满有的后半生经历不见于正史，且说法不一。曾任毛泽东秘书并为开展“吴满有运动”撰写社论的李锐认为，吴满有在南京的叛变讲话是国民党使的“离间计”，他甚至拿吴的情况与周恩来的“伍豪启事”相提并论。见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4 年第 4 期。
- [44] 图片征引自百家讲坛网：<http://bjjt.sx188.9935.ah.cn/print.aspx?id=1744>。
- [45] 莫艾：《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30 日。
- [46] 《吴满有——模范公民》，《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 日。
- [47] 《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11 日。
- [48] 李锐：《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4 ~ 306 页。
- [49] 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转引自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新闻学刊》，1988 年 4 期。
- [50] 戴维·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9 ~ 440 页。

- [51]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
- [52] 如前所述，这些行动包括通过游说、开会斗争等强行摊派收取公盐代金、寒衣代金、羊毛代金等诸多捐税，导致农民大批逃亡，甚至还有将农民逼至跳窑的。
- [53] 《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
- [54] 前揭书。
- [55] 《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
- [56] 莫艾：《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 [57] 除此以外，1942年还有一位名叫杨步浩的农民也为毛泽东代耕过粮食。和吴满有公开投书报社的做法不同，他是通过延安县政府上报这个请求的。
-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0页。
- [59]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4日，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553页。值得注意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吴满有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篇长文，因此也有人认为，不排除这封信是记者代为捉刀的。参见李公明：《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天涯》2007年第6期。
- [60]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4日。另参见李维汉前揭书，第554页。
- [61] 转引自贺永泰：《“人民政府”名称的提出和确立》，《党史文苑（纪实版）》，2009年第2期。
- [62]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82页；亦参见贺永泰：《“人民政府”名称的提出和确立》，《党史文苑（纪实版）》，2009年第2期。
- [6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 [64]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65] 对“翻身”主题叙事模式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可参见：杜霞：《翻身道情——解放区小说主题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 [66] 赵超构前揭书，第213页。
- [67] 哈罗德·D. 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 [68] 赵超构前揭书，第208页。
- [69] 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艾青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 [70] 《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
- [71] 陈履生、廖羽：《林岗与〈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2期。
- [72] 王尊三：《吴满有鼓词》，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1946年版。
- [7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人民出版社2003年年版，第282~283页。
- [74]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选集》

-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09页。
- [75] 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07页。
- [76] 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
- [7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7年版, 第418页。
- [78] 龚明德:《改“吴满有”为“刘玉厚”》, 《出版史料》, 2006年第4期。
- [79] 参见廉静:《百位文艺家口述实录:我们的演艺生涯》, 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处转引自[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20/id\\_XNTI1NTY=.html](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20/id_XNTI1NTY=.html)。
- [80]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政策汇编》, 中共中央东北局1949年版, 第249页。
- [81]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65页。
- [82] 艾青:《漫忆延安诗歌运动》, 载王海平、张军峰主编:《回想延安-1942》,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第375页。
- [83]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大生产运动》, 图18, 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 [84] 毛岸青、邵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人民文学》, 1977年第9期。
- [85] 在吴家设立的“延安毛岸英青少年教育中心”开馆时, 邵华曾经专程前往出席。后来邵华去世时, 吴家也派人赶往北京悼念。
- [86] 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送审稿), 延安大学印刷厂印1977年版, 第121~123页; 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133~136页。
- [87] 《吴满有“叛敌”之谜》: <http://you.video.sina.com.cn/b/18144214-1349012454.html>
- [88] 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 徐宗懋:《吴满有的故事》, 《老照片》第62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贺永泰:《“人民政府”名称的提出和确立》, 《党史文苑(纪实版)》2009年第2期等。
- [89]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1页。
- [90] 前揭书, 第10页。
- [91] 孙江:《事件·记忆·叙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73页。
- [92]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92页。
- [93] 《邓发谈赵占魁运动》, 薛幸福主编:《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 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 第34页。
- [9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三联书店1999年版, 第156页。
- [95] 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与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机构, 主要负责对从国统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和甄别, 并将政治上可靠者输送去延安。自1937年10月创办至1940年奉命撤离, 青训班历时两年半时间, 共举办14期, 组编127个连(队), 培训学员12000余名。职工大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

- 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 [96] 参见前揭书，及陈希文：《安吴堡职工大队概况》，载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 [97] 前揭书，第257页。
- [98] 前揭书，第276页。
- [99] 前揭书，第257页。
- [100] 参见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2页。
- [10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 [102] 《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效果》，《红色中华》第255期（1936年2月13日）。
- [103] 原载《斗争》，第77期；转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
- [104] 《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 [105]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 [106]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前揭书（上），第437页。
- [107]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294页。
- [108] 齐华：《抗战动员中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上），第241页。
- [10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前揭书第1辑，第294页。
- [110] 《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1940年11月1日），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上），第499页。
- [111] 《中央职委关于公营工厂职工会的问题》，1945年9月29日，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下），第535页。
- [112] 前揭书。
- [113] 《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劳动政策提纲（草案）》（1941年3月20日）。
- [114] 《中央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
- [115] 载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前揭书（下），第561页。
- [116] 高长久：《总结》，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上），第593页。
- [117] 《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下），第475页。
- [118]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 [119] 边区农具厂实为边区兵工厂，按照当时的保密制度，对外统一称为边区农具厂。薛幸福前揭书，第21页。
- [120] 张静：《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湖南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07。
- [121] 陈用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7期，第100页。

- [122] 图片征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2/18546465627.shtml>。
- [123]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 [124]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 [125] 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载前揭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书（下），第591页。
- [126] 《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 [127]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 [128] 参见：樊明方 胡雅各：《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 [129] 姬乃军：《赵占魁运动的前前后后》，载张明胜编：《延安博苑》（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 [130] 张水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赵占魁运动》，《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
- [131]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 [132] 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9月13日。
- [133] 《农具工厂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解放日报》，1942年9月29日。
- [134] 张铁夫、穆青前揭书。
- [135] 杨长春：《回忆赵占魁和赵占魁运动》，载薛幸福前揭书，21页。
- [136] 杨长春：《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6。
- [137]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
- [138] 张铁夫、穆青前揭书。
- [139] 前揭书。
- [140]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 [141] 张凤阳等前揭书，第299页。
- [142] 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载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前揭书（下），第591页。
- [143] 米歇尔·福柯前揭书《规训与惩罚》，第93页。
- [144]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 [145]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 [146] 《赵占魁运动普遍展开》，《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 [147] 邓发：《论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洛甫：《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 [148] 陈用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前揭书，第99页。
- [149] 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208~2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150] 薛幸福前揭书，第36页。
- [151] 《各厂工人进行坦白反省》，《解放日报》，1943年6月17日。
- [152] 李强：《略谈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前揭书，第45页。

[153] 徐驰：《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发展与工人运动》，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前揭书，第85页。

[154] 徐驰前揭书。

[155] 朱鸿召前揭书，第49页。一说被秘密枪毙，但笔者未能找到确证证实这一种说法。

[156] 刘景范：《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解放日报》，1943年6月9日。

[157]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5月20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158] 杨长春：《回忆赵占魁和赵占魁运动》，载薛幸福前揭书，136页。

[159] 前揭书。

[160] 《中国工人》，第十二期（1940年1月7日），第6页。

[161] 刘少奇前揭书，第305页。





## 第六章

# 话语即权力： 大生产记忆的三次重构

记忆是一种认识的工具，历史行动者通过它来解释现实——而且这还表明，他们必须借助于社会环境，而不能单独做这些事。

——伯得那

在前面的若干章，笔者论述了最初起于解决经济危机的大生产运动，在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之一，其形成的生产模式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但始于南泥湾垦荒的一系列大生产运动相关“神话”及从中总结而出的“南泥湾精神”，以及这种以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和群众运动为典型特征的生产模式，在哪些时间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它又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它们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继续产生影响吗？如何才能对被称为延安精神中“最为显著的标志”的“南泥湾精神”这一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sup>[1]</sup>？在这一章里，我将着重从这个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

福柯认为，权力影响并制约了某种话语的建构；话语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权力，成为某种权力话语。“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sup>[2]</sup>同时，话语也是权力运作和实施的工具。“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它（人的灵魂）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而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一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sup>[3]</sup>简而言之，话语即权力。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政治话语。对其政治话语的分析，能够有效地说明权力通过话语的不断阐述、推理、论证，通过对事件的有意识筛选、强调和隐匿，不断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进一步地，对其社会记忆的流变分析，也能够帮助解读它在不同时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本章，笔者尝试通过对中共中央机关报、国家话语的代表——《人民日报》所保存的、自1946年以来所有报纸资料中的相关文章进行统计和分析，运用频数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大生产运动及其核心“南泥湾精神”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流变，以及这些相关记忆是如何“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的<sup>[4]</sup>。

大生产运动本身首先是一个历史事件而非政治话语，同时，很多文章以南泥湾垦荒来指代大生产运动，或简称以“开展生产”、“生产运动”等，而自该事件发生以来的70余年中又有大量事件与经济生产相关联，它们也被称为“生产运动”，但却与大生产运动没有明显的联系，“生产”一词更是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词汇之一。因此为慎重起见，本研究在初期探索性研究中框定了一个较小的时间段（1951~1960年）进行反复比对，对这几个关键词搜索的结果进行了预读和比较，结论是它们都不够符合本研究问题的要求。基于以上几点原因，笔者认为，选择“大生产运动”或“生产运动”或“生产”作为关键词进行文本搜索，可能都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或产生混乱。

最终，本研究选择了大生产运动中的核心政治话语“南泥湾精神”作为人民日报检索的关键词，以在文本范围中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这一政治话语流变的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一些撰文者在行文中使用了“南泥湾作风”、“南泥湾政策”等近义词，因此笔者决定选择“南泥湾”作为检索的首要关键词，在搜索出所有出现“南泥湾”一词的文本（含图片及其说明）后，经人工阅读，剔除其中明显与“南泥湾精神”无关的两篇文章（这一结果本身也说明，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是较为准确的），余下文章均与“南泥湾精神”相关，这些文章最终构成了本研究频数分析的样本框和话语分析的文本范围。

检索显示，自1946年《人民日报》发刊至2003年，出现“南泥湾”一词的文章共829篇，平均每年14.9篇。据此，笔者将均值定为15篇。超过这一数值的有26年，低于总年份的一半。其中，最高值出现在1960年，为39篇，此外，1970年及1972年，南泥湾一词的出现频率也超过了30篇，分别为30篇和34篇；最低值出现在1951~1953年，均为0篇。

从曲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峰值段共有三个，分别为：1960~1966年，1970~1978年、1989年6月~1996年。本章将主要探讨这三

个时段国家话语中“南泥湾精神”的叙事变化及其相关记忆的重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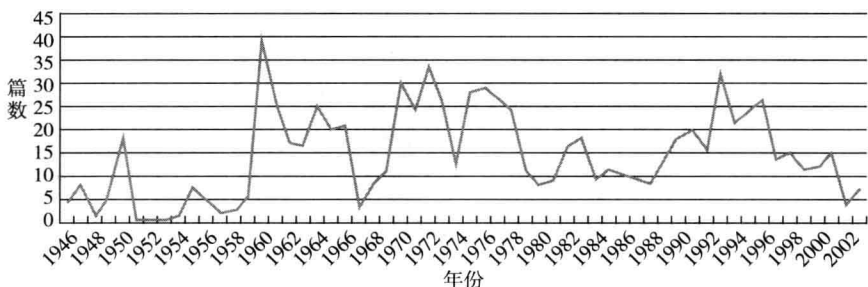


图 6-1 《人民日报》含有“南泥湾”一词的历年报道篇数曲线图

话语语词分布的频数分析是考察话语在不同时间段里总体隐显状态的有效方式，此外，通过交叉分析，并结合背景考察，可以辨析权力操控的痕迹。在频数分析中，笔者首先框定了一组在大生产运动过程中即已出现，并在三个阶段的样本框中都广泛分布的关键词语作为话语分析样本。它们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毛泽东”、“毛主席”，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毛泽东”与“毛主席”、“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与“丰衣足食”、“党中央”与“中共中央”四组语词高度的同义性，在研究中将这几组样本的语词分布合并统计）。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段，笔者通过对《人民日报》文献的广泛检索和阅读，运用判断抽样法初步确定当时的 6 个频繁出现的政治话语及其关键词如“大寨”、“总路线”、“人民公社”“上山下乡”“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并在每个时间段中确定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3 个政治语词，与前面的 7 个语词组成 10 个语词分析样本进行分析，观察这些政治话语与“南泥湾精神”之间的联系，以及权力是如何借此在不同时段内重新建构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的。

结合上述语词分布的频数分析，本文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建立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为基本研究框架<sup>[5]</sup>，对《人民日报》文本的政治话语分析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话语对象与话语主体；②话语主题及其逻辑；③话语阐述模式；④社会影响。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鉴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反映现实与实际情

况之间的差距，研究者也必须结合其他史料的梳理及个案分析，对基于《人民日报》的数据所得出的结果进行解释，进而尝试观察和描述这一社会记忆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 1 “人定胜天”：1960~1966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记忆话语分析

在《人民日报》上，有关南泥湾和大生产运动的文章发表的首个高峰期出现在1960~1966年。这7年里，有关南泥湾和大生产运动的文章总篇数为161篇，平均一年23篇，最低值为16篇（1963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的1951年到1959年，是平均数最低的阶段，1951、1952、1953年均均为0篇，此后的1954年为1篇，1955年为7篇，1956年为4篇，1957、1958年分别只有2篇，1959年，总数仅有5篇，这几年的总数为24篇，平均一年低于3篇。

1960年，有关“南泥湾”的文章数量猛然上升到39篇，其中，新华社多次刊发了全国各地城乡利用空闲土地大种瓜菜的通讯、消息及图片，号召各地发扬南泥湾垦荒精神，促进生产发展<sup>[6]</sup>。《人民日报》的“革命文物”等多个栏目也给予了积极配合，反复强调发扬南泥湾革命传统的重要性，通过对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题字、南泥湾的锄头镢头、桦皮信、八路军钢笔等象征艰苦奋斗的革命文物的历史回溯，吟咏这段历史<sup>[7]</sup>。一些干部专门撰文，歌颂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并呼吁“迅速行动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扬延安时代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在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贡献出更大的力量。”<sup>[8]</sup>

对关键词的查询能够比较明确地说明媒体在某个时段内大量刊发某一类主题报道的意图。在《人民日报》1960~1966年有关南泥湾的161篇报道中，上述话语语词的样本分布频率如图6-2所示。

数据显示，上述话语语词在此一阶段的出现频率如图6-3所示。

数据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所有报道共提及毛泽东本人达889次，平均每一篇有关南泥湾的报道要提及毛5.5次，但提及“党中央”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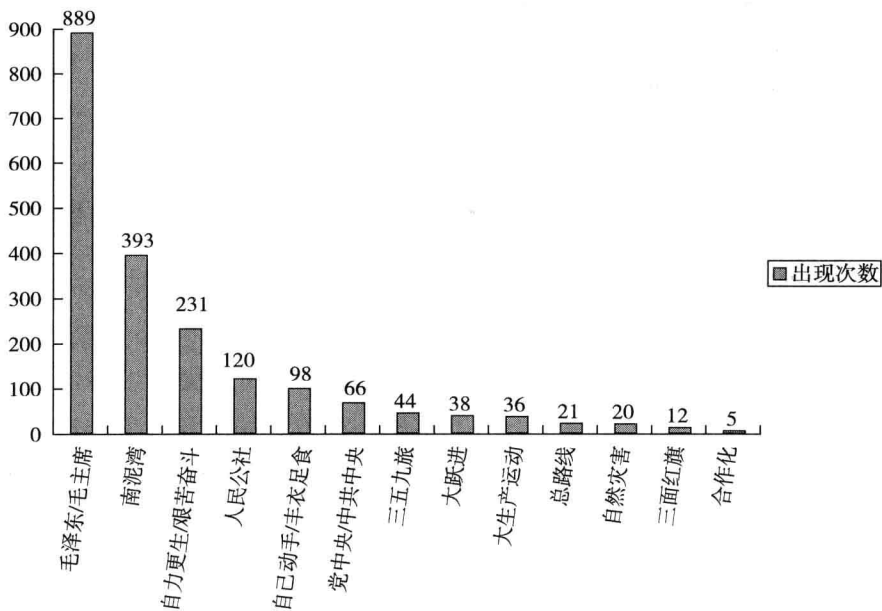


图 6-2 1960~1966 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总量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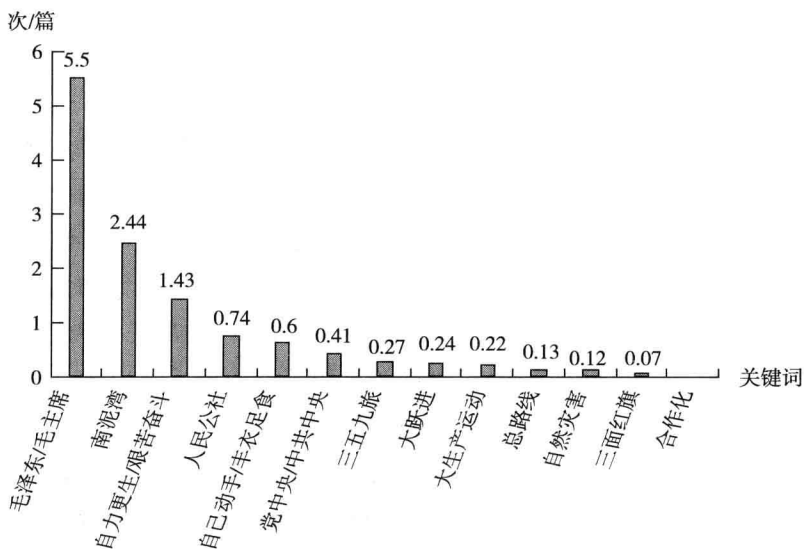


图 6-3 1960~1966 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频率统计

“中共中央”的则共为 60 次，平均每篇为 0.37 次。另外，由“毛泽东”和“毛主席”两词的出现频率比较可知，后者是前者的 2.4 倍。

如果在样本框内选择其他中共中央的领袖干部作为关键词进行比较，还能够进一步探讨这些报道的意图所在。例如，如果将大生产运动中尤其是对南泥湾垦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朱德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与毛泽东进行比较，框定“朱德”和“朱总司令”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结果共计仅为6处，有关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键词“刘少奇”、“刘主席”的合计结果仅9处，这可以旁证此前分析得出的结论，即对南泥湾记忆的唤起，目的并非还原历史事实，而是为了歌颂唯一的中央领袖毛泽东。数据显示出，这一阶段对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的唤起和刻写，首要目的意在证明领袖毛泽东的政策正确无误，并进一步突出其政治权威：

只要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胜利永远属于不怕困难的人们<sup>[9]</sup>。

在战争的年代里，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今天，我们依靠自己的两只手和物质技术基础，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也一定可以高速度地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sup>[10]</sup>。

在关于南泥湾的文章中，毛泽东被看作是大生产运动成就和“南泥湾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和推动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著作，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行动，在《人民日报》的话语逻辑中，不仅被看作是陕甘宁边区渡过困难的主要动因，也被视为是解决新中国现实困难的有效武器：

毛主席当年为部队大生产运动所题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照亮了我国革命艰辛而光辉的历程，鼓舞人们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低头，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地去夺取胜利。……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将来大步奔向共产主义胜利的一个法宝<sup>[11]</sup>！

从此，南泥湾精神便成为革命的传家宝<sup>[12]</sup>。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年来在建设边疆中创造的伟大成绩，是毛泽

东思想的胜利，是南泥湾精神的胜利<sup>[13]</sup>。

在这一阶段，按照研究设计，笔者根据文本细读进行判断抽样，选择了6个最为流行的时事政治话语语词进行频数分析。它们分别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自然灾害”、“三面红旗”和“合作化”，经过频数分析可知，与“南泥湾精神”最为相关的3个流行时事政治话语依次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

“人民公社”一词在这7年的所有文章中出現共达120处，平均每篇文章出现0.74次；这显示，对南泥湾精神和大生产运动的记忆唤起，是为了肯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以“人民公社”为首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的正确路线：

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把荒地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王国藩合作社，以其“从山上取来”的革命精神，踏实苦干，终于使自己的“穷棒子社”改变了穷困面貌；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无数事例，像白手起家办工厂，弄堂小厂出尖端，七天革个命实现全部机械化，淮北赶江南，一根竹筒兴水利等等，不都证明了毛主席论述的完全正确吗<sup>[14]</sup>？

虽然这些文章中只字不提当时的经济形势，但众所周知，1959年之后的这个阶段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粮食危机，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对此，《人民日报》上并非完全没有反映——查询可知，在关于发扬“南泥湾精神”的这些报道中，“自然灾害”一词出现共20处，而“饥荒”一词出现则为0。

但上述报道距离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众所周知，这场由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将国家经济推入濒临崩溃的境地。作为国家话语的代表，《人民日报》必须代表权力进行言说，但其目的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借由叙述和解释安抚民众，保证政权的稳定。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这一切都是权力经过精心计算的结果，《人民日报》每一篇发表的文章，都处于一个被精心建构和熟练运用的话语规则系统之内。



###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统计资料显示，在1958年前，中国的农业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粮食产量持续提高。195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63.9万吨，而1956和1957年，这个数字分别达到了192.7万吨和195.1万吨<sup>[15]</sup>。执政党所描绘的物质极大丰富、政治清明祥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就要到来。

但是，由于大跃进的发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都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最大的悲剧在于，这种破坏虽然如此明显，但如同阿伦特所言：“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sup>[16]</sup>

对此，邓小平后来直言不讳地承认：“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sup>[17]</sup>

今天来看，当时媒体上的乐观情绪几乎可以说是荒诞的：“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sup>[18]</sup>

在执政党所描绘的天堂愿景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面前，一直迷狂于人民公社神话的民众开始反思和质疑。陕西户县城关公社农民党员杨伟名有感于当时的惨状，于1962年在万言书《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中写道：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sup>[19]</sup>

经济危机直接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稳定，而动摇的标志之一，是刑事

案件的大幅度增加。根据杨继绳研究的资料，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 21 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 1960 年和 1961 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可以看到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饥荒而致。例如，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

1959 ~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 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 492 件，占总案数的 55.8%。

更为严重的是大饥荒所造成的大批人口死亡。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死亡总数是 2158 万人<sup>[20]</sup>；上海大学金辉在其论文《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认为这个数字是 2791 万<sup>[21]</sup>；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学者曹树基提出，1959 ~ 1961 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 3250 万<sup>[22]</sup>；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对这个数字的估算要更高一些，他认为，从 1958 年到 1962 年，中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不低于 3600 万。国外对此进行专项研究的美国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有关材料研究后，估算我国 1958 ~ 1963 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2700 万<sup>[23]</sup>。

对大饥荒期间死亡具体数据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但学者们所达成的一致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大饥荒导致了超过两千万人的死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同时，今天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部分中国地区风调雨顺，在气候上是极为适宜生产的年份<sup>[24]</sup>。因此，说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当属准确而公正的结论。

“1959 ~ 1961 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劳累过度 and 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地区蔓延。”<sup>[25]</sup>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的合法性长期一直奠定在两个关键词，即“翻身”和“解放”的基础之上，对此，袁光锋在对雷锋“神话”的研究中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一个是历史的记忆，即中国共产党解

放了中国，使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二个便是‘敌—我’的对立，包括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以及国内人民与反动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宣称自己负有解放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进而解放全世界的重任；第三个便是对于物质生活的承诺。它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记忆。它宣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过西方，过上富裕的共产主义生活。这三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自身执政合法性。”<sup>[26]</sup>当发现虽然被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被解放出来，却又陷入到无休止的苦役——尽管这种苦役被冠以“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堂皇称谓——之中，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温饱的起码要求，目睹亲人因饥饿而死去时，民众感到“消极、反感和失望”，甚至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sup>[27]</sup>，对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因如此，重提南泥湾的辉煌以及毛泽东当时的讲话——“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就成为必要的激励手段。执政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向它的民众宣告说，只要对党的正确路线坚信不疑，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完成革命任务。

纵观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上有关南泥湾的新闻报道、图片、诗歌等多个形式的文本，主要呈现为社论型、回忆型和呼应型三个类型：社论型的文本旨在宣示中央精神，传递权力意志；回忆型的文本通过“现身说法”，在大生产运动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之间建立推论，以证实现行政策的正确，呼应型的文本呈现民众一呼百应的乐观局面，通过基层的拥护证明权力的政治合法性。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则见于图6-4，以呼应型文本为主。

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国家意志通过政治动员和组织传播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呈现为金字塔形的结构：“领袖是中心点，第一个浪潮由他而起，接着是另一个同心浪潮，就像地震一样，将同样的观点传播的越来越远。显然，直接和间接这两种传播形式使同心圈日渐扩大，使他们将领袖发出的催眠波传播得更远。因此，中下层的领导人延续了集体暗示工作。”<sup>[28]</sup>

必须指出，无论是哪种类型，其言说的背后都是权力意志控制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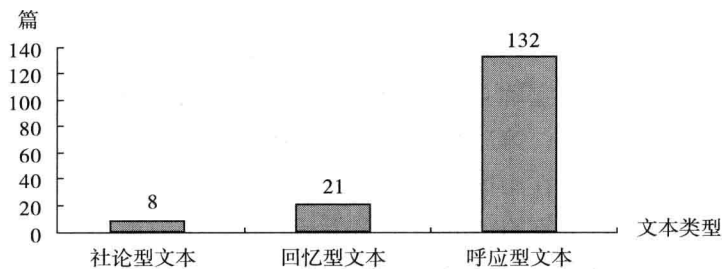


图 6-4 1960~1966 年三种文本类型比例示意图

社论型的文本首先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与执政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并鼓励民众发扬革命精神：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完成现阶段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而奋斗<sup>[29]</sup>。

国营农场在这些方面树立了榜样，创造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就会更充分地发挥对人民公社的典型示范作用，更有力地配合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建设早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斗争，促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的新高涨，使建设早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工作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他们继承了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党政军民生产自给的优良传统，继承了南泥湾军垦的优良作风。在国营农场创建的时期，需要人们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在今后国营农场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人们发扬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sup>[30]</sup>。

在回忆型的文本中，亲历者的现身说法颇为多见，在《我有一件灰布军衣……》中，曾经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军人首先以自己珍藏的旧军衣作为叙事线索，回忆了大生产运动中党的政策的正确和成功：

党的号召如同春风化雨：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手拿枪，一手拿镢头，

人人都有两件战斗武器。

以亲历者的身份证明这一政策的有效性，格外具有说服力：

秃坡荒岭长出蔬菜、谷米，  
 亲手纺线，亲手梳机，  
 织就土白布千匹万匹，  
 陕北的黄土做染料，  
 巧手操尺剪裁制新衣。  
 灰军衣漂亮、结实又平展，  
 一切是自己劳动创造的。

在诗歌的最后，这位老兵展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认为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国家将迅速走向共产主义：

有了毛泽东思想当武器，  
 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年走完几百载的路，  
 我这件灰军衣还要穿到共产主义；  
 怎能忘掉过去啊，  
 艰苦的过去是推动我前进的力<sup>[31]</sup>！

不断复述故事的目的之一，如丹尼斯·K. 姆贝所言，在于呈现给听者一个代表故事所处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赋予其生命的“生活片段”。通过不断进行的复述活动，故事中的事件被文化成员视为当然而接受。即使故事是编造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因为当故事被复述了相当的次数时，叙述的事件就变成了“真的”<sup>[32]</sup>。而像上述以老战士身份出现的话语主体，虽然实际上是精心挑选和控制的结果，但对受众则难以辨识，他们的出场因为有着亲历身份而更加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

1958年新民歌运动兴起之后，大量同样以亲历者口吻出现的“新民歌”，以昂扬的口气、激越的基调赞颂着“南泥湾精神”，其间，充分表现出民众在激进路线中急于求成、自负、崇上、盲目攀比、从众等社会心理。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上呼应型的文本中极为常见。

诗歌《灾区老农一席话》借一位“宁流血不流泪”的灾区老农的口，首先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谁亲，也亲不过咱们的党！  
毛主席  
是咱知寒知暖的贴心人！

接着强调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像今年这样的大荒年，  
真是百年少见：  
旱，旱得路上尘土脚脖深；  
涝，涝得马路上能撑船！

紧跟着是对旧社会苦难的回忆和控诉：

民国十八年也闹过“年成”，  
可是远比今年轻。  
那会儿，你下乡来，  
走一天也难碰见一个人影！  
能动的，拉起棍子，  
沿途乞讨，下了关东；  
老弱残废，饿死没人埋，  
狗都吃红了眼睛！  
财主家上了大门，  
又用杠子顶！  
看家奴，洋枪推上顶膛火，  
保护财主们  
喝酒吃肉烙油饼！  
穷人家，院里茅草齐腰深，  
锅腔里，野兔铺窝掏窟窿……

对于旧社会苦难的控诉一直是延安时期以来文学中绵延不断的关键主题。对此，杜霞在其对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中分析说：“当苦难的主体叙事在群体中得到呼应和链接，构建起一个善恶截然对立的修辞幻象时，受难的个体也就获得了一种集体意志的支撑。”她指出，诉苦“会有效地激发起个体的情感反应，引发出行动的渴望”<sup>[33]</sup>。

这个手段，在解放区的政治动员中极为有效，其成果也充分显示在文艺作品中。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不仅作为一个阶级，也在肉体上被基本消灭<sup>[34]</sup>。但诉苦的方式却作为今天美好幸福生活的鲜明对比而在文学中留存了下来。在这篇诗歌中，同样也有鲜明的体现：

饮食嘛，  
是营养灶格外做的饭。  
就说这碗粥吧：  
大米可能是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四川，  
这红枣，我清楚：它来自河南省灵宝县。  
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呀，  
一处有灾，八方支援！

文章中反复贯穿了对领袖英明领导的歌颂和无限拥护党的政策的决心，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天下人民是一家呀，  
咱们毛主席可真看得远……  
咱们公社社员  
人心比天高，  
要战胜这大荒年！  
老天爷故意捣蛋，  
设下了重重难关！  
不怕！有党，有毛主席，  
有全国人民六亿七千万！  
扛起三面大红旗，

咱要斩将过关！  
 打开南天门，  
 冲进凌霄殿，  
 叫老天爷磕头作揖，  
 乖乖地听咱使唤……<sup>[35]</sup>

主观精神决定一切的唯一意志心态，在这首诗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叙述是散布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特别有力的工具。”<sup>[36]</sup>在以上几个文本中，无论叙事的主人公是国家宣传机构，还是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老兵，或是翻身后感充满感恩和拥戴之情的老农，让这些身份截然不同的话语主体登上《人民日报》叙述当年的光荣创业史，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国家政权有能力带领民众克服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最终实现其“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承诺。但，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指出的——“他们的姿态是狂热而强烈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sup>[37]</sup>，它无法遮掩民生凋敝的残酷现实，只能依靠话语的一再重复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 （2）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在连续几年的大饥荒面前，寻找一个能够安抚民众的解释是渡过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关键。

执政者沿用了大生产运动时期的政治话语语义转换模式，巧妙地将内因偷换为外因，将因政策失误导致的经济崩溃巧妙地通过含混的转换化作因自然灾害等外因导致的困难，并顺此逻辑推动民众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战胜大自然加诸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这样，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被上升到精神高度。执政者期望，这一政治话语能够让农民将眼前的艰苦生活想象为朝圣道路上的磨炼，在历经困苦之后，他们的一切痛苦都会得到补偿，并最终踏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相应地，如果有人屈从于物质生活的诱惑，则将立刻被视为异端，遭到“无产阶级群众”的群体排斥。这种被排斥的感受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站出来公开宣布自己对于富足生活的向往。

叙述话语的另一主题及逻辑是针对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恶化。



1959年，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因此，在《人民日报》的话语中，对苏联撤援及债务的偿还，也成为解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另一重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则恰好契合这一语境，能够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纵观这个将内因偷换为外因，错误偷换为困难，对错误的纠正偷换为战胜困难的语义转换模式，不难看出，和20年前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之运作模式一脉相承，执政者也同样通过国家动员和组织传播的方式，将此一政治话语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迅速下达到社会基层。

在这一阶段的文本中，最为典型的阐述模式体现如下面这一类自传性叙事：

1942年前后，我们解放区真是困难极了。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大部分兵力集中于解放区战场，对我们实行反复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对我们进行包围和封锁。加以华北地区连年受灾，使我们遇上了要吃缺粮、要穿缺衣的境地。在那样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没有屈服。在前方继续坚持了抗战；在后方响应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sup>[38]</sup>。

通过类比、推理来论证“南泥湾精神”在今天的价值，也是139篇呼应型文本的主要话语阐述模式：

六十六岁的老八路军、共产党员刘保在，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无论是执行党的政策，还是参加生产劳动，他都是人们的模范。在南泥湾，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是他；积极拥护成立人民公社的，是他；首先被选为劳动模范的，也是他。就是这样一些坚强的战士，使南泥湾精神更加放射光芒。

南泥湾人民从三五九旅的手里接受了一件革命的传家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台庄大队开田种稻的事迹，就是证明。……今年，三台庄大队的稻子长得最好。社员们怎能不更加珍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家宝<sup>[39]</sup>？

需要关注的是，对这些建设经验的证明也推及到了其他国家，旨在

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一位日本朋友说：“看了《南泥湾》影片，我这样想：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拉丁美洲两位朋友留言道：“自力更生这种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财富，也是世界上受压迫人民的最大财富。”巴苏陀兰两位朋友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自力更生的方针，是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战士都应该遵循的方针。

一位法国朋友原来觉得改变自然面貌是不可思议的，认为人只得听从自然的摆布。在延安，他看到当地人民在一座座土山上修建了大量梯田，便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延安人民不愧是毛泽东教育下的人民。”马里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马马杜·马戴拉·凯塔站在凤凰山后的一座山顶上，指着眼前的层层梯田说：“这么浩大的工程，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做到。”日本歌声代表团副秘书长齐藤良三说：“我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由于有了毛主席的领导，确实确实地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sup>[40]</sup>

在这个阶段，国家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传播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和“南泥湾精神”。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首先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及其同名影片《东方红》。除此以外，这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的音乐、戏剧和曲艺作品。有关这些作品的介绍和报道、评论，均在《人民日报》中有所体现。

《东方红》创作于建国15周年前夕，是在国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之后为国庆15周年献礼之作。不过，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部普通的文艺创作作品，而是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一位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它的这一特点，将其定义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部创世神话”<sup>[41]</sup>。

《东方红》原本来自上海文艺界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它是上海文艺工作人员受朝鲜大歌舞的启发而为建国15周年创作的8场16景的音乐舞蹈剧。1964年5月23日首演之后，受到中央肯定，同年7月中旬军队系统接到中央指示后开始抽调文工

团，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当时的文件上明确指示：

为了使今年的国庆演出更富有充沛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认为可用原上海演出的三千人规模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进行修改加工，在国庆演出<sup>[42]</sup>。

仅仅3个月，《东方红》就于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成功地集众多红色符号之大成，《南泥湾》、《二月里来》、《东方红》等一批延安时期创作的文艺歌曲都在这一作品中得到极为突出的呈现，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红色旋律。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配以大量图片。在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第四场的介绍中，文本呈现为如下内容：

#### **朗诵：**

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击着日寇的野蛮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却重重封锁解放区，企图饿死我们、困死我们。解放区军民，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依靠自力更生，战胜一切困难，支持长期抗战！

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展开大生产运动。

#### **表演唱《南泥湾》：**

背景出现波浪滔滔的黄河，敌后军民正在奋勇抗战<sup>[43]</sup>。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成为红色文艺创作的不二法则。一部文艺作品由政府总理亲自指挥，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这显示，《东方红》不是一次纯粹的文艺创作，而是执政党创世神话的舞台再现。它以艺术的形式，完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歌颂中国共产党。

《东方红》的创作者之一、著名词作家乔羽在《人民日报》介绍自己的创作心得时说：

又如南泥湾一段，《东方红》中原来就有这个情节，我们却没有想

到这里应该写一段朗诵词。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件是观众都很熟悉的，而且有一首广为流传的、现成的好歌，舞编得也好，无需再写朗诵词了。领导上指出，这里最能表现毛主席关于依靠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坚持长期革命斗争的思想；发扬这一思想，不仅使历史生色，而且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要加写一段朗诵词，使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通过补写这段朗诵词，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作者的思想水平和作品的思想深度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这位词作家深刻地反思说：“在改与不改之间、写与不写之间”，“说明了许多重要的问题。”

通过反复的修改过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对毛泽东思想有一分领会，在艺术创作上便能增长一分本领；有十分领会，便会有十分本领。我们也体会到，必须经过长期地、不间断地学习，通过反复的实践，才有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sup>[44]</sup>。

相比乔羽，陈亚丁、安波等主要编导对于政治思想在这部作品中的作用就体会得更为清晰。他们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记述说：

起草史诗脚本的同志，首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条红线，决定表现什么，突出什么；所有写歌词、朗诵词的同志，都是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从中找到根据，摘下语录，思想明确了以后，才进行写作；所有作曲、编舞的同志，也都是首先从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得到启发，唤起真情实感，产生诗的意境。

大部分演员为了表演得好，也都随时随地挤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排练场地，结合每一场排练，普遍挂起了毛主席语录牌<sup>[45]</sup>。

为了让音乐歌舞剧能够以更加广泛的形式为民众所知，周恩来指示要将其拍成电影。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东方红》正式上映，它对大生产运动的叙述和还原，从此成为社会记忆中的经典片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部电影和其他影片一样被禁止上映，但在1977年再度公映，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革命创业史的记忆。

文艺作品中的符号聚合，也体现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话语载体所发表的其他形式的作品中。通过言说、推理、论证，以及符号聚合等多种多样的陈述形式，国家执政党对大生产记忆及“南泥湾精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话语重构，将新的政策与措施输入其中。

地球是颗红玛瑙，  
我爱怎雕就怎雕，  
按着毛主席的好图样，  
驯服山河建天堂<sup>[46]</sup>。

在刘白羽于1960年访问延安时写作的这篇诗歌体日记里，充满了当时盛行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毛主席的好图样”指代的是毛泽东所倡导的经济建设政策，“驯服山河”指代的是对现实困难的藐视和征服，最终，人民将抵达“天堂”所指代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人民日报》上选摘的只是刘白羽日记的一段，如果对照全文阅读，或许能够更准确地看到这一点：

这时，就像电炬一下照亮了面前的大道，突然，像浮雕一样把我重来延安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刻画出来了。是的，正是在这里，正是在那庄严、艰巨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就一步一步地雕着这一个晶莹、透明、通红、发光的红玛瑙的新世界了。而为了塑造这一个新世界，首先就雕塑了一批又一批能创造新世界的人。他们给共产主义思想阳光照耀后，像血一样鲜红，像火一样明亮，他们的灵魂，像红玛瑙一样坚固、纯洁、闪光。而这一切不正象征着我们整个中国革命、战斗的形象吗<sup>[47]</sup>？

在这篇被视为6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代表作品的散文中，新世界犹如一个“晶莹、透明、通红、发光的红玛瑙”，而其中的群众“给共产主义思想阳光照耀后，像血一样鲜红，像火一样明亮，他们的灵魂，像红玛瑙一样坚固、纯洁、闪光”，是整个中国“革命、战斗”的象征。

但童话般的叙事背后是残酷的现实：1959~1961年，每年因饥荒

而死亡的民众人数都约在 1000 万人左右。这些黑色现实，作家没有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去正视。所有在国家权力话语中出现的表达，所呈现的景象与饿殍遍地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充斥着瑰丽的想象和赞美的辞藻。

这种集体谎言的出现是必然的——在一个断言自身必然“优于一个容许个人‘自私’的利益阻挠公众所追求的目标全部实现的制度”里，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的“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sup>[48]</sup>无论是通过回忆对过往神话进行追述，还是“以名誉、光明和爱国主义为号召”<sup>[49]</sup>，动员民众克服眼前的困难，牺牲生命和幸福，去争取某一政治目标的胜利，目的都是为了在艰苦的现实生活与艰苦奋斗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物质匮乏转移到奋斗和献身的自豪感中，并以人们用巨大代价所得到的成果推断说，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创造出如斯奇迹<sup>[50]</sup>。

###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延安时期从南泥湾三五九旅开始的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对毛乃至整个中共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思路均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时期，这种影响至为剧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充斥着盲目乐观主义的“人定胜天”的政治话语转换。

毛泽东本人在描绘“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的新社会制度的美好愿景时，其参照系除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明显打上了“大生产运动”的烙印——1958年8月中旬，他在决策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



图 6-5 宣传画《人民公社好》系列之《公社食堂强》<sup>[51]</sup>

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sup>[52]</sup> 1958年10月，他在天津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sup>[53]</sup>。此后，这种带有强烈军事化色彩的“共产主义精神”的社会改造运动，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

可以清晰地看出，大生产的记忆对这一阶段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

#### ①军事化编制。

人民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生活在乡村里的每一农民均被编入一个“村民小组”；一定数量的村民小组则编成“生产队”；在“生产队”之上的建制为“大队”，其规模大小约莫相当于今日的行政村；“大队”之上即“人民公社”，相等于镇或乡的规模。这其中，由若干生产小组组成的被称为“生产队”的村民组织，其名称即直接来自毛泽东对三五九旅承担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职能的称许。《人民日报》在推广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经验时则把农民们完全等同于部队的战士——“现在卫星公社一共建立了27个卫星团，87个专业营，有两万多名生产战士……今天的新型农民，已经有组织守纪律的生产战斗部队了。”<sup>[54]</sup>

如周晓虹精准地总结的，公社的社员们过着高度同质化的生活：“他们听同一种广播，唱同一种歌曲，看同一部电影，上同一所学校，最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在食堂里吃同一种饭菜，在提倡‘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初期，晚上甚至还睡在同一张床上！”<sup>[55]</sup> 公社农民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婚丧嫁娶，都受到公社的控制，早晨集体出工，晚上定时集体回家，在极端时期，禹县等地甚至实行男女集体分宿，以保证生产建设进度，这些制度措施，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sup>[56]</sup>。

对比可以看到，这种“准军事组织形式”，正是从南泥湾屯垦的以“生产组”为基本单位的军事化生产模式演化而来：

团首长和旅直属各部门负责同志，也都分别和本部门秘书、警卫人员等编成小组……

有时，炊事员送饭来了，生产组长就给大家在前面指定一个目标

说：“同志们，再加一把油，挖到前面××地就吃饭<sup>[57]</sup>。”

以军事化建制为基础的“生产小组”，因其突出的生产效率，给前来视察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后来毛及其属下构建人民公社的基本单位，也就不足为奇。

对“人民公社”的准军事化组织形式，维克多·尼曾有过颇为精彩的描述：“……公社经由村社组织——民兵、党支部、大队、小队、农会、妇联、共青团等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联系起来。这些组织均非村庄内部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嵌入的，以保证对村庄的控制；人民公社的准军事组织形式依从的是国家权力的逻辑。”<sup>[58]</sup>对照当时宣传者的理解和阐述来看，这一评价可谓精准：

从组织机构来看，它也活像个小小“国家”，比如它有工业部、农业技术部、财经部、文教卫生部、军事保卫部，还有林业部、水利部、饲养部、交通部等等，一共是十几个部，甚至它还有“外交部”和驻外社的“大使”<sup>[59]</sup>。

与苏联的集体农庄相比，人民公社的生产制度，既有其类似之处，如完全否定私人财产权的集体化进程（其实质是以强制和半强制方式完全剥夺私人财产，并伴随着对稍有抗拒者的残酷打击）、计划经济的基本生产制度（其实质是对作为人的生存权的绝对控制）及集体化劳作生活（其实质是国家全方位控制民众个体的生活）的生产方式，但它又颇具“中国特色”：公社之名，脱胎于“巴黎公社”，本身就是战时状态的产物，将其作为乡村日常劳作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因名定物，让这个几千年来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从未出现的单位组织，带上了浓厚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

奥威尔曾经在《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个权力将所有民众置身于完全、彻底的监视之下，让他们完全失去自由与思想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不存在个人的秘密，群众性活动填满了所有人的生活，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没有人能够逃脱他人监视的目光。“电幕”、思想警察、亲人间的相互监视，即使是夫妻与母子之间都不敢表露一丝异见与质疑<sup>[60]</sup>。



集体化对于乡村民众的心灵重构过程让人联想到奥威尔笔下的这个“大洋国”——1960年代的中国乡村虽然没有“电幕”，却有着无所不在的高音喇叭，高高地竖立在村落的中心；集体活动几乎充填了农民所有的空间与时间，在生产的高潮中农民甚至连睡眠和进食都受到集体化、军事化的管理。例如，徐水县在1957年到1958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明确提出，“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将全县13万劳动力统一按青、壮、老、妇、幼分别编为若干“战斗团”、“战斗营”、“战斗连队”、下设“战斗排”，根据需要随时调配劳动力，为了解决劳动协作中的吃饭问题，还大办“野外战斗随营食堂”，连幼儿也统一安排进入“幼儿食堂”<sup>[61]</sup>。此后又实现了彻底军事化，全县编为93个团，417个营，1409个连，3265个排，不同的群体分别被冠以“阵前尖刀连”、“妇女突击连”、“老英雄连”和“少年先锋连”的名号，以鼓励民众进行生产<sup>[62]</sup>。此后，这种方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例如，河南全省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生产任务组织“水稻连”、“红薯营”、“钢铁兵团”，完全打乱生产组织，不固定耕作区，哪里有任务就调到哪里完成生产任务<sup>[63]</sup>。

被强行纳入军队体制之下的农民，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整齐划一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产实践的效率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 ②定额制生产。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大生产运动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定额制生产。每一个人，到每个集体，都有事先制定好的、分解细致的生产任务必须完成。这与小农经济时代农民自给自足也相对自主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对比人民公社制度则可以看到，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事先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逐层下达，直到每个生产队和小组，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类生产中，极为重视通过劳动竞赛来动员劳动者，实现“先进带动后进”的目标，其实质是以模范的示范来促进群体成员的效仿。模范所展现出的高水准使得原来那些只满足于完成底线任务的群众感受到被群体蔑视的危险，因此只能依靠更努力的工作免于被边缘化的可能。“对于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来说，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是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运动和在运动中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sup>[64]</sup>。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中一部分

力量的确来自它所带来的荣光，而另外一部分则来自巨大的压力。

### ③统购统销。

无论是在粮食生产还是在稍后发展的公营商业和工业中，三五九旅和其他屯垦部队均实行统购统销的模式。按规定，粮食生产是统一购入工具及种子等生产资料，而生产的粮食则统一归库，自己不留口粮，需要食用的口粮按分配定额领取。农副产品生产所需畜仔、养殖用粮等均造表定额领取，而所生产的副产品亦由上级统一按计划收购。在对当年南泥湾垦荒的老战士 GWS 的访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问：大爷，还有个问题，当时大生产那么多粮食，你们部队自己剩下来多少啊？

答：哎，那不留，不能留。不要说其他什么东西，粮食都不能留。

问：那都送到哪儿去呢？

答：都交给上级，上级就该管。

问：那您自己吃粮食怎么办呢？

答：就是按单位应吃多少给分。

问：那这个粮食是怎么分的？

答：粮食也是，一打下来后，就归库。归库，到吃的时候你去领<sup>[65]</sup>。

在商业生产中，由旅部所属军人合作社统一购入原材料，再分配进行生产和销售，所生产的产品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和销售，这也是当时边区的其他合作社所采用的运作模式。它成为后来毛泽东《论合作社》的实践经验基础，也成为新中国公私合营后公营工商业的发端。在农村，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其间，所有的生产过程由集体支配而非农民个人决定，农民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

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其实质也是对民众生活的全面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公开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但由于不再有选择的自由，因此，所有对创造力的激发，都旨在完成执政者所预期的目标，过程中的牺牲和奉献不再重要，民众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存在——如同哈耶克在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分析中指出的：“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的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

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马克思说过：“斗争就是幸福”。毛主席也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看，革命导师们对幸福是怎样理解的，他们的风格多么高尚；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能够不劳而获，而要通过艰苦的斗争去争取。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同大自然作斗争；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人类能够控制自然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sup>[66]</sup>。

作为陕西省委书记，赵守一于1960年发表的这一讲话，能够很好地说明“南泥湾精神”及其所依托的大生产运动，在1960~1966年间频繁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原因——对光荣创业史的反复铺陈，不是为了证实，而是为了推论；对过去的回忆旨在指点未来，阐明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正如丹尼斯·K. 姆贝引征汤普森所述的：“意识形态，就其试图通过把统治关系宣称为‘合法的’来维护这种关系这一方面而言时，往往采用叙述的形式。故事的讲述为权力掌握者对权力的运用辩护，将这些个体置于既简要概括了过去又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一组故事中。”<sup>[67]</sup>

通过反复叙事，这些话语重构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崭新内涵：只要坚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就能够“人定胜天”，战胜连续自然灾害和苏联撤援的双重困难。而通过歌舞剧等形式，这些政治内涵被牢牢地固化和刻写在民众的记忆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除了毛泽东近乎神一般的无上权威，整个中国社会的现行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大生产运动的相关政治话语，也被彻底湮没在“造反有理”、“砸烂旧世界”的喧嚣声中。

## 2 “到农村去”：1970~1978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记忆话语分析

从本研究观测的数据上可以看到，1970~1978年是“南泥湾精神”宣传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含有“南泥湾”的报道总篇数为234篇，平均每年达到了26篇，最低值为12篇（1974年），其他年份均在20篇以上。从曲线图中可以看到，这也是三个有关南泥湾宣传高峰期中平均值最高的时期。

数据显示，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话语在文革前期的1966年到1969年期间陷入了低潮，而从1970年开始，相关话语的出现频率迅速上升。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1966~1976年的文革可以分为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sup>[68]</sup>。如果从政治权力主体结构来看，前期以造反派夺权干政、老干部下台，现行政治秩序被彻底破坏为典型特征，而从1970年开始，由于政局动荡，经济瘫痪，一度被视为“牛鬼蛇神”并遭到严厉批斗的老干部们逐渐重新掌握了权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sup>[69]</sup>。对照前面所观察到的数据值变化，与这一权力结构的主体变化是相互印证的。

1970年开始，有关“南泥湾”的文章大量出现，在1970年、1972年、1976年达到这阶段的三个高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刊发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道，以及干部进入“五七”干校学习的报道。比较这两者的异同，可以发现，虽然身份有别，但报道的目标，都是通过沿袭大生产运动中“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手段，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1970~1978年有关南泥湾的234篇报道中，笔者除7个基础关键词外，同样选择了6个时事政治话语语词，作为搜索的关键词，进行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事政治话语频数分析。它们分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两个语词因高度同义性而合并统计）、“大寨”、“干校”、“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再教育”。

在《人民日报》这一阶段的文章中，其语词分布依次如图6-6、

图 6-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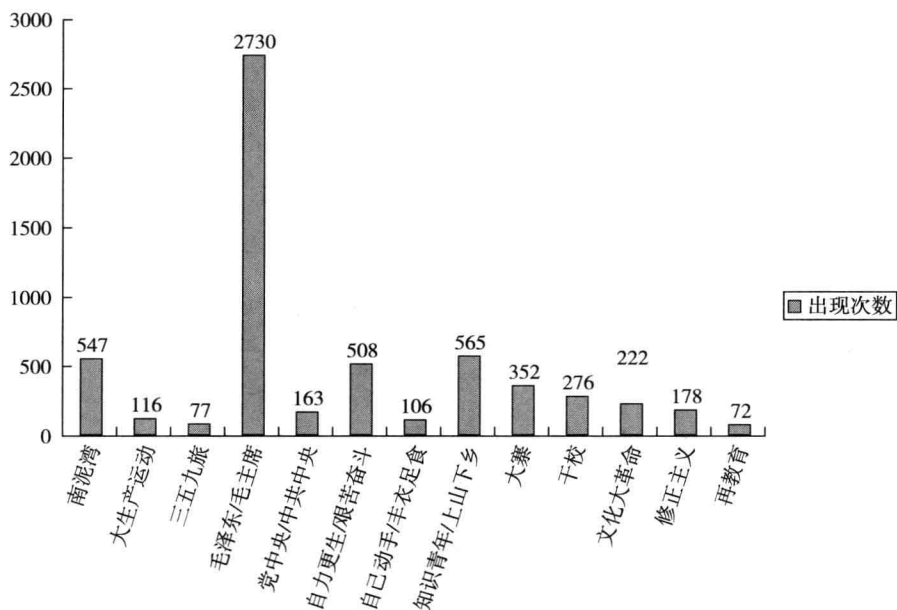


图 6-6 1970~1978 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统计

从数据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所有报道提及毛泽东本人的共达到 2730 处，在每篇含有“南泥湾”的关键词中，平均每篇提到毛 11.2 次，是第一阶段的两倍；“毛主席”一词出现的次数共计 2408 次，而“毛泽东”一词出现次数共 322 次，前者是后者的近 8 倍，显著高于第一阶段的 2.4 倍；此外，在这些语词的前后文中，“伟大领袖”一词出现的频率显著上升，从第一阶段的 13 处上升到 208 处，这显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显著加强了。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现出对斯大林的崇拜从未到达过的更为极端的形式”，甚至到达了“离奇”的程度<sup>[70]</sup>。

如果进一步框定其他中共中央的领袖干部作为关键词进行比较，还能够进一步探讨这些报道的意图所在。例如，“刘少奇”135 处，但刘少奇主席、刘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则为 0；“工贼”34 个；这显示，刘少奇的政治地位遽然下落——提及他的有 135 处，但无一例外均为负面评价，与“工贼”、“修正主义”紧紧相连。朱德一词出现频率虽然显著上升（“朱德”133 次，+“朱总司令”81 次，合计共 214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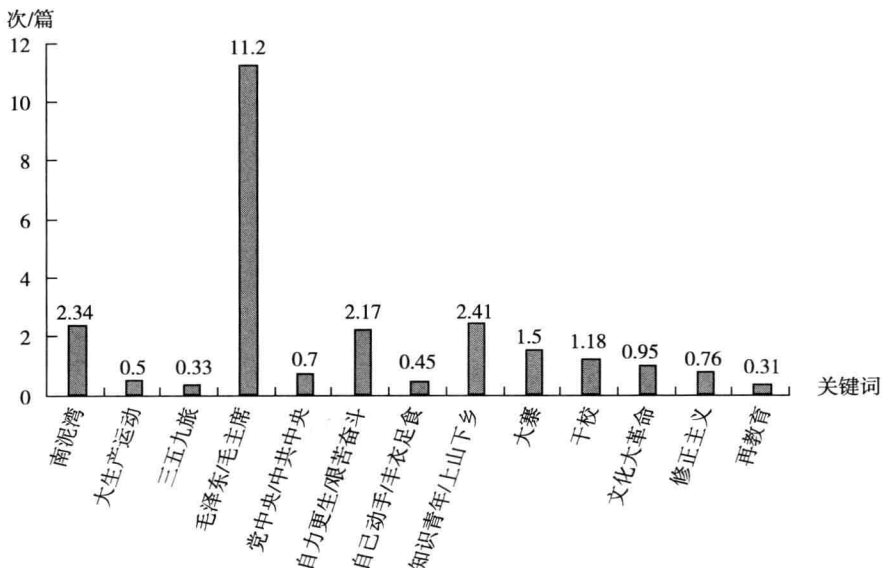


图 6-7 1960~1966 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频率统计

但这 214 个相关语词均出现在 1977 年四人帮集团覆灭之后。即使如此，其前后句段强调的仍然往往是朱德在关键时刻作为战友对毛泽东领导权的支持，由此两点可以看到，直至 1978 年，毛泽东去世之后，其“伟大领袖”的地位仍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未见丝毫动摇。

结合当时流行时事政治话语的分析与数据比较可知，与“南泥湾精神”最为相关的流行时事政治话语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次是“大寨”和“干校”。

这几个政治话语出现的高频度，与当时的时事形势有密切关联。从 1968 年 10 月开始，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下，各地开始大规模兴建“五七干校”，以改造和教育干部。

仅仅两个月后，城市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大生产记忆被频繁唤起和重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话语在各种国家话语中被频繁提及，用以构建和证

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行动的必要性和神圣性，并规范民众的政治行为<sup>[71]</sup>。

### (1) 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在1970~1978年的第二阶段，大生产记忆的话语对象构成主要可分为两类：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按照“五七指示”下乡改造的各级干部。

在这个阶段，《人民日报》上含有“南泥湾”语词的新闻报道、图片、诗歌等多个形式的文本，同样可分为社论型、回忆型和呼应型三个类型，但其比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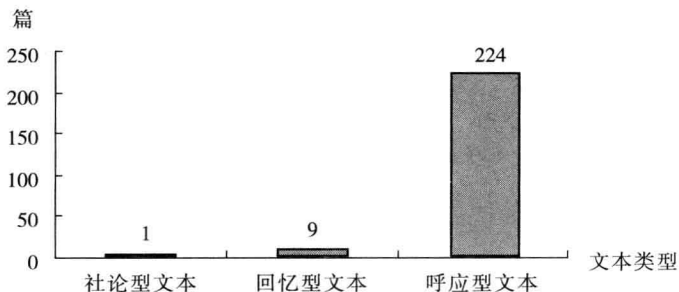


图6-8 1970~1978年三种文本类型比例示意图

从与第一阶段的相应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到，社论型的文本数量下降到原有比例的不足1/3。

在含有“南泥湾”语词的文本中，旨在传递权力意志的社论型文本仅1篇，它的标题是《国营农场要来一个大跃进》：

事实有力地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在农垦战线占主导地位。当年大批转业复员的指战员进军荒原艰苦创业，随后上百万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屯垦戍边，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扬南泥湾精神，积累了办好国营农场的丰富经验，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只有把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彻底弄明白了，革命正气和光荣传统才能大发扬，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把农场整顿一新<sup>[72]</sup>。

从数据曲线可以看到，回忆型的文本数量为9篇，同比也下降至

29%左右，比例明显减少。这部分文本均出现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主要表达对毛泽东的哀思。

呼应型文本数量显著上升，其中，尤其以于校干部身份现身说法的文本居多：

在干校期间，我亲眼看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南泥湾的广大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从贫下中农身上吸取了极其丰富的政治营养。在劳动中，我努力克服怕苦怕累的思想，拜贫下中农为师，认真向他们学习，和贫下中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个老贫农激动地说：“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不把我们穷人当人看，当官的下乡来，不是派粮催款，就是拉伕抓壮丁。今天，毛主席把干部送来同我们一起劳动，亲如骨肉。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啊！”

从干校回到工厂以后，我注意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又象以前一样地亲热起来。工人同志们都说我从干校回来变样了<sup>[73]</sup>。

在农村办干校，有利于学员们密切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认真看书学习，洗刷唯心精神；有利于学员向贫下中农学习，增强群众观点；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市领导和办校人员及学员一起，重新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回顾了两条干部教育路线斗争的历史，使大家认识到：干校坚持办在农村，有利于干部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搬回城市，容易走“三脱离”的回头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从领导力量、办校人员、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充实和加强，和干校负责同志一起，讨论制定了建校规划，自己动手建设干校，为坚持在农村办干校创造了物质条件<sup>[74]</sup>。

南泥湾“五·七”干校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为了捍卫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干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教导，不断批判刘少奇、林彪干扰破坏毛主席干部教育路线的罪行，肃清“关门读书”、“闭门修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修正主义黑货的流毒。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反



复批判林彪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孔孟之道，批判他恶毒攻击干部进“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的谬论。通过学习和批判，广大学员和工作人员划清了两条干部教育路线的界限，坚定了办好“五·七”干校的决心，把读书、劳动、插队锻炼三者结合起来，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从事群众工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发扬南泥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建窑洞，造稻田，办工业，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从一九七一年起，这个干校粮食生产连续三年跨《纲要》。通过劳动锻炼，学员们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sup>[75]</sup>。

另一类则是体现知识青年在农村改造的感受。与前面一类类似的是，它们也同样重视以亲身经历来证明国家政策的正确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完全走对了。这是一条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一条洒满了阳光的革命大道。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人，用自己的革命实践，粉碎了林彪一类骗子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无耻谰言<sup>[76]</sup>。

一些记者采写的报道，也着重强调了知识青年下乡和干部下放之后受到触动，积极加入到革命生产中，使得当地的生产形势蒸蒸日上的乐观局面。

最近，我们访问了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如当年的大生产运动那样，充分调动了这两个地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蓬勃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正在迅速改变。从延河两岸到毛乌素沙漠南缘，从“三边”到黄河滩，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山修梯田沟打坝、垒石造田水拉沙”的壮丽图景。仅两个多月，这两个地区就新修水浇地、坝地、水平梯田、水平埝地达七十六万多亩，有六个县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九七二年度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sup>[77]</sup>。

在这一阶段含有“南泥湾”语词的文本中，毛泽东被看作是挽救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救星：

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亮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有的老干部，过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吃过小米扛过枪，住过窑洞开过荒”。进城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反党阴谋家杨尚昆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不抓纲不问线，舒舒服服跟着变”。在“五·七”道路上，他们总结了自己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焕发了革命的朝气，在生产劳动中，“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心里热呼呼，想着毛主席”。不少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又象回到了南泥湾。

有的“三门干部”和知识青年，过去受“读书做官论”的影响，以安逸享受为乐，以成名成家为荣。通过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现在以苦为乐，以劳动为荣。原先看不起贫下中农，现在放下官架子，甘当贫下中农的小学生。从前嫌大粪臭，今天把大粪当“黄金”。以往吃着大米白面不觉得香，如今懂得一粒稻谷来之不易，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感情。

犯错误的干部，经过审查批判和劳动锻炼，大部分有了觉悟，得到了解放。他们深感毛主席挽救了自己，决心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上，“步步紧跟毛主席，千难万险志不移”<sup>[78]</sup>。

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老贫农含着幸福的热泪给指战员们讲述当年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毛主席亲自视察南泥湾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讲述当年三五九旅指战员一把镢头、一支枪，一边生产，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生动事迹。七连指战员们和三台庄的贫下中农回忆了连队紧跟毛主席的光荣历史，一遍又一遍学习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给延安各界的复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表示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胜利前进<sup>[79]</sup>。

社论的减少和呼应型的文本增加数据显示出，在这个时期，尽管有关南泥湾的文本数量平均值最高，但《人民日报》更重视的是通过发表基层民众对现行政策的呼应，来展现执政党强大的群众基础及伟大领袖号召的伟大效力。对比，勒庞曾经分析说，断言、重复和传染，是群体中的领袖进行说服和动员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sup>[80]</sup>。通过大众

媒体发布大量重复性的文本，反复阐释民众在领会领袖伟大思想过程中所得到的启示和因而激发产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巨大动力，正是利用这三种手段来强化民众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表现。不过，如同伯恩斯坦指出的，这些报道很可能只反映了“表扬的目的而不是下乡知青们的实际态度”<sup>[81]</sup>。

## （2）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从1968年7月开始，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对于知识分子“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政治运动由此发端。

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何会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记忆作为话语重新建构的主题？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从今天披露的史料追溯，上山下乡运动并不仅仅是涉及知识青年群体，其最早开始的时间也并非60年代，而是从50年代即已开始。不过，最初这一运动体现为小规模试点，首先以提倡农村高小学生原地安置务农的形式进行。此后，由于城市就业形势日益紧张，下乡务农的范围又扩展到城市里毕业后无法安置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目的是为了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作为一项响应“最高指示”的政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近20万名城市青年下到农村，加入了垦荒的行列。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希望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拔苗助长的结果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此后，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就业岗位则没有明显增加，粮食供应、劳动就业的矛盾日益凸显。

1962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



图 6-9 宣传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sup>[82]</sup>

场。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 1000 元，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大大增加。到 1963 年 5 月底，原本计划安排到农场的 33 万人，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这个数字让邓小平意识到，原定计划安置 100 万人的计划，如果按原有政策到农场安置，国家财政将要付出 10 亿元的代价，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64 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1965 年中央办公厅又发布了相关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1968 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持续性的震荡和混乱使得富有政治经验的领导人也感到棘手。到 1968 年暑期，大学仍然停止招生，工厂也同样停止招工，1966、1967、1968 三届高中毕业生 400 多万人无所事事，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遂成为一场席卷全国、影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的、20余年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

就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到高潮时期的1968年，毛泽东同时发动了另外一次将人口从城市向乡村迁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办“五七”干校，将精简下来的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部分干部直接落户到了农村。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

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

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加上了编者按并在编者按中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sup>[83]</sup>。

在职干部的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表面看来是使干部不脱离劳动人民，保持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这一政策首先是为了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

回顾当时的历史可以看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

“斗、批、改”的阶段。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各地“革委会”，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人物纷纷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按照《人民日报》的观点，这次“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到1969年中，仅国务院下放的行政人员就达到21万人。此外，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性的战备动员工作随即展开，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

如此数量巨大的、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人心浮动势不可免，当局心知肚明的是，要大规模下放如此之多且洋洋自得于自身无政府主义行动威力的“红卫兵”群体，此举很有可能使“文革”中本已极度动荡不安的政局发生更剧烈的变化。因此，调动社会记忆中的政治资源以证明此举的正确性、合理性、重要性，引导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就成为执政党必须采取的行动。

《人民日报》的检索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在大生产运动数十年后，当政府需要树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的典型时，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故事的回溯再次出现：国家文件、会议报告及媒体报道上均出现了大量通过对南泥湾光荣历史的追忆来阐释“上山下乡”运动意义的文本。这些文本在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中诸多错讹，但如同柯文所言：“神话化的过去不需要太准确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它要有效地说服或调动现在的民众，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sup>[84]</sup>，显而易见，这些历史事实的追溯，不是为了确证，而是为了说服和动员。

用“南泥湾精神”来教育知识青年和“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一系列行动接续了“大生产运动”以来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传统，也同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通过下放进行生产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一脉相承。

一位进入“五七”干校的干部在思想汇报中写道：

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弄得不好，还会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同群众对立的官老爷，甚至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多么危险啊<sup>[85]</sup>！

在当时，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同时进行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习气、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走资派”脱胎换骨，回到劳动人民中的必由之路：“劳动的汗水冲刷了他们头脑中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意识”<sup>[86]</sup>，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

为了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让干部思想稳定，国家话语在这一时期，对大生产运动的记忆更多地体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现实运用。文化大革命前期，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生产秩序都受到了猛烈冲击和破坏，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立刻开始整顿生产秩序，工业上树立了大庆为榜样，农业上则提倡“农业学大寨”：

一九六八年到延安市南泥湾公社马坊大队插队落户的女知识青年张秀清，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以当年革命老前辈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带头学好革命理论，带领群众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十八万斤，比前三年平均总产量翻了一番，每人平均向国家贡献粮食六百斤<sup>[87]</sup>。

在这阶段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数据从第一阶段的0.61次/篇下降到了0.45次/篇，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出现频率则从第一阶段的1.43次/篇上升到了2.17次/篇。这说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更多地取代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的代表“南泥湾精神”已经从经济方面的政策升华为执政党政治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鼓励群众不怕牺牲，自我奉献，依靠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力来完成政府所号召的艰巨、光荣和伟大的任务，“个人无需也不应该指望来自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方面的父权主义的保护和帮助。”<sup>[88]</sup>

在这个阶段，国家权力依然沿袭以往有效的动员方式，通过言说、推理、论证等多种方式以重新唤起“南泥湾精神”，并进行政治话语的重构，其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①首先论述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精神的心得体会，展示自己在得到了这种体会之后所获得的巨大力量，并把这种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并举出种种事例说明这种教导的

无上威力。

比如，1970~1978年高峰期的文本中，最为典型的阐述模式体现如下面这一类呼应性叙事：

“学大寨，赶大寨，路线不正学不开。”这是陕北人民的深切体会。目前这里出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形势，正是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结果。……在当年大生产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延安县，今天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在这个县，到处是冒严寒，战风雪，修水库、开渠道、平整土地的人群，每个公社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在陕北，不论是在劈山引水工地指挥部的草棚里，还是在不畏风雪严寒的劳动群众行列中，我们都遇见了许多县社的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学习和劳动。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培育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了发扬<sup>[89]</sup>。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所创作的诗歌《理想之歌》也是这一类旨在表达服从国家政策，知识青年坚决与工农结合的决心的诗歌。

### 理想之歌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欢迎你们呵！  
突击队的新战友，  
欢迎你们呵！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只有与工农相结合，  
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主席  
发出了进军号令！  
百川归海呵  
万马奔腾，  
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  
一列长龙，  
接待站前，  
同学少年  
待命出征<sup>[90]</sup>！

在这里，“报春的群雁”指代着肩负革命重任的知识青年，而“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决心书下，签名排成一列长龙”的描述，则体现出民众对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无限崇拜与服从。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向民众提供“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说法”<sup>[91]</sup>，以使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时刻被抛离人群的恐惧感所淹没的每一个体，都紧迫地、毫不怀疑地深信，只有同样排进这条长龙，才能获得哪怕是暂时的安全。

细读这些文本可以注意到，与第一阶段回忆型文本重在通过类比和推理对“南泥湾精神”的现实价值进行论证不同，这一阶段的文本的话语阐述模式，更多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及其成就不证自明的伟大意义，并表达出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即所谓“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因此，在话语中体现为呼应型文本的大量运用。

②“满怀热情—被泼冷水—思想动摇—老农谈心—大踏步进步”的话语模式。

这在一些现身说法的故事中极为常见：

我是一九六八年从延安市第四中学毕业，到南泥湾公社马坊大队插队落户的。七年来，在扎根农村的斗争中，我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地比较自觉的思想转变过程。

开始，我是怀着听毛主席的话这个朴素的阶级感情到农村来的。由于从小生活在城市，对于艰苦的劳动很不适应。遇到困难时，曾经感到农村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暗暗盼着早日离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我和其他同学思想上有波动，就把我们领到“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前，向我们讲述当年革命战士在南泥湾艰苦奋斗的情景，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南泥湾的新一代，希望你们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的革命精神，建设好南泥湾。”

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使我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我下定决心，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再苦再累不动摇，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认真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sup>[92]</sup>。

在这些故事中，“艰苦的劳动”时常语焉不详，很显然，其出现的目的并非为了展现农村艰苦生活的真实，而是为了通过“动摇—坚定”、“落后—先进”的新旧态度对比，通过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在与老农谈心后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对比，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政策的无限正确与伟大，并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鲜明对照，以贬斥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强调农民运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了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思想的明显效果，其目的是塑造毛泽东先知般的身份，强化毛泽东思想有如神启般的威力，巩固毛泽东的个人权威<sup>[93]</sup>。通过这种反复进行的思想改造，权力要求人们放弃原有的价值判断和思考，而自觉地服从于权威意志的需要。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依赖和服从，旨在培育民众忠诚驯服的政治人格。

饶具意味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很多对日本、柬埔寨、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地进行“大生产运动”，或通过外国友人参观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的成果而得到启发的报道，以证明中国经验的先进性和普适性。例如，在一篇有关日本参观者参观延安五七干校的报道中，记者摘录其感想写道：

在我们访问延安的过程中，曾经到过位于延安东南六十公里的南泥湾，参观了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五·七干校”。也得到机会同在南泥湾人民公社“插队”的北京中学毕业生交谈。……驻在南泥湾的八路军战士，英勇奋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克服了各种困难，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所需要的一切，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榜样。现在怎样继承和发扬这种“南泥湾精神”，是在那里“插队”的青年们和“五·七干校”学员的重要课题之一<sup>[94]</sup>。

宇文所安曾在论及权力的执掌者如何彰显他们认为重要的传统时说，他们总是“用大声强调真实可信来使得它真实可信”<sup>[95]</sup>。的确如此——对大生产运动及其核心“南泥湾精神”的反复宣传强调，在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无论它们的叙事主体是谁，这些核心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叙事总体上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通过老革命对当年革命传统及其业绩的回忆，证明这些来自毛泽东的历史经验的超验神力；二是通过对少数人后悔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坚定行动和坚定不移的先进的对比，证明毛的正确，从而展示其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阐述合法性。

这些话语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由于庞大的失业人群和生产停顿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与对政府的频繁冲击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悬挂在权力之上的两柄利剑。在“造反派”频繁的政治运动迷狂之中，怀疑情绪正潜滋暗长。权力对大生产记忆的调动，一方面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一系列政治口号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对红色记忆的唤起和重构，其实质是对干部和知识青年进行劳动及思想的双重改造，利用舆论压力消灭广泛存在于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质疑情绪，促使他们表达对执政党的忠诚和信仰，建构社会认同。

### (3) 话语的社会影响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sup>[96]</sup>而“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sup>[97]</sup>尽管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基于把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结合的思路，为“老三届”大批毕业生寻找就业出路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但从社会的稳定角度考虑，掌权者必须赋予它以宗教般的神圣使命色彩，才能够为这一完全打乱了现有社会秩序的政治行动建立道德权威，找到政治合法性根源。

“再教育”理论的提出，把知识青年和“五七”干部的“上山下乡”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敌人的猛烈攻击和批判，使其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政治色彩，这恰恰验证了别尔嘉耶夫的观察——“当这个敌人现实地已不再存在，人们就把它杜撰出来，人们靠关于敌人的神话为生，并扶持这样的神话。善依赖于恶，革命依赖于反动。”<sup>[98]</sup>而与“南泥湾精神”及大生产记忆的结合，则使其从历史源流上具备了合法性——它使知识分子相信这一行动是必要的、神圣的，也是符合红色革命传统的，因此也就实现了对“上山下乡”这一政治命令的服从。

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照50年代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政治口号可以看到，60年代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其性质发生了巨变。

“再教育”思想的提出与毛泽东一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密切相关。他认为建国后教育部门走的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所培养的也是一批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因此，毛泽东将阶级斗争作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脱胎换骨，完成“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改造过程。这恰恰如福柯所说“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sup>[99]</sup>

“上山下乡运动”把数十万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干部精英抛出他们的家园，彻底否定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使其被迫卷入“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所依归的情势之下，如果不能和这股风浪主动地融为一体，就可能溺毙其中。于是，“失根”的人们不得不依

附在运动“虚构的一致性”中<sup>[100]</sup>，始终保持忠诚追随的姿态，才能得以苟全。

“上山下乡运动”及其“到农村去”的政治话语，对于知识青年和干部群体无疑是一次思想改造和重构的过程，它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知识青年而言，这一代人丧失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最好时机，而对进入“五七”干校的国家干部来说，在干校的“思想洗礼”使得他们更加怖于怀疑，怯于反思，屈从于威权。

### 3 “艰苦奋斗”：1989年6月~1996年的《人民日报》大生产记忆话语分析

1978年文革结束，对于南泥湾的宣传戛然而止。直到1989年之后，“南泥湾精神”所蕴含的搞好军民关系、干群关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因为特殊的政治需要，再次凸显出重大价值而第三次达到宣传高峰。

人民日报稿件检索的结果显示，“南泥湾精神”及大生产运动宣传的第三个高峰期为1989年6月至1996年，这期间相关稿件总篇数为170篇，平均每年达到了21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1984年到1988年期间，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攻坚阶段，5年里“南泥湾”的相关文章总共仅有47篇，在1989年1~5月间更低至只有两篇，而在1989年的后7个月中，共出现了12篇有关“南泥湾精神”的文章，频率显著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了关于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的重点报道及王震的署名文章<sup>[101]</sup>。

这显示，“南泥湾精神”在国家政治话语中被重新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1989年6月~1996年有关南泥湾的170篇报道中，除前述选定的7个基础关键词外，笔者同样通过判断抽样选择了6个时事政治话语词作为搜索的关键词，进行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事政治话语频数分析。它们分别是：“改革开放”、“邓小平”、“稳定”、“王震”、“社会主义”、“延安精神”，通过如表6-10所示的频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排

在前面的3个时事政治语词分别是“王震”、“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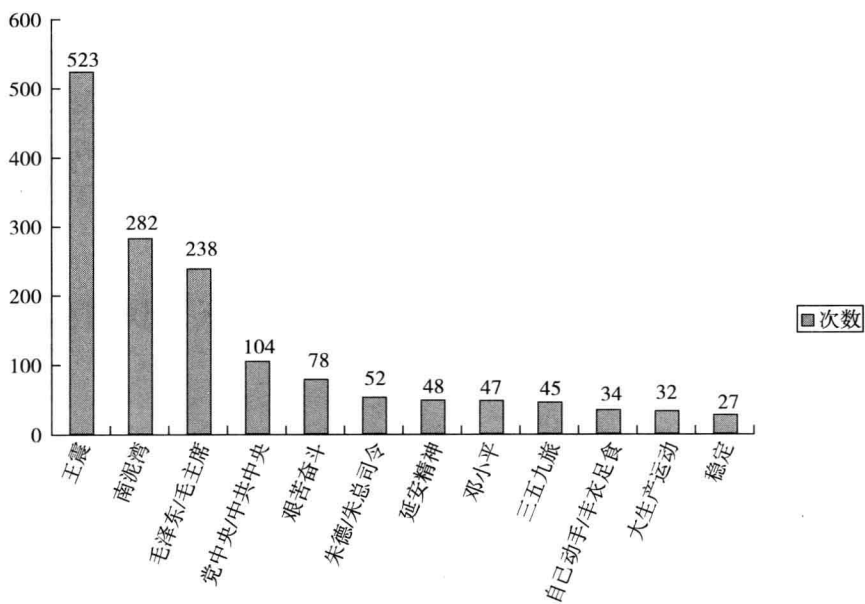


图6-10 1989年6月~1996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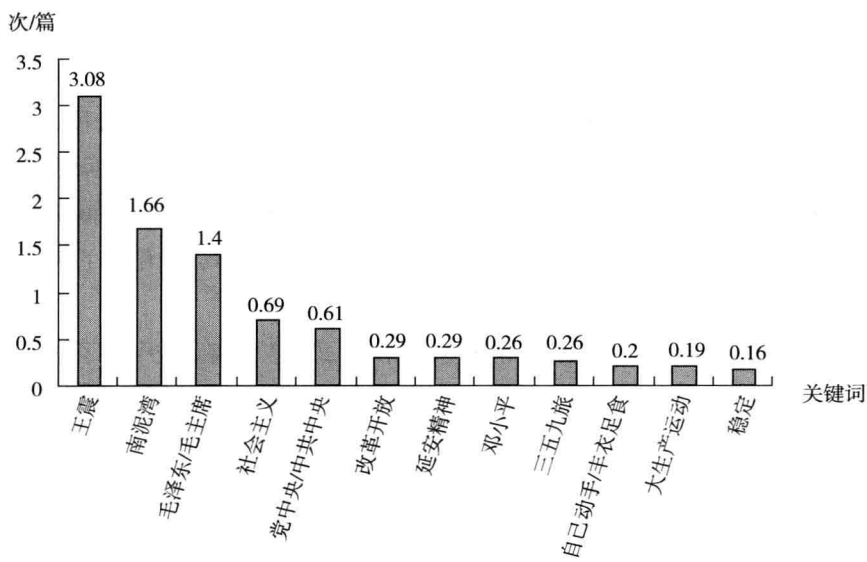


图6-11 1989年6月~1996年《人民日报》南泥湾相关报道关键词频率统计

对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南泥湾精神”的宣传高峰期，从图6-1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频度明显下降，仅为第二阶段的8.7%，也明显低于第一阶段，为第一阶段的37.8%，而“南泥湾”一词出现的频度首次超过了毛泽东个人；在“党中央/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毛主席”一词的频度对比上，在第一个高峰期，“党中央/中共中央”的出现频率仅为0.27，不足“毛泽东/毛主席”一词出现频率的5%；而在第二个高峰期，“党中央/中共中央”一词是“毛泽东/毛主席”一词出现频率的6%；可以看到，虽然在第三阶段的文本中“党中央/中共中央”一词并未超过“毛泽东/毛主席”一词的出现频率，但已经明显接近了。这一组数据的变化说明，领袖崇拜在对南泥湾及大生产运动宣传中的重要性有明显下降。此外，必须注意到，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的相关语词分布，系因其去世而导致悼念文章大幅度出现，因而“王震”一词的出现频率在同比中有明显上升。这一现象显示，权力在话语的控制中仍然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虽然在这个特殊时期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大大加强，但个人崇拜已经明显地退潮。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一个阶段频繁出现的语汇如“大寨”和“上山下乡”在这一阶段彻底消失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频率也大为降低，只有8处，不足第一阶段（141处）的6%，仅为第二阶段（261处）的3%，这表明，虽然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以正面为主，但作为一个政治语汇，“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显著边缘化。

### （1）话语对象和话语主体

“八九”风波之后，由于政局的变化，权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的质疑与挑战，它迫切需要寻找一个能够安抚民众的解释，渡过此次危机，以保证政权稳定。从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统治经验来看，重构关于现实政治解释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诉诸于“革命传统”，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追述来重复证明权力的合法性传统。

由社论型文本、回忆型文本和呼应型文本三类组成的话语主体格局并无太大变化。

在这个阶段，“艰苦奋斗”的话语主体中，社论型文本大为减少，而回忆型的文本则有所增加，例如，以王震为代表的三五九旅老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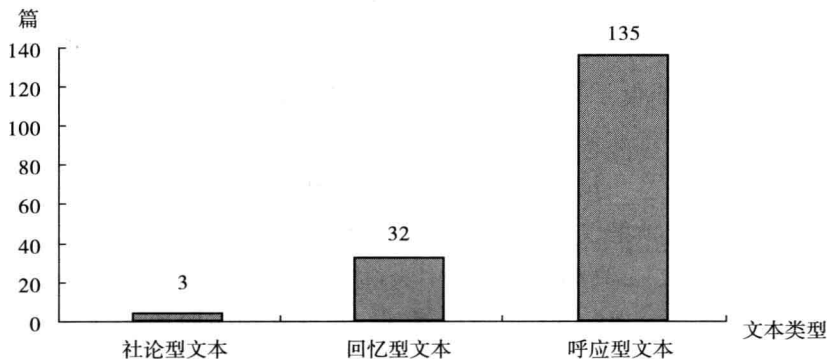


图 6-12 1989 年 6 月 ~ 1996 年三种文本类型比例示意图

以“过来人”的身份，通过“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回顾革命传统，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证明美好生活来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及继续的必要性。

例如，王震在慰问黑龙江省的农垦支边人员时高度赞扬他们的成绩：

这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大军，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边劳动，一边习武，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开发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建立了可歌可泣的功业，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就。三江平原建起了大批农工商联合企业，并已成为我国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北部亘古荒原上竖起了一座宏伟的大庆石油城，铁路铺进了大兴安岭林区。广大复转官兵、支边青年和科技人员在祖国东北边疆所创建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共和国辉煌建设成就的史册。……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以及后来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说到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本色和传家宝。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了这种精神，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打破了他们的封锁，建设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我衷心希望垦区的广大复转官兵、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和职工家属，牢固树立热爱边



疆、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思想，并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在边疆建功立业，为建设和保卫边疆作出更大的贡献<sup>[102]</sup>。

王恩茂在悼念王震逝世时也再次回顾了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以及它所代表的精神：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他率领 359 旅，一方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现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号召，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推动和促进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抗战相持阶段的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精神，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革命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sup>[103]</sup>。

回忆型文本的增加与社论型文本数量的减少，显示以国家威权话语形态出现的话语方式有所变化，但是，社论型文本，尤其是几个时间节点上出现的此类文本，仍然十分值得关注。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江泽民、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几次谈话。

在 1989 年党的又一任总书记江泽民履新之初，他就前往延安并视察了南泥湾，在这里，他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很难建成。

这篇新闻报道中记录了新任总书记的一举一动：

9 月 11 日，江泽民同志专程访问了山青水秀、稻花飘香的“陕北江南”南泥湾。他看到当年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地方，当年的米粮川又有新的发展，对陪同访问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说，大生产运动不光是历史，今天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时边区人民都动手，有了吃又有

了穿。今天，只要大家都动手，就能不断把我国的农业搞上去<sup>[104]</sup>。

江泽民主席与连队官兵一起就餐，关切地问起部队生活和农副业生产情况。他听说餐桌上的菜肴基本上都是部队自己生产的，高兴地说，这很好，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历来是我军的传家宝，什么时候也不能丢<sup>[105]</sup>。

此外，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南泥湾的言行，媒体也同样有着详细的记载：

杨主席说，陕西是一块宝地，在历史上曾作出过很大贡献，很有发展潜力，希望你们把陕西多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他还十分关切地了解陕北的建设情况，询问通往延安的铁路何时能修通，南泥湾是不是打出了石油<sup>[106]</sup>。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批民众表达对光荣传统追慕之忱的呼应型文本。与前述两项一升一降相比，呼应型文本数量变化较小，显示执政党对合法性认同的重要性认识一如既往。这方面的文本的话语主体包括学生、战士、工人、农民、干部等，话语主体成分丰富多样，不过，其话语的对象则同样是国家民众。它们“从现在的生活向后追述，以便重构有关过去的连贯叙述”<sup>[107]</sup>。在文本中，言说者的人称变化耐人寻味：通常，往往以“我”的亲身体验开头，但表述过程中人称则变化为“我们”，将自身的体验替代为话语对象的共同感受。

例如，作家浩然所写下的这段很有代表性：

尤其使我终生不忘而又享受终身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壮大起来的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革命队伍，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和实践表率，使我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为了让大多数人不受压迫、不被剥削、不遭饥饿而奋斗而献身，活着才有价值有意义。为此，我动员、协助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互助组、农业社。“组织起来”、“共同致富”的观念至今仍然铭刻在心中。

在文章的最后，他以号召的口气，流畅地将以第一人称所表述的个

人感受化为人们的共同心愿：

让我们携起手来，联合行动，为乡亲们服务，把燕山上下、长城内外、大河两岸的土地都绿化、美化起来。进而跟全北京市，全天津市，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成一片<sup>[108]</sup>！

通过叙事文本，作者营造了一个价值共同体，它让人们感受到，自己与这些在中央媒体上发言的国家精英融为一体，享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更拥有同样的理想和追求，这是营造社会认同的有效方式。

必须关注的还包括话语对象的变化。从上面引述的诸多文本可以看到，与前两个高峰期相比，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湮没，大生产记忆的相关话语不再面向知识青年和五七干部，而是面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政权及其军队与民众关系产生强烈质疑的国民。这期间刊发了大量关于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进行生产的稿件，其话语言说的主题都是通过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给民众增添负担的例证。

这一切是一个处于合法性困境之中，面临广泛信仰质疑的政权所进行的合法性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说服，向它所统治的民众进行重复和循环的论证：证明权力及其军队继承了与人民鱼水情深的光荣传统，通过肯定自身的道德权威来推论施政的正当性。这推论的另外一面，则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与军事监管，向民众施加压力迫使其服从统治。另一方面，很明显的一点是，通过密集报道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也暗示民众，应该将改善生活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自身的努力而不是政府的施政效果上。

## （2）话语主题及其阐述模式

八九风波之后，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的全面清算，迫切需要政治话语资源的支撑。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大生产运动的文章，一部分侧重于回顾当时的历史，以使这一随时间流逝渐趋淡忘的事件重新在历史长河中得以凸显，另一部分则侧重于将时事与南泥湾旧事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共通之处。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威胁的强调，这些文章不断重复说，人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国外势力提供的物质诱惑

保持警惕，这样，“南泥湾精神”就在建构之后被重新嵌入到新的政治诉求之中。

在这阶段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数据从第一阶段的0.61次/篇、第二阶段的0.45次/篇下降到了0.26次/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出现频率则从第一阶段的1.43次/篇、第二阶段的2.17次/篇下降到了0.56次/篇；此外，在第二阶段文本中大量出现的“延安精神”在这一阶段的文本中无论数量还是出现频率都有所下降，总数为48个，出现频率为0.28次/篇，而第二阶段则为0.44次/篇；“南泥湾”一词出现了282次，达到1.66次/篇，比第二阶段的2.34次/篇和第一阶段的2.44次/篇有显著减少；“南泥湾精神”的出现频率则较第二阶段稍有所上升，平均为0.29次/篇。

上述数据的显著下降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标志，即这不再是一个政治挂帅，口号至上的时代。然而，口号在文本中的减少未必意味着政治话语的弱化，而也许应该视为言说的方式开始有了变化。事实上，对王震等人功绩的频繁提及仍然旨在彰显革命传统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对新疆和北大荒垦荒历史的回溯，还是对南泥湾自采石油的夸炫，或是在王震及三五九旅的一批老干部去世时对其创业艰辛历史的回顾，都重在强调新中国重视独立自强，不屈不挠，最终艰难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荣历史。例如，在对南泥湾石油开采典型杨毅刚的报道中，文本就将杨的坚忍不拔和爱国精神与南泥湾精神联系起来，凸显了国家科技骨干独立研发石油开采，为国采油，摆脱依赖的光荣事迹。<sup>[109]</sup>

叙述话语的另一主题及逻辑是对中共军队勤劳爱民，发扬南泥湾精神，进行生产增收，减轻国家负担的行动的叙事。

在这个阶段，《人民日报》上同时出现了大量报道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进行生产的稿件，这些稿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对于部队“发展农副业生产，以实际行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减轻人民负担，补助部队供应”的连篇累牍的叙事，<sup>[110]</sup>其意在于回溯军队与人民“鱼水情深”的传统，并强调在今天，这一传统得到了有效承继，以化解当时对军队使用武力维持国家稳定的质疑，安抚因此而对军民关系产生疑问的民众。很显然，这些话语言说的对象是国家民众，其言说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证明风波以来一系列国家行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在1989年6月~1996年间《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出现了两种文

本的阐述模式，一种是从现在的生活向后追述，以便重构有关过去的连贯叙述：

在瞻仰了周总理纪念碑后，李鹏总理又参观了石河子总场展览馆。展览通过图片和实物，形象地再现了兵团广大农垦战士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经过近40年的建设，石河子已经建成了一座以农垦事业为依托，以轻纺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sup>[111]</sup>

刚到陕北那年，他就来到久已渴望的南泥湾。“南泥湾是块宝地，南泥湾精神更是革命和建设的无价之宝。”风华正茂的杨毅刚，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为延安造福，为南泥湾精神添彩。……杨毅刚坚定地对市领导说：“当年，先辈能让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今天，我们一定能让南泥湾富得流油！”<sup>[112]</sup>

例如，在《宝塔山下橄榄绿》中把延安称为“令人神往的地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描写了延安建设的成就：

红军住过的窑洞前，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红军女战士洗衣的乱石滩，如今杨柳泛绿，一片生机。“平展展街道柏油路，车如穿梭人如流”。100多万心灵手巧的延安儿女，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红军开创的天地打扮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他还描写了解放军战士是如何走出思想迷惘的：

战士们从徘徊、困惑、迷惘中走了出来。他们来到当年红军练兵的延河畔，对着宝塔山举起了右臂：“我们是红军的后代，延安精神是我们的命根子……”

对传统的追慕有着生动的体现：

部队驻地条件差，伙食不好，官兵们就一人一把锄头，像当年三五九旅一样，开荒种地，地挖出来了，又种上西红柿、辣椒、茄子、豆

角。秋收时，每个中队都产菜5万多公斤，除满足自己吃外，还把多余的部分送给驻地群众。

紧接着，官兵们又自己动手，办起了养鸡场、汽水厂，每年收入20多万元，他们又用这些钱为每个中队都添置了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收录机……

枣园，是当年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村西有一条渠，是当年书记处和驻地群众一起修的，每年雨季，泥石都要堵塞几次。每当这时，武警战士便及时赶到，他们肩扛手扒，披星戴月，每次都不声不响地把渠掏通。汗，洒下千滴；钱，不收一分……

二中队驻守在王家坪，革命旧居院子里有不少桃树、枣树，战士们执勤上哨都从树下经过。每当桃枣成熟时，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可战士们从未动过一个。一天晚上，冰雹将40多棵枣树上的枣全部打落在地。清晨战士们收操回来，见到满地的枣，一个个给拾起来，堆在一块……看枣树的李大爷见此情景，老泪纵横，说：“这些后生，和当年的红小鬼没啥两样！”<sup>[113]</sup>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有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报道：

江泽民总书记谈到他视察延安的目的时说：在建国40周年前夕，想到外地做些调查研究。在考虑究竟到哪里去时，很自然地想起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及陕北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我们党和国家很多优秀领导人和骨干都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更不应该忘记老区人民。……在窑外大树下，孙文义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村脱贫致富的决心……总书记听后说，你们的打算很好，就是要有一股自力更生的精神。当然国家还要给你们支持，帮助你们早日脱贫致富。<sup>[114]</sup>

第二种是从过去有关生活的自述向现在追溯，以便对权力关于现实的解释进行重构。

1942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当时担任三五九旅副政委的王恩茂同志与王震同志一道率领三五九旅将士进发南泥湾，开展了驰名中外的南

泥湾大生产运动。从此，南泥湾这昔日的荒川野岭，变成了延安的骄傲，陕北的江南。想起那一段日子，王老动情地回忆道：“当时，我们旅部驻在金盆湾，离延安只有90里山路。我们的部队屯垦驻守在那里，就像守卫着延安的南大门。我们经常骑着马去延安开会。战马每小时可跑40里山路，两个来小时就到延安了。开完会，心里惦着部队，连夜又赶回去。有时是同王震同志一道，有时是我一个人去。常常两头不见太阳，真正是披星戴月。”<sup>[115]</sup>

如同勒庞所说：“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sup>[116]</sup>这两种叙事方式，已经多次出现在前两次有关大生产记忆的话语高峰期，此次也不例外。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一组叙述被用于回答对另外一组叙述的提问。于是，“记忆完全不是孤立地回顾事件，它要变得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重构个人生活史的任务”，是“把孤立的或相异的现象，整合为单个统一的过程。”<sup>[117]</sup>

### （3）话语的社会影响

政治合法性既然是“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sup>[118]</sup>那么，这共同的价值信仰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基础。当它遭到挑战和质疑时，统治权力必须给出价值信仰仍然坚不可摧的证据，才能持续证明统治的正当性。

八九风波，在今天看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不过在当时，则毋庸讳言受到国内外强烈的质疑。从维持政局稳定与社会统治的角度来看，秉权者必须提供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证明，才能平息沸沸物议，说服民众自愿接受其统治。

在这个阶段，政权证明合法性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通过“操纵国家象征”<sup>[119]</sup>，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回溯国旗的光荣历史等，来唤起民众对共和国的认同；其二，是操纵社会记忆，用历史记忆来证明政党的先进性，以及它被广泛认同的历史。

在这个证明的过程中，大生产记忆能够居于被凸显的位置，正是由于它在这两点上具有丰富的阐释可能——对大生产中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记忆的唤起，能够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光

荣传统，不仅能够渡过困难，还能够改天换地，富强国族，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有力证明；而“自力更生”本身还含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对外国势力的警惕和强调独立自主强大中华的能力；毛泽东“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的自夸<sup>[120]</sup>，与9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警告遥相呼应<sup>[121]</sup>；对大生产运动中军民鱼水关系的强调，有利于缓解民众反感军队行为的情绪。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核心语义符码，以及所唤起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带头进行大生产运动共渡时艰的记忆场景，在当时“反腐败”的语境下则具有疏导民众不满的效力；这些话语的重复，使人们相信，现行的政治系统是当下社会最为适合的制度，“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大生产记忆对这一阶段的社会仍然有着明显的影响。不过，其影响已经不再具象化，像前两个阶段那样成为合作化生产制度设计和上山下乡政策的一个原始模本。90年代之后，国家经济模式全面转型，以集体化生产为特征的生产运动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强调高度集权、强力侵入民众生活的军事化运动模式也不再得到认可。如同亨廷顿所指出的，在现代，威权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其效力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让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在更刚性的指标上，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则必须通过营造政绩来提升。<sup>[122]</sup>执政党深知，一系列失败的教训证明，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军事化色彩强烈的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对中国及其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要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确保连续性”，<sup>[123]</sup>就必须引入社会记忆中具备这种连续性内涵，可以将两者相互接续并服务于现行统治秩序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例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存活于道统中的大生产记忆，其主要任务是“选出某些‘富有创造力’的因素，通过这些因素，把给予的印象扩大化”，并“按照一定的方向”<sup>[124]</sup>，引导人们对革命历史的想象，并按权力所设计的轨道实现对当前社会现实的解释和认同，这成为大生产记忆当仁不让的任务。

因此，大生产记忆的相关话语在这一特殊阶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通过将力图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外颠覆势力与40年代的日军侵华相联系，将中共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与抗击帝国主义的民



族救亡行动相联系，将“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的胜利与民族尊严相互联系，强化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颠覆势力进攻的危机感，唤起民族主义情绪。

②通过对军民鱼水关系的记忆唤起，证明执政党及其军队的先进性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缓解此前民众对军队行动的疑问和反感。

③通过对“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老传统的凸显，证明执政党及其军队中官员腐败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

④通过强调“改革开放”中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人们依靠自身努力而不是指望政府的帮助来解决现实困难，以此来平息民众对贫富分化、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的愤怒。

汤森和沃马克特别指出了“自力更生”原则在文革结束之后含义产生的微妙变化：“自力更生不再被解释为自给自足。现在，对商品生产和合作的强调代替了自给自足，鼓励农业和工业单位（在计划指导的范围内）为最大利润而生产。而不是生产自己所有的必需品。……在这一领域，自力更生仍然是反对过分依赖进口技术的一种谨慎提法。”<sup>[125]</sup>

显而易见，这是运用记忆话语唤起过往生动形象，以使现行政策得到合理解释的一个体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sup>[126]</sup>大生产记忆的相关话语传播，在八九风波之后的年代不断凸显出40年代那些生产过程中的感人场景，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执政党的统治。

必须强调的是，纵观三个宣传的高峰时期的大生产话语，明线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倡导，而暗线始终贯穿着“反帝反修”的民族主义的彰显：从大饥荒之后对“苏联逼债”的凸显，到70年代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的劳动称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路线斗争，六四风波之后，国家权力更把学习“南泥湾精神”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话语紧密相连，上升到“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严峻的阶级斗争”的高度<sup>[127]</sup>。从80年代开始的西方民主思潮，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而这股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国家的鼓励下一浪高过一浪，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它的踪迹。由此可见，社会记忆恰恰是“通过剔除意欲忘记的过去，以及加入并不存在或者故意歪曲的内容，以重建历史的现实意义”

的过程，最终，它“使得传统在一个社会的框架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变迁”。<sup>[128]</sup>

## 注 释

- [1] 延安革命纪念馆解说词。
- [2]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 [3] 米歇尔·福柯：《规训和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页。
- [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页。
- [5] 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45页。
- [6] 见新华社：《安排劳力种子肥料 充分利用空闲土地 及时种好种足 全国城乡抓紧农时大种瓜菜》，《人民日报》，1960年7月18日；新华社：《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 解放军官兵兵大抓农副业生产 绝大部分部队肉、菜等副食品基本上已能自给》，《人民日报》，1960年7月31日。
- [7] 见何维忠：《南泥湾生活片断》，《人民日报》，1960年9月7日；陈思：《南泥湾精神》，《人民日报》，1960年9月7日。
- [8] 赵守一：《发扬延安时代作风，作革命的接班人》，《人民日报》，1960年10月21日。赵时任陕西省委书记。
- [9] 王威伍：《战胜困难 其乐无穷——参加南泥湾生产运动的片断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3日。
- [10] 世藻：《毛主席的题字》，《人民日报》，1960年8月25日。
- [11] 陈思：《南泥湾精神 革命的接班人》《人民日报》，1960年9月7日。
- [12] 刘野、安南：《今日南泥湾》，《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5日。
- [13] 《把毛泽东思想、解放军传统和南泥湾精神带到边疆 新疆建设兵团为建设边疆作大贡献》，《人民日报》，1966年3月14日。
- [14] 丛民：《革命的传家宝》，《人民日报》，1960年8月25日。
- [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3。
- [16]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2页。
-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 [18] 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 [19]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 [20]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21]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22期。
- [22] 曹树基：《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 [23] 转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24]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 [25]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 [26] 袁光锋：《榜样制造、政治动员与社会记忆——以雷锋符号的媒体生产、传播与公众认同为例》，南京大学，2010。
- [27] 刘娅：《目标、手段、自主需要——人民公社制度兴衰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28] 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 [29] 转解放军报8月1日社论：《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人民日报》，1961年8月2日。
- [30] 《国营农场要积极为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而斗争》，《人民日报》，1964年3月23日。
- [31] 黄异：《我有一件灰布军衣》，《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
- [32] 丹尼斯·K.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 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5~136页。
- [33] 杜霞：《翻身道情——解放区小说主题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 [34] 一些个案提供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周晓虹引述浙江地区的档案数据说，仅在1951年9月浙江乐清市虹桥区临海乡的一次公判大会上，就有两名地主被处死，7名被判有期徒刑。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
- [35] 符加雷：《灾区老农一席话》，《人民日报》，1960年11月15日。
- [36] 丹尼斯·K. 姆贝前揭书，第114页。
- [37]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 [38] 王咸伍：《战胜困难 其乐无穷——参加南泥湾生产运动的片断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3日。
- [39] 刘野、安南：《今日南泥湾》，《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5日。
- [40]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访问延安的外国朋友热烈颂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1966年6月30日。
- [41] 陈爽：《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书城》2009年10月号。
- [42] 前揭书。
- [43]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介绍》，《人民日报》，1964年10月9日。
- [44] 乔羽：《一次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2日。
- [45] 陈亚丁：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人民音乐》，1964年增刊第2期；安波：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造新音乐——谈对大歌舞《东方红》音乐剧作的体会，《人民音乐》，1964年第10、11期合刊。
- [46] 刘白羽：《红玛瑙——1960年11月5日-7日的日记摘录》，《人民日报》，1961年7月2日。
- [47] 白羽：《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9页。

- [48]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 [4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 [50] 有关威权主义思想对人类主宰世界的“超意义的力量”的阐述，可参见汉娜·阿伦特的阐述，而在中国的一个实例可以参见韦君宜对“大寨经验”的严厉质疑。她在谈到采访大寨抗旱的经验时谈及，大寨人在陈永贵发动的全县动员之下到数十里外挑水抗旱，每担水能浇十棵小苗，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据统计，大寨大于12年，全县共有310位社员流血牺牲，730人受伤致残。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9年版，577页；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陈大斌著：《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 [51] 图片征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9-09-28/020816373738s.shtml>。
- [52] 前揭罗平汉书，第62-63页。
- [53] 前揭书，第220页。
- [54] 唐飞霄：《人民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人民日报》，1958年8月21日。
- [55]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183页。
- [56] 罗平汉前揭书，第131页。
- [57] 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 [58] 转引自景跃进：《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 [59] 唐飞霄：《人民公社是万人欢乐的大花园》，《人民日报》，1958年8月21日。
- [60] 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61] 罗平汉前揭书，第94页。
- [62] 前揭书第105页。
- [63] 前揭书第105-106页。
- [64]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309页，转引自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 [65] 见附录：《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军垦时期的历史——对90岁老红军GWS（高万树）的访谈》，访谈人，秦锐、孟庆延、钱力成、周海燕等。南京大学新农村联合调查组，2006年5月。
- [66] 赵守一：《发扬延安时代作风，作革命的接班人》，《人民日报》，1960年10月21日。
- [67] 转引自丹尼斯·K·姆贝前揭书，第114页。
- [68] 按照费正清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并非止于1976年，而是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就已经结束。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20页。其他很多学者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普遍认为，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69] 1977-1978两年相关数据的延伸，原因之一是毛的去世，大量纪念性文本中必然提及大生产运动的业绩，这一现象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毛泽东影响力的持续，至1978年三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功过有所反思之后，其宣传高潮才渐趋平息。

- [70]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 [71] 一项专门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也证实了笔者自数据得到的结论：“报道下乡青年劳动小组所取得的成就的文章都前后贯穿着一个主题，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 [72] 《国营农场要来一个大跃进》，《人民日报》，1978年1月26日。
- [73] 郭建才：《干校的教育使我又回到群众之中》，《人民日报》，1974年4月22日。
- [74] 《坚定不移地支持新生事物 中共西安市委加强对五·七干校的领导》，《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8日。
- [75] 《南泥湾五·七干校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人民日报》，1974年5月7日。
- [76] 郭敏：《十年》，《人民日报》，1973年9月26日。
- [77]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陕北农业学大寨运动见闻》，《人民日报》，1972年3月7日。
- [78] 《在“五·七”道路上不断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人民日报》，1970年3月20日。
- [79] 《南泥湾的“一对红”》，《人民日报》，1971年2月2日。
- [80] 古斯塔夫·勒庞前揭书，第102页。
- [81] 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82] 图片征引自 POCO 网：[http://tu.poco.cn/theme/item\\_detail.php?o=&show\\_num=10&p=1&theme\\_id=115617&item\\_id=58433129](http://tu.poco.cn/theme/item_detail.php?o=&show_num=10&p=1&theme_id=115617&item_id=58433129)。
- [83]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
- [84]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 [85] 郭建才：《干校的教育使我又回到群众之中》，《人民日报》，1974年4月22日。
- [86] 《北京市宣武区“五·七”干校党委成员认真学习理论总结经验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坚持办好“五·七”干校》，《人民日报》1975年4月15日。
- [87] 《铁心务农创新业 回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1976年2月5日。
- [88]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前揭书，178页。
- [89]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陕北农业学大寨运动见闻》，《人民日报》，1972年3月7日。
- [90] 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理想之歌》，《人民日报》，1976年1月25日。
- [91] 汉娜·阿伦特前揭书，第458页。
- [92] 张秀清：《扎根农村干革命 立志建设南泥湾》，《人民日报》1976年4月2日。
- [93]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见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 [94] 《日本朋友畅谈我国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和接受再教育的成就 毛主席〈五·七指示〉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纲 赞扬我国人民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人民日报》，1970年2月24日。
- [95] 宇文所安：《追忆：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 [96] 戴维·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440页。
- [97] 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 [98]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和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 [99]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4页。
- [100] 前揭书，453页。
- [101] 参见王焯彦：《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 江泽民强调发扬延安精神 要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人民日报》，1989年9月15日；王震：《矢志共产宏图业 为花欣作落泥红》，《解放日报》，1989年10月22日；何平、汪有富：《祖国不会忘记——李鹏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垦区纪实》，《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8日。
- [102] 王震：《百折不挠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在慰问黑龙江省复转官兵、农垦职工、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和驻东北地区部队指战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7月28日。
- [103] 王恩茂：《英雄功绩不灭 革命精神永存——沉痛悼念王震同志》，《人民日报》，1993年5月2日。
- [104] 王焯彦：《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 江泽民强调发扬延安精神 要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人民日报》，1989年9月15日。
- [105] 杨民青、张宝印：《热流暖边关——中央军委领导关心边防官兵纪实》，《人民日报》，1996年2月27日。
- [106] 张健、华年轮：《出国访问归来并在陕西视察工作后 杨尚昆主席回到北京 李鹏王震等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人民日报》，1991年11月5日。
- [107]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第25页。
- [108] 浩然：《我眷恋农村这个天地》，《人民日报》，1990年6月19日。
- [109] 孟西安：《释放南泥湾的能量——高级工程师杨毅刚探寻石油记》，《人民日报》，1990年1月25日。
- [110] 王义华：《弘扬南泥湾精神 自己动手补助供应 全军各部队努力发展农副业生产》，《人民日报》，1990年6月16日。
- [111] 何平、汪有富：《祖国不会忘记——李鹏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垦区纪实》，《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8日。
- [112] 孟西安前揭书。
- [113] 江道贵：《宝塔山下橄榄绿》，《人民日报》，1991年1月29日。
- [114] 王焯彦：《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 江泽民强调发扬延安精神 要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人民日报》，1989年9月15日。

- [115] 忽培元：《延安情结》，《人民日报》，1995年12月7日。
- [116] 古斯塔夫·勒庞前揭书，第103页。
- [117]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第25页。
- [118]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 [119]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 [1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页。
- [121] 王震：《百折不挠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在慰问黑龙江省复转官兵、农垦职工、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和驻东北地区部队指战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7月28日。
- [122]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 [123] 前揭书，第156页。
- [124]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5页。
- [125] 汤森、沃马克前揭书，第178页。
- [126]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3页。
- [127] 王震：《百折不挠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在慰问黑龙江省复转官兵、农垦职工、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和驻东北地区部队指战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7月28日。
- [128]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 第七章

# 作为地理实在的南泥湾： 红色记忆与中国现实

地景的塑造被视为表达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然后意识形态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

——Mike Crang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延安成为全国几十个革命旧址中的最热旅游地点之一。据延安市旅游部门统计，旅游已经成为延安市的支柱产业和第三龙头产业。从1997年开始，延安市的旅游增长率年均保持在35%左右。2009年，延安市一年接待游客1024万人次，而在2011年7月1日建党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仅1~6月的总游客人数即达到了创纪录的1063万<sup>[1]</sup>。

作为“红色旅游一号工程”延安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南泥湾是这条红色旅游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距离延安市约45公里的这荒僻村镇在1948年行政区划还属于临镇县，但后来被划入延安市宝塔区内，成为宝塔区辖地内最远的一个镇。作为延安最负盛名的标记物，矗立于延安宝塔山顶上的“宝塔”，本身就带有极其强烈的红色政治符号色彩。而将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的南泥湾镇通过行政手段划入以此为名的一个城区，明显有别于按地理远近划定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而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很显然，这一整合革命历史资源的举动，使南泥湾本身所固有的政治符号的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让“南泥湾精神”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地理上被纳入到“延安精神”之内。

今天的南泥湾镇，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状态，当然已和上世纪40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乡镇仍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在南泥湾垦荒时原有的农耕地貌——在陕北其他地区极为罕见的、于山谷间垦出的平坦水田，种植的是当地少见的水稻，颇具江南风致；近年来在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倡导下，延安斥资3000余万元，推动“山川秀美工程”退耕还林，此一工程亦惠及当地，渐渐为当年大规模垦荒而致的濯濯童山添上星星点点绿色，但在大部分山坡上，从破败的梯田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规模水土流失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小镇上的田地大多方正规整，“南泥湾农场农垦综合服务公司”，“南泥湾农场光华木器厂”、“南泥湾农场子弟学校”等隶属于军方所属南泥湾农场的招牌提醒人们，这里是执政者通过屯垦试行农业集体化建设的起点。即使如

此，若非对当时情况非常熟悉的人，亦很难在进入到南泥湾的初始，立即意识到这个西北小镇普普通通的外貌与其显赫的红色历史间的联系。

有关这红色记忆更为显要的空间，将在前来朝拜——也许还带着些许好奇——的旅游者进入到南泥湾镇的中心时次第呈现：纪念碑、广场，纪念雕塑，以及最为核心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和毛泽东当年盘桓5天进行视察的窑洞。除了窑洞，这一系列建筑物的出现均是近30年间复原和新建的结果，而非大生产运动中的原有产物。但当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站在它们面前时，这些物质性的实在空间与音乐、雕塑等共同塑造的气氛，唤起的却是对70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生产运动的记忆和共鸣——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未参与过这次生产运动，但从记事起，包括歌曲、小学课本、电视、影片等在内的众多叙事文本早已将这段历史镌刻进每一个中国民众的记忆里。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纪念地点，位于毛泽东唯一一次短暂视察南泥湾垦荒成果时居住的垦区政府阳湾窑洞所在地址。由于展览馆的建成，这里也就成为今天南泥湾镇的中心地带，不过，原大生产运动屯垦而形成的中心集镇其实位于今天的另一个镇——金盆湾。两地相隔大约有十公里之多。将大生产运动的纪念馆设于并非其建设中心的地区，而设于领袖短暂居住五天的地点，以上这些迹象，恰恰证明，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constructive process），而不是恢复的过程（retrieval process）”<sup>[2]</sup>。

在此前的几章，笔者运用历时性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大生产运动相关红色记忆最初形塑的过程，以及它在不同时段因应时势和权力要求所发生的变化。而在本章，笔者更多关注的是当下，即这段红色记忆在21世纪初开始全面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是如何被言说，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影响了今日的中国社会。为此，笔者在南泥湾镇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时间分别为2006年5月、2008年4~5月、2011年4月、2011年7~8月。调查的重点，一是利用无结构观察法，考察“大生产展览馆”对南泥湾的叙事及其所唤起的南泥湾记忆，对于参观者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利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考察被表述为“南泥湾精神”及它所依托的一系列故事的社会记忆，及所代表的运动式生产模式，是否对于南泥湾地区的乡村社会本身产生了影响。例如，它在2005年之后开展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是如何被言说，如何结合今天的需要，

被当代执政者阐释的？笔者试图通过这一角度，观察一段社会记忆如何在流变过程中影响中国当代社会进程。

## 1 空间叙事中的红色记忆建构

作为“大生产运动”最显要的地标性建筑，“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不出意料地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的中心地带。

在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建构中，“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的空间叙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集聚至此，倾听、感受、缅怀、感慨、宣誓，最终从革命传统中获取力量，以继续对革命信念的坚守。在多次前往展览馆进行无结构观察（包括非参与式观察及半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笔者所关注的是，在这一特殊的空间内，国家权力是怎样完成对以南泥湾垦荒为标志的“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之建构过程？哪些关于此一主题的事实被刻意强化和凸显，而某些事实则被刻意遗忘或改写？原因是什么？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中，“南泥湾精神”及它所依托的一系列故事，是如何对参观者产生影响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专门利用“政治的博物馆化”这一概念说明，作为历史回溯与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的博物馆，表面看来是对历史故事的客观叙事，但实际上，它的话语体系受到政权掌握者的严密掌控，被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纳入其框架。在深入分析了直布罗度极具殖民者色彩的博物馆建设与陈列方式之后，他写道：“它所呈现的，是作为国家权力标志以及‘当然，那就是它’的识别标志的波罗布度”。<sup>[3]</sup>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南泥湾的“大生产展览馆”。无论是它建设的时间，还是建设的发动者，以及建设的社会情境，都明确无误地与执政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

资料显示，尽管南泥湾声名显赫于歌谣、回忆录及会议文件、新闻报道，但将其明确标定为一个纪念地，以实在的物理空间唤起民众的红色记忆，则始自1972年。研究数据显示，这一年正处于《人民日报》宣传“南泥湾”的第二个高峰阶段之中。正值文革中后期，国家政局

动荡，经济濒临困境，执政党遂决定重新启用一批被打倒的、长于经济建设的元老，以挽救经济危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政治口号既出，与频繁的报道及言论相呼应，延安有关方面很快开放了毛泽东1943年视察时住过的窑洞，王震也前来参观，并与当年359旅的老战士合影留念。

大生产展览馆正式的展出始于1978年。其时，国家在三中全会之后重新调整政治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将政策重点转向经济尤其是农业建设，在多个场合，邓小平都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在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sup>[4]</sup>。

在此政治大背景下，对南泥湾垦荒历史的强调，恰恰能够呼应时势，唤起人们对于革命创业年代领袖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经济，鼓励致富的记忆，以纠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既有导向。于是，延安有关方面在这一年正式开工建设“大生产展览馆”，把窑洞里的陈列物移至展览馆内。

到1988年，展览馆开始布置新的展板，并补充和丰富了展出内容。1989年9月9日至12日，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80余天的江泽民很快启动了他的延安之行，并专程访问南泥湾。在这次视察中，他强调说：“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难建成的”<sup>[5]</sup>。随后他又在另一次讲话说：“前几天，我到了陕北，到了南泥湾，毛泽东同志当年曾大力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看这个精神今天仍然完全适用。……所有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国家都要继续倡导和发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sup>[6]</sup>此后的1990年，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改造。从事件发展脉络来看，显然，它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有直接关系的。

国家领导人的参观表面看只是一次普通的革命圣地的拜谒行动，但其中却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他们在参观之后所发表的讲话，均为事先精心准备和审定之作，以表明自己将继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革命传统，并带领民众将其发扬光大。这显示出，作为圣地延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泥湾记忆已经成为确认政权及其领导人合法性的关键资源。而国家领导人访问延安时必然光临的“大生产展览馆”，就成为唤起这一记忆的最佳场所。当领导人出现在馆内时，当他们专注倾听解说员的激情解说时，当他们在参观后发表公开讲话时，这些行动本身就带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它们表明领导人继承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道统”的继承。它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认同意识：参观一个红色圣地意味着你对它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高度认同，也同样意味着它对你的身份认同。很难想象一个被判定为“叛徒”的人会得到允许去参观红色圣地，因此，允许参观本身就蕴含彼此认同的意义，尤其是对政治人物而言正是如此。其次，是正统意识：拜谒意味着你认同、也同时被接纳成为正统的一部分。最后，是弘道意识。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是地方要员，在参观革命圣地之后对辖地民众发表公开讲话是既定的必经程序，保持沉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行动也带有“弘道”的强烈意味。这样一个极具政治仪式色彩的行动对领导人是必需的，它象征着领导人从先辈那里获取了政治的资源与力量，从而也就具备了继续领导人民的能力和权力。

当然，前往大生产展览馆参观的还包括千千万万普通的民众，虽然地位有所区别，目的也未必一致，但他们参观展览馆这一行动本身，同样蕴含有教化与接受教化，促成认同与达到认同的目的。在大生产展览馆发生的教化与被教化这一双向行动，在特定场所物质空间的形式结构与精神空间的主题内容整合上，在身体实践与刻写实践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成为权力掌控者控制社会记忆的有效手段。

### (1) 精心复原的“革命遗产”

从延安一路迤迳向东南约一小时车程，就进入到南泥湾镇地带，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山谷间大片平整的旱地，以及几家简陋的旅社。再向西走约十几分钟，大片平整的水田跃然眼前——这正是多次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上的那片象征着“陕北好江南”的神奇土地。由于红军多来自富产水稻的湖南、江西，因此在南泥湾垦荒时，除了种植当地作物如糜子等，也尝试垦出水田，种植水稻。令人意外的是，居然试种成功，这片水田遂成为三五九旅改天换地的成功标志。

极目远望，可以看到水田四周是环绕的黄土高原丘陵，这些浑圆拱起的山丘上零星点缀着绿色，据当地农民们说，这是近年来退耕还林的成果。而在此之前，这些山丘完全是一片黯淡的土黄色——从南泥湾垦荒时代开始，这里丰富的山林就以极其野蛮的方式被砍伐乃至烧毁，以显露出可以耕作的土地。此后，在农业学大寨大建梯田的阶段，这种方法被充分使用，导致当地的山林几乎被完全破坏。当地农民曾经回忆说，在1976年的时候当地曾经流行这么两句顺口溜：“要水时候没有水，不要水时发洪水”；“陕北开荒，河南遭殃”。<sup>[7]</sup>

与陕北的其他地区相比，南泥湾的人均土地面积明显偏少，在南泥湾村，人均只有4分口粮地。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南泥湾的大部分土地一直被保留在军队手里<sup>[8]</sup>。因此，这个以“南泥湾好地方”之名著称的乡村，农民的生活甚至比其他地区更为贫困。不过，加入“红色旅游”的人们很少注意，也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南泥湾地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实际生活，他们所关心的，是拜谒那些有着革命圣地意味的地点，“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与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sup>[9]</sup>。在大生产展览馆所在的南泥湾镇，这些地点显然被精心地修葺过：特意修整过的公路，粉刷过的白色墙面，显眼的革命旧址标志牌等等，都显示出，这里曾经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接近南泥湾镇的中心，红色圣地的气息扑面而来。高分贝音箱里放出的革命歌曲以及越来越密集的纪念品摊点，将游客的视线轻易地引向展览馆的方向。小摊上摆放的货物多种多样，但大体说来，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红色主题的纪念品，最为醒目的是毛泽东的合金塑像，以及上百种领袖纪念章——其尺寸比“文革”期间的要小得多，大约只有一枚纽扣那么大，但相当精美，有关大生产运动的明信片、光碟和图书也是摊贩们售卖的畅销货物。另一类则是当地的土产，如刺绣、荷包、剪纸、小米等。

越过重重叠叠的小摊，大生产展览馆的广场豁然出现在面前。这个于21世纪初修建的纪念广场外表简朴庄严，但却还算开阔，为进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虽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和天安门广场的性质是类似的：这一广场并非西方建筑学意义上供公众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广场”空间，而是中国建筑里的“校场”空间——它是为权力操控者展现权威，重现记忆而设，它和后面我们即将



谈到的一组建筑及其附属物一起，组成了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诺拉所定义的记忆的“场”<sup>[10]</sup>。无论是在广场上进行歌舞表演，还是发表庄严的讲话，或集结小团体进行宣誓效忠仪式，其实质都是国家话语在时代背景下对社会记忆再次进行建构的过程。

以白色花岗岩制成的纪念碑是广场旁另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在展览馆主体平房建筑的衬托下，它显得高大、庄严、朴素、简洁。犁铧外形显然是对大生产运动的形象化表达，10余米的高度令人不得不仰视其上的十一个金色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这句今人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纪念碑上唯一的文字装饰。从空间艺术语言的表现来看，这座纪念碑的外在形态和镌刻的纪念性文字，都直接指向政治符号的空间语言表达方式，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通过直接、明确的符号化的形式和内容的呈现，达到迅速唤起和固化民众有关大生产记忆的目的。

主体建筑大生产展览馆依山而立——更准确地说，依毛泽东当年在南泥湾短暂伫留的故居而立——面向广场，这使得留影的游客们可以站在广场上，以雕像为最近的背景，而远处的背景则可以同时涵盖松柏掩映下的展览馆与纪念碑，以及更远处的山丘，那里有毛泽东所住的阳湾窑洞——它们同样是这个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7-1 展览馆全景





在建筑的形制上，作为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生产展览馆明显比延安革命纪念馆要小和低矮，面积仅290平方米，其整体风格非常朴素，以呼应南泥湾精神中最为关键的“艰苦奋斗”的部分。广场雕塑“大生产”的主题显然提炼自三五九旅的生产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这座雕塑中，出现的不仅仅是士兵形象，还有当地老农的形象。这显然是为了表达出军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主题。



图7-2 纪念碑及雕像<sup>[11]</sup>

上述这些红色记忆的物质载体，并非严格意义上当年的“革命遗产”，而是经过精心复原和记忆重构的产物。资料显示，今天的南泥湾农场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刻意恢复的结果。在中共中央及军队离开陕北之后，南泥湾除了少数至此垦荒的移民之外，一度被改为劳改农场，部分垦区还一度成为“五七”干校改造“右派”干部的场所。

在三年破坏性的大饥荒之后，国家不得不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迷狂状态回到经济濒临崩溃的残酷现实中来，与此相应，宣传机构开始重拾大生产运动的光荣传统，以此鼓励民众振奋精神，发展生产，重拯经济，南泥湾垦荒的红色记忆与这一政治语境高度契合。恰逢此时，王震得知南泥湾已经沦为劳改农场，感到非常不满，要求恢复由革命军队进行军垦的光荣传统。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1965年10月，陕西省政府为恢复和发扬南泥湾农垦的革命传统，将劳改农场迁至他处，组建了陕西省农建师141团，后来这里更名为“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农场”。换言之，今天我们

看到的农场，并非纯粹意义上三五九旅的“遗产”。但在精心复原的历史叙事中，南泥湾被作为劳改农场的近十年“黑色档案”因其与红色记忆的叙事相矛盾而被刻意遗忘，只字不提<sup>[12]</sup>。农建师 141 团这一段历史则被选择性淡化，以刻意凸显出三五九旅的光荣历史而形成南泥湾的红色革命传统源流不断传承至今的印象。

## （2）被安排的叙事史

在大生产展览馆长方形的展馆内部，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一条流动有序的参观人流。从入口到出口，是一条单向、顺序流动的动线，在解说员的指引下，人们依次向前阅读和倾听介绍，在这里，罕有反方向行走的参观者。与其说这是参观者主动的行为，不如说是布展者刻意引导的结果：展馆采用革命历史展览馆常用的单向阅览动线，与古代文物等布展时常采用的圆形或多边形展馆、双向或自由动线，可自由选择参观对象的流动方式相比，这一强调顺序性、连续性的人流动线，充分保证了官方叙事逻辑完整和准确的传达。

叙事逻辑链条上最先被凸显的内容首先是前言，它为整个展览定下了基调：

南泥湾大生产，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1 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奉命进驻南泥湾，执行保卫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光荣使命。当年，在南泥湾进行生产和举办农场的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党校等单位。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南泥湾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南泥湾的开发史，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战士们用镢头和钢枪，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部伟大民族复兴的英雄史诗。

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泥湾精神，创造了过去的辉煌。

南泥湾精神，也将创造今天和未来！

假如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篇不到 300 字的前言，我们

将看到，它使用的大量名词都带有强烈的符号象征意义，使用的动词也显示出类似的作用。

“这些词以前被用作一种描述性的、逻辑的或语义上的含义，而现在是在当作要产生某种效果和激励起某种情感的巫术上的词语来使用的。<sup>[13]</sup>”——运用诗化语言，展览馆的前言巧妙地回避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崩溃民心离散的社会现实，把一次无奈的应对行动通过语义转换塑造为通过经济建设迅速改变局势的政治神话，将这段历史上升到“伟大民族复兴的英雄史诗”的高度。在文末多次出现的“南泥湾精神”，则是这一政治神话的核心。和其他政治神话一样，通过红色记忆与现实社会的联系，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化手段达到民众的高度认同，它成功地赋予这段历史以神性，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唯一领导者，并提炼出可为今天所用的合法性资源，成为当下执政者维护社会统治的有效工具。

在“前言”之后，按照“进军南泥湾”、“陕北好江南”、“亲切的关怀”、“开辟新战场”和结束语几个部分，参观者的眼前呈现出丰富的历史照片及其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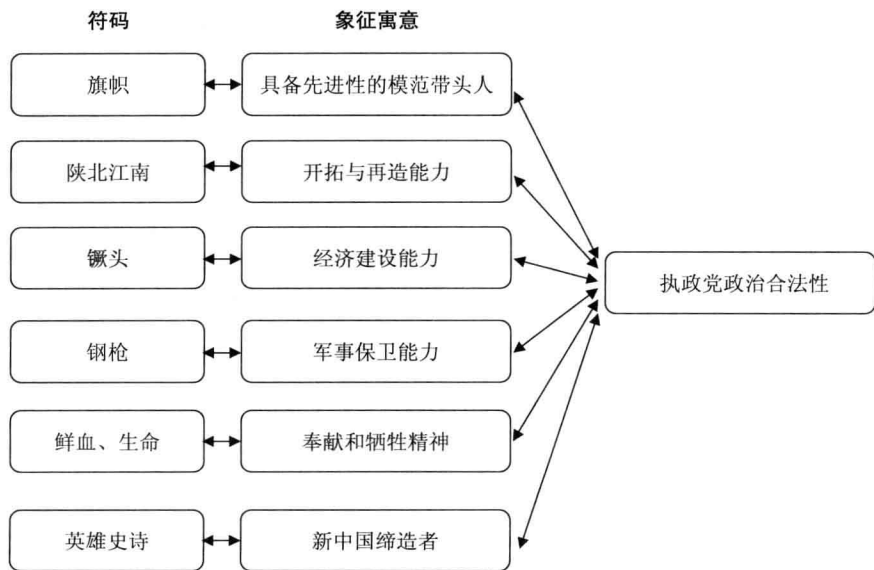


图 7-3 符码及其象征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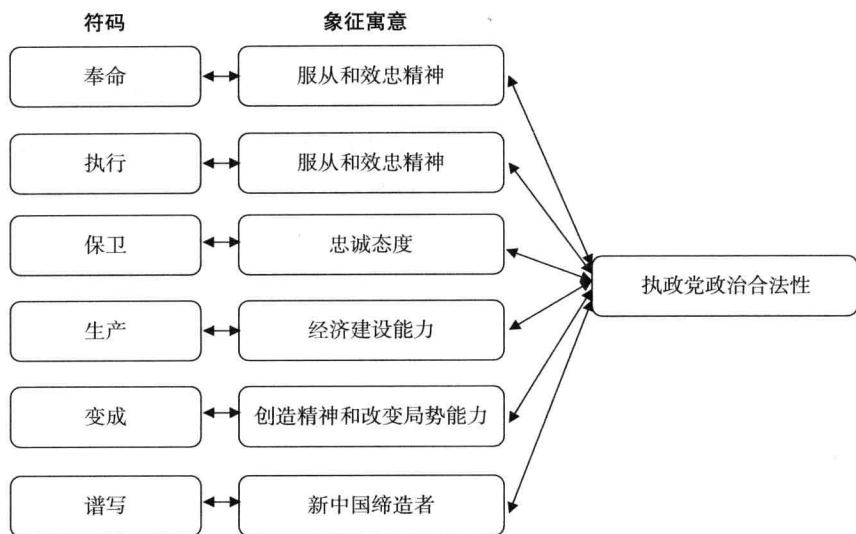


图 7-4 行动词及其象征寓意

在时序结构的叙事逻辑的表象下，这些历史图片和材料其实是精心选择、编辑和调度的结果。“实际经历是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而历史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sup>[14]</sup>。条理化和明晰化的代价标准，是权力掌控者的实际需要。例如，在第一展区，按照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最先出现的应当是边区经济崩溃、人民衣食无着、生活艰困、物价飞涨的图片，但这些都对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权的谴责所代替。

叙事学认为，叙事中隐含的时间序列是“叙事元素在空间或结构上的组织”<sup>[15]</sup>，因此，大生产展览馆里叙事次序的重组，不按事件本来发生的时间先后而是以主观评价的“重要性”和“条理化”来进行，这是饶有意味的行动。它将民众的困难淡化，并成功转移到对“反动派”和侵略者的愤怒上。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首幅图片的选择得到证明。整个展览中出现的第一幅图片是毛泽东题写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如前所述，这幅充分展现毛泽东夺人气魄的图片实际是在大生产运动的尾声时期拍摄的。但当它被安置在运动起始的位置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凸显出领袖决策的高瞻远瞩，而更多的是令人忽略当时大生产运动事出

无奈的现实。正因为这张图片强大的情感唤起能力，它成为基层民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最佳图释，从而永久地固化在每一个观看者的心里。

按照2003年展览馆设计者董玉梅的看法，整个展区的核心展品，是一幅三五九旅当年开荒种地前战士高举锄头誓师的照片和一个玻璃橱窗内摆放的“一把镢头一支枪”的组合展品：而在“镢头与钢枪”的周围，是各种各样的生产和战斗用品，中间最为突出的，则是三五九旅提出的响亮口号：“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sup>[16]</sup>。显然，和首先出现的毛的照片一样，它们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高举锄头誓师的图片与其说是为了展现大生产运动的实际成果，不如说它是一种姿态——向困难和敌人挑战，向党组织效忠的姿态——的定格，这个被实物定格的瞬间，正是卡尔斯·弗兰克尔在论及何谓象征时所指出的那种“能够产生和强化诸如爱与恨、尊崇与轻蔑、热望与冷漠等情感”的“客体或事件”，它“终极指向是某事物所代表的那些情感而不是事物本身”，使人们“对某事物产生赞同或反对的态度”<sup>[17]</sup>。

类似“一把镢头一支枪”的实物组合展品，如三五九旅的旗帜、自制的桦皮纸、木碗、木烟斗，战士自己生产的军毯、军服等等，琳琅满目，旨在以“铁的事实”证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的存在。

结合图片和解说，南泥湾精神中几个代表性的故事及其人物依次跃然而出：创日开荒4亩新纪录的连长刘顺清、踏冰背米的718团团团长陈宗尧、开创南泥湾水稻种植的供给部政委罗章、为王震担任农业生产副官的著名劳动英雄朱玉寰等等。它们分别显示出“南泥湾精神”的几个方面：“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组织起来”、“官兵平等”、“鱼水情深”。通过文字、实物、艺术再现和步步跟进的解说，这些故事及人物如众星捧月，生动和丰满地完成了“南泥湾记忆”这一政治神话的讲述，整个空间也就实现了在前言中执政者所指定的叙事逻辑——“南泥湾大生产，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图片和故事讲述的过程中，解说员会特别强调，三五九旅在陕北改变了当地不能种植水稻的历史，迄今为止，南泥湾仍是陕北唯一种植水稻的地区。对这一点的强调，在人民公社时期旨在证明共产党改天换

地的能力，而今天则被用以证明“把时代精神改革开放跟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南泥湾精神“是一种创造精神”，其应和执政者政治需要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sup>[18]</sup>。

革命纪念展览中国家话语对记忆的控制，在陈列内容调整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对此，据曾经担任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的闫树声回忆，延安革命纪念馆1950年12月从举办第一个文物陈列展览开始，曾经有过8次大的陈列内容调整。其中，第五次，即1968年的一次，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第二次调整：

“当时正处文革期间，制定陈列方案指导思想时，还深深打着文革极左思潮的烙印，即在以路线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陈列的色调上，为体现革命精神，要以红色为主。结果，就把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变成了毛泽东在陕北13年的革命活动史。因此，1973年6月，周总理在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时审查了陈列内容后指示说：‘要一分为二地宣传历史，一个陈列，就是一部历史。……革命不是几个人，要有群众观点，干部观点，要多出一些人的照片和名字。’”

对此，他反思说：“就内容来说，把反映党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历史，修改成了毛泽东个人在陕北13年的革命实践活动；就形式而言，整个展室成了红色的海洋。<sup>[19]</sup>”

有对领袖崇拜的凸显，就必然有对“阴暗面”的遮蔽。在展览馆里，人们为三五九旅劳动模范创造的“一天能抵一头牛”，一天开垦三亩六分地的奇迹而感慨激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人就像牲口一样，两个人顶一头牛”的过度劳动，导致许多战士因过度劳累吐血而死<sup>[20]</sup>。生产模范吴满有与朱德等人的合影，因其变节而在展览馆中被隐去其身份，代之以“朱德同志与农民谈话”的图片说明，而吴玉章在日记中所提及的“特货”则被代之以“特产”的委婉说法<sup>[21]</sup>。在大生产运动中后期同步进行的“整风”和“抢救”运动，其境况之惨烈，今天的研究者已有详细揭示，但在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展出里，却只字未提。此外，前文所提及的南泥湾劳改农场历史，也是一部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生产一整风”规训的血泪史。被访谈人证实，“反右”中被送至此地的劳改分子，需要承担艰苦的劳动，但每顿只能吃一小碗饭，农

民们试图偷偷接济他们食物，但却被看守制止，后来很多人都因过度劳累和病饿死于此地<sup>[22]</sup>。

保罗·康纳顿曾经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sup>[23]</sup>”正是执政者对记忆的精心过滤和控制，塑造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南泥湾精神”，而继续对记忆的控制，也意味着对权力的持续掌控。但事实的真相，则如他所指出的：“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sup>[24]</sup>。

### （3）行动者的四种模式

大生产展览馆的展示和参观过程中，作为人的参与者因其在行动中的角色差异，可被区分为操控者、参观者、效忠者和营利者四种类型。由于这身份的不同，他们也清晰地显现出四种行动模式，即操控者行动模式、参观者行动模式、效忠者行动模式和营利者行动模式。在南泥湾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这四种模式分别显示出不同的效果和功能。

①操控者行动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最权威的操控者——决策策展和布展的执政党——并未出现在展览馆内，但解说员承担了话语权力掌控者传声筒的功能。

如同其他所有的展览，经过严格训练的解说员需要严格按照文本流程介绍大生产运动的由来、概况。利用类似“请随我来”、“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三五九旅是怎样克服困难的”这样的引导式语句，解说员带领参观者依次行进到展览的各个板块，每个板块的解说占用时间、方式，特别是解说的重点事先都有一定之规，以保证话语体系的完整性。在展览馆里，解说员特别强调的是执政者的先进性——不畏艰难、勇抗外敌，力纾国难，爱民如子，上下平等，最重要的是，党创造性地通过大生产运动的发动，一举解除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威胁。当讲到某些故事时，解说员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尽管他未必每一次都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并且要运用解说技巧引发参观者的共鸣和认同。

这些故事经过栩栩如生的讲述，生动的展现出作为执政者的“众望所归”，以强调今天的政权具备强大、普遍和历史悠久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一些细节似乎更加值得关注。例如，为了强化庄严肃穆气氛的需要，馆内设置了要求保持安静的指示牌；在馆内比较拥挤的时候，管理者会提醒参观者依次、顺序参观，这一要求与其说是保持人流秩序，毋宁说是遵从权力话语的要求，刻意营造出革命圣地的庄严气氛，使整个参观的过程神圣化。

在今天的红色圣地里，解说员有时需要面对“不敬”的问题或议论。笔者注意到，他们通常保持沉默。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会出现在“文革”年代，这多少说明，即使是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革命圣地”，意识形态限制的尺度也在放宽。另外一个细节是商业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管理者在对参观者流动路线安排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进门处的商业柜台设置相当巧妙，不动声色地引导了参观者，让他们在参观前就购买馆内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本身是唤起和刻写的有力工具，一方面因其背负的历史价值而完成了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和渗透，从而也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传递到参观者以及更远更广阔的所在，但另外一方面，购买纪念品的商业行为本身，也带有某种消解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构成了对神圣性的解构。

②参观者行动模式。散落在南泥湾广场上的大多数是短期性的参观者，其中不少是那些从壶口瀑布前往延安，顺道短暂停留的散客。另外一些则是专程从延安乘坐大巴前来拜谒圣地的人。他们多半会经过如下行动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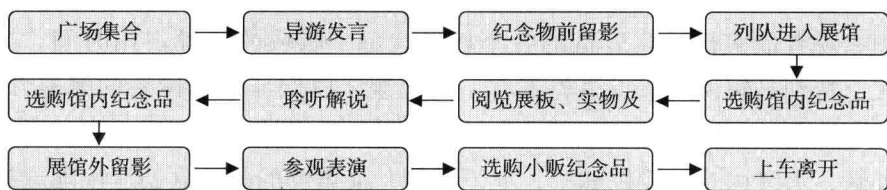


图 7-5 参观者行动模式

在这个行动流程中，参观者一般都能够保持安静、依次顺序参观、不自觉地体验和维护庄严肃穆的气氛。不过，行动流程难以体现出心理活动。笔者对他们进行的访谈，以及他们自己事后所写的游记，则能够体现出他们对展览馆的所思所想。

一位来自新疆武警部队且出身于农垦部队家庭的警官在一次集体瞻仰红色圣地的南泥湾之行中感慨颇深。他认为，这次南泥湾之行让自己



重温了父辈的光荣历史，也获得了丰富的启迪。看到当年三五九旅垦出的水田，他深感革命创业的不易，以及今天生活的美好<sup>[25]</sup>。最后，这位战士和同伴们一起在水田前合影留念，以纪念此次瞻仰圣地之行。

一些旅游者则在博客中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不大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大生产”浮雕，高高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耀人眼目。精明的当地人凭借着南泥湾的政治资源和历史荣耀，开发了旅游项目，在浮雕前摆上几个简陋的纺纱车，供游客参与纺线并摄影留念，每人收钱1元。难得到此一游，同伴们纷纷以浮雕为背景，纺线留影。我当然也不能错失良机。

坐在折叠式小凳上，右手握着纺纱车摇把，摇了一下，做个样子，同伴小王手中的相机就把我们“纺线”的瞬间化作了永恒。这种“纺线”只是一种游戏、一种轻松的体验，而当年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指战员纺线，却是一种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的艰苦劳作，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拯救<sup>[26]</sup>。

在自发写下的这段日志中，参观者把“在南泥湾纺线线”视为“做个样子”的“一种游戏”。他并未觉察到，“轻松的体验”恰恰符合了政治权力在策展时的初衷——“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sup>[27]</sup>。通过这种不失轻松却潜移默化方式，操控者利用参观者的身体，完成了对南泥湾记忆的操演和刻写。

依据所在区域的不同，参观者对南泥湾的理解也呈现出很大的区别。一位解说员观察到，来自有着红色传统的湖南、江西等地的参观者，即使相当年轻，对通过资料和图片所呈现出的这段历史，也多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解说员的介绍能够产生强烈共鸣，并主动介绍自己所在地区的光荣史——“我们那里也有革命纪念馆……”，但是，来自非红色老区的参观者，反应则相对平淡，有些人对展品颇为失望——“都是些锄头”<sup>[28]</sup>。这个细节证明，记忆建构的过程，在思想上通过前人不不断的讲述来实现；在物理特征上，则通过实物唤起并固化民众的记忆。

③效忠者模式。值得关注的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即效忠者模式。参

观者前来并非单纯的游览，而是带有强烈的仪式意味，如在纪念碑前宣誓入党，或在7月1日“党的生日”前来红色革命圣地“重温革命传统”，等等，都具有浓厚的宣誓与效忠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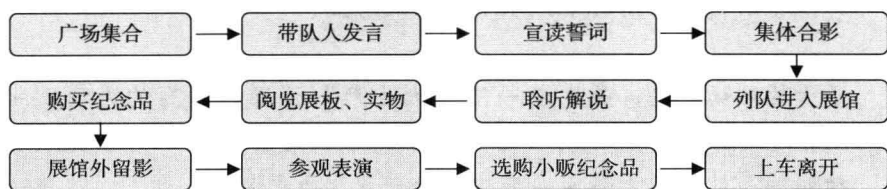


图 7-6 效忠者行动模式



图 7-7 纪念碑前的宣誓<sup>[29]</sup>

在广场上庄严宣誓的新党员入党仪式，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通过身体实践进行记忆刻写，以实现组织成员规训的过程。与参观者相比，他们的程序大致如图 7-4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效忠者的行动模式与参观者模式有类似之处，但多出环节为“带队人简短发言——新党员宣读誓词——集体合影”这个部分。在带队者的简短发言和其后的支部书记发言中，参与者都一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并展现安静和凝神倾听的姿态，而发言者的讲话简短、有力，显示出对革命圣地的崇拜，

并期望新的组织成员能够从在圣地进行的这一特殊仪式中汲取力量。

可以看到，这类保罗·康纳顿称之为“体化实践”的仪式事先经过了精心的安排<sup>[30]</sup>，程序严谨，准备充分。宣誓的背景通常不仅有纪念碑和雕像，还有特意远道带来的鲜红党旗——它因出现在革命圣地而带有了更多的神圣性——而成员们也高度配合其操演的过程，宣誓的动作整齐划一，声音铿锵有力，宣读誓词熟练流畅，这些行动“通过一系列经过特殊编排的操演程序，将身体装扮成政治生活中的视觉代码”<sup>[31]</sup>，通过严密的固定动作和展现的姿态让参与者实现记忆的“身体实践”，在严格的规训中展现出组织成员对党组织政治理念和光荣历史的高度认同，表达对权威的信仰和个人的忠诚，并进一步达到刻写和固化的目的。参观者事后所写的一些作品以及发布在网络上的日志显示出，这种通过身体实践来进行记忆刻写以实现对组织成员规训的方法效果显著。例如，一位北京大学生干部在他的感想中写道：

在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时的旧居前，我们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学生干部在旧居前的院子里，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拳，郑重发出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誓词。宣誓完毕，我们一起唱起了传唱已久的《南泥湾》，歌声在院子里缭绕，飘到了山沟、田野，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激起了涟漪。<sup>[32]</sup>

通过具备强烈规训色彩的“现场思想教育”环节的加入，效忠者的行动模式展现出更为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权威的力量在其中得以彰显。而这种在广场上举行的入党宣誓仪式，同样也起到了唤起其他参观者记忆的作用，加深了参观者对“革命圣地”的神圣观感。

④营利者模式。最后一种，也是比较容易受忽视的，是红色圣地里的营利者行动模式。展览馆场内把开头的最重要地段交给了纪念品柜台。不过，由于地点的神圣性，给这里的物品渲染了神圣色彩，因此，商业色彩是隐蔽其中的。展览馆外的广场，则显得更加具有现代商业社会的特色。这些摊贩的行为模式，似乎更能够说明商业与历史是如何巧

妙结合以达到依靠红色记忆营利与依靠营利来传播红色记忆的“双赢目的”的。

在广场上的营利者主要以摊贩、红色歌舞表演者、摄影者为主。广场小贩热情招呼正打算进入展馆或已经结束参观的游客，大声推荐领袖塑像、仿制的文革像章、VCD、明信片等等，如果发现游客不感兴趣，则转而向他们推荐富有本地特色的陕北剪纸、绣品等民间特色工艺品。几个摄影摊点通过能够轻易唤起参观者记忆从而引发“角色扮演”兴趣的八路军服装、陕北农民服装来招徕参观者。看到这些富于象征意义的服装，游客们纷纷花上三两元钱扮成八路军战士，模仿他们刚刚在展览馆中看到的历史图片，在雕像下模仿纺线或耕地。

这一类的角色扮演，在全国各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在故宫，你可以穿上“皇上”的龙袍；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你可以穿上藏民的皮袄；在桂林，你可以穿着“刘三姐”的绣花围裙在大榕树下留影；在大渡河，你可以扮演飞夺泸定桥的红军战士。人们乐此不疲的原因，通常被总结为好奇心和“怀旧情绪”——实际上，这种在某一纪念地发生的具备传染性的怀旧情绪，恰恰体现了集体性的社会记忆的力量。

假如深入观察，很容易注意到，在这种看似可以自由选择且其乐融融的角色扮演场景背后，仍然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例如，扮演国家执政党的领袖是被严厉禁止的。另外，不得不注意的是，摄影者通常也不愿提供“敌方”如国民党军队或日军军服，与其说这是商业因素所致，不如说是展览馆方、游客及营利者各方共同遵守的角色扮演禁忌：在革命圣地出现“敌人”是不被允许的，甚至仅仅是扮演“敌人”取乐的想法，也属冒犯之举<sup>[33]</sup>。唯一在这里出现“敌人”角色的可能性，只可能是某个现场戏剧演出中为反衬执政党的合法性而出现的“反动派”，而演出应当明确地让观众们认识到“敌人”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最终，这个敌人的角色必须被消灭或降服，否则就无从证实执政者的“光荣、伟大”。上述潜规则体现出集体性的社会记忆有别于个体记忆的另外一个特点：它虽与个人经验有关，但暗地里仍然受到权力的严格约束。这一点福柯早已指出：言语中存在着“禁律”（prohibition）“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sup>[34]</sup>

类似的“潜规则”其实随处可见——例如，作为革命圣地这一特



图 7-8 戏仿大生产

殊场域中的弱者，营利者们必须服从管理，上交摊位租金。因此，这些被特许经营（它意味着被授权并需要按时向授权者上贡）并必须按时缴纳租金的小摊贩们必须顺应权力的要求，销售意识形态许可的物品（你无法想象这里和中国其他熙熙攘攘的市场一样会出现关于毛的禁书）。另外，使用红色话语来招揽顾客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吆喝的人中，有不少是因故失学的少年儿童。在附近的金盆湾中学，尽管实行了两免一补的政策，但由于高中学费高昂，初中毕业之后能够有机会进入高中的学生只有不到 20%。<sup>[35]</sup>在广场上以捡瓶子方式向参观者诉苦以获得同情和少量收入的 16 岁女孩 SDD，虽然是因为成绩不好选择在小学毕业后不再读书的，但她也无法出外打工，因为她是超生儿童，迄今仍然未能上户口和办理身份证。于是，她流落在广场上<sup>[36]</sup>。凡此种种，不啻是对某些大道理的一种讽刺，但也构成了被消费主义冲击的中国当代社会里特有的社会记忆建构方式。

#### （4）生产劳动体验教学：一次完整的记忆建构

相对于游客们在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的短暂停留，另一种更为深入和系统地“形塑”大生产记忆的方法，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

教育基地推出的“生产劳动体验教学”。作为红色政权的一个标志，延安每年要迎来大批到此学习和体验“延安精神”的国家干部。其中，作为国家级培训基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声誉颇隆：它是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专门负责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军队干部进行中共党史、党建理论、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进行培训。

在一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教学宣传课件中，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被简练表述为“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有机统一”。它写道：

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是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着眼于新时期干部教育的新特点和新需求，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探索与实践，是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重要指示的一项重大举措。

基地依托南泥湾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和今日南泥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努力达到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有机统一。

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设在南泥湾镇桃宝峪风华北京知青林，依托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等9个革命旧址旧居和北京知青林150余亩生产劳动规划用地，运用现场讲授、现场点评和参观体验等活动实施革命传统教育，以多样化的生产劳动活动，体验艰苦奋斗精神，增强革命激情；依托南泥湾镇14个自然村，以农村基层党建、三农问题与村情民情调研、新农村建设等为主题实施基本国情教育。

南泥湾综合教学点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为主线，把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相结合，融课堂讲授、现场体验、社会实践于一体，使学员通过参观革命旧址旧居、参加生产劳动等现场体验活动，感受当年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英勇气概，体验和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内涵，并通过深入农村，了解三农，开展基层党建调研等实践活动，感受今日南泥湾人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精神风貌。

这个基地开设的课程包括：《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三五九旅辉煌的战斗历史》《宝塔区农村基层党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参观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毛泽东旧居、烈士纪念碑、九龙泉、中直干休所、三五九旅旅部、延安炮兵学校旧址等现场体验课。实地调研课程包括对桃宝峪村的实地调研及生产劳动体验等。特别要提及的是，该基地有生产劳动规划用地 150 余亩，能够让学员进行农作、林业等数种农业生产类型的劳动实践，将“科学细致的生产教育把生产体验与认识农事规律紧密结合”。从教学的方法来看，可谓生动和丰富，而从社会记忆的传承的角度看，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记忆是通过具仪式意味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sup>[37]</sup>。从官方表述上可以看出，如果说参观旧居是唤起记忆的主要方式，那么，参加生产劳动则是典型的“体化实践”的过程。在生产劳动体验教学的过程中，对这些从未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年轻干部而言，“南泥湾记忆”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在此一仪式化行为中的身体实践，来自“依令而行”的操演行动及其所带来的直接感受，正是这些通过身体实践而得到的感受，让他们获得和保持了集体的记忆。

在对桃宝峪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的实地调查中，笔者访问了部分当地工作人员及农户，不过，由于课程并非定期安排，在桃宝峪，笔者未能获得课程内半参与式观察的机会，只能依靠对现场环境的观察，以及与当地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来获取资料。

资料显示，这些学员身着统一服装，学习课程以课堂学习为主，实际参加劳动不超过一个小时。此外，次日早晨会安排到村里入户调研及访贫问苦的活动，为时大约 1 小时，主题主要是了解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和农民收入及医疗保障等问题。

笔者看到了教室内贴出的“生产劳动作业”课程安排，这些劳动课程从三月到十一月，依据当地农时分别安排了种植、收获玉米、土豆、荞麦、向日葵等本地农作物的活动，相当丰富。不过，从班次劳动登记表上可以看出，这里安排的学习班次并不多。我也从工作人员那里证实了这一点。据他们说，2011 年安排的仅有两次课程，每次为时两天。事实上，由于住宿环境较为艰苦，无法供应热水洗浴，学习者只在当地住宿一晚。

当地人对“生产劳动”体验的实际效果并不持乐观和肯定的态度：“急急忙忙地来，到当地村里呆个把小时访贫问苦，给个 100，200 的，急急忙忙地就走了。<sup>[38]</sup>”——这是当地一位农民对此类课程的评价。一



位村民则更加坦率地说：“都是大干部，哪能知道底下事情？来一趟，是为回去升官做准备嘞。<sup>[39]</sup>”这些评论，与学员们所学习的“艰苦奋斗”精神形成有趣的呼应。

笔者也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了一位记者对这一课程的观察和叙述：

如上述例子所示，现场体验课不光是游览红色景点，参观后有讲述点评，重要现场有半小时以上的专题讲授，互动研讨。有时候，学员还必须调动身心投入体验，例如再次宣誓；季节适宜时，他们必须到南泥湾拿起锄头参加劳动；又或者，需要唱歌。

课程表设有“激情教学”单元，学员得学唱革命歌曲，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要唱《游击队之歌》；还拉队到黄河壶口瀑布去齐唱《保卫黄河》，回忆抗战时期冼星海等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危机感。学院相信，澎湃的河水可激起干部保家卫国的决心意志<sup>[40]</sup>。

上述资料显示出，这个把“南泥湾记忆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国情相结合”的课程，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系统性记忆建构的过程。它通过集体化的仪式，通过统一的服装、语言、每个人都参与和体验的操演活动，完成了唤起、操演、刻写到固化记忆的一个完整的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而在革命传统基地的教育中纳入对当代基本国情内容的分析和训练，则证实了弗朗西斯科·德利奇对记忆的观点：“记忆是不断更新的重新建构”<sup>[41]</sup>。

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需要一以贯之地通过反复强调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而其主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各种时间点、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回溯和歌咏先辈确立政权的光荣历程。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社会记忆重建和确立的过程”正是“社会秩序的这一合法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中的参与者无论是否曾经亲历其事，都“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sup>[42]</sup>。这个共同记忆其间有真实存在的事件，也有辗转叙述之后以讹传讹的部分，有感怀，有想象，有抒情，更不乏夸大或隐蔽的内容，它们虚实相生，构成了参与者的集体认同并代代相传。

对于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南泥湾精神”正是他们需要让全社会民众集体铭记的共同记忆。它象征着执政党的优秀品质和唯



一先进性、象征着它与人民之间相互深厚的热爱之情，更象征着它强大的改造世界的的能力，以及由此期许的中国人民的美好未来。大生产展览馆对于“南泥湾记忆”的歌咏叙事，是国家塑造南泥湾垦荒等一系列“神话”最具存在感的一个物质构件，它所象征的“南泥湾精神”有力地形塑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蓬勃向上、鱼水情深、官兵平等之类的一系列固有印象，加深了民众对这段记忆，以及它所从属于的“延安精神”的认同，由此，执政党的合法性得以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确认。

## 2 村落记忆与中国现实

必须关注到的一点是，南泥湾不仅是一个叙事地名，在红色记忆中被频繁提及，同时，它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地理实在。本节，研究者将视线从历史铺叙转向这段记忆所扎根的现实乡村——今天的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占地面积356平方公里，属下包括南泥湾村、马坊村、桃宝峪村等在内的14个行政村落，人口大约7000人，其中，4000余人为农业人口。

作为一个国家力量高度控制的乡村样本，作为闻名遐迩的大生产运动的发源地，在歌曲中被呈现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南泥湾，和中国其他村庄一样，在50年间也经历了多次以国家力量为主导进行的运动式乡村改造，不过，其改造的结果，并不像官方媒体和官修史所记载的满载光荣与骄傲，而是更多地伴随着饥饿与困惑。

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马坊、南泥湾、桃宝峪、阳湾农场等南泥湾镇所属村落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希望由来自乡村的回忆中逐渐复原有别于官修史中对南泥湾光荣历史及新农村建设的民间记忆，并考察它们是如何与官方记忆并存于人们的脑海中，并经过选择、强化与遗忘，以及断裂和解构，从而形成个体记忆的自洽逻辑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部分，笔者经过慎重考量，选择了几个关键词来作为散乱丛杂的民间回忆的主线，因为，它们自始至终贯穿于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之中。

### (1) 饥饿、生产与斗争

与“大生产”所给予人们的丰饶意象相对，饥饿的阴影，一直萦绕在这片土地的真实回忆之中。在南泥湾，形容一个家庭经济困难，最常用的词既不是“穷”，也不是“困难”，而是直指口腹的一个语汇：“吃不上”。

40岁往上的人，无论如何看待南泥湾的历史，首先谈到的，谈得最细最生动的，总是“吃不上”，以及他们如何对付这种艰困的日子。

86岁的老农CLY是马坊村今天仍然健在的老人中最早迁居于此的一位。他来自榆林市米脂县。据他说，他很小就加入了红军，担任送信的任务，并因为工作优秀入了党。但是，在送信的途中时常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盘查，为安全计，不得已丢弃了党章——这在当时很常见。

1943年左右，边区政府号召榆林、绥德等地没有地的农民移民到延安开垦荒地，“吃不上”的CLY决定响应这个号召南下移民。拿着政府给的路费，他走了七八天，才来到延安，随即被分配到南泥湾马坊垦荒。当时，这里驻扎着三五九旅8团的士兵，此外，和他一样来到这里的，大约有20来户垦荒移民。

在老人眼里，南泥湾是个养穷人的地方，荒地很多，只要愿意出力，就能够靠瓜菜和粮食养活自己。8团的士兵和他们一样，需要上山“掏地”，种植玉米、小米等粮食。

CLY坦率地指出，种植粮食瓜菜，并不够士兵们自给，当地一直有种植“特货”的传统，但边区政府明文规定，老百姓如果偷着种，则不仅要铲除，还要受到处罚。

及至1958年大跃进时期，饥饿达到了最高潮。南泥湾因为山地多，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惨剧，但人们谈起当时的饥荒，仍然历历如在眼前。

CLY对这段历史记得异常清晰。作为当时生产小队的队长，时至今日他仍然能够列举出公社食堂所规定的、不同人群的粮食配额。按照这个规定，孩子分为四等，0~4岁的孩子是4个人合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馍，5~8岁是三个人合吃一个馍，9~12岁是两个人合吃一个馍，12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和大人同样待遇，每人分得一个馍。但是，这个馍并不是白面馒头或者玉米窝头——它是由杂草面制成的，几乎不含任何真正的粮食。至今，老人还能够清晰地列举出其中的成分：榆叶、草籽、

灰条籽、苦菜等等，非常难吃<sup>[43]</sup>。

66岁的HXZ在大饥荒期间从外乡逃难而来，她的饥饿记忆始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她还住在河南，合作化时期，村里和其他中国乡村一样，建起了公共食堂，大锅吃饭，集体劳动。家家都被收了锅，用镢头砸烂去大炼钢铁。如果家里冒烟，意味着这家没有遵守规定上交粮食和炊具，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很快粮食就不够吃了，三个人才能分一马勺的稀饭，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把煮黑豆。

由于村庄里的人大批饿死，家人决定带着HXZ外出逃荒。在西安亲戚家短暂停留之后，全家人决定到陕北这个“养穷人的地方”避过大饥荒。

最终选择南泥湾的原因，一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另外，更主要的是，当时“南泥湾”这首歌谣已经传唱开来，老百姓都知道南泥湾是个“好地方”。由于聪明伶俐，很快HXZ就在年仅16岁时成为南泥湾村的妇女队长和妇女大队主任<sup>[44]</sup>。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被问及三年大饥荒的起因时，老百姓们都习惯性地遵循着官方话语表述的逻辑，认为这场灾难应该归咎于自然灾害。但当我追问那年村里的粮食产量和气候变化时，他们在仔细回想时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产量与旧年相比“差不多”，事实上，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灾害发生。HXZ承认说——“没有特别大的灾害”，但“粮食都给国家交了。<sup>[45]</sup>”另一位老人形象地说“打下两颗粮，都叫官家交公粮了”<sup>[46]</sup>。

他们回忆说，当时生产队打下的粮食无论多少，必须先按照定额送交公粮粮库。由于浮夸风，当时纷纷吹嘘“亩产万斤”，因此，公粮定额也是按照这浮夸的产量来制定的。于是，政府几乎拿走了所有的粮食。

人们对当时收缴公粮的苛刻程度印象尤其深刻，粮食必须完全晒干，只要有一点点潮气，粮库就拒收，小米必须“剥得净净儿的”，有一点点米皮，就拒绝入库。“黑天半夜驴驮上，去了还不收。”人们总是要送上三回两回，才能勉强过关。一位老人清楚地记得，家里还剩下一点点粮食，也被生产队拿走作为公粮上交了，队里交完公粮余下仅有的一点，则作为生产队食堂的口粮。一位村上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

极分子”坦诚地承认，在家里粮食被拉走的时候，虽然想过粮食“不该收得这么狠”，但“谁敢说了？外面不敢说。”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国家的粮食政策。即使饿得孩子哭喊，也只能忍耐。

人们的集体记忆之所以高度一致，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共同目睹了某个事实，而往往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了某些话语。这些话语在重复讲述之后造成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多年之后仍然深存于他们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事件载体的它们最终与事实紧密相连，难以区分。在南泥湾人有关饥饿的记忆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突出：当回忆起自己饿饭的原因并非自然灾害时，农民们紧接着就想起了另外一条当时国家反复宣传的饥荒原由，把国家拿走几乎全部粮食的原因归结为“苏联人逼债”，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年农妇，也能够流畅地提及赫鲁晓夫、苏修等高度政治化的语汇。他们也多次向笔者讲述同一个故事，即苏联人在逼债时是如此苛刻，用一个漏子来量鸡蛋，凡是掉下去的鸡蛋就是小的、不合格的，只有卡在漏子里的鸡蛋，才被允许用来还债<sup>[47]</sup>。

这些居于深山中的老年农人，谁都没有见过苏联人逼债和国家还债的过程，但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每个人都深信不疑。这样，虽然当时并未发生明显的自然灾害这一点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官方叙事相矛盾，但加上“苏联逼债”这一点，人们就为当时的饥饿找到了一个与官方说法大体一致的叙事逻辑，而因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并在数年后度过饥荒的经历，为他们带来了战胜外族横加于国家的困难的尊严和成就感，从而使得个体经验与官方记忆保持了大体上的逻辑自洽。这种逻辑自洽对农民们非常重要：在当时，它是在艰困生活中支撑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

私自开伙被悬为厉禁，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你隐瞒了家中本该属于“国家”的那部分公粮，还破坏了集体化生产和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吃饭要全体走到数公里外的公社去，再集体走回来。有时候，这段路程耗时要两个半小时。农民们怨声载道，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可受老罪了。”

当农人们一点点回忆起当年的细节时，其朴素的词汇比他们被灌输的那些故事，更能够表达这三年的实质——在南泥湾，老人们回忆起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艰困时光，把它形象地叫做“三年饿饭”。在这个语汇中，饥饿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际关系问题，对他们来说，那就是

“饿饭”，且长达三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这漫长的饥饿中失去了至亲或者近邻。

这是他们能够看见并亲身体认的事实。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饥荒——此前，中国发生的最严重饥荒，死亡人数是一千万人<sup>[48]</sup>。

时隔 50 余年，人们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食谱”，乃至身边亲友邻居的悲惨故事。一位名叫 GJY 的妇女记得早期还能够吃到一点真正的粮食，一个庄开一灶饭——一个村只能分到两勺饭，里面是小米和洋芋疙瘩，为了让大家都吃到，就加上大量的水和树叶，煮成稀饭，分到手里，碗里面只有一口稠的，还全是野菜叶子。她记得当时自己吃过的包括槐条皮、苦菜、榆树叶、麸子、五加皮叶子以及红薯皮，还记得自己嫌苦不肯吃，母亲硬朝自己嘴里塞。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一天两顿，早上是树叶，晚上还是树叶。”吃了浑身都肿，不少邻居饿得生病，后来很早就病死了。但她回忆起榆林外婆告诉她的村里更惨烈的故事时，觉得自己算幸运者——“一个老婆婆带着孙儿，两个人都快饿死了，晚上去看，娃娃还在，第二天早上，娃娃没了，老婆婆在吃肉。第三天，老婆婆也死了。”

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但另外一位老人说到附近的高西沟人，当地人饿死了不让往外说。饿得没办法时，有吃草根的，有吃牛粪的，也有吃“软石头蛋子”的。人们不需要询问彼此充饥的招数，通过对方的嘴角就能够看到吃的是什么：吃草根、牛粪的满嘴乌黑，吃软石头蛋子的嘴里一直吐黄水，最后，“吃牛粪的都活了，吃软石头蛋子的都死了。”一些场景的碎片她至今仍然能够极其鲜活地描述出来——就像沙砾里的石英碎片一样在记忆中闪烁发光——例如，她记得人们饿得肿到发亮、透明，撩起小孩的衣服，肚子里吃下去的黑豆都能够看见。这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闪光灯式记忆”（flash - bulb memory），一种在高度紧张与情感反应的境况中形成的不可忘记的体验<sup>[49]</sup>。

饥饿的体验一直持续到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在这项制度实施之前，“一直没有吃饱过”是老人们不约而同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说到今天的生活改善时，最常使用的一个例证，是自 80 年代以来这 30 年终于吃饱了，今天还顿顿吃上了细粮。至于城市家庭每顿能够保证的荤素搭配，在他们仍然并不常见。即使如此，老人们也已经非

常满足。

对那近四十年的历史，人们忆及往事，除了饥饿，最常提及的是生产话题。与传统的、较为灵活散漫的生产方式相比，1949年之后的生产记忆，其主旋律是紧张和机械的，充满了战斗的气氛。

有意思的是，在说到生产劳动的主题时，老人们除了在引述口号时频频使用“生产”这一政治语汇外，另一并行使用的民间语汇是“受苦”。在当地，从事生产的农人被叫做“受苦人”，而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公社以上干部则被称为“干部”或者“官家”，或者“公家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公家人”是与“受苦人”相对立的一个身份。

之所以被称为“受苦”，是因为它的确名副其实。老人们回忆说，每天鸡叫就要摸黑起床，集体集合前往生产队的集体耕地里进行农作。到大约10点钟，人们才可以回家吃一天两顿饭中的第一顿饭，餐后休息1~2小时，下午继续耕作直到晚上。

“修水利、炼钢铁、种地，（苦）可受结实了。”老人们回忆说，当时生产队所有劳动力分为三拨，一拨去修水库，一拨大炼钢铁，还有一拨人留在家里耕作所有土地，连小孩子也必须出动去干活。在生产最紧张的年代里，不仅吃饭是在田间，晚饭后还要“夜战”两到三个小时。革命年代的火热生产，常常长达12小时，让农民们疲惫不堪。加上饥饿，导致不少人生病，但是，生病也不能随意休息，大病必须凭医生的假条才能请假，小病则必须坚持劳动。不过，农民们自有自己抵抗的方法——“上工，吊死鬼寻绳；下工，李闯王进城”。因此，虽然工时漫长，生产效率却极为低下。尽管如此，一次次生产运动还是不断进行着。

“搞运动是为了生产起劲，叫干甚就干甚。”运动的威力让人们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大多数时候不打不骂，人们尤其害怕开会，把开会称为“软刀子”。大多数时候，开会不打、不骂，但却漫长而充满说教、逼迫被批评者进行当众的自我反省。

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除了“夜战”阶段，生产队几乎每晚都要“开会”。这使得散漫惯了的农民们厌烦不堪。

“一晚上收拾一回，一晚上收拾一回……麻烦得不行，农民都怕着哩。”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抱怨，因为公开的抱怨很可能引火烧身，导致自己成为批斗的对象。

在“夜战”期间，生产与斗争之间有比较规律的节奏——一般来说，是两晚“夜战”，一晚开会，表面看来，开会使人们在体能上有所休整，但农民们似乎更愿意“夜战”而不是开会，严格的思想管制令人畏惧，加上劳动管制的严苛，让人们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

如果说教没有明显的效果，则只能采取批斗的形式，胆小的人在这种批斗会上被吓破了胆，甚至有寻死的。CLY 清晰地记得，村子里一共有三个人死于批斗及批斗之后的畏惧。一个是退伍军人，一个是会计，他被指责为贪污的支书进行了账目隐瞒；还有一个是个普通农民。CLY 已经记不清他犯了什么错误，似乎事情本身并不重大，但批斗的严厉让这个农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如此漫长的生产，很明显并没有提高生产的效率。对此，老人 CLY 承认，“一人一个想法”的农民们并不适应这种运动式的集体生产劳动。一个月定多少工，规定干多少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犯一点错误。

对此，老人们精辟地总结说，当时的生产队“人人都有制度”，虽然这样严格的制度让人们不敢干坏事，但仍然有数不清的批斗和自我检讨，让人们望而生畏。

“战天斗地”、“夜战”、“抓革命，促生产”——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表述方式，充斥在这些几乎不识字的老农们的记忆里。不过，似乎没有什么人将它们与声名显赫的大生产运动联系起来。在南泥湾军垦农场的墙上，迄今还保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农业学大寨”——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寨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国家将生产政治运动化，风暴式投入，典型化宣传、夸大产出的运作模式，军事化驱使与思想改造同步进行，其实最早起源于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关于南泥湾的生产，必须提及的还有一段劳改农场的历史。

三五九旅是 1944 年 11 月离开南泥湾的，除了少数留下的老兵仍然在此地耕作度日，此后，南泥湾不复当时的繁盛。虽然有少量绥德、榆林等外地来的流民流浪至此安家落户，但由于地广人稀，大生产运动中开垦出的大片荒地，逐渐荒芜。

不过，直到 50 年代末南泥湾再一次接受因大饥荒而逃难至此的大规模移民之前，这里还存在着一支特殊的垦荒队伍——劳改队。一直为史家讳言的是，在 1943 年之后长达 10 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建设者不

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军队，而是劳改犯人。这一段不见于官修史学及红色记忆的劳改垦荒史，从4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在南泥湾实际上从未中断。

关于劳改队到来的准确时间说法不一且今日已经难以考证，当时在此垦荒的一位老战士回忆说是1945年<sup>[50]</sup>，其时，大批在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捕的延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为“特务”、“反革命分子”之后，送至南泥湾进行劳动改造。作为思想改造的配合，他们必须通过极度艰苦的劳动，实现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改造，即笔者前面所反复提及的“生产—整风”双重规训的过程。

1947年从榆林来到南泥湾的村民GWS目睹了当时劳改队艰苦的劳动改造生活。他说：

“那时候山上就主要种糜子、谷子么。种什么吃什么，他们一顿才吃那么一碗小米饭。有人要给他们吃点玉米窝窝，得偷着给吃，结果就不叫吃，解放军不叫吃。那些人开荒可好看了，一上山，解放军上面下面都有保卫着呢，怕他们跑了。<sup>[51]</sup>”

垦荒生活是艰苦而残酷的——劳改队人犯最终绝大部分都死在改造的过程中：

“掳回来（意为押送来的——笔者注）的人开的这沟滩地，他们都受死了，病死了。<sup>[52]</sup>”

“那时那些来种地的人都死完了。<sup>[53]</sup>”

反右斗争开始后，南泥湾作为劳改农场所在地，接受了大量劳改“右派”。对这段历史，南泥湾的老人们并不主动提及，但当有人提出相关的问题时，他们也并不讳言。无论是抢救运动中的“劳改犯”，还是后来的“右派”，今天回忆起他们劳动的艰苦程度，农民们仍然有着深刻印象。本着善良的本性，人们还偷偷接济这些被荷枪实弹看守的“敌人”。被反复提及的一点是，劳改犯们一顿只能吃一碗小米饭，有的时候，他们出于同情想要偷偷给个窝头，却被看守的军队战士阻止。

这些身份不明的犯人中有不少死于劳改。HXZ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埋葬地点，是在一条隐蔽的山沟里。那个沟里大约埋了近200人，只有一块简单的木牌，有的人甚至连木牌也没有就静静沉睡在这里。

南泥湾作为劳动改造所在地的历史从4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60年代中期，有近20年历史。直到1965年前后王震因听说当年自己的革命样



本变成了劳改农场，大为不满，陕西省有关部门才不得不花近3年时间，将劳改农场迁移至姚家坡。南泥湾劳改农场至此结束了它的使命。

必须提及的是，村民们对大生产的记忆中虽然一直贯穿着“吃不上”、“受苦”“劳改犯人可怜”等主题，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时强调那个时候劳动的“红火”、“可高兴咧”<sup>[54]</sup>。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会有意无意对集体化劳动的方式和生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基于亲身经验的比较。他们既承认集体化生产任务重、时间长、监管严格、效率低下，同时又指出那个时候相对平等，连小队长也需要带头参加生产，同时，集体化的劳动方式让兴修水利等艰难的任务得以完成，而今天的人们至今仍享受其余荫。而比较今天的生活，他们既承认“生活好了”，但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深深的失落和不满。

如何理解这一看似矛盾之处？笔者认为，农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来自于集体生产的先进和优越，当然更不可能来自极端贫困的生活体验，而来自他们今天相较而言社会地位日益低下的现实。周晓虹曾经在论述江浙农民的心理嬗变时指出：“尽管因为农业政策的一再失误而使农民的生活不断恶化，但对地主阶级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剥夺，能够有效地使生活水平绝对下降的贫下中农获得心理上的相对满足的感觉。<sup>[55]</sup>”与此相形对应的是，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物质生活改善了，但农民们社会地位的日益边缘化和与城市生活水准的拉大，加剧了相对而言的强烈被剥夺感，使他们产生了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此外，贫富差距加大也是造成农民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水准距离迅速拉大，让有机会进入城市的农民们深感失落和痛苦，同时，即使是在一个村落内部，贫富差距也十分明显，如马坊村里的一个砂石厂老板年收入达到20多万，而普通村民一家人2010年一年的收入不过3万元左右，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了心理落差，使得文革时期的极度贫困但相对公平的生活变得令人怀念。<sup>[56]</sup>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了过去的苦难记忆<sup>[57]</sup>。

## （2）三次“新农村建设”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70年代、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南泥湾的乡村基层都曾经多次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进行过一轮又一轮的乡村改造运动。尤其是当地最大

的一个行政村马坊村，由于土地多，基础条件相对较好，在70年代就曾经自发兴起一轮旨在改善村民卫生和居住条件的乡村建设，并很快受到了政府的注意，迅速被树立为当时“新农村建设”的全国典型，还曾经登上《陕西日报》《红旗》等官方重要媒体。

20世纪50年代，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围绕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在这个时期，国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形象地描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初步树立起以大寨为代表的一批典型村寨，以及以陈永贵、吴仁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民”。其最为突出的成绩，是在全国兴修水利，建设了大批水库和灌溉工程，迄今其中很多工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此外，这一阶段的新农村建设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1958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建立了敬老院、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

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并非是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要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是一种动员手段，导致城乡差别加剧。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是，国家对新农村建设很少实际的资金投入和政策优惠，其动员手段主要体现为政治运动和口号宣传，口惠而实不至，实际的投入完全依靠乡村自身和农民个体的人力和菲薄物力。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处于文革期间，这一阶段的新农村建设突出特点是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通过人为制造乡村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不得不依附于政治权力以求自保。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手段和大量资金的暗中扶持，持续制造一些极个别的“典型”如“大寨经验”等，而后将其作为普世经验广泛推行，要求农业增产增收，保证粮食产量以维持城市需要，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这种无视区域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的生产经验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改善民众生活和生产条件的。

纵观这三个十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求增产增收，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在这个时期，农村建设的投入主要依靠农民的非常规高强度体力劳动，以及在严厉的政治威慑下超常规的物质付出。因此，在这个阶段的新农村建设，

尽管提出了种种目标，但都把改善农民的生活放在次要的位置。由于国家缺少投入，而农民们由于农产品的剩余价值被剥夺而无力投入资金，只能依靠大会战式的方式投入人力，难以持久，因此，一方面，生产效率在实质上没有很大提高，而为了政治宣传，不得不采取“假、大、空”的方式完成所谓“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对这一乡镇60年来新农村建设的回顾，也许可视为中国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是老人们关于生产记忆中时常提起的一段。这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于1970年，重点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粮田，并在中后期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南泥湾的如下“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三台庄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时时处处听毛主席的话，继承和发扬三五九旅当年在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几年来，三台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兴建了十六座水坝，整修了六百多亩川台地，对增产粮食起了重要的作用。

……去年，三台庄大队成为延安县第一个粮食跨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大队。他们向国家交售的粮食逐年增多，集体的储备粮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几年来，由于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大牲畜也猛增了一倍多。这个大队还依靠自己的力量，添置了拖拉机、播种机、粉碎机、铲草机等十部机器，使不少工序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现在，在三台庄大队呈现着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昌盛的景象。<sup>[58]</sup>

由此可见，当时的新农村建设，其首要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除此以外，改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也是当时新农村建设运动中比较重要的要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泥湾镇马坊大队<sup>[59]</sup>的村民在大队支书张向华的带领下，自发兴起了改善村民生活的一轮建设，并登上了《陕西日报》、《红旗》等党报媒体，使马坊大队成为当时陕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一面旗帜。

70年代马坊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除了当时普遍实行的农田水利建设之外，主要还包括三项内容：建立大队合作医疗站，实行新的合作医疗；修建自来水；以及建造成排的窑洞，统一规划住处。

马坊大队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大队内部的合作医疗为开端的。1972年前后，当时实行的合作医疗方案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还是马坊大队赤脚医生兼大队副书记的张向华经过调查，制定了本村新的合作医疗方案。根据当时的大队会计李致忠的介绍，为了筹集资金，节约开支，村里专门派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汉，划出一块地来种中药材。收获的药材一部分留下，供医疗站自己使用，配一些中药，另一部分就是卖钱，卖得的钱由生产队统一支配。医疗站的中药不需要花钱，只有西药需要自己购买。需到外面诊治的疑难重症，回来后也实行报销制度。由于有种药材的收入，生产队里还会对村民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些补贴。此外，医生是以工分的形式获取报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医疗方面的诊疗费支出。因此，农民的医疗费用很低，从这种合作医疗中得到了实惠。

合作医疗实质上是一种通过计入集体劳动公摊诊疗药费的形式。从当时的现实条件衡量，马坊村的合作医疗是成功的，逐渐引起了上面的注意。1972年底，马坊村的做法被《陕西日报》和《红旗》杂志报道，名噪一时<sup>[60]</sup>。

马坊新农村建设的另外一项重要突破是修建自来水工程。由于马坊村的合作医疗效果突出，卫生局对这里给予了重视，派干部驻队蹲点马坊。1978年，马坊村在卫生局的帮助下，对原有的水源系统进行了改造。马坊原有水源为井水，水质较差，人吃了容易得大脖子病、大骨节病等疾病<sup>[61]</sup>。卫生局经过寻找、鉴定，发现山另外一边的泉水质量较好。通过政府拨款，马坊建起了自来水系统，直到21世纪初，马坊民众所使用的，除部分管道有所更换外，仍然是70年代的这一套自来水系统。

在合作医疗和自来水工程完工后，马坊开始着手“新农村规划工程”。规划的重点是修建新的成排的窑洞供村民统一居住。当时，马坊村分为两个自然村，有三个生产小队，分别住在两侧的山上，第一、二小队住得比较近，第三小队相距较远，形成了另一个自然村。新农村规划的重点，是修建两排大型连窑，将两个自然村和三个生产小队合并起来，集中居住。但由于面积不足，因此统一规划，规划修建两排四十孔

的连窑，以此来解决新来的搬迁户和原有无房户的居住问题，又改善了村庄的面貌。

与今天农民完全依靠自己的收入修建新居相比，当时修建这些连窑，均由马坊大队统一投资——当时村里有一个砖厂，砖由生产队统一出资生产，队里统一派工从附近采石，由队里的石匠加工。这样，除了人工之外，进入新居时，居民们基本没花什么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马坊村的连窑只建了一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马坊村的新农村建设就停止了。

今天，这个“新农村规划工程”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沿着山坡上到马坊村中心，可以见到村里最大的一棵老榆树，这棵老榆树被视为是村里的风水树。沿着老榆树向北，即可看见一排整齐的窑洞。虽然已经破败，但仍然能够看出当年精心规划的痕迹。

当年的规划者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设想，例如，规划的两排窑洞之间明显留下了一排开阔地，据称，这是作为队员广场使用的，不仅可以用于召开大队社员会议，收工归来，晚上还可以在这里聊天、唱歌、跳舞。与旧有的分散居住相比，两排窑洞及其附属的广场形成了一个围合式的空间，已经具备公共空间的形式。

改善卫生条件、进行乡村规划，设计公共空间——马坊村的新农村建设，在开始的阶段是自发性质的，最初也并未冠之以“新农村建设”之名。后来虽然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并纳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但就其整个过程来看，民间的力量仍然是主导力量。农民之所以建设这些，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个建设运动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在这一过程之中，国家力量也起了重要作用，从后来的“新农村建设”的名称以及规划图的设计就可见政府的影响。而国家力量之所以介入，是因为这种民间自发的建设不仅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添加了生动鲜活的例证，还能够证明这一精神的民间实践的确可以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而言，它又是一次唤起大生产记忆及其内核“南泥湾精神”的契机，能够增强农民对“南泥湾精神”的社会认同感，也稳固了政党的统治。

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当时的这个新农村建设运动，本身是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一次运动。但今天，给当地民众留下印象的并不是粮食产

量，也不是水田改造。农民对70年代“新农村”的正面评价，普遍集中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居住质量的提高，由此可见，在发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国家目的和农民的愿望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而最终，能够获得农民广泛认同的，仍然是那些自下而上，反映民意，能够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的措施，而不是从上至下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而形成的政治运动。

在数十年里，这种依靠国家强力动员来进行经济建设的方式，表面看轰轰烈烈，但如果深入到乡村内部去观察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具体生活指标，则将发现，其生存状态在几十年轮回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并无实质性改善。这一点，在运动式生产起源地的南泥湾镇，表现得颇为明显。直到包产到户制度实施之前，一次又一次的生产建设运动并没有改变农民贫苦饥饿的生存状态。在有关它的民间记忆叙事中，不可或缺甚至更加强烈的是对饥饿的记忆。它与集体化大生产、农民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民间叙事的主旋律。而到生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农民们的民间记忆才被代之以“吃饱了”、“自己干了”，以及“揽工”等，生活明显有所改善的同时，和其他中国乡村类似，留下的是老弱妇孺，而最具活力的青壮年大批外流到城市，村庄日益衰落。

### （3）分裂的村庄

时间进入到21世纪，虽然经济发展与延安其他乡镇相比并不理想甚至还比较落后，但南泥湾无论是在经济形态上，还是村庄政治上，都展现出社会转型的一些明显迹象。与当年强调准军事化生产生活的人民公社大队建制相比，今天南泥湾镇属下的村落，更多地呈现出碎片化与分裂状态。

一个具有代表性意味的迹象是，宗教组织发展迅速，取代了严格的、“人人都有”的“制度”，成为缺少整合力量的乡村里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在马坊，一座关帝庙从破败到兴盛的历史是这一变化的最好说明。

马坊村的关帝庙在当地历时久远，即使是至今仍然健在的最早移民也无法说清它的建成时间。有人认为是从唐代就出现了这座庙宇，因为这里传世的签谱传承有绪，显示它最早是于唐代排版印刷的，不过，这

一说法没有其他可印证的证据。

这座庙宇的辉煌在大生产运动期间被遽然中断——驻守当地的三五九旅8团认为它与共产主义思想无法共存，于是将其夷为平地。

三十多年倏忽而过，关帝庙的废墟中唯一存留下来的是一个沉重而巨大的石香炉，沉默地见证着村落的历史——不仅仅是关帝，龙王、观音、送子娘娘，所有被认为能够应和乡人祈求的神佛，连同“关帝会”等等会众组织，都被一扫而空，家家窑洞里最显要的位置原来供奉的神佛都被换成了毛泽东画像。

但是，在席卷全国的伟人崇拜中，人们并没有忘记地方的神灵，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地藏起代代相传的签谱。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村里的几个老人就私下悄悄筹划重修关帝庙，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踊跃响应。人们拿出家里本就不多的现金，凑上些木料，开始低调地重修庙宇。一年之后的1977年，关帝庙重新建成，并且新造了一口大钟，记录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据“关帝会”副会长回忆，连塑像在内，建庙一共花了一万八千多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

关帝会的组织者清楚地记得，大部分村民们“当时不敬神”，原因之一是三十年的共产主义教育让人们淡漠了对神的敬仰，二是对政府管制还有疑虑。于是，关帝的供奉主要靠会里的几个积极分子，他们中有一个是自己生了眼病，医院治不好，而依靠对“关老爷”的虔诚信仰治好了，另一个则是家里的儿子发疯，父母在“关老爷”面前许了愿，神奇地不治而愈。

关帝庙的灵验，最具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村支书态度的转变。据会众们说，以村支书为主导的村干部们因为信仰上的冲突，一度非常排斥“关帝会”，办会的时候，偶尔想向村里借点板凳家具，都被拒绝。但是，后来发生了砖瓦厂事件，情况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村支书自己开了个砖瓦厂，开始时生意非常红火，但“打坏”（即打死）过一个工人后，厂里出现了种种怪事。

“没看见人也听见有人吼，有人喊叫。没办法了，请了一个法师，法师说他不行，他镇不了，如果你（村书记）拜了关老爷，他（法师）可以去镇，如果你不拜关老爷，他就不敢镇，最后没办法了，（村书记）就拜了关老爷，然后（法师）就去镇了，镇了以后再也没听说吼

了、叫了，砖瓦厂就又开了。所以最后没办法，（村支书）只好信了。<sup>[62]</sup>”

按照这个说法，本应坚定地、唯一地信仰共产主义的村支书，最终因为关帝庙的灵验而向以前他所称的“封建迷信”妥协，而其他村干部，也多少因为自己的不顺利，在祈请关帝之后得到了解决而改变了态度。虽然村干部官方并不出面支持关帝会的活动，但干部们个人都经常“支持”一下，“个人三十五十，十块八块，上点纸，敬敬神，点香烛什么的。”<sup>[63]</sup>

这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村庙。不过，据说马坊村里的关帝是最灵验的，因此，这里香火颇为旺盛，也带动了其他庙宇的修建。2006年笔者第一次前往调查时，村里只有两座村庙，而5年后，村庙已经增加到5座，分别是关帝庙、娘娘殿、五龙殿、药王庙和真武祖师殿，这几座村庙聚集在村落边缘一小块平地上，关帝庙居中，其他庙宇在其后方成围合之势，组成了萧凤霞所说的“强化的仪式景观”<sup>[64]</sup>。它们分别代表了农民们日常祈愿的几个方面：身体健康、人丁兴旺，风调雨顺和邪灵不侵。

每年的5月13日是庙会日。近年来，这里每年都举办盛大的庙会，在演戏之前，会有一个敬神的仪式。然后，是连续三天的社戏。这是马坊村民狂欢的节日，也是关帝会借机宣传其宗教理念的最好契机。

宗教的兴旺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在思想管制上的宽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政府改善其实际生活的能力并不满意，显示出乡村政治中政府力量有所削弱。事实上，村级政治在社会的转型中陷入了迷失境地。

分裂的表现之一是村级行政力量在利益集团的把持下不能正常更替。在南泥湾村，三次选举都没有为村民们迎来一个村长。因为两个村长身后都有一群家族势力的支持者，因此，三次选举的票数相差都很近，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泥湾村的村支书不得已由一位弱势的妇女来担任。她告诉笔者，刘和顾在本村都属于大家族，亲戚很多。可见，即使在南泥湾这样移民组成的村庄中，家族势力依然是不可回避的力量。

在隔壁的马坊村，情况正相反。马坊村书记虽然已经不住在村里，但却仍然把持着当地的村政。书记一当就是20多年，村民们对其怨声载道，但是敢怒不敢言。这个书记曾经因为有人不服他而指使其弟打伤其人，村里实行的“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也只是他的一块遮羞



布，发挥不了任何实质作用。

这两个例子说明，村政实际上已经只是村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所谓有权有势者）的游戏工具，现行的村民自治很难动摇这个基础，而由于权力的惯性效应，这种状况可能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在镇政府一级，面临更多的是 GDP 考核的压力和民众生活改善的迫切需求。然而，国家力量主导下的运动式建设，虽然刮起一阵又一阵政策风，但实际收效并不理想。在对当地镇政府的访谈中，当地干部不断强调镇政府的“作为和探索”，从最初的大棚、蔬菜计划的失败到山羊养殖的失败，一直到现在的“以牛为主，猪鸡并进”政策和沼气计划（根据村民的看法，由于不符合地方实际，很明显这个计划也已经失败），镇政府虽然是在“摸索”一条发展之路，并且只是“号召”农民们这样做，但问题是，无论这些计划成功与否，最终受害的只是农民，而政府几乎不会在这场变故中损失任何东西。于是，一方面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没有承担起政策失败的责任，通过这种手段，村民们无奈地成为体制风险的最终受害者。当政府大力号召修建沼气或者养殖秦川牛时，那些老实的人们怀着美好或者不美好的愿望参加了计划，可是当计划失败时，只有他们自己会对所处的困境负责。

正因为如此，农民们对于村政都很冷漠，很多人不在乎参加所谓的“村民选举”。因为他们知道，“选不选都一样，还不是那个人”。可见，村民自治的运行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农民的素质偏低。

对于农民，与其说他们没有参加村庄政治的意愿，不如说他们没有参加村政的能力更为恰当。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村政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重力量被村庄中的上层精英所把持，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只是一个形式，因此，农民们不得不选择了沉默。体制之内与体制之外，出现了明显的分裂。

另一重分裂是村民之间的分裂。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如前所述，在马坊，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一年能够挣二十万元左右，但是，普通农户一年种地的收入只有他的 1/7。<sup>[65]</sup>

相比起 90 年代沉重的农业税负担，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感觉经济压力的确有所减轻，但由于化肥等农资物品价格的上升，这部分免交的资金实际上是变相地从另一个途径回收了，甚至更多。同时，由于税费改革，村里的财政被极大削弱，村庄自身是绝无力量承担大型基础设施

施建设的费用的。于是，农民们时常需要为天灾付出沉重的代价。

为了增加收入，当地曾经有过多种尝试：养殖山羊、秦川牛、猪，也发展种植香紫苏（一种天然植物香料），并且还发展过大棚蔬菜。不过，这些尝试大部分以失败告终，而承担失败苦果的并不是贸然决定上项目的政府干部，而是农民自己，这也使得农民们对村镇干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因病致贫和因学致贫的现象在南泥湾尤其明显。和大多数乡村所面临的医疗问题一样，这里的村卫生室和乡卫生院医疗水平都不如人意。

南泥湾镇共有 14 个村，每个村都有一个自己的卫生室，除了个别村每年还对卫生室补助 100 元以外，各级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补助。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村医生活难以为继，新毕业的学生又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村诊所的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医疗器械仅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为了维持运转，村级医疗只能依靠以药养医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即使是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医疗费也远远超出农民的收入所能够承担的水准，延安市内的医院虽然医疗水平较高，但费用更为高昂，治疗费用往往是农民家庭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因此，有病不看，小病拖成大病的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而一旦拖成大病，则意味着倾家荡产。

在 2005 年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前，卫生部的一项研究透露，农村居民的两医就诊率从 1993 年的 17% 下降到 2003 年的 13.4%，2004 年又降至 8.6%，11 年间下降了一半。据调查，在农村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到 30%<sup>[66]</sup>。

由于高企的医疗费用，农民耗尽了多年的积蓄，四处借贷，沦为赤贫阶层，处于教育期的子女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成年子女则失去与健康富裕的农民家庭联姻的机会，往往只能嫁（娶）同样贫病交加的家庭子女，这使得原有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甚至跌入乡村生活的最底层：外出行乞、流浪。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均衡发展的一个明显障碍。

在 2005 年实行“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农民医疗制度从传统的“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制度转变为“公民合办”的新型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看病难的状况。依据不同病种和用药区别，农民们能够有大约 30% 至 50% 的医疗费用得以报销，看病难的情

况有所改善<sup>[67]</sup>。

第三重分裂是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分裂。

由于高昂的升学费用，能够读得起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少。2003年起，延安地区按照国家的制度，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这一政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它对加快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投入，当地农村教育体系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其现状很难因为这一项措施的采取而得到明显的改观。

在离当地最近的金盆湾中学，虽然初中大部分学生得以完成学业，但高昂的高中择校费用，使得学生不愿在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在南泥湾村的TJ家，同在金盆湾中学读书的TB和TJ相差三届，相比起TB所在班上的情况，2000年TJ所在的班级里60个人中，有30个上了高中、中专和师范，而在TB所在的班，48个孩子中，只有6个学生继续读书。他还特地提及当地所发生的一起轰动劫案：7个初中毕业没有继续上学的学生，结伙到附近的金盆湾中学打劫了19个女生<sup>[68]</sup>。这显示出，当地的教育和阶层流动状况不如人意。

这个数据与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数据得以相互印证。据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2005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统计数字表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sup>[69]</sup>。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变得日趋狭窄。

根据笔者所带领的调研小组的调查，2006年，按照延安当地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达到2.8万，相当于一个当地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是在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因素的情况下<sup>[70]</sup>。

即使如此，一些人家仍然坚持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负担极为沉重。已经在西安工作的南泥湾青年LHF告诉笔者，在之前最难的日子里，他们的父母先后要供四个孩子读书，每年的花费达到了2万元

左右，这已经是全家全年不吃不喝收入的两倍。由于实在困难，母亲不得不出借高利贷，利息是三分贷，即借10000元要还1.3万元，对于乡村家庭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高昂、几乎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选择。<sup>[71]</sup>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乐意或有条件如此付出，但年轻人还是以各种方式在尽可能离开乡村。在南泥湾镇的各个村落里稍一走动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村里还是田地里，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大多只能见到老人、孩子和为家庭做饭和养育子女的中年妇女。成年男子以及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都已经离开。

无论是通过高考离开乡村，还是今天放弃学业，通过打工、经商来进入城市，乡村中年轻而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人几乎是永远地离开了家乡。这种单向的流动，使得乡村失去了最为优秀的精英——他们不可能再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再参与乡村政治的运作，也几乎不可能再对生养他们的家乡作出任何贡献。这个最具活力的人群永远自乡村消失，也就意味着乡村的新鲜血液被持续抽离。这使得乡村与城市间的断裂日益加剧。

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经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对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的冲击和变动，但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体系。一方面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他在1989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当代中国农民被分为8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sup>[72]</sup>。

与之相呼应的一个发现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体系被打破了，既有的“贫下中农”、“富农”和“地主”等身份标签被逐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种田大户”、“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称谓。

这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主要源自市场经济制度而非包产到户制度——后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但却不能给农民带来身份的变化。而今，中国社会正在由威权社会转型，在东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成为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民间主要动力；而在南泥湾这样的地区，

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民间力量偏弱，因此，动力主要是国家力量的嵌入，推动方式仍然沿袭着运动式建设的方式，一旦国家力量从农村社会撤出或中断，建设也就后继乏力。

如前所述，南泥湾的军事化、集体化生产模式曾经是新中国“新农村建设”最早的原始模本，但在今天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并不重视这方面的话语言说，而将与“南泥湾精神”结合的言说重点置于“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大生产记忆的相关话语被巧妙地嵌入了今天的需要，被重新阐释，纳入了新的内涵。

调查小组对当地政府官员的访谈显示，当地发展经济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推动<sup>[73]</sup>。同样，在2007年人民网“喜迎十七大”的专题访谈中，南泥湾镇镇党委书记也告诉记者，在他心目中的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为农民盖几间房，修两条路，更重要的是带动农民懂得怎样去致富，怎样发展产业。”他描绘当地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是“家家过上好日子，家家门前都有柏油路，晚上有路灯亮堂堂地照着；多修建几个供大家观光的广场”<sup>[74]</sup>。可以看到，在地方精英的政治话语中，今天的“南泥湾精神”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体现，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谋求GDP的提升。这一建设，并不涉及民主建设、公民启蒙等乡村政治的重大问题。

但是，运动式的建设，如果说当年依靠强力的推动能够在某些集体项目如兴修水库等方面有所作为——代价是剥夺民众的自由，且事实证明对国家及民众的富足强大助益甚微，那么，在威权制度已经不再为民众所认可的今天，它更加明显地难以适应社会之转型。一个相当明显的证据是，2006年被选定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落的马坊，曾经一度规划了道路硬化、村容整洁、集中修建新窑洞，以及下水道等项目，但后来，示范村被重新定为附近的桃宝峪，于是，这里的所有项目都趋于停顿。直到5年之后，除了建设了几个垃圾站，以及集中规划但由村民们自行出资建设的新窑之外，这里的一切，仍然定格在项目停止时的建设状态。

#### （4）红色记忆经济学

在南泥湾，越来越多的游客是此地发展的希望所在。“红色旅游”的兴盛，以及从延安到著名景点黄河壶口瀑布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南

泥湾到延安的汽车需时从近两个小时缩短到 40 分钟，从壶口前往延安或者反向自延安去壶口的游客，都有机会在这里稍事停留，参观大生产展览馆，以及匆忙地在那片著名的水稻田前合影。

当地农民意识到了这其间的商机。最早出现的是一批小饭馆，如“小江南”等，都以通过唤起红色记忆的“怀旧情绪”作为招徕食客的机缘。此后，一些提供住宿的旅社，如“南泥湾大酒店”、“土窑洞”等也逐渐出现了。广场上日益增多的纪念品小摊，则是红色旅游日益兴盛的说明。

让农民们苦恼的是，游客们停留在南泥湾的时间太短了。他们通常只是匆匆路过，而不是在这里盘桓数日。如果是后者，就有机会发展成规模的宾馆、饭店以及其他旅游项目。但是，目前由于缺乏游客逗留，没有人愿意投资。

而从游客的角度来看，他们难以停留在南泥湾，除了紧张的行程安排之外，当地缺乏住宿接待能力，则是重要的原因。仅有的一两家小旅社卫生状况极差，难以适应现代人的旅行需求。此外，当地缺少能够留下人的景点，使人缺少旅游的兴致。

这一尴尬状况，随着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之子及他们所携庞大计划的到来，有可能得以改变——2010 年 10 月，王震的两个儿子来到南泥湾，宣布已经成立了南泥湾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并即将启动一个总投资额达到 100 亿元的庞大项目——“陕北好江南——南泥湾”，发展南泥湾的红色旅游。

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六大板块，含有革命传统教育、绿色生态、农业观光等多个方向的若干产业。按照官方的说法，它不仅要建成“延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基地”，而且将“加快改善南泥湾的整体面貌，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sup>[75]</sup>。

对于这个计划，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一些人寄望于庞大的资金能够带来直接和丰厚的收益。他们迅速地将自己地里的粮食作物清空，而种植上松树等赔偿额度更高的树苗，希望当拆迁到自家土地的时候，能够获得高额的赔偿——这一行为不啻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讽刺。这件事情也遭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讥讽，不过，他们倒不是为了维护神圣的信念，而是认为这个庞大的计划不可能最终成功，因为“南泥湾就这么个烂地方”。<sup>[76]</sup>

一位农场工人的儿子非常看好“红色旅游”的未来。他投资了大约八万元，重修了近十孔三五九旅战士当年居住过的窑洞，以“土窑洞”和“农家饭”作为招揽顾客的由头。在修葺一新的窑洞门口，有简单的说明，表明这个看似平常的窑洞的光荣历史。他还修整了上山的道路，方便游客从高处远眺南泥湾的全景。

无论是来自北京的庞大计划，还是本地居民自行筹建的小型景点，应该看到，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其实更多出自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而非红色信仰。他们尝试通过红色记忆的唤起和重构，进行商业活动以获得现实利益。一方面，对意识形态的宣扬，使得人们逐渐淡忘的红色记忆得以唤起和重塑，这当然与延安今日的发展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一方面，这些出于商业利益的解读，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着革命意识形态。

在延安，对于干部的培训、红色旅游和相关的红色服务业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国每年有大量干部进入延安干部学院进行培训，这些人在当地不仅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培训，同样也为当地的旅游业、服务业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延安的消费水准是陕西最高的地区之一。

观察延安的纪念品市场，是饶具意味的一件事。这里，毛泽东的纪念品非常丰富。红色记忆文化出现在任何你能够想象到的商品上。笔记本、香烟盒、茶杯、文具用品、项链、太阳帽……复制的宣传画宣传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及“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各种各样的革命书籍、影像制品和红色旅游纪念品，都在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光荣历史的延续。不过，最受人们欢迎的，是用于汽车后视镜上悬挂以避免车祸的护身符，以及供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的、合金材质的卡片，上面有金光闪闪的毛泽东侧面像，镌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类的水文话语。毛泽东的照片、护身符，与观音像一样成为趋吉避凶的神圣物品；他的塑像甚至被供在佛龛里，接受香火供养，小贩们察言观色，依据来客的服饰言谈分别介绍说，这样的塑像能够“旺官运”、“招财运”或是“镇宅”、“改善风水”。远道而来请走这些具有神性的塑像的人们则相信，毛泽东的塑像，尤其是在革命圣地“请回”的像，具有和开光类似的神效，它和关公像、观音像、龙王像一样，能够护佑请托许愿的人。不过，除了官方认定的商店，类似的很多商品只能在地下购买，例如，扑克牌和搞笑版的毛泽东摇头公仔。一



位小贩神秘地告知，打一个电话，就会有人供货上门，但他们行踪神秘，做了好几年了，也没有他们的具体地址。<sup>[77]</sup>

这显示，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地方经济驱动与国家权力对神圣话语的控制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分歧与媾和：市场和地方政府因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敏锐地注意到红色记忆的商业价值，急于将其商品化，并转化为“红色财富”；而国家权力则乐于利用这种商品化的渠道去传播红色记忆，但前提是要将利益的驱动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这个过程中它多少有些担忧革命传统过度的商业化会导致其如徐贲所指出的“低俗化、琐屑化和颓废化”而失去神圣性<sup>[78]</sup>，因此，对这些商业用途有严厉的控制与监管措施。如同多年前三五九旅所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和封建迷信不应共存，因此，国家绝不会允许大生产展览馆旁出现村庙，这里的老百姓有什么祈愿，得到几公里外的马坊去上香；不过，私下里，地方精英并不避讳并参加“迷信活动”，如果它能够为自己带来切身利益的话——这和“让游客们记住南泥湾，记住当初的三五九旅，让旅游业带领南泥湾的经济一路走好”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红色记忆经济学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信仰的经济学”。被学者们称为“神格化”的新形式毛泽东崇拜趋势背后<sup>[79]</sup>，当地人对南泥湾的记忆叙事，明显呈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在有游客的公众场合，人们表现出对红色历史的强烈自豪感，并熟练地引用大量展览馆中的展板解说词进行介绍；而当笔者深入到他们的家庭去探访，谈话较为深入之后，他们则对自己的生活、政府的不作为存在大量的抱怨；当希望某些项目能够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时，他们重复着这段光荣史所积淀的深厚资本，但说到老干部们对此地的关心程度及项目的引进过慢时，他们又委屈地感觉到，与安塞、枣园等地相比，南泥湾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扶持——最重要的证据是，这里没有“中央大领导”来调研和帮扶，更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和项目。说到这些，人们似乎没怎么意识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宗旨，其实与他们目前的诉求是相互冲突的。

红色记忆在一方面被强化，另外一方面，也在被经济利益计算解构。对红色记忆的赞美和强调，往往出现在初次的闲聊和商业兜售之中。例如，当我尝试与广场上摆纪念品摊位的老太太搭讪时，她总是热情地引用官方话语，赞美着“南泥湾是个好地方”。另一位流浪在广场上的小姑娘，也会看准机会为好奇的游客表演有关南泥湾历史的红色快



板书，或是为身穿军服的参观者讲述军民一家亲的故事，借以获得一些金钱和物质上的馈赠。可是，当与他们有更多时间去闲聊时，他们往往会告诉你，这里是个“烂地方”，不可能取得官员们所声称的成绩——如同他们在有关红色记忆的采访中常做的那样。他们毫不讳言贫困的现实，对政府无所作为的愤怒，和对军队占有土地的不满。

再如，面对旅游者，他们会非常热情地指出，展览馆背后的一排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以显示此地的神圣性，但是在游客们离开后的傍晚，在晚饭之后的串门闲聊中则常常可以听到他们清楚地抱怨，其实毛泽东并不真正关心和爱护这里，他在南泥湾只是走马观花地住了5日，并且再也没有来过，也没有为这里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但在游客面前，他们对此绝口不提。“说那个干啥，（说那个）人家都不来了。”一位饭店老板坦率地承认，他不会在游客们面前提到这些有碍于南泥湾革命记忆盛名的事实，因为，这会让很多人认为南泥湾在延安旅游地位中没那么重要，影响他本来就不多的营业收入。恰恰相反，他会把客人带到门口，遥瞰平整的水田和远处王震骨灰撒下之地，因为，那些能够引发人们的革命怀旧情绪，这对他的生意是有帮助的。

另一现象能够更好地说明记忆中双重叙事的标准所在：在展览馆所在的南泥湾镇所在地阳湾，人们对“特货”种植的情况讳莫如深，而在距离阳湾分别有2公里和5公里左右的南泥湾村、马坊村，由于很难从参观者那里获益，人们在回忆和叙述此事时显得更为坦白：一位老人十分坦率地抱怨，不让老百姓种“特货”，这不够公平。

意识形态的控制政策以及民众与之如影随形的利益至上价值判断，严重地影响了个人和社会对它的反思，这些记忆被有意识地选择、被遗忘，谎言和沉默，使得历史记忆成为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此时，必须注意到，选择性叙事的标准，已经不完全是国家话语的强制，经济利益驱动与国家权力的共谋是明显的。当红色记忆不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收益时，他们也许乐于说出与官方话语不一致的事实，但如果红色记忆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经济的实际收益，他们则乐于选择遵从官方修订的叙事逻辑，甚至主动在自己的记忆里选择和不断强化它们。例如，通过主动背诵——据我的观察和访问，没有人强行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纪念馆的解说词及其衍生文本，或是红色快板书，来获取游客的购买或是馈赠等经济利益。

此时，在个人对往事的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因利益驱动和国家话语的共谋而产生的过滤与选择势不可免。随着知情人一个个逝去，也随着他们言说过程中的选择与遗忘，历史的断裂因此而产生。

## 注 释

- [1] 《延安旅游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 综合收入达到 53 亿》，《华商报》，2010 年 1 月 6 日。《延安游客满意度倒数第一属误读 红色旅游需挖内涵》；《华商报》，2011 年 7 月 14 日。
- [2]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 页。
-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世纪出版集团 2003 年版，第 170—171 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7 页。
- [5] 《江泽民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强调发扬延安精神》，《人民日报》，1989 年 9 月 15 日。
- [6] 江泽民：《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 年 9 月 20 日。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 [7] 《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的一段历史》，访谈对象：LFY，访谈对象：LFY，访谈人：秦锐，孟庆延，钱立成；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新农村访谈录：从红色革命到绿色革命》，访谈对象：马坊村民；访谈人：徐翔，葛丽莎；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8] 军队所属南泥湾农场的土地面积达到 2.3 万亩，耕地面积 4100 亩，但农场人口却不足 1600 人，人均耕地面积近 3 亩，大大高于当地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由于人手不足，军队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转租给农民。
- [9]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9 页。
- [10] 转引自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9 页。
- [11] 7-1、7-2 图片均征引自图片中国网：[http://www.yananda.com/type.asp?news\\_id=179](http://www.yananda.com/type.asp?news_id=179)。
- [12] 对此，在新农村访谈中，当地农民有生动的表述：“王震自从 1948 年走了以后，全国还以为南泥湾这儿还在发扬三五九旅的精神在这儿开荒种地，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实际是劳改农场在这儿改造呢！”见《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村 22 号 HXZ 家访谈实录》，访谈对象：HXZ，访谈人：徐翔，葛丽莎；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13]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3 页。
- [14]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 页。
- [15]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 页。
- [16] 孟庆延：《南泥湾三调》，南京大学，2007 年。
- [17] Charles Frankel,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Symbols*, Lyman Bryson,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New York: Harper, 1954. pp. 369.
- [18] 重庆卫视：《追寻中国红——南泥湾精神代代相传》，[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ODU00DA0.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ODU00DA0.html)。
- [19] 闫树声：《对四次陈列调整的回忆》，张明胜主编：《延安革命纪念馆 50 年（1950—2000）》，

内部资料 2000 年版，第 48 页。大生产展览馆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个部分。

- [20] 见《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军垦时期的历史——对 90 岁老红军 GWS 的访谈》，访谈对象：GWS，访谈人，秦锐、孟庆延、钱力成，周海燕等。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21] 关于延安“特货”种植的情况已有相当充分可靠的研究成果，可参见：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新史学》，第一卷第 4 期，1990 年 12 月。这一研究的成果也在本人带领学生进行的新农村调查中得到了证实，见附录：《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军垦时期的历史——对 90 岁老红军 GWS 的访谈》，访谈对象：GWS，访谈人，秦锐、孟庆延、钱力成，周海燕等。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22] 见《新农村访谈录：南泥湾村 HXZ 访谈实录》，访谈对象：HXZ，访谈人：徐翔，葛丽莎，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23]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导论第 1 页。
- [24] 前揭书，第 11 页。
- [25] 见《南泥湾访谈录：关于新疆武警 SWF 的访谈实录》，访谈对象：SWF，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 年 4 月。
- [26] 曾德强：《我在南泥湾纺线线》，<http://rd.ankang.gov.cn/Article/Class17/200608/174.html>
- [27]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第 81 页。
- [28] 见《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展览馆工作人员的访谈实录》，访谈对象：大生产展览馆工作人员，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 年 4 月。
- [29] 图片征引自：[http://www.yananda.com/type.asp?news\\_id=179](http://www.yananda.com/type.asp?news_id=179)。
- [30]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第 91 页。
- [31]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8 页。
- [32] 陈颖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星鸟》，第 20 期，2003 年 10 月。其他类似内容可参见：《延安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开展纪念党的生日活动》，[http://www.sxny.gov.cn/Html/2009\\_07\\_09/2\\_1847\\_2009\\_07\\_09\\_125140.html](http://www.sxny.gov.cn/Html/2009_07_09/2_1847_2009_07_09_125140.html)。
- [33] 关于在旅游景点是否可以穿着敌人服装留影的行为曾经多次在媒体上引发激烈争议。参见：晴晴：《游客红色景区内穿日军军服拍照引争议》，《华商报》2009 年 7 月 9 日，《专家称应适用法律手段避免穿日本军服照相事件》，《法制日报》，2009 年 10 月 15 日，但这类事件从未在延安等革命圣地出现，似乎可以说明，至少直到现在，这仍是红色圣地的绝对禁忌。
- [34]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 页。
- [35] 见《新农村访谈录：义务教育之后》，访谈对象：南泥湾村民 TB，访谈人：周海燕，葛莹。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 [36] 《南泥湾访谈录：SDD 访谈》，访谈对象：SDD，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 年 4 月。
- [37] 参见保罗·康纳顿前揭书，导论第 4 页。
- [38]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桃宝峪的访谈》，访谈对象：桃宝峪村民，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 年 4 月。
- [39]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桃宝峪的访谈》，访谈对象：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工作人员，访谈人：

- 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4月。
- [40] 韩咏红：《中国干部在历史现场上课》，《联合早报》2010年5月9日。
- [41] 弗朗西斯科·德利奇：《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载《第欧根尼》，2006年第2期。
- [42] 保罗·康纳顿前揭书，导论第3页。
- [43] 此处均据《南泥湾访谈录：关于马坊村的访谈》，访谈对象：CLY，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4月。
- [44] 此处均据《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南泥湾村的访谈》，访谈对象：HXZ，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7月。
- [45]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南泥湾村的访谈》，访谈对象：HXZ，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7月。
- [46]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南泥湾村的访谈》，访谈对象：DCZ，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7月。
- [47] 关于苏联债务与大饥荒的相关性研究，可参见腾讯网燕山大讲堂上的演讲记录。[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30995529\\_2938925937.html](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30995529_2938925937.html)。
- [48] 第二十三章，<http://xk.2000y.net/788423/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2884>。
- [49] 转引自景军前揭书。
- [50] “359旅来的第四年上，劳改队才来的。”《GWS访谈录：南泥湾军垦时期的历史》，访谈对象：GWS，访谈人：秦锐、孟庆延、钱力成，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51] 前揭访谈录。
- [52] 前揭访谈录。
- [53] 《LFY访谈录：南泥湾的一段历史》，访谈对象：LFY，访谈人：秦锐、孟庆延，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54] 郭于华在—项关于骊村女性记忆的研究论文中也指出，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使得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因而这一心灵集体化的过程使她们在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可见，苦难过程中片刻的快乐记忆在各地的不同群体中都存在。参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骊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 [55]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
- [56] 王家平指出，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广大下岗工人和农民频频怀念起文革时代的“公平”生活，这成为“新左派”在民间的思想基础。参见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 [57] 除注明出处外，上述所引谈话均据《南泥湾访谈录：关于桃宝峪的访谈》、《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南泥湾村的访谈》，《南泥湾访谈录：关于马坊村的访谈》、《南泥湾访谈录：关于阳湾农场的访谈》，访谈对象：CLY、DCZ、GJY、HDY等，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08年4~5月、2011年4~5月、2011年7~8月。
- [58] 《发扬南泥湾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记延安县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艰苦奋斗夺高产的事迹》《人民日报》，1970年5月13日。

- [59] 即现马坊行政村——笔者注。
- [60] 延安县南泥湾公社马坊大队医疗站：《我们是怎样巩固合作医疗的？》，《红旗》，1972年第12期，总第二五六期。
- [61] 南泥湾地区原来是大脖子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病区。
- [62]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马坊村的访谈》，访谈对象：CHN等，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7-8月。
- [63] 前揭访谈录。
- [64] 转引自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文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集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 [65] 前揭访谈录。
- [66] 《卫生部调查称全国4成患者无钱看病3成因病致贫》，网易网：<http://news.163.com/41123/7/15RT3NDG0001124T.html>。
- [67] 周海燕、杨渝东、夏洁秋等：《新农村访谈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79页。
- [68] 《新农村访谈录：关于教育的访谈》，访谈对象：TB，访谈人：周海燕、曾航等，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69] 吕诺、张宗堂：《最新研究表明 城乡间教育差距巨大》，新华社，2005年2月13日。
- [70] 《新农村访谈录：关于教育的访谈》，访谈对象：LHF、TB等，访谈人：周海燕、曾航等，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71] 《新农村访谈录：关于教育的访谈》，访谈对象：LHF，访谈人：周海燕、曾航等，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7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 [73]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南泥湾镇政府的访谈》，访谈对象：南泥湾镇镇干部 MF，访谈人：孟庆延、钱立成、秦锐等，访谈时间：2006年5月。
- [74] 高雷、王倩：《专访南泥湾镇党委书记钱光亮：南泥湾的明天会更好》，人民网，2007年9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101558/101560/6331819.html>。
- [75] 刘晶：《“陕北好江南——南泥湾”景区项目奠基仪式隆重举行》，延安政府网，2010年10月27日。[http://www.yanan.gov.cn/structure/xwzx/zwyw/zw\\_27819\\_1.htm](http://www.yanan.gov.cn/structure/xwzx/zwyw/zw_27819_1.htm)。
- [76] 《南泥湾访谈录：关于阳湾农场的访谈》，访谈对象：阳湾农场职工，访谈人：周海燕，访谈时间：2011年8月。
- [77] 徐贲认为，文革记忆的商品化和消费化是90年代后文革记忆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把文革当成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它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把文革记忆变成一种无实质社会问题和无社会正义意识的记忆。参见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二十一世纪评论》，2006年2月。
- [78] 前揭徐贲书。
- [79] 李向平：《“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南风窗》，2009年第6期。



## 结论 | 大生产记忆与中国道路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哈耶克

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笔者关于大生产运动的记忆，始自《南泥湾》的反复吟唱——为人所熟知的歌词中，描绘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经过中共军民富有创造力的艰苦开垦，改天换地，成为富饶美丽的家园。

在三十岁之前，我从未踏上这一在共产党创业史中被描绘得神奇和充满朝气的土地。然而，有关它的故事细节，我并不陌生：锄镢如林的垦荒竞赛、亲密无间的军民互助、在窑洞前开展纺线比赛的热烈场景，一幕幕都活生生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如同我曾经亲眼目睹那些场面。

它们是如何进入我的记忆？它们与生于70年代的我有何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我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那时，我还是个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记者，每日忙于记录明天可能就被遗忘的新闻，并认为这些信息是当前最为重要之事，对“故纸”与“故事”不屑一顾。

但是，当我在实地采访中目睹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它们已经比以前的烈度和频度小了很多，但仍然是社会生活主旋律的一部分：大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新农村建设，小到推广沼气或生产大棚蔬菜，都沿袭着旧有的模式：制定政策、提出口号、广泛的政治动员，报纸上出现各地纷纷响应的报道，并推广其间涌现的典型人物和集体，展现一呼百应的乐观局面，最终，这些运动渐渐湮没，被新兴起的另一些运动所替代，于是，社会进入另一个轮回——我不禁自问：这种运动模式是如何成型，它们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怀着这样的疑问，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开始接触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如同我在阐述研究缘起时所提到的，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当时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其影响力也绝不仅仅限于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经济危机。一方面，从农业、工业到商业，大生产运动铸就了执政党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整套运作模式，以政治动员式的生产方式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新中国的国家生产建设中深刻地受到了这一制度的影响。另一方



面，它是国家权力操纵话语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传媒全面渗透社会生活，人们可以“从未谋面的族群体认共同的传统遗产，也可以在没有地缘和生理关联的背景下获得相同的历史记忆”<sup>[1]</sup>，因此，由国家权力建构的话语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介塑造了民众的社会记忆，并建构了民众的集体认同。

权力的持续来自人们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培养是任何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而对记忆的操纵——凸显、遗忘、修订和不断唤起、重构与嵌入——正是培养合法性信念的最关键途径之一。如同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sup>[2]</sup>可见，如何建构和传播社会记忆，是直接影响到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因如此，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又如何被传播，它是如何被形塑为我们今天之所见，才显得如此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说，梳理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的形塑过程，并观察它在新中国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我以为有着重要的价值。

通过对大生产运动以来形成的、今日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以为不言自明的众多叙事文本的话语分析，尽可能厘清大生产运动发生的历史情境与相关史实，同时考察其社会记忆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知识”逐渐积累成型的过程，揭示其间权力和话语相互纠缠的关系，考察大生产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我在这一研究中为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我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事实、个体经历、艺术创作和感怀想象的混合产物，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是如何不断被建构和重构，在其流变历程中，又是如何对不同的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最终，笔者试图传达的“再发现”，可简要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作为战时紧急政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

就历史背景而言，大生产运动首先是一次应对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

而进行的战时应急政治动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了解决边区执政党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挽救执政党的政治危局。

回顾这一段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入主边区之后，采取了土地改革、“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乡村教育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措施，获得了边区民众的认同，初步稳固了边区政权。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急于扩张实力，非生产性人口迅速增加，使得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向边区农民大幅增收“救国公粮”来解决粮食供给的匮乏。这一矛盾在“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急趋恶化之后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迫使边区政府完全依靠向民众加征税负来维持日常运转。1941年，“救国公粮”额度为20万石，是1938年实际征收量的12倍以上，此外其他负担如义务运盐、“公益代金”、“救国公债”等也极为沉重，这使得边区经济迅速走到崩溃的边缘。民众纷纷罢市、逃亡，甚至出现了群体性骚乱迹象。

不仅基层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大为降低，即便在中共高层内部，此一阶段对政策争论亦多。对于一个实力尚弱、割据一方的年轻政权而言，来自内部和外部同时出现的认同危机，是极其危险的信号——中共中央在1941年所面临的困境，已不是简单的供给困难，而是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双重挤压下，民众认同感急剧降低所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由此可见，大生产运动的首要起因，并非如我们所习知的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是因急于扩展军事实力而导致人口增长过速、财政入不敷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继之而来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危机当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通过紧急政治动员发动边区各界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挽救政治危局。但这一政治动员的行动必须被赋予正当性理由，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以具备合法性，因此，最初由于军队膨胀、人口扩张而致的边区经济危机，被中共中央直接归因为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的“三光”政策，并由此推出了以“大生产运动”对抗国民党封锁和日本侵略的国家议题。同时，在抗战时期不同的阶段，它体现为政治口号的核心诉求不断因应时势之变而变，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

通过诉诸民族主义，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意义等一系列行动，中

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引向边区之外，将“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无奈之举成功转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行动，激起民众对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停发军饷的不满，激发民众通过自己动手战胜困难，抗日救国的民族自豪感，凝聚了边区社会对政权的认同，渡过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 2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大生产运动

与长征叙事多为后来补叙演绎不同，大生产运动的相关叙事文本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记录、创作的“即时神话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风运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大生产运动中后期，同时进行的整风运动对大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上的全面改造。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群众路线”的洪流，在“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号召下，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一系列革命口号进行政治图解式的创作，创造出一大批生动的文艺作品，将权力所指定的话语秩序以程式化的叙事嵌入大生产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这个过程中生产的大量叙事文本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语义代码，通过文件、新闻报道、传记、回忆录、戏剧、歌谣等多种形式将其传之后世，“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网络”<sup>[3]</sup>。

简言之，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是一次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话语的体系化构建，由于其丰富的多义性，这段社会记忆也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反复重新建构，为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在这个完整的话语系统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组织起来”、“鱼水情深”以及“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四种核心语义代码构成了后来大生产记忆的核心——“南泥湾精神”，它形塑了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成为其革命创业史中的重要一章。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被官方表述为“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记忆，其实是不断形塑的结果，即福柯所谓历史的“沉积层”<sup>[4]</sup>。作为研究者，

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切开历史的剖面，查看相关社会记忆“深层地质层面的各个层次”<sup>[5]</sup>，以解读它形成的过程。通过对吴满有、赵占魁和三五九旅这三个典型或隐或显的命运的个案研究，我剖析了大生产记忆是怎样在权力的需要中被制造出来，又不断被重新建构的过程。在不同时代里，它们被利用为政治资源，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执政党的立国之本。党的一代又一代执政者，也正是通过对这些民众所熟知的符号的再次建构和运用，来唤起民众的社会认同。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指出的，“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加深或扩大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是“使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sup>[6]</sup>。

必须指出，我们今天以为不证自明的许多观念，都与话语生产中权力的控制有着密切关系。厘清大生产记忆中话语生产与权力操控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大生产记忆形塑过程中存在的凸显、扭曲、遗忘、排斥和建构，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运动式生产模式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它在经济领域之外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这个部分，我通过对《人民日报》上大生产记忆三个高峰期的分析，证实执政党每一次对大生产记忆这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高频度调用，都伴随着深重社会危机的政治背景。权力频繁唤起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不仅是试图通过重复来确认社会价值及行为规范，维持和确立社会成员对它的顺从和忠诚，更是为了将当前的政治需求嵌入这段记忆的核心语义代码，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各阶层民众的社会认同。

在第一个高峰期，对大生产记忆的频繁唤起和重构出现在大跃进之后的1960~1966年，其目的是渡过连续数年的大饥荒所造成的政治危机。

在第二个高峰期，大生产记忆在《人民日报》上的频繁出现与两次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办“五七”干校。通过将“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政治话语与大生产记忆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心语义符码相联系，国家权力为干部的思想整肃行动和本来是解决“老三届”就业困难的下放知识青年务农政策找到了政治合法性依据，将“上山下乡”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使其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政治色彩——它要

求知识分子相信这一行动是必要的、神圣的，并以其行动表现自己的忠诚追随。

在第三个高峰期，《人民日报》上有关大生产的记忆频繁出现在“八九”风波之后，彼时，每一个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该记得，当时的政局已经飘摇到了何等程度。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此时多次亲笔撰文叙述当年三五九旅的光辉业绩，其意当然不应该仅仅视为为自己带领的部队夸耀旧时荣光。通过对当年革命传统的回溯，权力的掌控者再次强调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执政党及其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再次向民众重复只要忠诚追随就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的断言。很显然，这是又一次社会记忆的唤起和重构过程。与以往一样，其目的在于消除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质疑，凝聚社会认同，重建政治合法性。

它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同米尔斯所说：人们共享的相同价值“把社会连接到一块，因为被社会期望的东西成了个人所需要的。<sup>[7]</sup>”这些共享的相同价值，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记忆承载——正是政权所控制的、民众共同享有的社会记忆，维持着政权的合法性并保证了社会稳定。

### 3 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

此前既有研究几乎不曾提及但却极为关键的是，大生产运动并不仅仅是一次应急社会行动，更是一次对边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成功规训和控制。通过“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边区社会被执政党全面控制并逐步走向准军事化，这也是后来新中国社会控制和改造模式的雏形。

被马克·塞尔登命名为“延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执政思想，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整肃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制度改造两个部分。前者贯穿于“整风”和“抢救”运动之中，而大生产运动中经济建设上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从经济基础层面进行社会改造的突出体现，是利用经济手段对个体施加控制的方式。

哈耶克曾经在论述经济控制对社会的影响时指出，“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sup>[8]</sup>”因此，对“延安道路”的研究，不但应关注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施加的控制，也必须关注它渗透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政策中的控制和改造。今天，对前一方面的研究已经突破了重重限制而渐趋深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sup>[9]</sup>，但就大生产运动中的诸多政策、措施以及它们对后来新中国社会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个人以为，还有更多可以商榷和探讨的学术空间。对既有大部分研究结论中所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持审慎态度。

作为规训的手段，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通过生产为主要方式的规训，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的控制和改造。

要充分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须把它放进更长的时段中进行考察——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天高皇帝远”的松散化状态，如同曹树基在考察农民是如何对新中国形象产生认同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从王朝时期直到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联系都只“局限于维护地方秩序和征收赋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仅仅在于承认政权的权威。<sup>[10]</sup>”正因如此，农民也就难以被动员和使用为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的生产力；反过来说，农民个体一旦由于不堪压迫而“组织起来”，则通常是政权面临重大危险的信号，即农民暴动与大规模起义。这种盲动的力量在暴动中具有强大破坏效力，但却难以被驾驭和驯服为建设性的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政治控制策略恰恰在于，在运用这种强大的破坏力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破坏既有政权的统治基础之后，更通过大生产运动摸索出一套前所未有的驾驭和使用它的规训手段——这就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用满负荷的生产竞赛制度使边区农民被普遍驯服，从生产到生活普遍受到全方位的集体主义规训。这个过程中，边区广大地区尤其是乡村的民众被精心组织、定位和训诫，在三五九旅等模范的激励和“改造二流子”等运动的反面典型教育下，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全程监控的生产中成为可被驾驭的、驯顺而有用的生产力。<sup>[11]</sup>

当然，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大生产运动中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控制和改造措施，之所以迅速被农民接受，有着

一定的必然性。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曾经指出，晚清之后，中国乡村宗法家族逐渐解体，城市的兴起又使得乡村的实际秉权者——乡绅逐渐流向城市，从而在乡村政治中留下了权力真空，这一政治空缺的替代者是乡村的地方豪强劣绅。洪宪帝制流产之后，军绅合流的最大受害对象是乡村社会：自耕农纷纷破产，流落为匪，打家劫舍的目标，往往是普通乡村百姓而非具备强大自卫能力的地方豪强。军队以平息匪患为名勒索粮饷，更进一步破坏了乡村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sup>[12]</sup>。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干部资源的不足，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直未能有效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各地农村能够得以长期割据，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回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乡村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可以看到，盗贼蜂起、乡村社会全面失控的状态，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乃至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与上述研究结论高度一致。

乡村政治的长期失控，组织化权力的全面缺位，让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贫困农民渴望有所改变，这种来自农民群体内在需求的强大驱动力，在中国共产党进入边区并且表现出高度组织化能力与建设乡村的强烈意愿之后被极大激发，客观上为毛泽东全面改造乡村社会提供了可能。这是大生产运动得以实现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

但同样必须看到的是，大生产运动对乡村实行的全面改造，在当时取得有效成绩的同时，其定额制生产（如不顾个体能力差异强行制定生产额度）、竞赛式生产（如从个体到集体普遍组织的生产竞赛以制造强大压力）、标签化生产（如区分先进与后进、区隔“二流子”制造被群体遗弃的羞耻感和恐惧感）、集体化生产（如行政属地管理的农业合作互助代替民间契约为基础的自发变工）、供给制生产（这意味着一旦被人群抛弃则失去生存权利）等一系列激发生产力的措施，将人们制度性地置身于“由生存的向外抛出的恐惧”之中<sup>[13]</sup>，蕴含了诸多威权主义的因素，本身就埋下了边区社会准军事化改造的种子，也为后来新中国实施的全面乡村社会改造提供了原型。

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它另一必须关注的重要影响是对边区知识分子干部群体实现的改造——大生产运动中期和进入高潮之后，“整风运动”也在边区全面推开，两者紧密呼应的结果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树立劳动观点”，用超负荷体力劳动来改造人，改造思想。

与对农民的生产规训有所不同，对于知识分子的规训是同时从生产和整风两个层面推进的。这种“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而贬低脑力劳动的价值。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执政党片面地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其实质并非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要迫使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干部阶层把劳动作为苦修手段，对照执政党钦定的道德体系，在灵魂的自我审查中放弃“五四”以来“左翼”知识分子中已经形成的独立与质疑的传统，选择追随与效忠，完成一元化改造。

在这一点上，福柯在解析监禁中的劳动惩罚时的观点，最为一针见血：“劳动是形成秩序与规则性的原则，发挥着让人们懂得权力的威严的作用”<sup>[14]</sup>。

从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通过生产为形式的规训，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对农民的高度组织和严密控制，这是几千年来来的掌权者均未能成就之“大业”；同样也是通过生产为形式的规训，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与整风运动并行的“生产—整风”双重规训，在延安时期完成了干部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

如果说在战时阶段上述措施尚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后来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军事化改造和建设，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的一部分，这些因素被视为“延安道路”的成功经验，在日益激进的政策中被放大和累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它罔顾人的差别，轻视人的尊严，人为区隔和制造敌人并进行无情打击，鼓励不惜代价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就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运动中的境遇而言，体力劳动正是国家权力借以贯彻其至高无上的旨意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将人异化为达到既定政治目标的生产工具<sup>[15]</sup>。

在此有必要提醒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施拉姆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思想已经内含在“毛泽东的经济学”的早期理论之中的观点是“太片面了”<sup>[16]</sup>。但是，如笔者在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的研究中已经阐述的，这种观点并非缺乏论据支持的武断结论。同时，更加关键的是，对毛泽东时代乃至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它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经济生产异化为驯服民众的手段，与思想改造始终同步进行，并进而全面控制民众的社会生活。



哈耶克曾经引述希莱尔·贝洛克的话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sup>[17]</sup>”在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中，必须关注的是，“延安道路”或曰“延安精神”，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不限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而同样体现于大生产运动诸多“形而下”的具体生产政策和措施之中。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比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影响来得浅淡。

在某个意义上说，如同别尔嘉耶夫在70年前就已经指出的——“正是手段和途径见证着人们所渗透的精神。<sup>[18]</sup>”我们今天也许已经在思想上认识到强调“大一统”的威权意识形态的危险所在，也对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所进行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个人崇拜塑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体，无论是否有所反思，人们往往在实际的工作中却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威权意识形态的手段和途径。个人之见，习焉不察，恰恰是因为对“形而下”的手段和途径所形塑的社会记忆的深远影响缺乏反省的结果。比如，在乡村普遍推行的许多做法，如包括南泥湾镇在内的中国农村为进行新农村建设而普遍建立的“示范村”等，可能就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由此看来，经由社会记忆的路径重新理解和思考上述“手段与途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价值。

综上所述，本书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大生产运动进行基于话语文本的“再发现”，从紧急政治动员、政治合法性资源和社会规训手段三个方面对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社会记忆建构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从运用社会记忆的理论框架及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国家权力因应需要而操纵社会记忆以塑造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典型个案。

以“南泥湾精神”为核心的大生产记忆，在数十年里被逐渐形塑为罗兰·巴特所指的“含有各种意象和信仰的神话系统”<sup>[19]</sup>。这种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织的人工之物<sup>[20]</sup>”，其间充斥的政治象征符号与其伴随的社会记忆，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今天想要回忆起那些荒诞年代时，即使想要诉说的是它所带来的黑暗和苦难，却在不知不觉中哼唱着权力所有者刻意制造的激越昂扬的音符。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sars.com》中准确地表述了这样的感受：“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

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sup>[21]</sup>”

另一方面，如同本研究在深度访谈的内容中所揭示的，即使是在国家权力话语占有绝对优势的南泥湾地区，这段社会记忆之中秉权者不愿提及的某些段落，虽然曾经，也正在不断被改写和抹去，同样也在被反复唤起和争夺。“过去不会自动保存于记忆，它要被说出来才能成为记忆。<sup>[22]</sup>”应该看到，民间的声音有如刘亚秋所言“记忆的微光<sup>[23]</sup>”，尽管非常弱小，但却从不曾被扼杀，并“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sup>[24]</sup>。可以想见，未来，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社会记忆，如同有关其他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的政治争夺，还会不断继续。

最后，我想再次引用景军《神堂记忆》中的一段引述来结束本书的写作，同时也借此表达对在社会记忆的研究道路上诸多前行者的敬意：“历史是对记忆进行社会规范的制度。那些能够对规范集体记忆的方法进行控制的人，可以指导未来历史的走向。政治策略中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之一，就是通过重写国家的历史重构国人的记忆。<sup>[25]</sup>”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通过大生产运动的个案对“记忆的政治”的话语解读，显而易见地，只是这个庞大课题的冰山一角。

## 注 释

- [1] Lipsitz, George. *Time Passages: 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5. 转引自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38 页。
- [2]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 年第 3 期。
- [3] 王汉生，刘亚秋前揭书。
- [4] 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2 页。
- [5] 前揭书，第 133 页。
- [6]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1 页。
- [7]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2 页。
- [8]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 页。
- [9] 这一部分前人有专门而深入的著述，本文因篇幅所限，因而较少涉及。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陈永发：

《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1990年版。

- [10] 曹树基：《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11] 卢西恩·比安科和田中忠夫等学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研究表明，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阶级斗争。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自己的负担。笔者认为，使农民高度组织化，同时从农民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得财政收入，中国共产党的规训手法是特别值得强调和研究的。转引自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 [1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3页，第183—188页。
- [13]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和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 [14] 樱井哲夫：《福柯：知识与权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 [15]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把人和制度都看作是具有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标”。参见前揭斯图尔特·R·施拉姆书，第157页。
- [16] 但他没有提及有哪些研究在这方面走向了片面的结论。参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
- [17] 哈耶克前揭书，第87页。
- [18] 别尔嘉耶夫前揭书，第229页。
- [19]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 [20]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 [21] 胡发云：《如焉@sars.co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 [22] Huysen. Andreas,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3.
- [23]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 [24] 前揭书。
- [25] B. 斯沃茨，转引自景军：《神堂记忆》，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7-12-20/4130.html>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部分

### 【史料·档案·方志】

- [1] 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 党史研究资料(第6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2] 湖南省档案馆编. 林伯渠日记.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3] 甘泉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 甘泉县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4]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5]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安吴古堡的钟声: 安吴青训班史料集.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6] 任勇. 南泥湾.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8]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9]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10]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 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1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6
- [12]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8
- [13] 史志诚主编.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14]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 [15] 谢觉哉. 谢觉哉日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7] 薛幸福主编. 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 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 1990
- [18]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 延安大生产运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 [19] 延安农村调查团.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20] 张明胜编. 延安博苑(第二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21] 张明胜主编. 延安革命纪念馆50年(1950-2000). 内部资料2000
- [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党史资料通讯
- [23]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四川党史研究资料.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内部资料

-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延安文史资料. 内部资料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韩延龙 常兆儒 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 延安文萃.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27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30]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3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 1992
- [3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 1994
- [33] 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1994
- [34]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3 (1941-194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论文及论文集】

- [35] 安波.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造新音乐—谈对大歌舞《东方红》音乐剧作的体会. 人民音乐, 1964 (10、11)
- [36] 曹树基. 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1)
- [37] 曹树基. 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 [38] 陈力丹. 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 新闻学刊, 1988 (4)
- [39] 陈履生、廖羽. 林岗与《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中国美术馆, 2006 (2)
- [40] 陈启能. 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2)
- [41] 陈爽. 前奏、间奏与余响: 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书城, 2009-10
- [42] 陈舜卿. 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 (3)
- [43] 陈思和. 民间的浮沉: 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 上海文学, 1994 (1)
- [44] 陈向明. 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 载大卫·费特曼《民族志: 步步深入》.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45] 陈旭清. 心灵的记忆: 苦难与抗争——山西抗战口述史.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46] 陈亚丁. 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 人民音乐, 1964 (2)
- [47] 陈颖鸿.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星鸟, 第20期, 2003 (10)
- [48] 陈永发.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新史学, 一卷第四期
- [49] 陈志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 社会科学家, 2003 (6)
- [50] 陈志杰、刘远柱.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经营中的几个问题.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2001 (4)
- [51] 樊明方、胡雅各. 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1)
- [52] 弗朗西斯科·德利奇. 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 陈源译. 第欧根尼, 2006 (2)
- [53] 高华.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社会科学论坛, 2006 (8)

- [54] 龚明德. 改“吴满有”为“刘玉厚”. 出版史料, 2006 (4)
- [55] 郭庆光. 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从“沉默的螺旋”假说谈起.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 (3)
- [56] 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 陕北骠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4)
- [57] 贺永泰. “人民政府”名称的提出和确立. 党史文苑 (纪实版), 2009 (2)
- [58] 黄道炫. 逃跑与回流: 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社会科学研究, 2005 (6)
- [59] 黄兴涛. 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4)
- [60] 黄正林.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研究, 2001 (3)
- [61] 黄正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中国农史, 2004 (4)
- [62] 黄正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 抗日战争研究, 2005 (5)
- [63] 贾康、赵云旗. 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 预算管理会计, 2005 (8)
- [64] 金观涛、刘青峰. “科举”和“科学”: 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科学文化评论, 第2卷第3期 (2005)
- [65] 金辉.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社会, 1993 (Z2)
- [66] 金辉. 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方法, 1998 (3)
- [67] 景军. 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5年秋季卷
- [68] 景跃进. 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 江苏社会科学, 1999 (6)
- [69] 李成瑞.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中共党史研究, 1997 (2)
- [70] 李放春. 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黄宗智主编. 中国乡村研究, 第三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71] 李放春、李猛. 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 社会理论论坛, 1997 (1)
- [72] 李红英. 秧歌剧《兄妹开荒》对旧秧歌形式的利用与改造. 作家·下半月, 2009 (8)
- [73] 李锐.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炎黄春秋, 1994 (4)
- [74] 刘娅. 目标、手段、自主需要——人民公社制度兴衰的思考.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 (1)
- [75] 刘亚秋. “青春无悔”: 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社会学研究, 2003 (2)
- [76] 李向平. “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南风窗, 2009 (6)
- [77] 罗燕明. 90年代海外延安研究述评. 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 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论文集. 483页,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 [78] 路伟东. 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历史地理, 2003 (19)
- [79] 马敏. 政治象征: 作为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功能. 探索与争鸣, 2004 (2)
- [80] 毛岸青、邵华.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人民文学, 1977 (9)
- [81] 孟庆延. 南泥湾三调.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 2007
- [82] 米歇尔·福柯. 话语的秩序, 载许宝强、袁伟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83] 牧人.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地区盐务. 盐业史研究, 2005 (3)
- [84] 牛淑萍. 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党史文汇, 1999 (2)
- [85] 秦燕. 陕甘宁边区时期农业开发政策的环境效应. 开发研究, 2006 (4)

- [86] 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 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论文集,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 [87]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朱德毛泽东延安种菜记. 当代陕西, 2011 (1)
- [88] 孙琦. 关于八路军编成人数问题. 军事历史研究, 1995 (4)
- [89] 孙晓忠. 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 文学评论, 2010 (4)
- [90] 孙晓忠. 改造说书人——1944年改造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 文学评论, 2008 (3)
- [91] 王汉生, 刘亚秋.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社会, 2006 (3)
- [92] 王光荣. 穆青与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 人物春秋, 2001 (1)
- [93] 王铁群. 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炎黄春秋, 2007 (10)
- [94] 王中义, 洪文军. 善于抓住第一个——穆青采访赵占魁的经验. 新闻三昧, 2004 (3)
- [95] 吴永.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9)
- [96] 谢立中. 话语或权力: 福柯前后期话语分析理论之间的矛盾. 载邱正《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8-长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97] 薛鑫良. 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 学习月刊, 2009 (9)
- [98] 徐贲. 变化中的文革记忆. 二十一世纪评论, 2006 (2)
- [99] 许良. 陕北秧歌沿革的文化意蕴.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 (1)
- [100] 杨念群.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01] 杨正国. 毛泽东与友人乐天宇. 党史纵览, 2004 (9)
- [102] 耶尔恩·吕森. 危机、创伤与认同. 中国学术, 2002 (1)
- [103] 叶晓军. 历史时期西北城市的发展规律与特点.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5 (2)
- [104] 袁光锋. 榜样制造、政治动员与社会记忆——以雷锋符号的媒体生产、传播与公众认同为例.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105] 袁文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剿匪政策及其特点, 载《中国现代史学会30周年庆典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106] 于松晶、薛薇. 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管理. 历史档案, 1999 (1)
- [107] 张静. 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 湘潭: 湖南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108] 张水良.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赵占魁运动. 人文杂志, 1981 (5)
- [109] 周晓虹. 认同理论: 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 社会科学, 2008 (4)
- [110] 朱鸿召. 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 炎黄春秋, 2001 (12)

## 【论著】

- [111] 埃德加·斯诺. 斯诺文集(2)·红星照耀中国.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112] 阿利埃斯·杜比. 私人生活史.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9

- [113] 艾青. 艾青选集(第三卷).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 [114] 安格爾·梅麗. 诉讼的话语: 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15] 奥托·布莱恩. 中国纪事.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116]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17]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18] 贝特兰. 华北前线.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11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3
- [120] 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奴役和自由.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 [121] 柏克.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7
- [122] 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 [123] 陈大斌.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 [124] 陈建华.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25] 陈晋.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126] 陈晓卿、李继峰、朱乐贤著. 一个时代的侧影: 中国1931-1945.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
- [127] 陈永发. 延安的阴影.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
- [128] 川崎修. 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 [129]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130] 戴维·米勒等主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 [131] 丹尼斯·K. 姆贝. 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 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32] D. 包瑞德.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 [133] 迪迪埃·埃里蓬. 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34] 邓小平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35] 丁淦林等. 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136] 杜霞. 翻身道情——解放区小说主题叙事研究.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137]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 [138]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39] 恩斯特·卡西尔. 国家的神话.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 [140] 恩斯特·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141] 范·戴克. 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42] 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43] 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44]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145]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 记忆: 一个试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146] 甘惜分主编. 新闻学大辞典.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147] 高彬编. 延安文艺丛书 第七卷 秧歌剧卷.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 [148]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 [149]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150]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51] 哈罗德·D. 拉斯韦尔.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52] 汉娜·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153]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 [154]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55] 贺龙传编写组. 贺龙军事文选.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156] 亨廷顿. 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157] 何维忠. 南泥湾屯垦记.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 [158] 侯建新.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59] 黄修荣编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160] 黄正林.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61] 黄正林.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 (1937—1945).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62] 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63] 胡春阳. 话语分析: 传播研究的新路径.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164] 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2
- [165] 胡绩伟. 青春岁月.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166] 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等编. 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 [167]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68] 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169] 勒华·拉杜里. 蒙塔尤.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70] 雷云峰. 陕甘宁边区史 (抗日战争时期, 中下篇),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3
- [171] 梁启超全集.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72] 李建国.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 [173] 李锐论说文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74] 李智勇. 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75]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 1900—1937).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176] 刘建明. 现代新闻理论.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177]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78]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179] 刘少奇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80] 李泽厚. 世纪新梦.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181] 罗平汉. 天堂实验: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 [182] 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18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84] 贾芝主编. 延河儿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85] 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 [186] 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 [187] 迈克尔·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188] 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89] 马克·塞尔登著. 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90]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91] 毛泽东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92] 毛泽东选集.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 1948
- [193] 毛泽东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94] 毛泽东著作选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95]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196] 毛泽东选集(卷五). 哈尔滨: 东北书店, 1948
- [197]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98]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199]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200]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20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0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03] 莫里斯·迈斯纳.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0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05] 乔治埃利亚、萨尔法蒂. 话语分析基础知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 [206] 任宏、高梅主编. 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5
- [207] 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208] 三岛宪一. 本雅明: 破坏·收集·记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09] 斯图尔特·R·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10] 史志诚主编.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211] 孙江. 事件·记忆·叙述.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212] 孙新园、高德周编. 延安岁月——延安革命时期美术活动回忆录.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

- 版社, 1985
- [213] 唐小兵.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 [214] 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15] 托马斯·阿瑟·毕森. 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 沈阳: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0
- [216] 托马斯·伯恩斯坦. 上山下乡: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2
- [217] 王海平、张军峰主编. 回想延安-1942.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 [218] 王海洲. 合法性的争夺: 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219] 王家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220]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97
- [221] 王首道. 王首道文集.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 [222] 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7
- [223] 王炎. 奥斯维辛之后: 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224] 韦君宜. 思痛录.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225]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 丁玲自传.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226] 许宝强、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27] 许子东.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228] 徐懋庸. 徐懋庸回忆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229] 杨念群.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230] 杨念群.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231] 杨伟名. 一叶知秋: 杨伟名文存.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4
- [232] 燕继荣. 政治学 15 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33] 严艳.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 (1937 - 1950).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34] 樱井哲夫. 福柯: 知识与权力.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35] 宇文所安. 追忆: 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236] 詹姆斯·R. 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 中国政治.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 [237] 张凤阳等. 政治哲学关键词.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238] 张素华.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 [239]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 [240] 张正明. 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241] 赵超构. 延安一月.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 [242] 赵毅衡. 礼教下延之后: 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24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陈云文选 (1926 - 1949 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24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 任弼时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2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回忆朱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2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2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2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249]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政策汇编.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9
- [2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 (中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251]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52] 周扬. 周扬文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253] 朱鸿召.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7
- [254] 朱鸿召编选. 王实味文存.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报刊、杂志】

- [255] 《解放日报》(延安)
- [256] 《红色中华》(延安)
- [257] 《新中华报》(延安)
- [258] 《共产党人》(延安, 1939 - 1941)
- [259] 《人民日报》(1946 ~ )
- [260] 《大公报》(重庆)
- [261] 《红旗》
- [262] 《中国工人》(延安)

## 【历史故事集、小说与其他文艺作品】

- [263] 奥威尔. 一九八四.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264] 胡发云. 如焉@ SARS. come.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6
- [265] 刘白羽. 刘白羽散文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 [266] 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编. 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送审稿) 延安大学印刷厂印, 1977
- [267]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编. 毛泽东在延安的故事.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 [268] 毛主席在陕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 [269] 穆义. 模范党员申长林的故事. 北京: 新华书店
- [270] 王尊三. 吴满有鼓词. 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 1946
- [271] 韦君宜. 露沙的路. 载《思痛录》,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网络文献】

- [272] 重庆卫视:《追寻中国红——南泥湾精神代代相传》[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3ODU00DA0.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3ODU00DA0.html)
- [273] 崔月德 王峰存:《陕北民歌作者、歌唱者初考》,中国大陕北网,[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410/18/90591\\_3086021.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410/18/90591_3086021.html)
- [274] 高雷 王倩:《专访南泥湾镇党委书记钱光亮:南泥湾的明天会更好》,人民网,2007年9月29日。<http://e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101558/101560/6331819.html>
- [275] 景军:《神堂记忆》,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07-12-20/4130.html>
- [276] 廉静:《百位文艺家口述实录:我们的演艺生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20/id\\_XNTI1NTY=.html](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1/20/id_XNTI1NTY=.html)
- [277] 刘烽:《答记者问之五:东方红的创作情况》,征引自搜狐网:<http://liufeng1928.blog.sohu.com/55901712.html>
- [278] 刘晶:《“陕北好江南—南泥湾”景区项目奠基仪式隆重举行》,延安政府网,2010年10月27日。[http://www.yanan.gov.cn/structure/xwzx/zwyw/zw\\_27819\\_1.htm](http://www.yanan.gov.cn/structure/xwzx/zwyw/zw_27819_1.htm)
- [279] 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美)《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72期),转引自<http://www.usc.cuhk.edu.hk/wk.asp>
- [280] 《卫生部调查称全国4成患者无钱看病3成因病致贫》,网易网:<http://news.163.com/41123/7/15RT3NDG0001124T.html>
- [281] 《吴满有“叛敌”之谜》:新浪网<http://you.video.sina.com.cn/b/18144214-1349012454.html>
- [282] 《延安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开展纪念党的生日活动》,[http://www.sxny.gov.cn/html/2009\\_07\\_09/2\\_1847\\_2009\\_07\\_09\\_125140.html](http://www.sxny.gov.cn/html/2009_07_09/2_1847_2009_07_09_125140.html)
- [283] 杨和亭:《红日照陕北》,西安: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1996。转引自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051c601000e3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051c601000e38.html)
- [284] 曾德强:《我在南泥湾纺线线》,<http://rd.ankang.gov.cn/Article/Class17/200608/174.html>
- [285] 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自哈布瓦奇以来》,<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lilun/2007-04-23/1539.html>

## 二、外文文献部分

- [286]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87] Charles Frankel,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Symbols*, Lyman Bryson,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New York: Harper, 1954.
- [288] Hanson Allan,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1, No. 4 (Dec., 1989).
- [289] Huyssen Andreas,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290] Nolle – Neumann, E. ,The Spiral of Silence;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1974, p. 24.
- [291] Pohlandt – McCormick Helena,“I saw a nightmare – ”:vio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9 ,No. 4( Dec. ,2000).
- [292] Pauline Keating,The Ecology of the Yan’an Way,*The Australian Journal* ,No. 13( Aug. ,2009).
- [293] Pauline Keating,*Two Revolution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 1934 – 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94] Rosaldo Renato,Doing Oral History,*Social Analysis* 4( 1980).
- [295] Schwartz B. ,Memory as a Culture System;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Oct. ,1996).
- [296] Schwartz B.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2( Apr. ,1991).

## 后 记

《记忆的政治》基于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它完成的那一刻：2011年10月18日深夜——更准确地说，是19日凌晨5时。此时，距离我决定以“大生产运动”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因此，当我在沉沉夜色中落笔写下30余万字的最后一个段落，与其说感到了行至终点的兴奋，毋宁说，百感交集。5年来，一个人跋涉在陕北乡村旷野里的时刻，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独自面对那些发黄史料档案的时刻，我内心时常深深怀疑，是否选择了一个超出我驾驭能力的选题，是否应该放弃似乎永无止境又罕有收获的资料搜索，是否应该尽快结束对一个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漫长追问？

现在看来，5年的时光是值得付出的，虽然学海无涯而学力有限，由于个人知识结构的欠缺，论文毫无疑问存在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庆幸学习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也努力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目前力所能及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这段追问的过程，也是在对史料的艰难搜索和独立思考中思想得以成长的历程。

为了阅读的流畅，本文在出版时对结构略有调整。在后记中，我想，首先应该简要交待一下研究的方法设计与操作过程。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史料的搜集是研究的关键。5年中，我搜集了与此选题密切相关的大量史料，对大生产运动历史背景的厘清、其政治议题的提出及神圣性赋义过程的考察、对记忆核心代码的形成过程的解

读、对三五九旅等几个模范形塑过程的研究、对建国后三个大生产记忆相关话语高峰期的分析等，均有赖于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搜集和追溯。

鉴于一手资料对于确认这个题目价值的重要性，研究者首先在延安和陕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安着手进行原始文献的搜集。在走访了延安大学中共党史资料中心、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延安市档案馆、延安市中山图书馆之后，我查阅和搜集到了大量丰富全面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其中包括《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中国工人》等报刊的合订复印本、从18世纪开始的陕西延安地方志、延安自然和社会概况介绍、延安时期大量的相关专著和回忆录以及有关大生产运动的一些研究文章。

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其图书馆藏丰富，就国内的藏书水准而言已可算名列前茅，此外，南京大学历史系也是民国研究的重镇。我在本校通过数据库寻找到了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绝大部分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并且查找到了相当重要的一些研究专著。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台湾大学的图书馆内，我找到了一些少见的、陕甘宁边区部分县府的地方志、年鉴，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外专著和中文期刊及报纸。

另一些在前述几地未能寻找到的著述，则借力于师生友人的帮助，自北京等地的高校图书馆及海外高校的图书资源中获得。

笔者注意到，历史文献研究法更多适用于纸质文本的研究，而鉴于图书报纸及档案等所受的严密管制，它们更多呈现的是权力掌控下的话语；而在对民间记忆的研究中，历史文献研究法时时力有不逮，田野调查的研究则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田野调查中无结构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搜集的民间资料，可与官方话语进行比对，考察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并进而寻找其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内在理路。因此，这两种研究方法被我运用于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对比分析。

在南泥湾地区，我先后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时间分别为2006年5月、2008年4~5月、2011年4月、2011年7~8月。其中第一次即2006年5月的这次研究，由我和我所带领的14人研究小组共同进行。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研究小组访问了南泥湾当地的家庭，在当年三五九旅所开垦的土地上和农民们聊天，到因为开荒而变成荒山秃岭的小山上察看水土流失的情况；研究小组也进入到镇上最为豪华的建筑——乡



镇的办公楼内和官员对话。官员们提供了近年来关于南泥湾的发展思路等系列文件，介绍了这个地方的变化。这可以作为历时研究非常有价值的对比资料。

我和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的两位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该展览馆一共四位工作人员），他们向我详尽地介绍了这个纪念馆的历史以及目前展览布展的思路及其珍贵展品的来历。征得他们的同意，我拍摄了他们的一些文件。

四次调查中共计进行了约 500 小时的入户访问，这些访问为我增加了大量生动的一手资料。按照学术规范，我将这些访谈资料的录音整理后进行了化名处理。鉴于现场访问和回忆口述有限的可靠性，我将其与公开的文献、资料进行对照，以筛选出较为可靠的资料。这部分的内容主要用在了第七章，即对南泥湾当地大生产记忆建构过程的相关考察中。此外，在第六章也有少量涉及。

第三种方法是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对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理解和解释方面，话语分析被视为较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其有效性也为诸多研究成果所验证。本研究中，它贯穿于对大生产记忆核心语义代码形成过程及对模范的塑造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不同阶段大生产记忆建构过程的考察之中。笔者试图以此来说明执政党是如何利用话语权力进行政治动员和建构社会记忆的。

在这个部分，研究者对前述搜集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文本细读。基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建立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这一部分具体的研究内容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话语对象与话语主体；②话语主题及其逻辑；③话语阐述模式；④社会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话语分析方法对文本的解读本身就暗含有内在封闭性的倾向，而本研究则更希望将其置于动态的、多层次多结构的历史网络中进行考察，因此，本文对不同时期呈现于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诸多载体中的话语分析，也结合了大量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考察，力图深入透视话语生产的背景与影响。

第四种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法。在对大生产运动模范的塑造过程的研究中，笔者对代表工、农、兵三个群体的三个模范赵占魁、吴满有和三五九旅进行了个案研究。我尝试通过这三个典型个案的相关社会记忆重构过程的追溯，分析执政党是如何运用话语权力，向民众输送其价值

观念与政治诉求的过程。

第五种方法是频数分析。研究者使用“大生产运动”的核心话语“南泥湾”为关键词，对国家话语的代表——1946年发刊以来的《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上出现的有关文章进行数据搜索，利用频数分析的方法，描绘出其间“南泥湾”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高峰期，然后对这些时段内所有的相关文章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南泥湾精神”和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流变，以较为准确和清晰地描述官方如何在不同时间阶段进行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在这部专著最终得以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您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自由的学术精神，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我永远无法忘怀那天清晨见到您深夜发来的近万字修改意见时的感受——作为一名学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动；而作为一个年轻老师，我也从这篇长文中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大学精神”。感谢您在我拖沓的博士学业里给予我的细致指导和无限耐心，让我得以度过研究和写作的瓶颈；我同样深深感激您在人生道路上给我的指点——“正”与“善”，是的，点点滴滴，我都记得。

我也要深深感谢我攻读硕士生时的导师丁柏铨教授，作为新闻传播学院的前辈，从我起步之时起您就一直鼓励和扶持我，让我有机会在更广阔的学术天空里去学习和思考。

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Perry 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主任 Spakowski 教授对我的指点和鼓励，作为一个贸然从新闻学跨界到社会学、历史学领域的新手，你们两位的点评对我而言有着莫大的意义，这是我跨界坚持的动力所在。同样，我也要感谢燕京学社的学术主任助理李若虹博士，您对于日常生活视角的精彩点评给我接下来的持续研究打开了另一种可能。

感谢张玉林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诸多中肯建议，感谢翟学伟教授、陈友华教授、彭华民教授、范可教授、贺晓星教授在预答辩中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指点；感谢答辩委员会张文宏教授、刘林平教授、翟学伟教授、风笑天教授、彭华民教授的直言不讳而勉励有加。我还要深深感谢南大社会学院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众多师长——作为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年轻学人，在社会学院所得到的教益将使我受益终生。

感谢钱钢教授、展江教授在我最初确定选题之时给我的启发，以及李永刚教授自始至终细致入微的帮助；感谢陈力丹教授、吴重庆教授、刘鹏主编、闻小波教授、孙江教授、陈蕴茜教授等多位学者在写作过程中和后期出版过程中对研究的肯定；也借此机会感谢张洁、胡劲草等新闻界的诸多新老朋友——新闻人对中国议题的现实关怀始终是我出发去追溯这些往事的动力所在。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感谢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在中大的短暂驻留里，你们对选题价值的判断及给我的指点和鼓励，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想，接受过你们鼓励的后辈一定很多，你们不一定都记得，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激。

我也要感谢台湾政治大学思源出版社因此一研究颁给我“思源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使我借此机会认识了其他优秀的获奖青年学者。

深深感谢在西安、延安和北京向我提供诸多原始资料的每一位长者、老师、同学，请原谅我出于多虑在此不一一列出你们的名字，也请相信我永远内心感激。接受我访问的老人们，他们中有人已经去世，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我想说，你们在窑洞里打破的缄默，让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得以重现，成为这段社会记忆中最嘹亮的弱音。

感谢2006年和我一同带队前往延安的钟鑫老师，以及社会学院、新闻学院亲爱的孩子们：葛丽莎、李磊、孟庆延、钱力成、秦锐、黄榕、吴芳、夏鑫、薛莹、徐翔、姚雪青、曾航，我永远记得你们在高天厚土下奔走于陕北乡村的剪影，也永远记得你们和我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特别要感谢为我录入数据、查找资料或提供翻译建议的梁靖雯、王卫、高敏、黄淑贞、李赫然、黄榕、薛莹、赵延蕾、刘航、张翔、史迁、程远州、李靖姝、杨佳秋等多位同学，以及将自己的同类题材论文慷慨提供给我作为参考的袁光锋和孟庆延同学——你们的才华对我是压力也是动力。事实上，5年里给我提供帮助的同学实在是太多了，感谢你们。

感谢我最好的朋友江雪和李论，倾盖如故，你们的深厚情谊和无私帮助是我在大西北能够顺利完成田野调查和后期写作的关键。

我想深深地向我的所有家人致谢。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

一艰苦的工作。外子骏飞与我之间的热烈讨论，以及在研究方法上对我的启发，对我完成这一研究的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是你们在我人生最艰困的一个阶段里，毫无怨言地陪伴和扶持我。年至不惑，我深深体会到，是你们，以言传与身教，告诉我人生中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品质：真诚，与勇气。

周海燕，2013年夏于南京大学